

自动翻译成中文.

原始版本

: http://pos.eicos.psicologia.ufrj.br/wp-content/uploads/2020_Tese_Doutorado_Leonardo_Viana.pdf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RIO DE JANEIRO

哲学与人文科学中心

心理学研究所

莱昂纳多·维亚纳

顾问

米尔顿·菲尔兹

阿戈拉：在对远程教育的偏见背景下，重新审视社会表现。

里约热内卢

2020

莱昂纳多·戈尼亚维斯·维亚纳

阿戈拉：在对远程教育的偏见背景下，重新审视社会表现。

向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心理学研究所-
UFRJ社区和社会生态学社会学研究生项目-
EICOS) 提交博士论文，在巴塞罗那大学-
UAB (西班牙) 获得博士学位所需的部分在
国外获得三明治博士学位。

方向：米尔顿·努内斯·坎波斯教授。

里约热内卢

2020

CIP - 出版编目

Gv614 莱昂纳多·维亚纳

?

阿戈拉：在对远程教育/莱昂纳多·戈尼亚维斯·维亚纳的偏见的背景下，重新审视社会表现。
--里约热内卢，2020年。

302 f.

顾问：米尔顿·努内斯·坎波斯。

论文（博士） -

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心理学研究所，社区心理社会学和社会生态学研究生课程，2020年。

1. 社会代表。2. 偏见。3. 远程教育。4. EAD.5. 阿戈拉。我. 努内斯坎波斯, 米尔顿, 东方。二、标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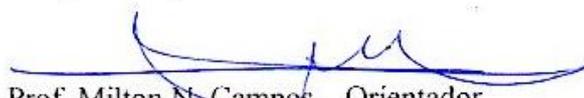
FOLHA DE APROVAÇÃO

TÍTULO: ÁGORA: UM NOVO OLHAR SOBRE REPRESENTAÇÕES
SOCIAIS NO CONTEXTO DE PRECONCEITOS CONTRA A EDUCAÇÃO
À DISTÂNCIA.

Leonardo Gonçalves Viana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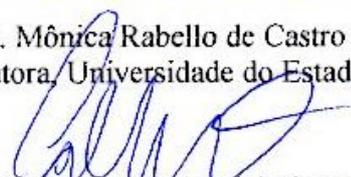
Tese submetida ao Corpo Docente do Instituto de Psicologia da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Rio de Janeiro - UFRJ, como parte dos requisitos
necessários à obtenção do grau de Dou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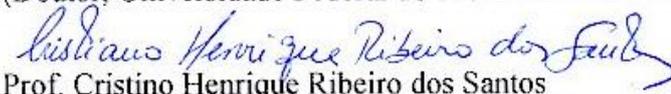
Aprovada por:


Prof. Milton N. Campos – Orientador
(Doutor,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Rio de Janeiro - UFRJ)


Prof. Ibis M. Alvarez Valdivia
(Doutora,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Barcelona - U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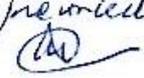

Prof. Mônica Rabello de Castro
(Doutora, Universidade do Estado do Rio de Janeiro - UERJ)


Prof. Carlos Eduardo Bielschowsky
(Doutor,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Rio de Janeiro - UFRJ)


Prof. Cristino Henrique Ribeiro dos Santos
(Doutor,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Rio de Janeiro - UFRJ)

Rio de Janeiro

2020

Título alterado a pedido da banca: "Ágora, um novo
olhar sobre representações sociais no contexto de preconceitos
contra a educação à distância". Março 2020 

谢谢

要不是你的勇气、勇气、鼓励，尤其是你的感情，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我把这篇文献给了她，我妈妈。她愿意改变一切和每个人，她一直是她周围的人的镜子。谢谢你所做的一切。。。并帮助我成为我。

世界很大，她知道这一点。它展示了一个女人在简单的微笑中所能拥有的所有力量和智慧。我们一起踏上了博士之路，继续成长和奋斗。我感谢我亲爱的新娘法比安·普罗巴我越来越站在你这边，感谢你的光和力量。

在世界所能提供的所有可能性和可能性中，我陷入了命运和好运的恩典中，这给我的家人带来了好运。被命运所团结，被爱所束缚，谢谢大家!!!贝托，瓦尼尔达，弗雷德，尼尼夫，罗伯塔，库尔蒂尼奥，塞缪尔（卡卡），佩德里尼奥，保利尼奥（我的教子），拉克尔，伊莎，库尔特和我的父母。

对我的主人米尔顿·坎波斯，他一直不仅仅是一个导师。你的能力和智慧激励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他是那些不追求职业的人之一，是的，他过着辉煌的职业。谢谢你指导这项工作和我的博士学位。他的智慧显示了一个只有真正的圣人才能拥有的方面：人性。非常感谢。

阿比斯·瓦尔维迪亚在巴塞罗那大学和乌乌纳格兰梅斯特拉·米·德萨罗洛大学
马卡斯 y 多阿斯格拉西亚斯自始至终。!富乌纳帕萨达[西班牙]

格拉西亚斯·卡特卢尼亚，格拉西亚斯·巴塞罗那，格拉西亚斯·埃斯帕尼亚。图·图·波布拉西翁的儿子乌纳·英斯皮拉西翁。我在角落里[西班牙]

巴塞罗那奥托诺马大学 - 阿波斯塔骨盆圆锥体 i la 创新。 [加泰罗尼亚 - 加泰罗尼亚]

对于我一直在场的的朋友，即使有时很遥远，我知道每个人都写在这里，不仅在这项工作，而且在我的日常。

弗雷德·维亚纳，我的兄弟，他奇妙的帮助，在开发这个论文，他的计算机科学的的天赋和他的智慧来构建这项工作。非常感谢你的友谊和陪伴。

我特别感谢塞西耶基基金会的朋友们，感谢一些直接帮助这项研究的人：卡洛斯·爱德华多·比尔肖夫斯基教授，我的感激之情：法比奥·拉佩罗，在学术之旅中，对话和书籍总是弥足珍贵：维托里奥·洛比安科，为永远受欢迎的合作：埃斯特班·莫雷诺教授，他一直用他的智慧来创造和研究：和美妙的老师谁离开了我们的身体，亲爱的内西佩雷拉努内斯。致本机构通讯部的朋友们，卡梅姆·普恩特和莉迪亚·阿泽维多，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给UFRJ的克里斯蒂娜·黑格瑙尔教授，感谢EICOS项目的精彩接待。致Inter@ctiva研究小组的朋友：阿尔米尔·费尔南德斯、罗森盖拉·德·卡瓦略、艾琳·萨蒂安和特别的娜塔莉亚·朗菲尼，他们总是对每个人都很强大。

感谢秘书处的里卡多·费尔南德斯以及EICOS和UFRJ的所有教授，他们一直愿意提供帮助。

我不能不感谢在这部作品中激励我很多的各种科学的巨人：有着深刻而革命性的想象力——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热爱知识和科学传播——

法拉第和卡尔·萨根：并与精致的观察-

达尔文。更精彩的贡献：我们霍金的树皮：伽利略的异教徒;牛顿，麦克斯韦，特斯拉和费曼的智慧;创新的玛丽居里和所有的科学家和教师谁奉献了他们的一生知识。谢谢！

这项工作是在提高高等教育人员协调组织的支持下进行的 - 巴西 (CAPES) - 融资代码 001

"常识是世界上最好的分布方式：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拥有如此充足的财富，因此，即使是那些最难以满足自己需求的人，通常也不会比他们更渴望常识。因此，并不是每个人都错了：但是，相反，这表明判断和区分真与假的权力，这正是我们所说的常识或理性，本质上是人人平等的：因此，我们意见的多样性并不是因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合理，而只是因为我们以各种方式进行我们的思想。

勒内·笛卡尔

总结

该研究旨在通过差异化的眼光来研究以偏见为焦点的远程教育的社会表现，其中意识形态在自我中以世界形象为指导的人口分组中占据中心位置，并加以改变。对于从这个角度形成的企业集团，我们称之为"阿拉斯"。这一全景通过对42,000多名希望申请远程学习机构入学考试的人的研究进行了实证测试。作为数据提取的方法，使用了基于Bbric单词记忆技术（1994年）的调查问卷，其中邀请研究人员提到五个词，即合格的关于自我的远程教育——获得他们自己的陈述——并改变——

以抓住对方的陈述。在分析结果时，采用了坎波斯感官生态学理论（2017年），通过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相互作用来理解受试者世界图像的配置：和马尔科维的对话理论（2003），在自我改变对象的反射（EAD）

。这项研究是在里约热内卢州远程高等教育中心-

CEDERJ进行的。因此，有人强调，对教学距离模式的偏见主要是由于在陈述中出现消极，奇怪的是，这种消极情绪在改变中得到了证实，而不是在自我中得到了证实。阿戈拉方法及其各种配置为扩大对偏见的理解带来了可能性。

关键词： 社会表现， 偏见， 远程学习， 远程学习， 阿戈拉

抽象

研究的目的是研究社会表现，重点是远距离教育的偏见（EAD），其依据是意识形态以自我和自我改变中的世界形象为指导，以人口群体的中心地位为指导的不同观点。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称之为“阿戈拉斯”（“组合”，希腊语单词“Agora”）。通过对42,000多名远程学习机构入学考试的考生进行调查，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实证测试。关于数据提取方法，使用了一份基于Abrie的单词召唤技术（1994年）的调查问卷，其中要求答卷人提及五个词，这些词符合远程教育的条件，即自我——获得自己的代表权——以及改变——

以逮捕对方的陈述。为了分析结果，Campos采用了感官生态学理论（2017年），通过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来理解受试者的世界图像的配置：和马尔科维的对话理论（2003年），在自我的反射-改变-

对象相互作用（EAD）。这项研究是在里约热内卢州高等教育中心（CEDERJ）进行的。结果表明，对远程教学模式的偏见主要是由在陈述中出现的消极现象造成的，有趣的是，这种偏见在改变中得到了证实，而不是在自我中得到了证实。这种偏见及其各种结构为扩大对远程学习偏见的理解带来了可能性。

关键词：社会表现、偏见、远程学习、远程教育、电子学习、Agora

为了分析洛斯结果，我们采用了《坎波斯生态学》一书（2017年），《无自然与社会的相互影响》：马尔科韦对话组织（2003年），国际间自我-改变-物体（EAD）。里约热内卢埃斯塔多-塞雷迪埃中心高级迪斯塔西亚 CEDERJ。因此，塞德斯塔克·克·普雷朱西奥·康塞安扎是一个异质的埃斯塔巴组成校长波尔·拉·阿帕里西翁·德·内加蒂维达德斯在拉斯代表 que, 古罗萨门特，塞维塔龙在改变 y 没有恩埃尔自我。埃尔恩福克·奥戈拉和苏斯潜水员配置介绍杜杰龙·拉·普莱比利达·德洛斯·普雷朱西奥斯·阿普伦迪扎耶一个异质。为了分析洛斯结果，我们采用了《坎波斯生态学》一书（2017年），《无自然与社会的相互影响》：马尔科韦对话组织（2003年），国际间自我-改变-物体（EAD）。里约热内卢埃斯塔多-塞雷迪埃中心高级迪斯塔西亚 CEDERJ。因此，塞德斯塔克·克·普雷朱西奥·康塞安扎是一个异质的埃斯塔巴组成校长波尔·拉·阿帕里西翁·德·内加蒂维达德斯在拉斯代表 que, 古罗萨门特，塞维塔龙在改变 y 没有恩埃尔自我。埃尔恩福克·奥戈拉和苏斯潜水员配置介绍杜杰龙·拉·普莱比利达·德洛斯·普雷朱西奥斯·阿普伦迪扎耶一个异质。

帕拉布拉克拉夫：代表社会，前朱迪西奥斯，阿普伦迪扎耶一个疏远，Ead, 阿戈拉

数字列表

图 1 - 面对面和远程课程的年龄组 (%)	25
图 2 - EAD.....	25
图3 - 巴西与西班牙的尺寸	30
图4 - CEDERJ财团波兰人	33
图 5 - EGO、阿尔特和对象之间的对话 (EAO)	59
图 6 - 常识托布隆模型	60
图7 - 具有文化元素的模型	61
图8 - 社会表现研究的一些主要研究轴	63
图9- 中央核心和外围系统的特点	65
图 10 - 感官生态学 (CAMPOS, 2017)	67
图11 - 雅典阿戈拉	72
图 12 - EAO 关注 EGO	78
图13-EAO关注EGO对ALTER	80
图14- 观察汽车	81
图15 - 根据研究人员制定的标准划分人口。	87
图 16 - 根据巴兰	88
图 17 - 以集线器94 的形式形成.....	89
图18 - 阿戈拉斯	89
图19 - 不同组	89
图 20 - 第	90
图 21 - 阿戈拉在理解自我和改变	91

图 22 - 阿戈拉亲和力计划	92
图23 - 负阿戈拉感觉的生态学	166
图24 - 理论框架：感官生态学中的文学评论之题	212
图25-阿戈拉"互联网"在自我	223
图26-阿戈拉偏见在自我	223
图27-弱阿戈拉在改变和社会表现在自我	224
图28-在自我和社会表现的阿戈拉困难在改变	224
图29-阿戈拉机会在自我和社会表现在改变	225

框架列表

表1 - 远程教育的几代人	26
表 2- EAD 分类.....	26
表3 - 马塔尔的态度 (1997)	38
表4 -	42
表5 - 面对面教学的正面和负面方面	42
表 6 - 与 AEd 和中央核心的研究之间的比较 - 与 Aed 没有联系的人。	48
表7-与AEd和中央核的研究比较-参加距离模式	48
表8 - 分析解释过程的阶段	94
表9 - 数量	97
表 10 - EGO 和 ALTER 105 的	99
表 11 - 在 ALTER 和 EGO	100
表 12 - 在 ALTER 和 EGO	101
表 13 - ALTER	102
表14-在感官生态	102
表15 - EGO在感官生态学	103
表16 - 感官	106
表17 - 埃戈和阿尔特·埃戈斯 - 阿戈拉-阿戈拉·梅多	107
表 18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梅多	107
表 19 - 性 - 阿戈拉恐惧	108
表 20- 与 EAD 的经验 - 阿戈拉梅多.....	108
表21 - 市政地理分布 - 阿戈拉梅多	109
表22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梅多	110
表23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梅多	110

表 24 - EGO 和改变使命 - 阿戈拉 - 阿戈拉偏见	111
表 25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偏见	112
表 26 - 性 - 阿戈拉偏见	112
表 27 - 与 EAD 的经验 - 阿戈拉·普雷康西托	113
表28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普雷康西托	113
表29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普雷康西托	114
表30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普雷康西托	115
表31 - EGO和阿尔特召唤 - 弱阿戈拉-阿戈拉	115
表 32 - 年龄变化 - 弱阿戈拉	116
表 33 - 性别 - 弱阿戈拉	117
表 34 - 与 EAD 的经验 - 弱阿戈拉	117
表35-城市地理分布-弱阿戈拉	117
表36 - 区域地理分布 - 弱阿戈拉	118
表37 - 经济参与 - 弱阿戈拉	119
表 38 - 年龄变化 - 坏阿戈拉	120
表 39 - 性 - 坏阿戈拉	121
表40 - 与EAD的经验 - 坏阿戈拉	121
表41 - 城市地理分布 - 坏阿戈拉	122
表42 - 区域地理分布 - 坏阿戈拉	122
表43 - 经济参与 - 坏阿戈拉	123
表 44 - 埃戈和阿尔特·埃戈斯 - 阿戈拉 - 阿戈拉不信任	124
表45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不信任	124
表46 - 性 - 阿戈拉不信任	125
表47 - EAD经验 - 阿戈拉不信任	126

表48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不信任	126
表49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不信任	127
表50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不信任	128
表 51 - EGO 和阿尔特使命 - 阿戈拉 - 复杂的阿戈拉	128
表 52 - 年龄变化 - 复杂的阿戈拉	129
表 53 - 性别 - 复杂的阿戈拉	130
表 54 - 与 EAD 复杂阿戈拉	130
表55 - 城市地理分布 - 复杂的阿戈拉	131
表 56 - 区域的地理分布 - 复杂的阿戈拉	131
表57 - 经济参与 - 复杂的阿戈拉	132
表 58 - EGO 和改变使命 - 阿戈拉 - 阿戈拉怀疑	132
表 59 年龄变化 - 阿戈拉·达维达	133
表60-性-阿戈拉怀疑	134
表 61 - 与 EAD 的经验 - 阿戈拉·达维达	134
表 62 - 市政地理分布 - 阿戈拉·达维达	134
表 63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达维达	135
表64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达维达	136
表 65 - 埃戈和阿尔特召唤 - 阿戈拉 - 阿戈拉无知	136
表 66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无知	137
表 67 - 性 - 阿戈拉无知	137
表 68 - EAD 体验 - 未知阿戈拉	138
表 69 - 城市地理分布 - Agora 未知	139
表 70 - 区域的地理分布 - Agora 未知	139
表71 - 经济参与 - 未知的阿戈拉	140

表 72 - 埃戈和阿尔特召唤 - 阿戈拉 - 阿戈拉懒惰	141
表74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普雷吉尼亚	141
表 75 - 性 - 阿戈拉懒惰	141
表 76 - EAD 体验 - 懒惰	142
表77 - 市政地理分布 - 阿戈拉普雷吉尼亚	143
表78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普雷吉尼亚	144
表79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普雷吉尼亚	144
表 80 - EGO 和改变使命 - 阿戈拉 - 困难阿戈拉	145
表 81 - 年龄变化 - 困难阿戈拉	146
表 82 - 性 - 困难阿戈拉	147
表 83 - EAD 经验 - 困难的阿戈拉	147
表 84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迪菲西尔	148
表 85 - 区域的地理分布 - 困难的阿戈拉	149
表86 - 经济参与 - 困难阿戈拉	149
表 88 - EGO 和改变使命 - 阿戈拉 - 阿戈拉困难	150
表 89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困难	150
表90-性-阿戈拉困难	151
表 91 - 与 Aed 的经验 - 阿戈拉迪库尔达德	152
表92 - 市政地理分布 - 阿戈拉迪普尔达德	152
表93-区域地理分布-阿戈拉困难	153
表94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迪富尔达德	154
表 95 - EGO 和阿尔特召唤 - 阿戈拉 - 阿戈拉法西利达德	155

表96-年龄变化-阿戈拉设施.....	155
表97 - 性-阿戈拉设施.....	156
表 98 - EAD 体验 - 阿戈拉设施.....	156
表 100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法西斯利达德.....	157
表101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设施.....	158
表102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设施.....	158
表103-从文献.....	166
表104-根据我们对文献评论中感官生态学的解释而组织的可能社会表现的召唤.....	167
表105-文献中唤起的词语与我们研究中关于EGO和ALTER.....	168
表 106 - EGO 和改变使命 - 阿戈拉便利.....	169
表 107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便利.....	170
表 108 - 性 - 阿戈拉便利.....	171
表 109 - EAD 体验 - 阿戈拉便利.....	171
表110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便利.....	171
表111 - 区域地理分布 - Agora 便利.....	172
表112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便利.....	173
表 113 - EGO 和阿尔特电子职业 - 阿戈拉科斯特.....	173
表 114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成本.....	174
表 115 - 性 - 阿戈拉成本.....	175
表 117 - EAD -阿戈拉科斯特.....	175
表118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科斯特.....	176
表119 - 区域地理分布 - Agora 成本.....	176
表120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成本.....	177
表 121 - EGO 和阿尔特职业 - 阿戈拉纪律.....	177
表122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纪律.....	178

表 123 - 性 - 阿戈拉纪律	179
表124 - EAD经验 - 阿戈拉纪律	179
表125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学科	180
表126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学科	180
表127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纪律	181
表 129 - EGO 和阿尔特电子职业 - 阿戈拉经济	181
表 130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经济	182
表 131 - 性 - 阿戈拉经济	183
表 132 - 与 EAD 的经验 - 阿戈拉经济.....	183
表133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经济	184
表134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经济	184
表135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经济	185
表 136 - EGO 和阿尔特职业 - 阿戈拉灵活性	186
表137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灵活性	186
表 138 - 性别 - 阿戈拉灵活性	187
表 139 - EAD 体验 - 阿戈拉灵活性.....	187
表140 - 城市地理分布 - Agora 灵活性.....	188
表141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灵活性	189
表142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灵活性	189
表143 - EGO和阿尔特电子职业 - 阿戈拉互联网	190
表 144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互联网	191
表 145 - 性 - 阿戈拉互联网	192
表 146 - EAD 体验 - 阿戈拉互联网.....	192

表147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互联网	193
表148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互联网	193
表149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互联网	194
表 150 - EGO 和阿尔特职业 - 阿戈拉机会	195
表 151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机会	195
表 152 - 性 - 阿戈拉机会	196
表153 - EAD经验 - 阿戈拉机会	196
表154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机会	197
表155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机会	197
表156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机会	198
表 157 - EGO 和阿尔特使命 - 阿戈拉实用性	199
表158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实用性	199
表 159 - 性别 - 阿戈拉实用性	200
表 160 - EAD 体验 - 阿戈拉实用性.....	200
表161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实用性	201
表162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实用性	201
表163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实用性	202
表164 - EGO和阿尔特·埃戈尔斯 - 阿戈拉·坦波	202
表165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坦波	203
表 166 - 性别 - 阿戈拉坦波	204
表 167 - EAD 体验 - 阿戈拉临时.....	204
表168 - 市政地理分布 - 阿戈拉临时	204
表169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临时	205

表170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坦波	206
表171-5级EGO亲和力计划，高发生率	214
表172 - EGO自我召唤A1计划5	214
表 173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 "A1 计划 5"	215
表174 - 性别 - 阿戈拉"A1计划	215
表175 - EAD经验 - 阿戈拉"A1计划	216
表176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A1计划	216
表177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A1计划	217
表178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A1计划	217
表 179 - EGO	217
表180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A2计划	218
表181 - 性别 - 阿戈拉"A2计划	218
表182 - EAD经验 - 阿戈拉"A2计划	219
表183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A2计划	219
表184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A2计划	219
表185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A2计划	220
表 186 - 具有消极评级	228

图表列表

图1 - 人口里约 x 南美国家.....	31
图 2 - 按学术级别	32
图3 - 首次接受高等教育	32
图 4 - 与采用 EAD.....	40
图 5 - 以	40

内容

导言	20
1 远程教育	23
1.1 导言	23
1.2 EAD 及其特征.....	23
1.3 EAD 历史.....	27
1.4 巴西的 EAD.....	28
1.4.1 里约热内卢的 EAD.....	33
1.5 福特主义和学院教学商品化	34
1.6 对 EAD 的偏见.....	35
1.7 抵抗 EAD.....	37
1.8	42
1.9 社会、技术和 EAD.....	44
1.10 模式效率	45
1.11 社会代表和 EAD.....	47
1.12 研究问题：第一近似	49
2 对象征性社区的社会代表	51
2.1 社会表现	51
2.1.1 玫瑰不说话：从表示到社会表现	51
2.1.2 认知革命和社会表现：共同梦想的梦想是现实	52
2.1.3 社会表现理论（RRT）	56
2.1.3 社会表现的对话性	59
2.1.4 总结：trs.....	61
2.1.5 社会表现的结构方法	64
2.2 感官的生态学.....	66

2.2.1 格里泽和皮亚吉特对感官生态的贡献	68
2.2.2 与情感有关的一些补充性理论考虑	70
2.2.3 与对话有关的一些补充性理论考虑	71
2.3 走向可能的阿戈拉理论	71
2.3.1 关于阿戈拉	72
2.3.1.1 象征性社区	73
2.3.2 其他	75
2.3.2.1 生活在	75
2.3.2.2 根据第80	76
2.3.2.3 改变和同情	77
2.3.3 阿戈拉	77
2.3.3.1 物理学的一个例子, 说明阿戈拉假说	82
2.3.3.2 在其他	83
2.4 研究问题: 阿戈拉	84
3 方法	85
3.1 方法方法	85
3.1.1 在 EAD	85
3.1.2 根据阿戈拉模型	86
3.2 方法	91
3.2.1 召唤	91
3.2.3 主题采样策略	93
3.2.4 数据收集工具	93
3.2.5 结果的数据处理、分析和解释	93
4 分析结果和解释数据	95
4.1 结果分析	95
4.1.1 介绍	95

4.1.2 数据处理	96
4.1.2 关于公众	96
4.1.4 概述数据讨论	102
4.1.5 总体数据分析	104
4.1.6 分析阿戈拉斯和五个研究轴	105
4.2 轴 1 - 分析被引用最多的负面陈述。	106
4.2.2 介绍 - 负面陈述的痛苦	106
4.2.1 阿戈拉恐惧	106
4.2.2 阿戈拉偏见	111
4.2.3 弱阿戈拉	115
4.2.4 坏阿戈拉	119
4.2.5 阿戈拉"不信任"	123
4.2.6 复杂的阿戈拉	128
4.2.7 阿戈拉怀疑	132
4.2.8 阿戈拉无知	136
4.2.9 阿戈拉懒惰	140
4.2.12 可疑词	145
4.2.12.1 困难阿戈拉	145
4.2.12.2 阿戈拉难度	150
4.2.12.3 阿戈拉设施	154
4.2.13 轴 1 结果的整体分析 - 负阿戈拉斯	159
4.2.13.1 恐惧	159
4.2.13.2 偏见	160
4.2.13.3 弱	160
4.2.13.4 坏	160

4.2.13.5 不信任	161
4.2.13.6 复杂	161
4.2.13.7 怀疑	162
4.2.13.8 无知	162
4.2.13.9 懒惰	162
4.2.13.10 硬	163
4.2.13.11 难度	163
4.2.13.12 设施	164
4.3 轴 2 - 与文献评论.....	166
4.3.1 导言	166
4.3.2 阿戈拉便利	169
4.3.3 阿戈拉成本	173
4.3.4 阿戈拉难度	177
4.3.5 阿戈拉纪律	177
4.3.6 阿戈拉经济	181
4.3.7 阿戈拉设施	185
4.3.8 阿戈拉灵活性	185
4.3.9 阿戈拉互联网	190
4.3.10 现在端口	194
4.3.11 阿戈拉实用性	198
4.3.12 阿戈拉时间	202
4.3.13 轴 2	206
4.4 轴 3 - 分析阿戈拉亲和力计划.....	212
4.4.1 介绍	212

4.4.2 亲和力计划	213
4.4.3 Agora de A1 计划 5 (纪律、组织、动机、主动性、自主性)	214
4.4.4 Agora de A2 计划 5 (纪律、组织、动机、主动性、好奇心)	217
4.4.5 轴 3	220
4.5 轴 4 - 阿戈拉斯	221
4.5.1 介绍	221
4.5.2 关系分析 Ego 和改变	222
4.4.3 轴 4	226
4.6 轴 5 - 调查问卷	227
4.6.1 导言	227
4.6.2 轴 5	228
5 讨论	229
5.1 关于研究问题	229
5.2 关于 EAD	231
5.3 文学评论阿戈拉斯	233
5.4 亲和力计划	234
5.5 阿戈拉斯	234
5.6 其他观察	235
6 结论	237
7 参考书目	Erro! Indicador não definido.
8 附件。。。	262

介绍

现代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革命，新的财富将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阿尔巴格利, (1999) .这种基于全球化世界背景下的信息的现代范式将把信息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需求作为中心，随着互联网的扩展而更加全面地推动这种模式（CASTELLS, 2015年）。随着信息前沿的开放，我们将建立一个"网络空间"（LÉVY, 1999年），在那里可以建立更快的教育桥梁，并在这个"知识社会"中形成新的需要（LASTRES：阿尔巴格利, 1999）...

教育无国界，即在任何时间和空间，如远程教育（远程教育），传输信息，例如，使用互联网的毛细安。在像巴西这样具有大陆层面的国家，EAD将有权协助知识的传播，使地理上孤立的人能够像大学通常所在的大型中心一样平等地获得知识（SANTOS, 2006年）。

但显然，与"知识社会"中的EAD有关的问题（最后：巴西的ALBAGLI, 1999年）将处于技术秩序（如无法接入因特网），而且具有象征意义，其形式是部分民众拒绝这种方式，造成偏见。许多作者认为，消极的判断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实验测试显示，面对面的方式和距离在学习方面是等价的，但即便如此，社会上也会对这类教育产生怀疑和抵制（《摩尔》，2007年：桑托斯, 2006：席尔瓦, 2010）...

一些作者指出，鉴于该国从函授课程开始，成本低，学术可信度低，由没有适当教学经验的业余爱好者领导，这种担心是合理的（SCHLICKMANN等人, 2009年）。在大学中，远程教育的贬值有时来自教师本身，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从面对面到距离的改变将改变论文，教师感到被降职为教师或中学职位（CORRÉA：桑托斯, 2009;MAGGIO, 2001），除了失业的威胁，物理教室的疏远。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教育学院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因为对一些作者来说，这不是教育的民主化做法，而是政府为降低教学成本而找到的方法（BELLONI, 1999年：彼得斯, 2003;SILVA, 2010），然后可能很少关心质量.这种做法也可用于基于利润的教育公司（比尔肖斯基, 2018年）。

通过这个过程，THE可以唤起一种社会共享的精神形象，我们称之为社会表现（莫斯科, 2000年）。

由于目前远程教育被取消资格的历史，他们的陈述在社会上可能是负面的。即使是取消专业人员资格的流行术语也是“通过函授获得文凭”（FERREIRA, 2010年），指那些从事EAD工作的人。鉴于一些作者已经提到这个问题（BELLONI, 1999年；摩尔；卡尔斯利, 2010;维亚纳;普罗巴, 2015）。

关于社会表现的研究是多种多样的，有不同的方法，其中之一被称为结构方法，其主要作者之一Abrie (2004年)。

这句台词使用被研究者唤起的词语来提取社会表现。这方面的研究在巴西有一系列的经验研究，包括与国家，其中有可能找到一些使用这种技术由作者（1994年）提出的，以了解的表现（PEREIRA, 2014年）。

在文献审查中，可以证实，诸如灵活性、时间等涉及日常生活的表述被广泛使用，并提出了消极的观点。

一般来说，在基于结构方法的研究中，要求被调查人口回忆对某一主题以及《阿布里克》（1999年）中想到的词语或表达方式。因此，考虑到每个群体形成的想法，提取了与这一群体有关的陈述。然而，在本文中，我们考虑了一个反向动态，即每个思想形成的人口，理解意识形态可以形成不同的群体，并有可能单独研究，这要归功于一系列因素，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某些群体特有的词典的使用。对于这些人口群体谁有大致的想法作为他们的联盟的基础，我们称之为阿戈拉。

本研究提出的其他要点与改变之间不可分割的观点有关，莫斯科维奇（2000年）、马尔科维的对话性（2003年）和坎波斯感官的生态学（2017年）提出了自我和对象（EAD），其中还提出了这三种理论的阐述，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关键问题：一个涉及自我，另一个根据其表现情况进行改变。研究的这一方向延伸至变化，在理解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时，不仅考虑了自我的感知，而且考虑了自我的改变。

阿戈拉的灵感来自网络理论（考夫曼, 2012年;MARTELETO, 2001年），除了通过他们的社会表现寻求群体分析之外，还使用结构方法进行数据提取;也许，社会心理学的现代挑战之一（JOVCHELOVITCH, 2014年），以期扩大网络社会中的互动，这在整个研究及其结果中是可以欣赏的。

分析分为五个主要研究轴，即：轴1-具有负面表示的阿格拉斯分析：轴2-用文献评论的表述分析痛苦：轴 3 - 分析具有多个表示的阿戈拉亲和力计划：轴4 - 阿戈拉和社会表现之间的关系分析来自变化和自我和：轴 5 - 分析前 500 个有效答案，以识别表示中的消极性。

这项研究由Cederj财团在2019年入学考试过程中对42,000多名打算在远处进入大学的人进行，并申请了一份问卷。该机构被认为是巴西的优质模式。本论文所述的结论可以评价本研究的实证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上述公众与《社会代表》相关的社会表现概况。

1 远程教育

1.1 介绍

我们从这里开始，大量从事研究表明存在偏见和对 Ae 的抵抗。我们将从有关远程教育问题的文献综述中讨论这个问题的背景，以及从对这个问题的学术理论反思中发现的问题。以改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中心地位、教学商品化、打破教育手工结构为主要内容。在社会上，评价是关于围绕这一主题的阻力和偏见，因为《社会》与负面形容词（如"皮卡雷塔姆"）有关。本章将讨论与之相关的积极社会表现。

1.2 EAD 及其特征

教育是一个教学过程，其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发展和提高学科的身心和智力发展。为此，它创造了教学、教学和教学方法，以促进旨在学习的教学。然而，当目标是在一个不同于教学物理场所的地方促进教学过程，并通过适当的技术进行规划和构建时，这个过程可以定义为远程教育（MOORE：科尔斯利，2010）。

一些作者认为，《教育法》除了有利于基于研究和解决问题的知识建设条件外，还有助于对我们的教育制度进行必要的修改，"因为它允许集体工作和跨学科，不同行为者共同的教育实践的发展，协作和创造力精神的激发"（VILLARDI：吕克，2015，第216页）。

EAD是一种教育方式，通常被错误地称为方法论。2001年1月9日《国家教育计划》（PNE）第10，172号法律明确指出了这一区别，表明它们是巴西的教育模式：青年和成人教育、远程教育和教育技术、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以及土著教育（巴西，2001年）。

1988年联邦宪法将远程教育定义为：

一种教学形式，使自学，在系统有组织的教学资源的调解下，呈现在不同的信息媒体上，单独使用或组合使用，并通过各种传播手段进行传播。（巴西，1988年）

强调通过

THE

学习不是偶然进行的。上网并不意味着互联网用户有有效的教学和知识建设实践（学习）。为了使教学过程有效，以及通过任何其他手段，该过程必须是有意的、有组织的和以某种教学目的为指导的。桑托斯，2009;摩尔，2007)。Zerbini等人（2006年）解释说，远程教育需要更系统的规划和先进的通信技术的应用，以便空间和时间距离，远程的特点，可以正确使用。

AE的定义由巴西政府正式确定，2017年5月25日第9, 057号法令正常化如下：

第10条为了本法令的目的，远程教育被视为教学和学习过程中的教学-教学调解，使用信息和通信手段和技术，配备合格人员，采用准入政策，兼容监测和评价等教育方式，并开展不同地点和时代的学生和教育专业人员的教育活动。（巴西，2017）

远程教育也由贝罗尼（1999年）定义，他指出了以下特点：

- a) 学生和教师之间的身体分离;
- b) 教师和学生使用适当的沟通技术;
- c) 由学生控制学习节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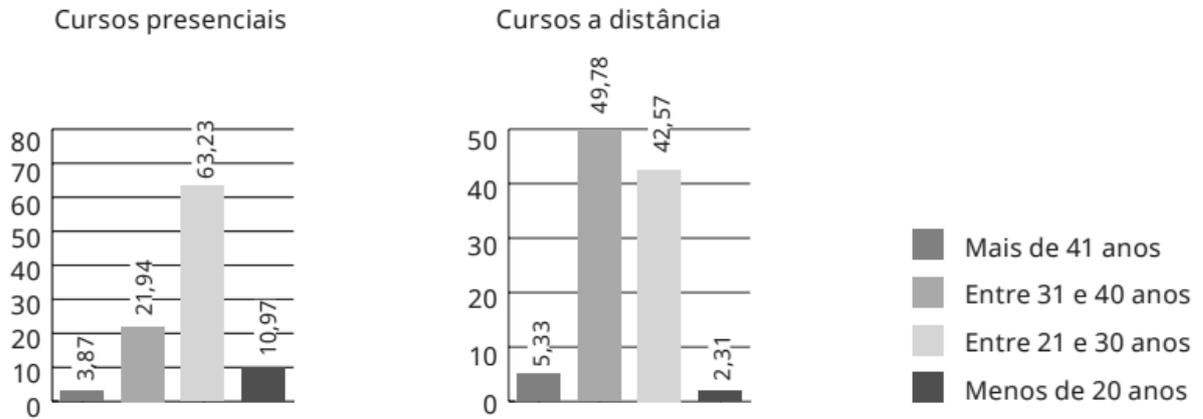
EAD目前基于使用技术通信手段和信息，如电子邮件、互联网、音频和视频会议。它是一种经济上有利的媒介，有可能为大量学生服务，特别是基于互联网等技术时（BELLONI，1999年：从海岸;法国，2005年;蚂蚁;利托，2009)。因此，可以总结出，远程教育涉及学习和教学等各个方面，但也涉及规划，因为教学场所不同于传统上学习（学校、大学等）和通过各种技术进行交流的地方。

另一个特点是与方法论中和生物学技术的使用有关（FORMIGA：利托，2009)。我们将讨论面向成人的教育，由一套面向公众的教学方法所倡导。例如，和神学的技巧之一是向学生解释学习的好处，用这个论点作为激励因素（FORMIGA：利托，2009)。

巴西远程教育协会（ABED，2016年）的人口普查调查证实了这一方面，因为远程教育协会（ABED，2016年）以成年人为主要公众，占主导作用，因为成年人占主要公众的主导作用。这种占主导性可能与学生更大的自主性和纪律性有关，这是在远处进行活动的必要条件。如图1所见，比较面对面和远程课程学员的年龄差异，经核实，面对面教育的学生集中在21至30岁之间（63.23%），而远程课程的年龄差异在31至40岁之间（49.78%）。这些数据还证实了教育部的数据，通过国家教育研究所（INEP）

表明，2017年，面对面教育的平均年龄为21岁，而远程模式为28岁（INEP，2016年）：
：《环球报》，201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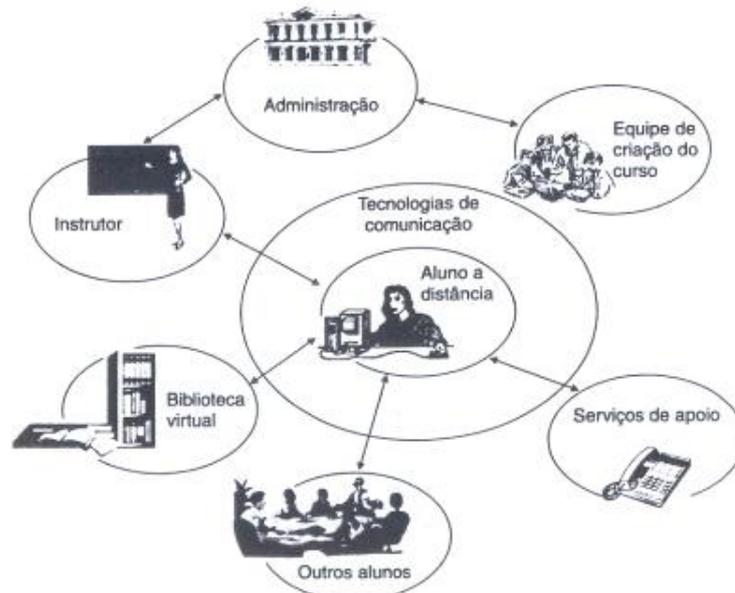
图 1 - 面对面和远程课程的年龄组 (%)



资料来源：阿贝德（2016年）。

对摩尔（2007年）来说，这种教育方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关注学生的核心，他称之为“科白尼革命”（图2），暗指科学家所说的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在摩尔的类比中，学生是核心人物，参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及其产生的所有教育过程，与传统的面对面教学不同，后者的核心是教师（FORMIGA）：利托，2009;摩尔;科尔斯利，2010）。

图2 - EAD 中的学生界面



资料来源：摩尔（2007年，第22页）。

作者贝罗尼（1999年）和科斯塔·弗朗哥（2005年）补充说，THE是基于数字技术通信手段的使用。媒体根据所使用技术的开发阶段和与社会不同技术产品同时发展的特点，向EAD展示自己的特点（FORMIGA：利托，2009）。对于摩尔（2007年）来说，这些模式的五代人是：第一，从开始用信件写作，并随着古特姆伯格的发明而扩展：第二，随着广播电视的创建：第三，开放大学的概念，学生不需要出现在大学校园里：第四，电话会议，可以发出一个类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使用电视，直到今天与第五代（摩尔，2007年），其里程碑是互联网的到来（见表1）。

表1-远程教育的几代人

匹配	第一代
广播和电视广播	第二代
开放大学	第三代
电话会议	第四代
互联网/网络	第五代

资料来源：摩尔（2007）。

技术的演变还提供了AD类型的分类（表2）及其与学生的关系，以及通信格式（BELLONI, 1999年：摩尔;科尔斯利，2010）。

表2-EAD分类

通信类型	沟通的性质	技术支持
一对一	同步	电话、传真、录像机
一对一	异步	电子邮件、文件传输、主页
一对多	同步	直接卫星传输与互动
一对多	异步	讨论列表，文件转移
多到多	同步	直接卫星传输与互动
多到多	异步	通过计算机举行会议

资料来源：摩尔和科尔斯利（2010年）。

在巴西，1891年宣布专业打字课程被认为是EAD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根据Saraiva（1996年）的说法，这种教学方式在20世纪通过印刷媒体和通信实施后，在20世纪对巴西具有更大的力度，正如托雷斯（2002年）指出的。然而，据Saraiva（1996年）说，1922年，第一个里程碑发生了，罗奎特·平托通过这辆车创立了里约热内卢国际广播电台，以传播教育。从那天起，托雷斯（2002年）增加了一些重要的日期，如：

- 1941年-巴西环球研究所的成立；
- 1965-1970年 - 教育电视的创建；
- 1985年 - 计算机独立或在本地网络上；
- 1985-1998- 存储媒体（视频类、软盘、CDROM等）；
- 1990- 开始集中使用电话会议（卫星）；
- 1991年-创建RNP；
- 1995- 网络传播（互联网）；
- 1996-视频会议网络；
- 1998-虚拟现实。

EAD的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根据技术发展情况制定和传播的。虽然远程教育在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已为人所知，但在高等教育中，它只得到1996年《LDB（基本准则法）》（MORAN, 2009年）的承认。

从1996年12月20日第9, 394号法律——达西·里贝罗法——起，EAD在该国获得了更制度化的地位。正如Lacé（2014）所说。

达西的提案在国民议会获得通过，然后于1996年12月由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总统修改为第9 394/1996号法律。关于远程教育的案文"精益"和"最小"，规范了国际组织建议的方式，将公共当局作为各级远程教育方式的伟大推动者，同时将今后的条例交由公共当局掌握，以便具体说明如何实施远程高等教育。这一进程在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的领导下启动，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将跨越卢拉政府，并通过2005年第5 622号法令予以接纳。从那一刻起，私立机构的远程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LAC+, 2014, 第172页）

即使没有这种正式承认，巴西通过数字技术进行远程本科课程的首次记录也发生在1994年。同年，马托格罗索联邦大学（UFMT）开放了基础教育教师培训远程课程的入学考试登记，目的是为小学初等成绩培养专业人员（PRETTI, 1996年：桑托斯, 2006）。

1.4 巴西的 EAD

根据Nis基尔（1999年）的说法，EAD作为"希望之技术"出现在巴西，因为它允许公立大学因其学术价值而认可的知识到达遥远的地方。因此，在巴西等具有大陆层

面的国家中，THE具有巨大的分配能力，这是一个有用的特征（BELLONI, 1999年：
尼斯基尔, 1999年：席尔瓦, 2010;维亚纳, 2011）。
这一维度可在图3中进行评估，其中比较了巴西领土与欧洲国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西班牙（红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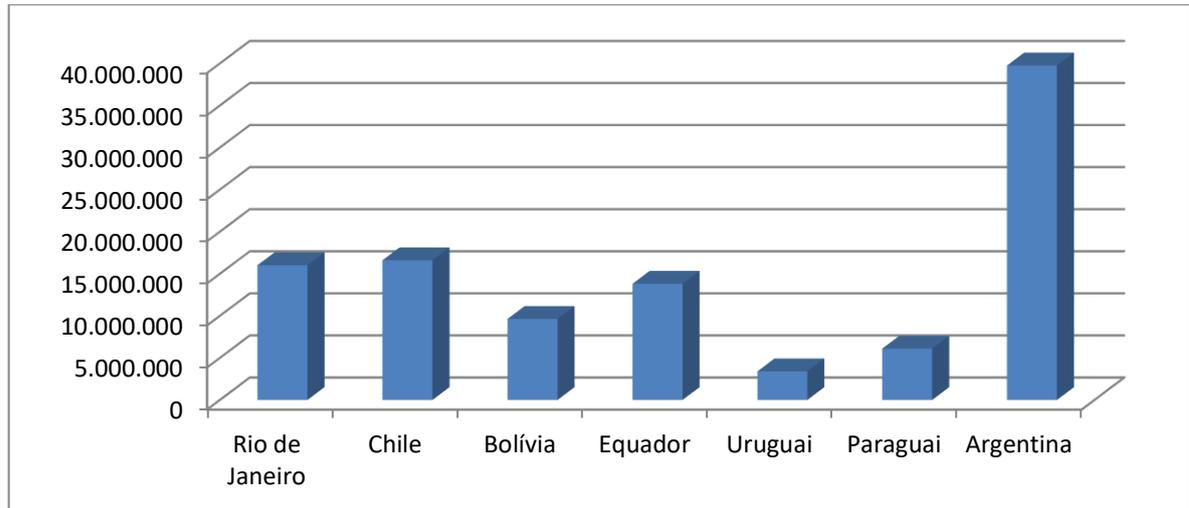
图3 - 与西班牙相比，巴西的尺寸



资料来源：改编自谷歌地图。

席尔瓦（2010年）补充说，距离模式也可以帮助更遥远的地区获得固定在自己所在地区的劳动力资格。因此，没有必要将工人迁移到大型中心，目的是获得在其居住地不提供的资格。例如，在目前里约热内卢州公立大学内部化和扩大方案中，教育学院发挥着重要作用：高等教育成为可能（由设在里约热内卢大都市区的公立大学发展），以便它惠及远离首都的地区的人（2010年，SILVA）；维亚纳，（2011）。里约热内卢州的人口与南美洲国家的人口相符（图1）。

图 1 - 人口里约 x 南美国家



资料来源：IBGE（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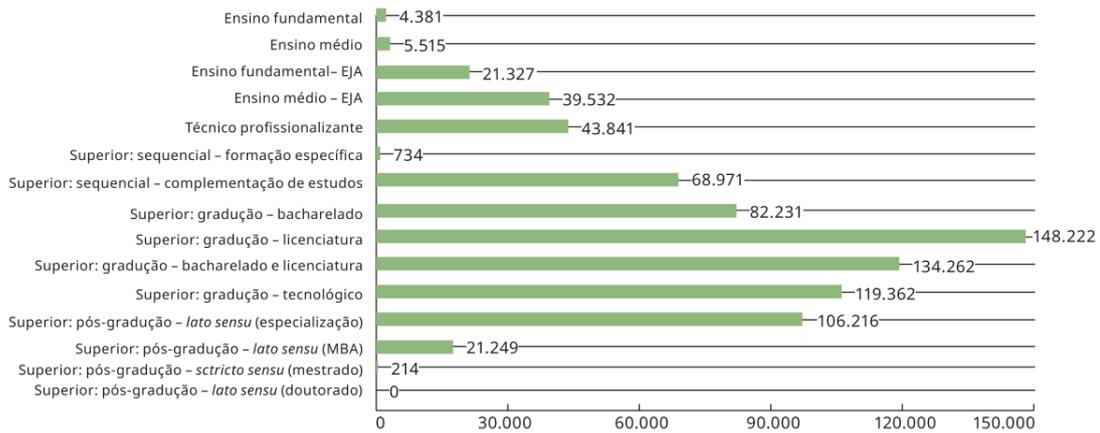
寻求

EAD

的学生通常被时间和地点灵活性的便利性所吸引。大多数在巴西寻求EAD的人工作（ABED, 2016年; ABRAEAD, 2008; 蚂蚁; 利托, 2009; 摩尔, 2007）。需要调和学习和工作可以是巴西的一大吸引力。例如，私营营利性机构报告说，2016年，在一项对提供这类教育的机构（ABED, 2016年）的调查中，70.45%的学生参加了学习和工作。联邦公共机构记录为65.63%（ABED, 2016年）。这种需求和其他需求使远程学习在这个国家增长。

自从在巴西推出以来，距离模式一直在增长，今天有大量的学生，其最集中的本科课程，如下图2）。2016年，毕业生人数约为553,000人，远高于小学、中学和技术教育的约114,0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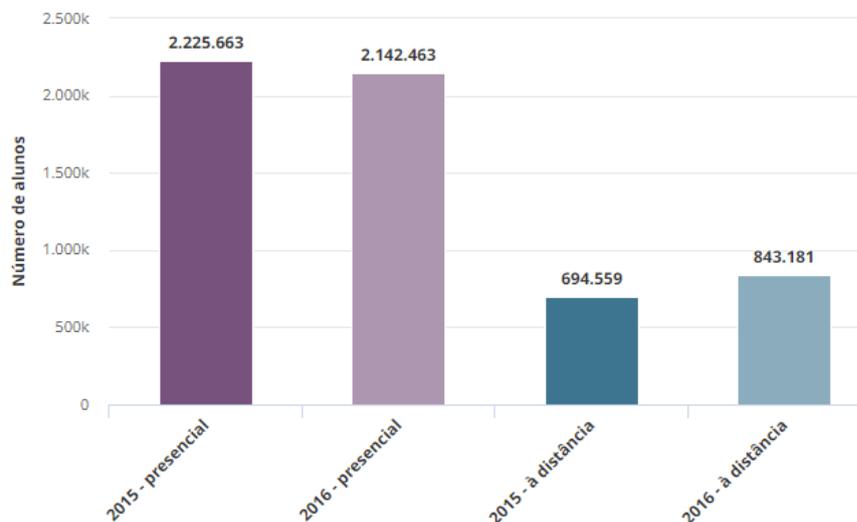
图2 - 按学术水平分，报名参加完全远程监管的课程



资料来源：阿贝德（2016年）。

另一个相关点是教育部（MEC）在2017年进行的上一次高等教育普查中记录的全国高等教育指数级增长。虽然面对面系统中的学生人数下降了3.7%，但在距离方式方面，则增加了20%（图3）（INEP，2016年）。据《O Globo》（2017年）报道，与1992年相比，2016年面对面教育的空缺率首次下降，下降了1.2%。然而，在远程学习课程中，他们增加了7.2%，这是可以观察到的。该工具还评估，远程学习课程高等教育的总招生人数也录得增长。通过将绝对数字转换为百分比，我们在2006年，4.2%的这种模式的招生是大学生，而在2016年，有18.6%（O GLOBO，2017年）。

图3 - 高等教育新生



资料来源：INEP（2016）和 O GLOBO（2017）。

随后，巴西政府支持这种教学模式，并采取了一些举措，如2005年创建巴西开放大学（UAB）（SCHLICKMANN等人，2009年），与教育部直接挂钩，教育部负责处理这类教育问题。这些举措就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旨在扩大通过教育学院教授的高等教育课程。

1.4.1 里约热内卢的 E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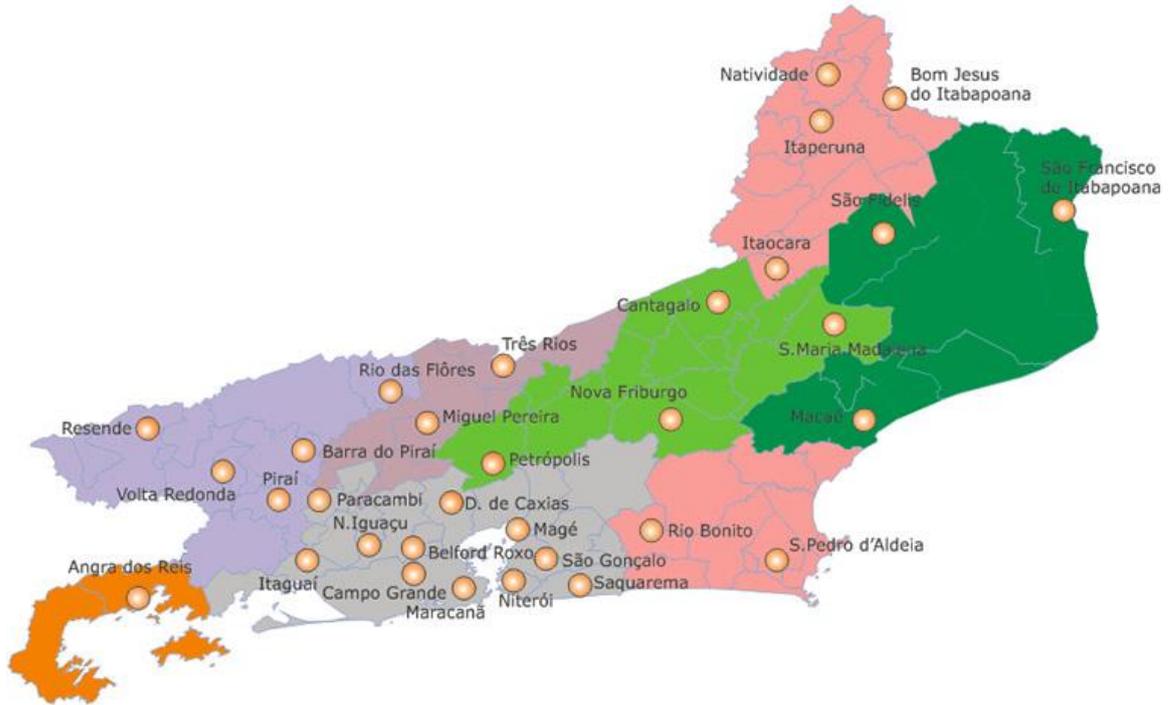
CEDERJ（里约热内卢州远程教育中心）是公共大学的工作部门之一，由CECIE RJ基金会（里约热内卢州远程科学和高等教育基金会）管理，是州政府的一个机构。

根据塞尔索·科斯塔教授的说法，

Cederj 财团诞生于达西·里贝罗（Darcy Ribeiro）的想法，当时他正在寻找一个安装北弗卢米嫩塞国立大学（Uenf）的地方，"因为，"对于里约州的特殊性，公立大学只位于首都"。现任塞蒂秘书万德利·德苏萨是乌恩夫的第一任校长，他呼吁该州的公立大学团结在达西·里贝罗的周围，以便在远处建立一所大学，"向内陆敞开大门"。因此，2000年，Cederj联盟诞生，由里约热内卢的六所公立大学（Uerj、UFRJ、UFF、UniRio、Uenf和UFRRJ）组成。两年后，该财团加入了Cecierj基金会，由里约州政府管理和资助。（汉森，2004年）

该联合会由在该州运营的七所公立大学组成，它们是联邦技术教育中心塞尔索·苏考·达丰塞卡（CEFET-RJ）：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UFRJ） 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UERJ）：弗卢米嫩塞州立大学弗卢米嫩塞·达西·里贝罗（UENF） 弗卢米嫩塞联邦大学（UFF）；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UNIRIO）：里约热内卢联邦农村大学（UFRRJ），除了IFF（弗卢米嫩塞联邦学院）、FAETEC（技术学校支持基金会）和UEZO（西区州立大学中心基金会），目前约有50,000名学生。Cecierj基金会的中心位于里约热内卢的几十个城市，如图4所见。

图4 - CEDERJ财团波兰人



资料来源：塞西耶基金会（2019年）

该项目最初旨在将远程高等教育内化，提供精确和生物科学领域的学士学位。据科斯塔（2005年）说，其想法是将其分发到里约热内卢州，以避免大学之间争夺资源，以便共享面对面的区域中心、各种学科和业务评估过程。因此，对于教师来说，c ederj 的基本职业如下：

- 有助于在内地建立人口；
- 教师培训；
- 里约热内卢州的经济的发展；
- 使用远程方法为本科课程提供高质量的参数。（海岸，2005年）

1.5 福特主义与学术界教学商品化

贝洛尼（1999年）并不认同“教育是教育的救赎”的观点。它的实施不是开放教育民主化的胜利，而是受福特车型生产线启发的廉价教育形式。在批评中，作者指出，政府利用EAD来省钱，改善高等教育的统计数据，不一定能提高教育质量（BELLONI，1999年）。

彼得斯（2003年）证实了这一观点，因为它是EAD现代技术的结果，然后会损害教学

的手工结构，创造一个以泰勒主义为典型、具有合理化、分工化和注重大规模生产的内联生产体系。对这种大众形式的教育，作者称之为"教学工业"（BELLONI, 1999年：彼得斯, 2003;席尔瓦, 2010）。因此，EAD，对于学院的一些愿景，将是一种"工厂"，其目标是在教育机构内部进行廉价而不是改进，甚至可能造成机构雇员和教师的大规模裁员（MAGGIO, 2001年），正如贝洛尼指出的：

在贫穷国家，远程教育似乎是解决教育问题的紧急办法，而在富裕国家，远程教育有助于提高各级面对面教育的质量。（贝洛尼，1999年，第20页）

上述问题不会是EAD在各机构中面临的唯一问题。其他几个因素意味着，这个问题导致该学院受到来自学术界的抵制和偏见的批评。科里亚和桑托斯（2009年）和费雷拉（2010年）等作者认为，在学生整个教学过程中，重点发生了转变（MOORE, 2007年;摩尔;KEARSLEY, 2010），与传统教学中观察到的相反，教师是信息的持有者。因此，根据作者的说法，由于失去了教学中心的力量，教师可能无法控制其质量。桑托斯, 2009;费雷拉, 2010）。科里亚和桑托斯（2009年）指出的另一个原因涉及教育领域职能的重组，即在教学调解人之前的教师现在成为教师或导师：他们分别是只为班级制作内容的人，例如讲义分发者或学生如有任何疑问，可求助于这种房间监测器。在作者看来，这将是一种降级（CORRÉA：桑托斯, 2009;马焦, 2001）。因此，学校将在一个集体实体中建立液化教学机构，转变为单纯的服务提供者（BELLONI, 1999年）。在许多课程中，以这种方式，导师的角色都不是：只有一个人，没有面子，谁生产的内容（MAGGIO, 2001年）。

1.6 对 EAD 的偏见

不仅在学术界，他们面临着阻力，而且在社会上，一般来说，也会有偏见。例如，桑托斯（2006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证实，文凭的贬值来自那些甚至没有接触过它

的人的距离方式。对于福米加和利托（2009年），民众对它有偏见：“我没有看到，也不喜欢它！（桑托斯，2006年，第15页），我们将看到如下。

在社会心理学中，偏见的定义之一是由美国研究员戈登·阿尔波特在1954年的作品《偏见的本质》中给出的：“对属于一个群体的人的敌对或预防态度，仅仅是因为他属于这个群体，因此假设他有归属于这个群体的可争议特征”（第22页）。Allport（1954年）还提出了五种偏见的表现形式：消极的言语化、回避、歧视、人身攻击和灭绝。这种偏见的观点是基于社会认知过程（FIORIN;佩雷拉SILVA, 2016）作为错误想法的培训师，他们与社会如何代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保持亲和力（CABECINHAS, 2004）。即偏见一般与社会因素有关，并不总是需要理性的动机来建立自己。

虽然这也是一种心理现象，但是什么导致个人受到偏见或没有偏见，可以在他的社会化进程中找到，在这个过程中，他转变并形成于个人。即，允许个人也构成自己对是否发展偏见负有责任的原因。它的表现是个人的，也是对个人非理性需求的回应，而是在社会化进程中产生的，是对那里产生的冲突的回应。（《克罗奇克》，2006年，第14页）

在远程教育中，偏见可能与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没有理性的动机。在新一代之前，所谓的“数字本地人”——出生在互联网时代的人——将是未来教育通过技术远程流动的希望，更有可能克服这些障碍（PRENSKY, 2001年）。

然而，他们有偏见，背负着巨大的恐惧和不信任负担（CARLOS, 2007年；艾萨;桑托斯, 2009;桑托斯, 2006）关于，以及他们之前的几代人。数据普及研究所在201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3%的24岁以下的年轻人和79%的24岁以上的年轻人不想参加远程或半面对面的课程。绝大多数人担心社会对这些文凭缺乏认可（《大众》，2016年）。

对于费雷拉（2010年）来说，偏见将从学术界开始，正如先前所说，这与通过远程教学过程将重点从教师转移到学生有关（FERREIRA, 2010年；摩尔, 2007）。

对于像Schlickmann和合作者（2009年）这样的作者来说，EAD在社会上具有“第二次机会”特征，因为各种原因，包括进入劳动市场和寻求更好的资格。与亲自提供的教育相比，这些人应该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施利克曼等人，2009年）。

[...]面对任何新奇事物，偏见都是一种现实。需要做的是以某种方式真正运作EAD，因为只有结果才能消除这些偏见。我们不相信这是一种麻烦的教学方式。然而，我们知道，如果工作顺利，它可以产生优质的水果，因此，是那些需要毕业或培训，没有时间参加面对面机构的人的一个伟大的盟友。（瓦斯康塞洛斯，2002年，第11页）

因此，许多从未接触过这种模式的人对此有不好的看法，这强化了偏见的概念。根据科雷亚和桑托斯（2009年）的说法，“选择”、“不完整”、“肤浅”和“反社会”等形容词与EAD有关。在同一研究中，79%的面对面课程的学生在距离方式上有选择，对我们进行负面评价，强化了偏见的概念（CORRÉA：桑托斯，2009）。另一个假设是，即使MEC没有区分这两种模式，也希望获得与EAD模式相同课程的同事之间的一些差异。

当学生与远程课程接触时，人们注意到，即使通过与课程相关的积极经验，对课程模式也有负面看法，从而强化了偏见（CORRÉA：桑托斯，2009）。与AEd有关的一些抵制原因是基于不利的观点，主要是那些从未经历过这种经历的人，这强化了偏见的观念（《戈麦斯》，2008年）。

1.7 抵抗 EAD

偏见不会是将消极情绪分配给 EAD 的唯一属性。诸如不熟悉信息技术、拒绝学术界、社会缺乏信誉等属性也形成了我们所谓的对 AE 的抵制（GOMES, 2008 年；维亚纳，2011；维亚纳；普罗巴，2015）。因此，抵抗有不同的动机。当评估 THE 的学习效果低于面对面教学时，它们可能具有教学性质：与演员在教学过程中角色的变化有关：和/或经济，当它被认为是一种模式，将满足资本的需求，使教学有更低的成本，等等。

抵抗的定义是个人在改变力量之前必须保持不变，维持其现状的反应（ZALTMAN：邓肯，1977年）。对于拉庞特和里瓦尔德（2005年），个人和群体可以有不同的意图和行为，从技术变革的看法。研究人员强调，其中，收养，中立，冷漠和被动，主动和积极的抵抗。抵抗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行为意图，从与变化相关的感知。即，没有必要确实有一个变化，它有阻力，或者没有必要知道它发生。

对于戈麦斯（2008年），抵抗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态度，对于Mattar（1997年，第197页）来说，“是人的潜意识倾向，源于以前的经历、对情感的认知、他的行为反应与产品、组织、人或事实的确定”。根据这位研究人员的说法，态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情感、认知和行为（图表3）。

表3 - 马塔尔的态度（1997）

态度	定义
情感	这是一个美化，质量期望的东西
认知	衡量有关产品属性或事实的信念
行为	衡量意图

资料来源：马塔尔（1997年，第197页）。

对于Brauer（2008年）来说，阻力问题涉及在远程课程的准备，这些课程通常是业余的面对面课程转换为虚拟课程，没有必要的质量，也没有考虑学生的个人资料。据作者说，这也有助于增加抵抗力。这也是以前不成功的经验，事实上，THE已经开始为低收入观众的低学术价值的专业课程，如基本电子，缝纫，力学，补充，等等。即，即使这些课程满足了社会的一些需要，《国家教育》本身的历史也会被配置为抵制的理由。今天，当有人说某人是畸形或无能的，据说该人撤回文凭的信件（FERREIRA, 2010年）。有必要考虑，AE不良课程带来的挫折增加了以同样方式开设新课程的阻力。然而，亲自教授的不良课程也会产生挫折感。在EAD模式中，由不良课程构成的阅读似乎更多地与课程模式有关，而不是与课程本身有关，而传统课程中的挫折感则有其他原因，与面对面的方式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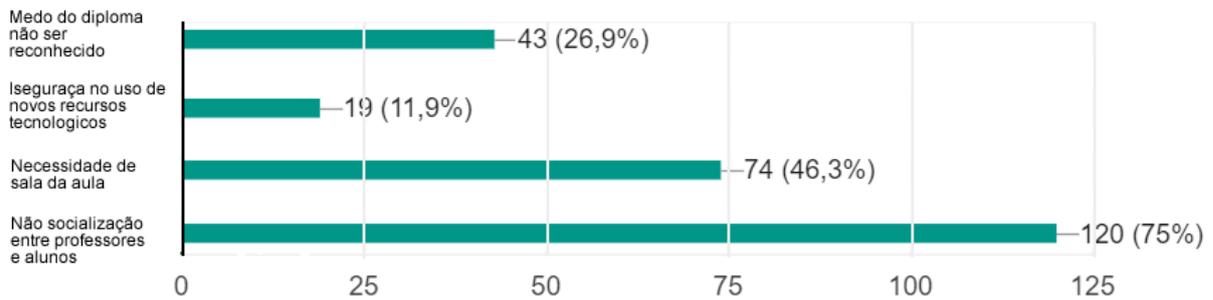
哈拉和克林（1999年阿普德·卡雷格纳托和莫拉，2006年）将远程课程的挫折分为三组：缺乏教师的即时反馈，教师可以面对面地评估学生，包括肢体语言;教师的模棱两可的指示;以及技术使用方面的问题。

Perdue和瓦伦丁（2000年）从444份问卷中对通过"THE"进行的专业发展进行了一项研究，结论是，由于以下原因，学生强烈不愿意采用这种模式：学生怀疑他们适应这种模式的能力;关于课程质量的问题;以及基于技术及其技能的获取。社会因素也是与抵抗合作的因素之一。根据Inter@ctiva实验室成员正在进行的里约热内卢青年研究的初步数

据，导致一个人不参加EAD课程的主要原因包括：非社会化、需要教室和担心文凭得不到承认。图4提供了关于里约热内卢低收入青年动机问题的回答。¹

¹Inter@ctiva的成员，连接社区心理社会学和社会生态学研究生课程是米尔顿·坎波斯教授，学生法比安·普罗巴、娜塔莉亚·朗菲尼、阿尔米尔·费尔南德斯·多斯桑托斯、艾琳·卡瓦略、罗桑盖拉·德·卡瓦略和莱昂纳多·维亚纳）。在巴西普拉塔菲卡注册的正在进行的研究的部分结果，带有来自 n. CAAE 的道德证书：50100415.6.0000.5582。FAPERJ 融资号 2104842016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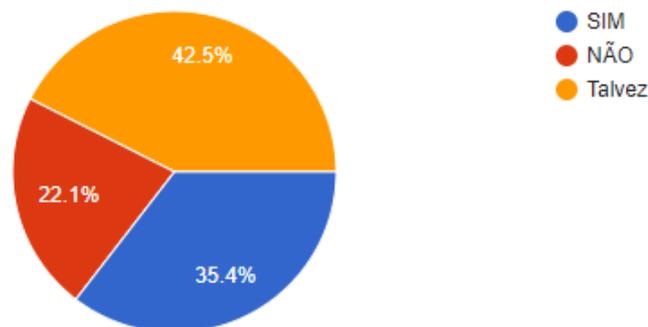
图4 - 与采用



资料来源：Inter@tiva (2018) ¹

这些数据使我们假定阻力因素甚至可能影响年轻人在距离方式上对课程的决定。在这项正在进行的研究中，一个课堂课程的年轻学生正在为一所公共远程教育机构的入学考试做准备，我们试图了解他们是否会以这种方式上大学，结果64.6%的被调查者说“不”和“也许”。只有35.4%的人宣布他们将进入远程学院，即即使是远程学院的学生也不希望以这种方式获得文凭（图5）。这是，即使CEDERJ财团被认为是一个示范机构，在巴西的mec和参考这种类型的教育（VIANNEY, 2009年）。

图 5 - 以 ead 模式上大学的可能性



资料来源：Inter@tiva (2018) ¹

对摩尔（2007年）来说，学生的抵制是由于几个因素造成的。其中之一是发现EAD课程比传统课程更容易，并遇到另一个现实。此外，学生不会意识到，在EAD中，他们需要更加负责和熟悉技术。作者认为，导致对AE的抵抗力的主要因素是：

错误地认为，THE是一种更容易的方式，需要较少的奉献。当一个人意识到情况正好

相反时，就会非常沮丧，因为学生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需要更大的奉献精神：

与所使用的技术缺乏联系。一个坏的看法会随之而来，因为，当有熟悉，学生感知正好相反：

-课程准备失败。

在巴西，ABRAEAD（2010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证实了摩尔（2007年）在"学生的错误期望"一项中，该研究显示，51%的学生因为认为比传统系统（CAREGNATO）更容易的方式而辍学。莫拉，2006）。布劳尔（2008年）在企业大学（UC）以抵抗为主题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参加EAD的人的抵抗传导将有八个主要方面，分为两个特点：一方面，我们将有个别的：

- （一）个人具有自我执行系统的自我效能：
- （2） IT 能力 - 个人与技术元素的亲密关系：
- （3） 绩效期望——个人认为这将对他的生活产生多大影响：和
- （4） 对努力的期望——在系统中发现的便利程度，如接口等。

另一方面，我们将有那些与环境有关：

- （5） 社会影响-认为个人有其他相关的人认为他应该使用该系统：
- （六） 便利条件——个人认为良好的技术设置和设备，以支持该系统的使用：
- （7） 互动性 - 个人之间的互动：和
- （8） 内部通信 - 涉及通信的要素，如响应速度和通信系统的效率。

Viana解释说，对于没有与"THE"没有联系的学生来说，主要有三个困难：

- （1） 期望值：
- （2） 自我效能：和
- （3） 缺乏与技术的亲密关系。

对于梅雷莱斯和玛娅（2002年）来说，学校必须关注学生的认知，因为消极的认知会损害他们自己的学习成果。理解为什么学生拒绝学习EAD将有助于丰富大学的主题，考虑到这不是一个统一的领域，但相反，它是在发展。

1.8 EAD 的正面和负面方面

与任何类型的教学学习过程一样，THE 具有积极和消极的方面（BELLONI, 1999 年；摩尔；卡尔斯利, 2010;尼基耶, 1999）。积极的一面是，我们有研究人员，如Caregnato和Moura（2006年），他们研究了计算机课程学生的看法，相比之下，学生报名参加面对面课程。关于远程学习，研究人员报告了一些积极的经验，如时间本身管理的灵活性，以及更严格的纪律、虚拟群体中班级的更激烈参与以及教师作为辅导员角色的转变。Caregnato和Moura还讨论了《教育法》的消极方面，例如对技术的依赖——这种依赖使参与者的体力分散变得昂贵或不可用——因为在距离方式上，除了由于距离或技术障碍而限制讨论之外，学生在需要自主执行任务的情况下需要更大的承诺（表4）。

表4 - 积极和消极的方面

EAD 的积极方面	EAD 的负面方面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方便 • 自主学习 • 客观性 • 大规模学生参与 • 被视为辅导员的教师 • ITC 的操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技术依赖性 • 身体分散的参与者 • 需要更大的学生承诺 • 讨论限制

资料来源：卡雷格纳托·穆拉（2006年）

关于与远程有关的面对面教学，根据Caregnato和Moura（2006年）的说法，积极的方面将是班级的接触和互动、机器独立性等。底片（图5）将是位移，难以表达自己，使用被认为是传统的黑板和粉笔和教师权威的技术。

表5 - 面对面教学的正面和负面方面

面对面的积极方面与	面对面的负面方面与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班级之间的个人接触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参加课程的动向

- | |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无需任何媒体的互动 • 机器独立性 • 深化主题讨论 • 小组工作的可能性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难以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 • 使用传统技术 • 教师的威权主义 |
|--|--|

资料来源：卡雷尼亚托和莫拉（2006年），第11页。

关于Caregnato和Moura（2006年）所述的"THE"的负面因素，Brown（2005年）增加了其他被认为更容易在传统课堂课堂上处理的因素，从而促成了讨论。作者举的一个例子是，学生是否正在享受一门主题或课程，这些科目或课程印在场学生的脸上。身体交流可以表明，如果学生理解一个特定的主题，老师可以亲自理解。如果没有，老师可以寻求以其他方式解释这个主题。在教育署，对于布朗（2005年），教师不能在教条转介中做出改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诊断学生的理解是否令人满意，而不是亲自获得的理解。

该学院的积极要点之一是这种模式在教学过程管理方面的能力，因为它可以将信息提供和教学培训的扩展转移到偏远地区，因为巴西大学校园在大都市地区更加拥挤（BELLONI，1999年；尼斯基尔，1999年；席尔瓦，2010）。换言之，THE可以促进创造环境，使地理上分散的人能够发展认知教学技能，而不论其地理位置如何（GARCEZ：拉多斯，2002）。此外，在行政学本科课程（希利克曼等人）进行的研究。（2009年），另一个积极点出现。结论是，学生更喜欢距离模式，因为主要与组织学习动力学本身的灵活性有关，而这种能力受到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的高度重视。这项研究证实了Shaa和科尔卡博拉多雷斯（2001年）的建议：寻求教育的学生被灵活性的便利所驱使，在有利于它的地方制定自己的时间表和发展学习。

摩尔（2007年）还报告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考虑与公共政策有关的问题。作者认为，诸如增加学习机会的机会、更新技能、降低教育成本、支持现有教育结构、培训教育系统、消除年龄组之间的不平等、指导特定群体、对重要群体进行紧急培训、增加新领域的技能、将工作、家庭生活和教育结合起来、汇集国际教育经验等原因。所有这些都将是当代社会的重要项目（摩尔：科尔斯利，2010）。

1.9 社会、技术和 EAD

对于托夫勒（1997年）来说，当代社会正在经历新的变革，一场革命。被作者理解为波浪，人类会达到第三。第一波将与大约一万年游牧文明成为农业的时代有关。第二波，大约200年前的工业革命。第三种是在1950年左右在美国和一些富裕国家出现的，与信息革命有关，现在被认为是一种财富。研究人员（TOFFLER, 1997年）也认为，未来的战斗将不再是能源，商品或原材料，而是与知识相关的产品，如通信渠道，数据库，知识产权及其产品，除了智能服务。

托夫勒对这场革命的思考源于我们生活在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知识社会"的理解中。这将作为其基础和资本，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管理知识，被视为一种经济技术范式（LASTRES：ALBAGLI, 1999），因为它无处不在的使用将渗透到整个全球社会，其经济后果，在日常生活中点头，是不可避免的（CASTELLS, 2015）。今天，根据Castells的说法，我们可以申明，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渴望信息和技术服务的社会，这种服务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基础，其价值观正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瓦尔迪兹：奥利维拉-史密斯，2013;卡洛斯，2007;卡斯特尔斯，2015;利维，1999）。除了许多其他术语外，正在创造新的术语，作为"信息社会"和"学习经济"，以指定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社会模式，通过交流连接起来，这要归功于对信息的获取。：阿尔巴格利，1999年）。互联网是渗透到全球化世界的ICT的结果，它使在地理上完全孤立的人们能够迅速获得信息（SCHOENHERR, 2001年）。

在这场媒体和信息革命的背后（CASTELLS, 2015年;最后：ALBAGLI, 1999），来到 EAD 在一个动态增长的过程中，因为信息和工程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作技术支持其扩展（FORMIGA：利托, 2009）。随着构成所谓"网络空间"的虚拟空间的建立，社会开始获得其他产生和获取知识的方式（LéVY, 1999年;2007年）。网络空间使教学学习替代方案（如 EAD）的成长具有更大的发展能力（FORMIGA;利托, 2009）。反过来，这种增长也使分配等优势得以出现，因为全球互联网的连接和喷洒、时间和空间的灵活化、运营成本的降低等。（坎波斯，2015a;蚂蚁;利托, 2009;尼基耶,

1999) .技术进步为信息传输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使教学能够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ALVAREZ：奥利维拉-史密斯，2013年）。

电子媒体的这些进步最大限度地利用了EAD。对于这些设施和其他设施，近年来，EAD的增长显著增加（2007年，PACHECO）。

社会方面也需要一种灵活的教育方式，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日程安排和生活动态获得信息（VILLARDI：奥利维拉，

2005）.由此产生的这一概念是开放教育模式理念的基础，这种观念在当今社会日益存在，因为它符合满足新的教育需求（ROCHA：瓦尔迪维亚;菲罗斯，2015年），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贝洛尼等人，2002年）。据福米加和利托（2009年）称，随着互联网等服务在世界各地的普及，它也会增加对课程的需求。THE

的传播与今天基于互联网可能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CITs）可以采取的行动的动态性有着内在的联系。这将增加推广《教育法》的可能性，因为由于有可能使用技术，采用该技术的机构没有时间限制，也不需要为发展教育活动提供实际场所。因此，将促进以另一种方式学习，特别是对于那些不能或不能接受传统教育的人（FERREIRA，2010年：摩尔，2007;摩尔;卡尔斯利，2010;席尔瓦，2010;维亚纳;普罗巴，2015）。

重要的是要强调，THE是一种教学方式，就像面对面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一些减法，而另一些则增加了新的教育可能性，允许在其特定特征范围内实现具体目标（戈麦斯，2008年）。然而，对《国家教育法》的积极看法似乎没有可信度（BELLONI，1999年），因为在网络空间发展起来的正规教育与传统的面对面教育没有同样的公众认可（SANTOS，2006年：维亚纳，2011;维亚纳;普罗巴，2015）。

因此，即使我们社会有扩张的所有可能性，也产生了一系列偏见，其起源和动机影响了对EAD的抵抗。

1.10 模式效率

事实上，导致消极认识，甚至抵制这种当代教育形式的原因，将与其最终目标的教学方法的低效有关。即，只有让评估学习的预期结果得以实现，偏见才能有具体的理由。然而，研究表明，远程和面对面教育的有效性相当（CARLOS，2007年：艾萨;桑托斯，2009;蚂蚁;利托，2009;摩尔，2007;摩尔;卡尔斯利，2010;VIANA，2011）建议，偏见和抵抗距离模式可能是没有根据的。对于坎波斯（2015）来说，

区别在于使用的方法，

而不是模式。例如，在里约热内卢联邦农村大学（UFRRJ），远程管理课程在全国学生绩效考试（Enade）中获得了比亲自提供的同一课程更高的成绩（UFRRJ，2017年）。

。

在公布的排名中，该课程在距离方式上被归类为国内最高等级的课程：这不是孤立的事实。

席尔瓦（2010年）在巴西进行的一项比较研究表明，在管理课程的会计科学某些学科（一般会计一和二、管理会计、财务报表分析和财务报表分析）方面，CEDERJ联合会的EAD模式与面对面的方式之间没有重大差异。根据该研究，在这些学科中，学生在学习中的表现，当在信誉良好的大学的面对面课程中教授时，以及通过基于AD的课程（由上述财团管理（也由信誉良好的大学提供）进行教学时，其表现是等效的（SILVA，2010年）。凯茜克（2001年）进行的研究也指出了同样的结论。

在米纳斯吉拉斯州联邦技术教育中心，通过《手工白兰地生产和控制方法》的因特网进行面对面和非面对面的方式比较，发现它们相似。在这项分析中，作者认识到，尽管个别学习轨迹不同（CACIQUE，2001年），但学生在考试中成绩所揭示的平均成绩是等价的。但还有更多。在一项与伯南布哥联邦大学学生进行的一项研究中，22%的学生有AD经验，发现在总共64.8%的学生中，有64.8%的学生认为这种经历是积极的。此外，老年人对参与广告模式表现出更大的兴趣（CARLOS，2007年）。在国家环境规划署（200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这些课程在13个可能对不同模式进行比较评价的领域中，有7个表现更好。

对于开放大学的英国研究员迈克尔·摩尔（2007年）来说，在世界各个地区，THE在学习方面并不逊色。据这位学者说，可以看出，与传统的教学建议相比，一些使用"THE"研究教学建议的作者往往指出，前者能够提供与第二级相同的学习质量。

如果指出远程和面对面教育同等有效程度的研究是有充分根据的，这可能意味着对距离模式的偏见或抵制可能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坚持。简言之，THE的障碍不仅与技术有关，而且在社会领域，由于偏见和负面形象，它们将是常识的构建，而不是客观基础的构建。因此，消极的社会观念和象征性的观念，即社会表现，可能是现代AEd的主要障碍之一，而不是技术障碍。

1.11 社会表现和

与社会表现有关的许多研究都出现了对AEd的偏见或抵制问题。社会表现学的研究路线包括让-

克劳德·阿布里克（1998年）创造的中央核心。在这一行中，发现了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经验研究（巴雷托：梅内塞斯;莫斯康,

2016;概念：美国西尔瓦;欧盟，2011年;马尔基索蒂等人，2017年;SANTOS,

2006），从中我们能够提取比较标准，使用中央核的概念。稍后，我们将在本文中更深入地探讨这一概念。然而，要理解下面的第6表，我们会指出，与共同社会表现的基础相对应的"中心核心"，从某一群体的记忆中协商一致，将对一个群体的集体变革产生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抵抗力（Sé, 1996年）。

我们组织了与上述实证研究相关的结果，创建了一个表格，其中提到与 **THE** 接触过的人（图表 7）和从未与 **THE** 接触过的人（图表 6）。

表 6 - 与 AEd 和中央核心的研究之间的比较 - 与 Aed 没有联系的人。

研究	中央核心	公共	显示 (人)	EAD 结果	观察
从巴西的角度来看， 远程教育的社会表现 (马尔基索蒂等人，2017年)。	灵活性，易用性，实用性，纪律性，时间，便宜，成本，机会，互联网和便利性	方便 无明确	100	积极的 看法 EAD	81%的人至少修过研究生课程，其中34%是硕士。结果被认为是积极的一些发现，如：方法效率低下，缺乏与教师的互动和可能的市场贬值
远程教育的社会表现 (SANTOS, 2006年)	缓解 灵活工作时间 方便 互联网 迅速	大学 课堂 教学	195	灵活性的积极 见解 对结果和努力的负面 影响。	绝大多数人认为市场将ead文凭 (3/4的学生) 和其外围系统词区分为"双重"。那些与 THE 接触的人会有较少的负面反省倾向。学生有舒适和灵活性的感觉，因为他们不会有测试或流离失所
教师和学生在线远程教育的社会表现： 抵抗和/或偏见？ (概念：美国西尔瓦； 欧泽比奥，2011)	经济学与肤浅，孤独	教师 和 大学生 高等教育	20	阴性	85.7%的人认为面对面课程获得的文凭在市场上更有价值。

表7- 与 AEd 和中央核心的研究比较 - 参加远程模式的人

研究	中央核心	公共	显示 (人)	EA D 结果	观察
远程教育的社会表现 (SANTOS, 2006年)	轻松、灵活、 自由、方便、 速度	大学远 程高等 教育	201	积 极 见 解	他们认为文凭的价值与面对面的文 凭不同。 出现在"双重"和"互联网"等概念的 外围。 学习的灵活性，但有很多的奉献精神 理解为工具和功利
教师和学生在线远程 教育的社会表现：抵抗 和/或偏见？ (概念：美国西尔瓦； 欧泽比奥，2011)	自主，未来， 教师准备，未 来	教师和 大学生 远程高 等教育	20	阴 性	85.7% 的人认为面对面课程获得的文凭在 市场上更有价值。诸如"经济"和"表 面发现"之类的词。
EaD学生关于远程学习 和就业能力的社会代表 (巴雷托：梅内塞斯； 莫斯康，2016)	难度、灵活性 、识别性、时 间和便利性	大学远 程高等 教育	26	阳 性	学生在加入之前认为要改变方式是 很困难的。 提出的消极的一面是管理自己学习 的困难。 学生不会担心就业市场和 EAD 学生的就业能力。

我们强调下面从上表 6 和 7 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桑托斯(2006年)，在距离模式，78%的学生说，他们不担心教学质量，虽然这个答案并不妨碍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回答市场不应用相同的价值，面对面的课程。在同一研究中，作者(SANTOS, 2006年)重申，对于这一群体来说，选择《战略》具有工具性和功利价值。在上述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存在积极的偏见，鉴于市场的期望，EAD模式文凭的性质仍然存在尴尬。

1.12 研究问题：第一种方法

正如迄今为止广泛讨论的那样，对于高等教育中未达到正常年龄的人来说，《教育法》一直是第二选择方式(BELLONI, 1999年：2001年，维亚纳，2011)。然而，它似乎有许多实际优势，如时间灵活性(戈麦斯，2008年：尼基耶，1999)。如果没有学习方面的损失(费雷拉，2010年：摩尔，2007；SILVA，

2010) , 为什么远程教育仍然处于阻力和偏见之下 (BRAUER, 2008 : 概念, 西尔维娅;席尔瓦, 本托·杜阿尔特·达 : 欧盟, 2011年;维亚纳, 2011) ?

对于某些作者(康塞尼奥 : 美国西尔瓦;EUZEBIO, 2011) , 还有其他与决策相关的因素, 如情绪和社会背景。其影响将是实际的, 因为主题将根据他理解的忠于自己, 由于他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的压力 (STRUNGA, 2015年) 作出决定。

决策, 无论多么合理, 总是通过负面或正面的形象系统, 由表示 (CASTELLS, 2015年;达米西奥, 1995年, 2004年) 。

选择

THE

的决策可以考虑以前与社会构建图像相关的情感因素, 这些情绪因素通常由接受劳动力市场模式的负面社会压力产生。社会象征成为有效的障碍

(国家 : 美国西尔瓦;EUZEBIO, 2011年) , 因为负面的表述"似乎是一种结晶的态度, 并作为一个象征性的障碍, 这种教育的有效性" (CONCEIÃO : 美国西尔瓦;欧盟, 2011年, 第1273页) 。

我们认为, 对EAD的抵抗结构似乎有两种力量 : 一种是微观的, 与个别因素有关 : 另一个宏观, 与社会方面有关。根据某些作者的说法, 这两个因素

(康塞尼奥 : 美国西尔瓦;欧盟, 2011年;STRUNGA, 2015) , 在决策中直接影响主题。据他们称, 即使个人明白劳动和社会保障会为他的生活带来好处, 当他意识到有社会表现不能证实他个人的理解时, 他也会改变自己的行为, 预见到未来劳动力市场将因教育而受到惩罚。

有鉴于此, 我们想进一步探讨许多作者讨论的问题, 我们在此章节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 最初的研究问题是基于我们在这些研究人员的贡献中发现的差距。本论文的目的在于绘制对《社会代表法》的偏见和抵制, 用一种新的视角来概括这一现象的图景 : 阿戈拉斯现象, 这是本研究的一个核心要素, 通过这一观点, 对理论方法建议产生的问题的处理具有独创性, 并在社会表现理论的一个方面的方法框架中进行了重大修改。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强调社会表现与其群体的关系, 其特点是围绕阿格拉的概念, 这将在本文的后期定义。在理论章节的结尾, 我们将根据下面的思考重新提出我们的研究问题。

对象征性社区的2种社会表现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讨论与我们工作阐述有关的三个理论层面。首先，我们将简要回顾一下与社会代表理论有关的方法。其次，我们将提出我们用来解释互动交流过程的感官生态学理论。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个阿戈拉假说，一种形成交流的机制，我们采用这种机制作为召唤方法的补充模式，通常用于研究社会表现，我们稍后将对此进行讨论。

2.1 社会表现

2.1.1 玫瑰不说话：从陈述到社会表现

毕竟，它代表什么东西？人类的头脑除了命令它们并赋予它们意义之外，还有能力在内部保留和复制心理图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代表（达米西奥，1995年，2004年；皮亚格特，1964年；维戈茨基；塞梅诺维奇，2014）。此存储不仅仅用于视觉图像。还有其他的，如“声音图像”和“嗅觉图像”（DAMÁSIO, 1995年，2004年）。

这些不同的感性图像，从真实的过去唤起，从未来的计划唤起-是大脑结构。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真实的自己，还有其他人谁建立相同类型的图像。我们与其他人分享，甚至与一些动物分享我们世界概念所支持的形象：不同个体对环境的基本方面（纹理、声音、形状、颜色、空间）进行阐述的构造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因此，我们心中的图像是我们每个人与生物体周围物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达米西奥，2004年，第116页）

头脑可以创建表示，积累它们，并组织它们。随着意义的归因，它产生的意义，我们通过我们所谓的“思想”来表达。例如，这些表示能够进行行为或操纵未来的操作。这些陈述是主题相互作用的结果（DAMÁSIO, 1995年，第108页）。人类的代表性将意义与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一组含义可以由组成员共享（HALL, 2009）。然而，感官将取决于与世界及其对象、人、事件、事实等相关的其他变量。例如，在罗马认知与技术科学研究所由意大利灵长类动物学家埃利萨贝塔·维萨尔贝吉进行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美洲最大的灵长类动物——

卡布钦猴，即使不完整（ADDESSI等人，2008年）也有必要进行认知回路来表达符号。然而，在人类中，有极大的抽象和象征性操作能力。代表使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诞生于童年，从感官运动阶段（18-24个月），当孩子们开始建立表现和思想（PIAGET，1964年）。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没有图像或心理表现的力量，知识就无法传播（MARKOVÁ，2003年）。

对于Marková来说，“现在已知的精神表现是自然的镜子或迹象，它们是象征性结构的正式化，它们是大脑的过程和规则”（2003年，第34页）。

用伟大的巴西桑比斯塔诗人阿格诺·德奥利维拉的话说，卡托拉是“玫瑰不说话”（O GLOBO，2007年）。诗人在这句话中，用一个比喻概括了一般表现力和社会表现力。玫瑰，作为一个对象，存储在我们的头脑（表示）属于客观，物理世界。然而，它的意义超越了客观世界，即美丽和美味，除其他外，还属于花的范畴，它可以传递另一系列的精神形象，如愉快的气味和和谐。这些含义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共同的（构成一种社会代表性）。给某人一朵玫瑰不仅仅是送植物，而是一种充满意义的感情行为。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卡托拉的短语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可以赋予的意义是无数的。玫瑰不是通过葡萄牙语产生意义的，而是人们把意义归结于玫瑰。问这些花关于这些台词的真实性是没用的，因为毕竟“玫瑰不说话”。

2.1.2 认知革命和社会表现：共同梦想的梦想是现实

现在，我们将从认知革命的角度解读社会表现的形成。据了解，在本文的这一背景下，生物社会方面形成并融合了社会表现的概念，是我们今天对人与人的认识的组成部分。我们在这里强调社会表现（RS）作为自然人类现象与社会代表理论（RRT）及其各种方法之间的差异的重要性，作为研究S的学科。

人类物种（来自拉丁“智者”的智人）在西非居住了至少20万年。它的游牧生活方式导致该物种喷洒自己在世界各地（桑托斯;DIAS，2013），建立越来越多的复杂的工具，这开始成为他们生存不可或缺的项目。这使得该物种有能力适应各种环境，从缝制文物发展到切割。在70至30,000年前，智人开始发展弓箭、灯和容器（PRADEEP，2012年：圣徒;天，2013）。此时也出现了宗教和社会分层的第一个迹象，即我们不仅开始讲故事，而且开

始相信它们。这一时期被称为人类的认知革命（哈拉里，2017年）。

换句话说，根据哈拉里的说法，我们能够通过语言进行对话，并在社会上分享这一信息。

认知革命使人类在沟通中发展出不可思议的多功能性。然而，这本身并不是其巨大智力能力的唯一原因，这也将通过其成员之间的沟通形式（HARARI, 2017年）形成。

了解人类社区比了解世界的客观信息更重要，例如野牛或任何其他动物的位置。重要的是要知道谁是谁在他们的社区，谁感到仇恨谁，谁领导谁和相互关系（弗里曼，美国：赫伦，2009;哈拉里，2017;普拉迪普，2012）。

智人主要是一种社会动物。事实上，只有以复杂的方式进行沟通，才不会给人以极大的智慧。昆虫和其他动物以各种方式交流：在某些种类的灵长类动物中，个体可以与羊流捕食性动物的到来，蜜蜂可以移动到花的蜂巢精确位置等。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类，不仅是信息交流的复杂性，而且是社会进化的交流超越了对物质的观察，也可能代表一些从未接触或感受过的东西，创造一个主观的新世界，完全看不见，相信它是现实的一部分（HARARI, 2017年）。因此，认知革命和社会表现将促成两种现实类型的形成：主观世界和世界目标。

人们通过这个故事网络创造的东西类型在学术界被称为"小说"、"社会结构"或"想象中的现实"。与谎言不同，想象中的现实是每个人都相信的，虽然这种共同的信念依然存在，但想象中的现实对世界产生了影响.....因此，自认知革命以来，智人一直生活在双重现实中。一方面，河流、树木和狮子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神、国家和公司的想象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象中的现实变得更加强大，所以今天河流、树木和狮子的生存取决于神、国家和公司等想象实体的恩典。（哈拉里，2014，第38页）

代表社会的事实突出了其他物种的人。例如，某些灵长类动物作为猴子，将是"从他们自己的视野中奴役奴隶"（VYGOTSKI, 1991年）。

对于杜尔克海姆（1999年，2000年，第180页），"没有概念的人不会是人，因为他不会是一个社会存在，仅限于个人的看法，他不会与动物不同"。从根本上说，概念和社会是我们作为人类基础的一部分（莫斯科，2000年）。

创造、沟通和设想现实是物种个体在植物遗传和社会文化历史中发展起来的技能，因此是人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MARKOVÁ, 2003年）。

语言将概念连接在人与人之间，例如，允许我们参考物体的真实世界，从事件到想象世界（HALL, 2009年）。

对于维戈茨基（1991年）来说，世界不是仅仅在客观的平面上看到颜色和形式，而是被看作是一个有意义和感官的世界。看到时间的简单行为本身就比较客观理解更复杂。“我们不只是看到一些圆和黑色的双手：我们看到一个时钟，我们可以区分一只手和另一只手”（VYGOTSKY, 1991年, 第25页）。

一些社会接受的概念仅仅是人类想象力的阐明。例如，让我们以在公司工作的现代人为例。这一概念在物理规划中并不存在，而是集体社会建设的结果。在葡萄牙语和英语中，为了指定一家公司，我们使用术语“公司”或公司，从拉丁语语料库，其翻译将是身体。我们创建一个社会机构，维持它，并提供它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有自己的个性。我们为行为人采取行动，为本机构内行为准则定义明确的演员创造角色（HARARI, 2014年）。

认知革命后的智人创造了极其复杂的概念，如货币。这种社会观念是建立在发行国和经营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之上的：如果人们不相信发行的钱有价值，它就会不再被接受，而只是一张纸。携带巴西纸币前往其他国家旅行时，不得在兑换处外接受，因为对于其他国家，人们并不普遍认为该货币有效。这只是一张毫无价值的纸。在其他国家，如南美洲的厄瓜多尔，货币是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没有自己的货币，但这并不是说厄瓜多尔作为一个国家并不存在。2002年，人们认为欧元将取代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西班牙比塞塔、意大利里拉、葡萄牙盾等硬币，欧洲没有熔化金条，将其转换成新货币：它只为该人口重建了标志（THÉRET, 2008年）。

国家的概念就是基于集体的想象，每个人都是。除了极少数例外，分裂一个国家的大多数边界都是虚拟的，因为它们只存在于制图地图和复杂的海关迁移过程中。不仅仅是基因组合的抽签，它导致一个人是巴西人，美国人或法国人，它不是身体特征，而是主体认为的主观身份，由相信它的其他人，在规则（法律，规范等）监管的象征单位内维持。

社会和生物力学可以有直接和所谓的普遍联系。根据莫斯科维奇（2000年）的说法，帮助我们社会形成的两项原则是连贯性和稳定性。马尔科维（2003年）建议个人尝试将自己的信仰组织在内部连贯的结构中。因此，人类更喜欢稳定的结构，而不是不可烤的结构。一些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组成群体的个人往往有相似的观点、品味和行为，以维持现状，避免冲突（MARKOV+, 2003年：莫斯科，1978年）。对于

马尔科韦（2003年）来说，稳定并不意味着停止，在分析这一现象时，各方之间有一种持续行动的感觉，用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平衡理论（1976年），因为这一过程是动态的，正如作者所观察到的（MARKOVÉ, 2003年）。

国家、货币、国籍都是我们认为相互联系的社会象征的一部分，为个人团体和社区提供了稳定和一致性（MARKOV+, 2003年：莫斯科，2000年）共享某些物理，象征性的领土或两者兼而有之。在理解我们通过稳定和一致性构成社会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三件事：

- (1) 我们假设人们同时了解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
- (2) 我们使用他人跟踪的经验：和
- (3)

思想和信仰使我们能够面对现有的社会结构，如俱乐部、部族、教会、家庭（莫斯科维西，1978年）。

文化的概念正是与这种理解联系在一起，这种理解是由将客观世界与主观生活和社会生活融为一体的现实所形成的。

文化的概念本质上是象征性的。相信，像马克斯韦伯，该名男子是一个动物绑在天花板的意义，他自己编织，我认为文化作为这些天花板和他们的分析：因此，不是作为一种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作为一门解释性科学，寻找意义。（1989年，盖尔茨，第15页）

用莱温的话说（1948年，2000年，莫斯科），"现实对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接受的现实"。然而，作为一个个体实体，并不排除我们理解我们属于一个群体或社区，接受社会现实，将我们融入社会本身。"梦想只是一个梦想，梦想在一起就是现实"这句话，归结于诗人、剧作家、西班牙小说家、著名名著《多姆·吉克索德·德拉曼查》的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韦德拉，他通过劳尔·塞克斯于1974年创作的一首歌在巴西广为人知。这句话概括了这一节：我们有可能不仅把现实理解为一个客观世界，而且可以通过集体相信一个思想、一个梦想、一个社会构成的阐述，通过我们的认知能力来构建，我们从主观性中互动地改变它。简单的思维行为是反映内在现实过程的动态行为，与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认知和感受一起构成。

2.1.3 社会表现理论

RRT于1961年提出（阿尔梅达：圣徒;特里恩达德，2014年），由谢尔盖·莫斯科维奇，试图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角度重新讨论陈述的主题（莫斯科，1978年;南非，1996）。社会表现理论在作为科学框架的构成中并不暗示实用主义，而是基于人性本身的对话为基础的常识逻辑。因此，它过去在文化、传统和语言（MARKOVÁ，2003年）中确立，是日常思想所设想的一种自然和社会现象，即所谓的“常识”。如果没有人们在属于某一群体的个人之间掌握和传播这一信息的渠道系统内的互动，就不可能有社会知识（《莫斯科国际报》，2000年：罗曼，1992）。

在莫斯科维奇的定义（2000年）中，社会表现是“一组概念、命题和解释，起源于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日常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它们相当于传统社会的神话和信仰体系：它们也可以被看作是当代的常识版本。（莫斯科，2000年，第45页）

对于Jodelet（2001年）来说，社会代表性的定义包括“一种知识形式，由社会阐述和分享，具有实际目标，有助于构建社会共同的现实”。作者让-克劳德·阿布里克（2004年）提到，这是“个人或群体重组其所面对的真实情况并赋予特定含义的心理活动的产物和过程”。Geertz（1989年）则建议将文化作为一种心理结构，通过这种结构，个人或群体引导他们的行为，我们在这里理解它相当于社会代表性的概念。最后，Stuart Hall（2009年）将代表和文化定义为“共享的概念地图”，有助于理解什么是社会代表性。

代表性是培养和分享一种文化成员的符号的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有时被定义为“共享感官或共享概念地图”（HALL，2009年，第45页）。

代表权的概念与社会接受和使用的概念有关，能够帮助传导或产生现实。社会代表性应被视为一种与个人和群体有关的氛围（MARKOVÉ，2003年）。例如，对于与金融有关的群体，红色数字被认为是消极的（MOSCOVICI，2000年），这是社会接受的，是理解这种媒介的一部分。诸如“我闯红了”之类的短语，反映了这个想法，意在说某人没有钱，即有中心思想的体现。受试者对物体的全局图像称为比喻核（Sé，1996年）。

社会代表理论由两个社会认知和辩证层面组成（《社会代表理论》，2005年：莫斯科VICI，1978年） - 从两个角度观察：(a) 个人 - 是集体共同要素的单独发展和分布代表；(b) 集体 - 涉及个人在社会群体中产生的社会共同表现，来自群体中主体的沟通关系。然而，根据莫斯科维西（2000年）的说法，接受环境中的自主权和条件，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都有两种具体的功能：

a) 首先，他们将他们遇到的对象、人员或事件传统化。他们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形状，定位在某一类别，并逐渐把他们的某种类型的模型，独特的和共享的一群人。。。b) 第二，陈述是规定性的，即它们把自己强加于我们作为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个结构的组合，存在之前，我们甚至开始思考和传统法令什么应该思考...（莫斯科，2000年，第36页）

即，社会表现既被视为常规的，又是规范性的，即它们先于这一主题并把自己强加于人（《莫斯科国际报》，2000年），作为社会行动和关系的指导（ABRIC，1998年）。对于 Abric（2004年，第14页），表现在社会动态和实践中发挥着根本作用，有四个功能支持这些功能：

- 知识的功能：允许解释或理解一种现实：
- 身份功能：定位主体及其与群体的关系，定义个人和集体身份：
- 指导功能：在社会上进行个人的行为和行为：
- 证明功能：允许受试者为行为和立场辩护。

社会表现可以在构成世界和人民各种形象的物理和社会环境中确定。此外，由于新的表示，我们不断添加、交换和丢弃表示，因此这种表示是动态的（ABRIC，2004年：霍尔，2009；乔德莱特，2001年，2005年）。

社会代表性的目标是通过莫斯科维奇（2000年）称之为安克雷奇和对象化的双重过程，将一些不熟悉的东西转变为家庭。对象化是同化具体表现的过程，锚定具有认知功能，将所代表的对象整合到现有的思维系统中（JODELET，2005年：莫斯科维奇，2000）。因此，这种双重过程产生：

- 对象化系统 - 将不熟悉的东西转换为熟悉的东西，将象征性质量归于一个想法；
- 锚定系统-

根据过去的记忆和结论对某物进行分类和命名，这就是为什么当您无法对某物进行分类时，会遇到阻力的原因。

分类和命名的活动是截然不同的。当我们调用某物时，我们将此命名对象纳入我们的文化存储，将其从莫斯科维奇所谓的"令人不安的匿名"中删除（莫斯科文，2000年，第66页）。这提供了一个家谱，以定位这个新的对象在我们的文化矩阵。已经把不熟悉的宇宙变成熟悉的、自愿的宇宙，创造了我们可以移动的宇宙。根据莫斯科维奇（2000年，第59页）的说法，熟悉的过程"确认和安慰"了我们，赋予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群体和个人连续性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于研究人员来说，社会代表消除了不熟悉的群体，并导致这个群体受到不连续性和缺乏意义的威胁。然而，根据心理社会学家的说法，因此，需要不断重建构成图像和感官基质的常识，没有这种常识，就没有集体活动。

RRT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所谓的"认知多失语症"，用约夫切洛维奇（2014年）的话说，即"对外部观察者来说似乎是非理性的或错误的，对知识主体有意义，与对个人和社区表达和意义有关"。即，通过这个概念，人们理解，没有绝对的真理，而是根据每个社会的真理版本（JOVCHELOVITCH, 2014年：莫斯科维奇，2000）。作为这一概念的一个例子，可以观察到，在我们的社会中，当一个人生病时，医生选择他的疾病是很自然的。然而，在土著部落中，巫师是卫生权威的代表，而不是穿白色外套的人。这些概念可以根据每个社会群体或社区的理解进行交替。然而，一方面，人们不能理解部落是错误的：也不是其他的，白人会被误认为。甚至什么是好的医学的概念也改变了，就像中国，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那里的绝大多数居民不使用西方合金，而是使用传统中医。然而，在巴西等其他地方，其有效性是争议和争议的主题（2013年《圣保罗圣保罗报告》）。我们可以说，对于一个群体来说，valor将是一个人学会重视的东西。例如，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冈萨雷斯抵达美洲寻找黄金时，降落在现在的巴拿马，奴役了该地区的印第安人，拆除了他们的卡拉维尔，用奴隶武力将其重新组装在太平洋上（BUENO, 2018年）。

这，在穿越达里安地峡后，被认为是今天美洲最危险的地区之一（英国广播公司，2018年），目的是寻求"埃尔多拉多"（秘鲁）。对西班牙人来说，黄金是财富和浮士德的概念，而对于该地区的魁北克人和印加印第安人来说，黄金并不象征货币价值，而是象征着"太阳神的眼泪"（BOUYSSSE-CASSAGNE, 2017年）。

这可以在群体和个人中看到，从他们的社会表现到理解世界和情感的逻辑。关于这个主题，我们可以增加哲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勒内·笛卡尔（2001年）的贡献。在他的著作《方法的话语》中，他指出，"常识是世界上最好的传播方式：因为每个人都认

为他们得到了很好的提供，所以即使是那些最难以满足自己需要其他东西的人，通常也不会比他们更渴望常识。因此，并不是每个人都错了：但是，相反，这表明判断和区分真与假的权力，这正是我们所说的常识或理性，本质上是人人平等的：因此，我们意见的多样性并不是因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合理，而只是因为我们以各种方式进行我们的思想。（《德斯卡特斯》，2001年，第5页）

这种对认知多失语症的解读——个人理解的逻辑和社会表现——将从主题扩展到Agoras的逻辑，其中建议考虑社会群体的各种物品，这将很快在本文中提出和讨论。

2.1.3 社会表现的对话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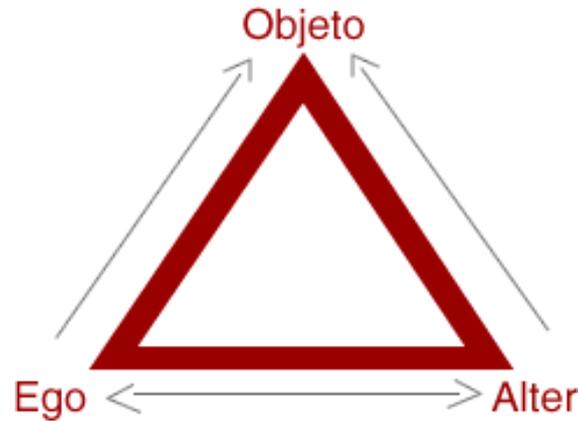
为了更好地了解指导社会表现理论的心理社会学方法，莫斯科维奇（2000年）增加了以主体-对象三角测量为指导参数的必要性。换句话说，欧盟（EGO） - 其他（阿尔特） - 目标之间会有一个三角形。这些不是三个固定的，但动态的实体，将结构从诊断（MARKOVÉ, 2003年, 2017年）。

总之，社会表现是通过这三个不可分割的实体建立和发展的。对于莫斯科维西（2000年）来说，RRT的起点是主体和对象的经典区别的破裂。这位归化的法国罗马尼亚社会研究人员鼓吹说，主体和对象在功能上不会是不同的，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先验集，这意味着对象本身不会存在，而只是与一个主体（个人或群体）有关。对他来说，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决定对象本身的原因。即，与其他思路不同，EGO和ALTER在此背景下不被视为对手，而是被视为沟通系统的两极（MARKOV+, 2003年：马尔科维，2017）。

马尔科韦（2003年）认为这种结构是社会知识理论的基本单元（图5）。人类的头脑能够处理和沟通EGO、ALTER和对象之间的对话，从而创造社会现实。²

图 5 - EGO、阿尔特和对象之间的对话（EAO）

²当我们谈论"EGO"或"ALTER"时，我们指的是数百个唤起代表世界形象的术语的人，我们通过使用定义的文章来废除所有提及它们的词语。“o”改变”，指个人。我们尽可能避免使用未定义的文章，而倾向于中性形式（EGO 和 ALTER，无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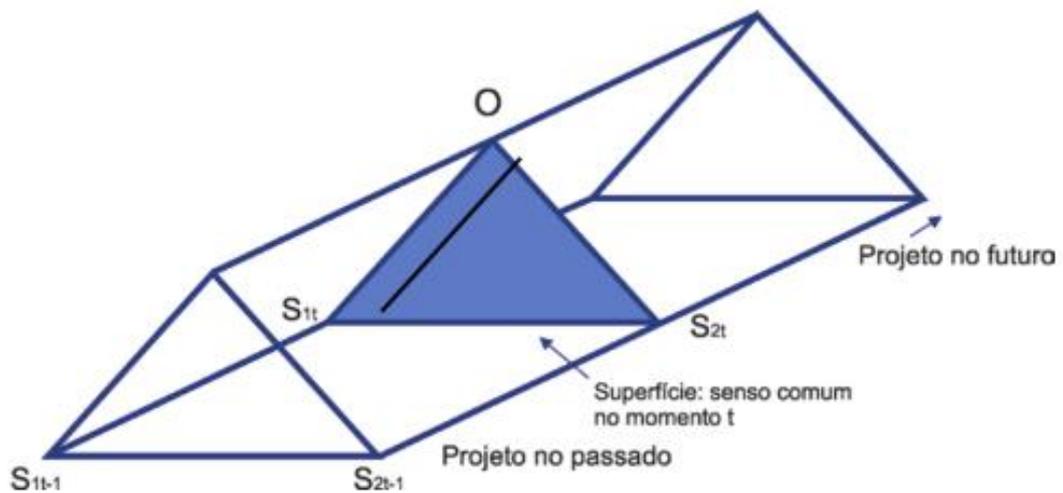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马尔科韦（2003年）

语言和社会思维是AOE关系引起的动态现象，呈现了对话性特征。它们是紧张和冲突的产生者，总是需要一个平衡的过程来维持自己。即，这个三合会的伙伴关系总是需要双方谈判（MARKOV+, 2003年, 2017年）齐通，2014）。因此，Ego 和 Alter 之间存在电压关系（MARKOVÉ, 2003 年）。因此，社会表现理论将交流和语言作为社会心理学中每个命题的中心点（MARA PALLÉ：拉罗卡，2007;马尔科维，2003）。

社会知识是沟通中的知识，是行动中的知识。除非社会内部、个人之间或个人与群体之间、子群体和文化之间形成、维护、传播和转化社会知识，否则就不可能有社会知识。社会知识是指稳定和变化的动态（MARKOVÉ, 2006a, 第27页）。

EGO和ALTER是本体论本身的领域，基于它们：自然和适当的人类，一个象征性地沟通的物种（MARKOVÁ, 2003年）。鲍尔和加斯克尔（1999年）在研究社会表现物的EGO-ALTER-OBJETO（EAO）三角测量（EAO）三角测量的文献中发现了一种名为Toblerone（图6）的模型，以呈现一个类似于瑞士巧克力的几何方面——它预测未来的事件是对过去积累的回音。在这种情况下，删减的代表性将发生在主体生命中的特定时刻（时刻 T），因此，临时性格可能始终在变化。阿尔特（S1）和 Ego（S2）都将处于时间运动中。因此，总剪报将与对象（O）相关的时间相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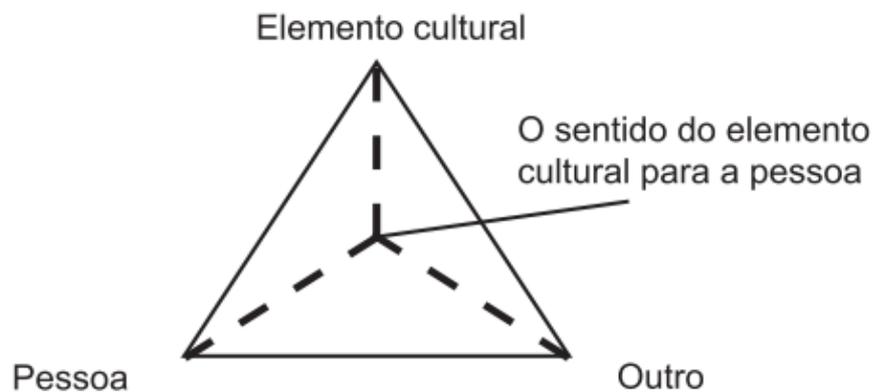
图6 - 常识托布勒龙模型



资料来源：鲍尔和加斯克尔（1999年）

提出的另一个模型（图7）是Zittoun（2014年），它有很大的亲和力，显示了维戈茨基对研究人员的影响。提交人指出，除了与对方和对象互动外，主题还涉及与自己的内部对话，即与自己就对象进行对话。因此，主体与知识对象的内在对话沿着两条线进行。内部对话的产生是因为预先存在的记忆关联和整合了新的体验。主题的意义将是这些内省方面的汇合（MARKOV+，2017年；齐通，2014）。

图7 - 具有文化元素的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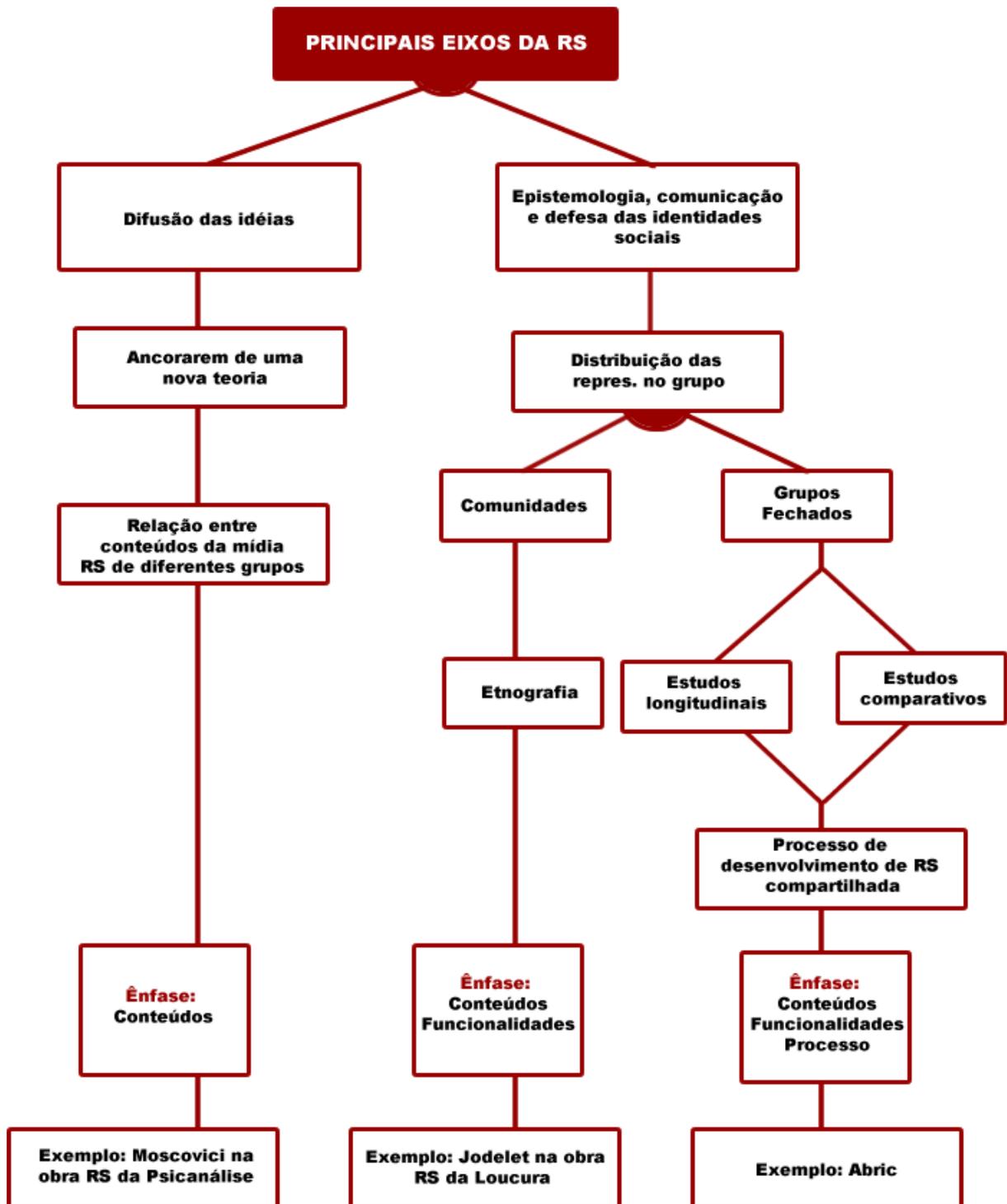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齐通（2014）

2.1.4 总结：RRT 中的主要研究轴

从对社会表现理论的一些主要研究轴的分析中，可以根据其目标来理解这一领域的不同方法，这些方法以不同的假设为指导。这些轴由斯宾克（1996年）绘制，如图8所示。

图8 - 社会表现研究的一些主要研究轴



资料来源：斯宾克（1996）

其他作者，密切但不等于sé（1998年），理解将有三个主要电流和补充莫斯科维奇的"伟大理论"：

a)

程序性及其主要配置由丹尼斯·乔德莱特（2005年）的著作提出。作者在话语中增加了社会实践，作为社会表现的支持：

b)

结构理论，也称为核心理论，具有更自信的方法论重点，在陈述的构成中提取复制的数据，由让·克劳德·阿布里克（2000年，2003年）提出，并辅之以克劳德·弗拉门特：和

c)

威廉·多伊塞社会学院，与日内瓦学校有联系，其工作侧重于个人作为决定因素的社会地位，以及该群体作为社会代表产生优势的社会地位。他的理论基础基于皮埃尔·博尔迪厄的作品（马查多，2018年）。

在本文中，我们选择社会表现的结构方法作为概念和方法框架。

2.1.5 社会表现的结构方法

一般来说，对社会表现学研究的方法理解是利用社会科学的传统技术，如访谈、实地笔记、观察、参与性观察等发展起来的。贝利尼，2011;斯宾克，1996)。这些工作形式包括建造研究（MARKOVÉ，2003年）的手工、非自动化和解释性优势，但灵感来自基于数学系统（Sé，2002年）的网络运动和方法。利用这种性质的数据来了解社会表现，法国米迪集团（安装在地中海，蒙彼利埃大学），其初步建议由让-

克劳德·阿布里克提出，后来由弗拉门特、莫利纳、吉梅利等人补充（Sé，2002年）提出。这种类型的研究被称为表达或中心核心理论的结构方法（ABRIC，2004年：Sé，2002）。

结构理论以系统化的方法论和实验原理为视角，是首次尝试与社会表现理论合作的实验室尝试（Sé，1996年）。这种方法有三个基础（ABRIC，2004年：Sé，2002），即：

(1) 社会表现是结构化和有组织的社会认知集：

(2)

社会代表的完整结构由两个子系统组成：一个中心核心和一个外围系统：

(3)

了解构建模型中社会代表性的内容并不意味着完整的定义。有必要确定一个中心核心，它将提供相互结合的纽带，这些要素是对其转变作出反应的复杂内容的要素。

据Sé（2002年）说，Abriç本人说，可以进一步探讨一些问题，例如：（a）分析中心核心的性质和决定中心核心的进程：（b）

中央和外围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与社会实践的联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一个比喻核心的构建，即认知元素的图像重组。根据Abriç（2004年，第71页）的研究，这种结构具有多样化的形态，具有两个明显的矛盾特征："表述既稳定又移动，刚性又灵活。。。。。这些陈述是双方自愿的，但也带有强烈的个人间差异。

然后，Abriç建议，社会代表将是一个单一的实体，由双重内部制度（图9）管理，相互补充，由中心核心和外围形成（MAZZOTTI，2005年）。

图9- 中央核心和外围系统的特点

Núcleo Central	Sistema Periférico
Ligado à memória coletiva e à história do grupo	Permite a integração das experiências e das histórias individuais
Consensual: define a homogeneidade do grupo	Suporta a heterogeneidade do grupo
Estável, coerente e rígido	Flexível, suporta contradições
Resiste à mudança	Transforma-se
Pouco sensível ao contexto imediato	Sensível ao contexto imediato
Gera a significação da representação e determina sua organização	Permite a adaptação à realidade concreta e a diferenciação do conteúdo: protege o sistema central

资料来源：马佐蒂（2005年，第23页）

因此，在制度的一方面，社会代表的核心将产生代表的基本含义，并确定要素的组织，具有以下特点（ABRIC，2004年；马佐蒂，2005）：

- 建立在集体记忆中，转现某一群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价值观：
- 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界定社会群体的同质性，集体共同代表的共识：
- 具有稳定性、对变化的抵抗力，从而确保代表的连续性：
- 对眼前的社会和物质环境没有什么敏感性。

系统的另一边将构成代表的外围，在那里还有其他保护和支持中心核心的要素。这也负责上下文和更新核心决定，即"具体现实与中央系统之间的接口"（ABRIC，1

994b, 第79页)。在这方面,有流动的空间和社会表现的个性化表达 (Sé, 2002年)。根据马佐蒂(2005年)的理解,其特点是:

- 允许整合个人经验:
- 异质性,忍受群体的矛盾:
- 对眼前的社会和日常环境敏感。

通过形成代表性,主体构成并重组了自己的认知体系,使其适应自己的价值观。然而,这一制度将取决于它入的社会和意识形态(马佐蒂, 2005年:莫斯科,1978年)。

社会表现的结构建议,一般来说,在方法上,转化为一个群体中个人关键词复制的系统化。提取关键字使用一种称为自由关联或自由回忆 (EVOC) 的技术,在该技术中,研究人员可以找到对对象给定心理图像 (REIS) 的研究:贝利尼, 2011)。

在思想被复制的情况下,根据该团体唤起同一词的次数,形成了一个中心核心和社会表现的外围(MAZZOTTI, 2005年:南非, 1996)。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通过研究人员激发的关于物体的召唤来收集信息,答案的总和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表现。

召唤的方法过程被用于关于"远程教育"的社会表现的研究,从提取关于物体的关键词中,通过诸如"关于"远程教育"的前五个单词或表达方式?(概念:美国西尔瓦;欧泽比奥, 2011):"关于"远程教育"的前五个单词或短语是什么?(桑托斯,2006年)"当你听到远程教育这个词时,你会想到五个字"(MARCHISOTTI等人,2017年)。

前面提到的研究在第6和第7表中提出。

只有通过自我(EGO)和另一个(ALTER)之间的沟通,才能实现以思想作为世界共同形象来表达社会表现的主张,即在人们与世界现象的互动关系中,在群体、社区和社会的形成将是交流的表达之间客观地共同构建的现实。为了处理这一方面,我们结合了我们的理论阐述,在本文中,感官生态学理论(CAMPOS, 2017年)。这种交流理论使我们能够从主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理解世界图像的共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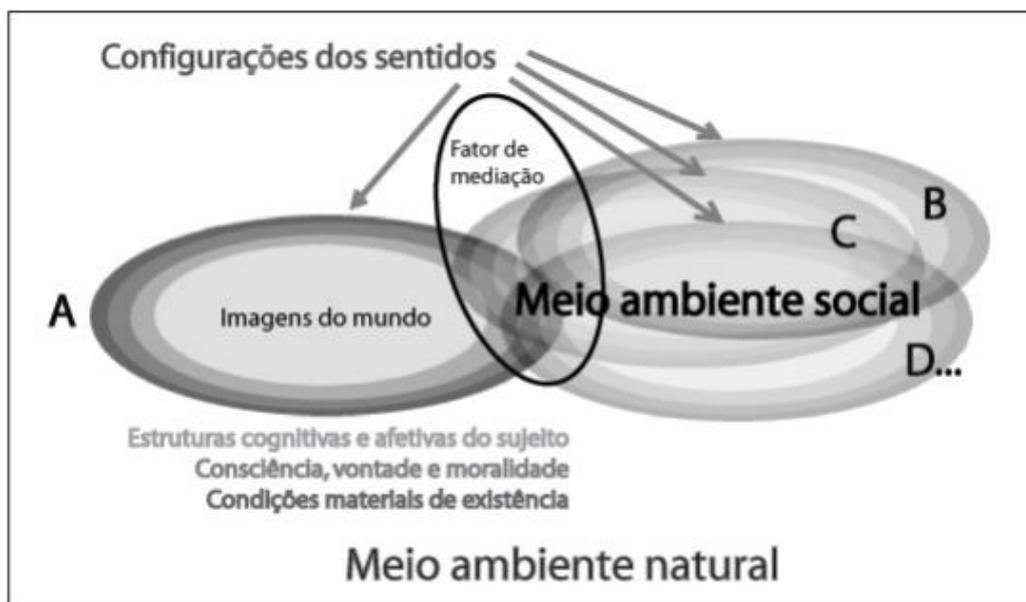
2.2 感官的生态学

感官的生态学是一种横向的传播理论，它理解知识领域被世界图像的构造和共建所跨越，这些图像由受试者、群体和/或社会产生感官的配置（CAMPOS, 2017年）。

必须强调，对作者来说，意义的配置是在相互作用中构成的，情感和认知共同促成了世界形象的形成。因此，我们不会只是被逻辑（认知）或只有感情所命令。即在交流中，认知和情感之间会有一种平衡。

关于世界形象，Campos (2017) 解释说，它是从主体、群体、社区和/或社会之间的互动中共同创造的，产生有意义的环境。这种生产构成了一个自然和社会环境，如下图10所示)。通过这个形象，也可以看出，它们是由个人产生的，这要归功于他们对主体的认知和情感结构，以及带出他们意识、意志和道德的物质生存条件。此外，可能从交易所产生的多个社会代理人（如下图10中的A、B、C和D）可能进行调解。这整套，坎波斯称之为“感官设置”，因此，表达个人表示，社会化表示（GRABOVSC HI：坎波斯， 2014） - 那些中间的主题和社会 - 和社会表现。

图10- 感官生态学（CAMPOS, 2017）



资料来源：坎波斯（2017）

因此，世界图像（表示）的形成是在动态交互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以便通过适应过程使主体中原有的配置退出。

在这里，交流被视为一种生物机制，使主体能够理解自己和外部世界。任何到内部的运动都与另一个运动与外部相关。人类已经进化并发展了通过语言来构建内在现象学体验的能力，语言融合了逻辑推理和情感。（坎波斯，2015b，第 981 页）

我们对上文作者的解释是，代表的产生前提是（图10）：

-
在社会和自然环境中的交流中创造和共同创造"世界形象"，使其具有"意志"功能的"意识"和"道德"，这要归功于其"认知和情感结构"：

-
我们只有通过"认知和情感结构"才能对社会和交际世界进行解释，因为它是我们进入世界的任何自觉行动的基础：

- 感官生态学的形成是通过主体在环境中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
- "物质条件"是感官生态学生产的基础和条件，通过它，我们与世界互动：
- 每个过程都在自然环境中同时进行。

因此，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受试者的世界表现范围是由他的认知和情感结构、群体和/或社会划定的，这反过来又与存在的环境和物质条件有关，从而能够表达由意志引导的意识，从而产生主体的伦理道德感受。正是通过沟通

（CAMPOS，2017），这些维度是社会产生的，使感官从表示的深化和出现。

作者还在他的理论中讨论了世界图像可以根据各种社会方面假设的可塑形式（CAMPOS，2017年，第430页）。这种沟通行为为他人服务，并以具有各种意图、动机等的塑料活动为榜样。在实践中，思想的流动性和复杂性表现在几个方面。其轮廓将取决于背景和与对方的关系，以及它的辞职，这始终意味着解释过程，我们称之为Grize（1996年）提出的"计划化"。

2.2.1 格里泽和皮亚吉特对感官生态的贡献

为了更好地了解坎波斯所接触的交流过程，有必要了解坎波斯的前提，并点点头，指出纳沙泰尔大学水学研究中心的创始人瑞士人让-

布莱斯·格里泽提出的自然逻辑戒律。自然逻辑，不像布尔逻辑，不是基于导致"真"或"假"思想的前提。在这种逻辑中，在特定背景条件下进行交流的主体不一定局限于"是、否"和"也许"的顺序。例如，在物理科学中，正式逻辑在就业能力方面将实现什么，需要在人文科学中超越它，以便能够理解该学科的关系状况（GRABOVSKI：坎波斯，2014;格里泽，1996）。在形式逻辑中，命题是永恒的，其核心是抽象和数学概念。然而，当一个人考虑这个论点时，它基于一个主题，他宣布某事是为了另一个主题。在Grize的陈述中，自然论证逻辑与正式争论方法的区别在于，这种交流恰恰是一种修辞的说服过程，目的是说服听众（CAMPOS，2017年）。

从这个意义上说，Grize论证逻辑的命题实际上是在一个有计划化的交流游戏中的结构化陈述（GRABOVSKI：坎波斯，2014）。

计划化将作为前提五个基本假设（格拉博夫斯基：坎波斯，2014;格里泽，1996）：

1-对话主义——

即使话语有方向，即使它来自一个演讲者（如演讲者和教师），它也带来了对话的痕迹，因为它的产生是相互指向的。

2- 对话的情况-是指在给定语境中进行任何类型的交流的理解。

3- 代表——主体、群体或社会的分型是在三种情况下产生的，即：

a) 自己的代表（A）甚至

"重新（A）"：

b) 对话者的代表（B）

"重新（B）"：

c) 最后，讨论了主题（T）的表示：

«雷普拉（T）»

4) 文化预构建，指对话者在陈述建设中调动的一组信息。

5)

物体的构建-

话语作为符号的应用，从术语的含义到对象，目的是根据沟通的动机和目标进行计划化。

Grize

(1993)

对沟通的贡献在于理解，社会表现在共同构建时，与基于编码/解码和发送者/接收者的传统通信模式不同。这就是说，这不仅仅是一个考虑一个发送信息的主题和另一个欢迎的主题的问题。从格里泽的角度看，在背景决定性的对话中（口头和书面）将会有阴谋。讨论将有一个争论的层面：不仅要为主题构建阴谋化，而且要从另一个主题的角度进行。

另一个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坎波斯感官生态学的贡献涉及皮亚吉特价值交换模式（ETUDES社会学，1977年），从根本上说，与本文的方法同时，该模型将处理EGO和ALTER在沟通中的关系。皮亚格特认为，一个主题、一个群体和/或一个社会（这里理解为EGO），在其相对于另一个群体的行动和反应动态中，可以在交流中产生

（1）满意、债务感和欣赏感；（二）不满、信用感（或认为对方欠他什么）和贬值；或（3）中立，当有歧点或冷漠。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部作品中，值得包括来自皮亚杰的坎波斯带来的"债务或信用"和"满意或不满"的含义，即作者讨论了有助于形成社会表现的社会遗传和历史文化机制。即，感官生态学的交流游戏遵循了整合上述作者互动机制的功能。

2.2.2 与情感有关的一些补充性理论考虑

债务或信用的道德感受在情感领域运作，这在感官生态体系中共同构建世界形象提供信息。例如，通过理解大脑在寻求问题的答案时需要做出选择，在日常情况下，这个过程可能会影响交流中表达的共享。这个过程与躯体标记假说的理论模型有相似之处，从这个模型中可以归纳出情感在选择过程中与认知一起工作，即使它们显然被解释为严格理性。这一假设是由葡萄牙安东尼奥·达米西奥（1995年）提出的。据提交人说，情感事实有助于将价值观归于某些情况，有助于决策。实际上，面对分析的选择和应用，受试者面临着与该选项相关的消极或积极的自动感觉，内部报警触发导致被试者拒绝或立即接受该选项（DAMÁSIO, 1995年, 2004年：施耐德;相对, 2006）。考虑到"情绪是评价我们周围环境的自然手段"（DAMÁSIO, 2004年, 第45页），以及坎波斯的解释（2017年），人们也可以承认，情绪可以影响特定代表的出现，为其"消极或积极"的形成、"信用或债务"、"满足或不满"提供基石。

这次讨论的一个标志性例子是由Facebook领导，康奈尔大学与加利福尼亚大学联合进行的研究。2012年，这个社交网络发起了一项针对70万用户的实验，以测试研究人员称之为“情感传染”的假设。一个星期来，人们在时间线上受到负面和悲伤的帖子。在此期间，人们发现，当收到负面图像时，这些受试者将更倾向于发布负面图像（G1, 2012）。这将强化这样一种观念，即情感将存在于受试者的心理选择中。即，当受试者因情感上的满足感或不满感而遭受债务或道德信用时，基于要传达的世界形象的形成的陈述将受到最初启动这一进程的因素的影响。皮亚格特提出的这种与感官生态学相结合的交流逻辑，强化了认知与情感在表现形式中共同表达的理念。

2.2.3 与对话有关的一些补充性理论考虑

本文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与对话的主题有关。它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研究人员的问题本身在面试中触发了一个逻辑论证过程。由于我们将在下面介绍的研究提出了一个由研究人员提出的方法，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对于我们取得我们推进的结果似乎很重要。在故意通过问题干涉受试者思维机制的情况下，而不是在与简单或直观的抽象有关的自发思维过程中，无论沟通手段如何，我们承认这种干涉是一种理论组成部分。据了解，沟通从它吃的互动行为可能会产生不准确。坎波斯（2017年）转述诗人费尔南多·佩索亚给他的书题目是“导航准确，沟通不准确”，以突出沟通过程的不准确性。我们认为，“感知生态学”理论允许代表过程的上下文化，尽管不精确，但其根源比其原因、程序发展和后果更为广泛和复杂。我们认为，这一理论符合莫斯科维奇（2000年）的观测结果，因为它将它们，例如，在对象化和锚定的过程中，将它们整合在一起，这将直接与主体的认知和情感结构的维度联系起来。此外，它使我们能够理解它们在受试者记忆中扎根这些结构，这要归功于马尔科维（2003年）和格里泽（1996年）所讨论的对话性，以及它们作为共同构建和分享世界形象的出现，在交流中，它们调动了主观、社会和客观世界。

迄今所走的道路用我们下面提出的补充理论建议阐明，在项目2.3中。

2.3 走向可能的阿戈拉理论

2.3.1 关于阿戈拉的概念

在古希腊，"Agora"一词代表着一个公共广场，在那里讨论了"政治"的重要思想。阿戈拉，作为一个集体空间，也适用于时代，高点和小神社，一些献给英雄，如希腊神话的恶魔（CAMP, 2010年）。

我们采纳了这一原则，即由来自同一社区的主体在公共交流中共同构建世界形象，作为能够模拟包括群体个人和社会利益中产生的思想现象和/或事实的陈述共同构建的一种表达方式。

对我们来说，对"Agora"的理解相对简单：他们是拥有和分享社会代表性的人，无论是他们自己（EGO）还是另一组人（ALTER）。这里是Agora作为一个自发形成的结构，因为它带出了关于对象，现象和/或事实等的想法，即共享的社会表现。

图11 - 雅典的阿戈拉



即，我们称之为通过社会表现（形成与否的意识形态）对类似想法进行分组或分享，这种意识形态可以从考虑EGO和ALTER的结构中产生。因此，人们假定，不同地方的团体、社区和/或社会的人可以参加，并有不同的概念或想法。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思想没有边界的前提。例如，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它们变得越来越广泛。因此，一个人在几个群体中的参与可能会改变一个物体的社会代表性。这种表达服从了一个假设，即人类在他身上有一个EGO，也代表ALTER，从而构建对象的表达作为表达。根

据属于社会群体，改变、调整、操纵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代表制是人类交流过程的组成部分。

在下面的子项目中，我们将阐明痛苦与象征性社区问题的想法。

2.3.1.1 象征性社区

正如先前所讨论的，在整个认知革命期间，人类作为一种群居动物，必须留在一个群体中，并不断进步和改善（HARARI, 2017年;雷奎罗, 2002）。这一理念正在从传统的物质生产社会概念扩展到以庞大而复杂的网络为特征的全球化生产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值得注意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研究员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80年）指出，在全球化社会中，我们对彼此的依赖是如此之大，甚至连像铅笔这样的简单物品都不可能由一个人生产。

依赖生产形式是不同群体和社会之间多年谈判和历史互动的结果。如果说过去人类依靠自己的群体和自己的技术来生产食品、商品和产品（HARARI, 2017年），今天的全球化社会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复杂的依赖性特征，不仅在象征性的世界中，而且在材料中，包括生产资料。在这方面，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分析：社会和社区。虽然社会的概念相对稳定，但正如我们在下面解释的那样，社会经历了几次转变。

虽然从技术上讲，我们的工作并不直接涉及社区的概念，但当我们对社会群体的表述进行研究时，社区问题就出现了。社区的概念一直存在，对于我们的物种进化成智人是必要的（HARARI, 2017年）。

然而，今天，随着传播媒介的演变和物理距离之间互动的扩大，社区和社会等概念已经扩大，应该重新讨论。

社区的概念是广泛的，这一领域的经典作者之一费迪南德·特尼斯试图将其与社会的概念区分开来。对Tönnies来说，一个代表家庭，这个村庄，由传统、地方互动和脱离当地文化的自愿规范所维持的感情关系所推动，他通过德语术语*Gemeinschaft*（社区）来定义这种关系。

Gesellschaft（社会）将建立基于契约关系的关系，这种关系由规范、法律、具有经营动机的公约和超本地关系维持，这些关系将服从于国家（RECUEIRO, 2002年），以

便"通过这个，我们可以说，社区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以及一个具有整体和机械文物的社会"（TÖNIES, 1999年，我们的翻译）。

关于社区，Brancaleone（2008年）解释了他所谓的Tönnies在亲属关系方面的"主要法律"：a) 配偶、家庭成员、邻居和朋友之间相互交流的感情；b) 在彼此喜欢并建立共识的个人中；c) 相互了解和喜欢对方的人，以及生活在一起和在一起的人，以及如何建立共同生活的协调（布兰卡里昂，2008年）。

韦伯（2002年）也提到了这一概念，即社区以情感融合为对象，他称社会关系社区建立在团结感的基础上，因此，他称之为"参与者情感或传统联系的结果"（第71页）。而社会的社会关系，是出于某种目的的判断所激励的理性等式的结果，也是"基于遵守义务义务的强制性有效性的信念"（WEBER, 2002年，第71页）。

韦伯（2002年，第74页）提请注意语言的重要性。那不是语言当然，语言和语言本身不足以形成一个社区，但它们将促进其成员之间的交流。也就是说，用韦伯的话说，说同一种语言并有共同情况的个人"可能会体验到一种社区感"（2002年，第74页）。

这些词连接主题，形成主体和集体之间的联系（JACQUES等人，2013年）。作为布兰卡里昂（2008年，第99页），"[...]

起初有互动。由此产生的语言，符号，代码。将我们塑造成一个社会和社区的团体和一切来自互动、沟通过程（CAMPOS, 2017年;哈拉里, 2017）。这些位置对于理解阿戈拉理论非常重要。

2.3.1.2 阿戈拉和象征性社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社区感和象征意义从属于某一群体的意义原则开始（PALACIOS, 1996年：雷奎罗，2002）。然而，agora的概念是基于象征性维度的前提，即独立于一个社区的归属感，特别是在计算机化网络互动更大的今天。对于乔夫切洛维奇（2014年）等作家来说，面对新技术，这一主题是社会心理学的一大挑战。

知识的社会化和认知多样性是人类社区的基本现象，也是当代社会的中心标志。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仅以新的时代和地方组合为标志，而且由于新的社会技术

和日益数字化的公共领域，也呈现出高度的象征性饱和。对方的思想和知识只是一个“点击”：确定这种潜在的遭遇是如何发生的，并形成表现过程是社会学的一大挑战（JOVCHELOVITCH, 2014年, 第5页）

Agora——我们将在下面更详细地讨论——

并不使任何互动培训（如社区和社会）无效。值得注意的是，思想的本质超越了物理层面，理解一个象征性的世界没有概述的边界的刚性，有时是用武力雕刻的。也与计算机虚拟性无关。毫不含糊地，agora将产生于一个元素的链接，这些元素共享一些共同点，即无形领域的潜在网络。

Agora

可以包含以前的想法，即它的形成不一定涉及物理或虚拟空间的共享，但有通过接近想法实现的前提。也就是说，管理

Agora

的是同一对象的共同表示或共享含义，它们可以根据交互的动态以多种方式形成。我们提醒你，象征性的社区不一定来自共同领土，而是来自有归属感的群体，甚至分散。阿戈拉

是一种表现现象。它发生在两个领域的表示和轨道的世界：EGO和ALTER。两者都有从表示开始的理解和感受，根据每个群体，这种理解和感受可能会发生显著变化。

2.3.2 其他

2.3.2.1 生活在别人话语的世界里

自我的存在只有在通过语言和符号向另一个方向定位时才有意义：它构成了我们自己在世界上的观念（HARARI, 2017年;维戈茨基, 1991年）。

对I领土的完全主权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总是与其他领土共享边界。在我们自己的目光中，我们有对方的愿景，甚至语言是由许多在我们到达之前预先构建的。这并不否认自我的存在，而只是为了使他人构成并融合我们（莫斯科, 2000年：维戈茨基, 1991年）。另一个特征是人类植物发生的结果（哈拉里, 2017年）。

对话作为人类沟通的能力，通过 EGO 和 ALTER 与世界对象（EAO）的相互作用，共同构建并赋予经验中的标志、符号和意义意义，指的是我们从本理论章节开始以来在这里讨论的作者的观念之间的张力（CAMPOS, 2017

年）：马尔科韦，

2003;格里泽，

1996;皮亚格特, 1977年)。这种理解也存在于乔治·米德 (ABIB, 2005年) 的作品中, 它理解自我是由英语术语“我”形成的, 以及代词I作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作为生物和认知主题的关键观察者所形成的社会主题。

2.3.2.2 视组而定

根据卡尼曼 (2011年) 和米德 (1934年), 本文理解, 人类有能力在并不总是客观的实体中创造个性或角色, 而米德有时将其理解为“其他概括”, 因为

另一个概括的态度是整个社会的态度。因此, 例如, 就作为一个球员团队的社会群体而言, 是另一个被概括的球队, 只要它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过程或社会活动, 以每个成员的经验参与 (MEAD, 1934年, 第132页)

EGO可以赋予群体或社会一些个性特征, 但这些特征是虚构的, 是自己对他人的表述。这样的点头通过 EGO 的视角传达灵魂和感情。诸如“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 甚至理想化的分类和短语等表达方式可以刻板印象和想象, 即即使从EGO对ALTER的观点广泛解释, 它们也不会被视为事实。在实践中, 你不能做像“就业市场”这样的面试! 如果不存在的其他人群体存在并且是不可见的, 如果他们有时没有身体、组成逻辑或代表, 它们如何形成? 连贯的回答是, 这些群体只会以表示的形式存在于主题中, 它们可能的形成将源于相互作用。即, 这个群体不需要是真实的, 我们来判断或归结于它的个性。

从痛苦的角度来看, 重要的是对一个群体的主体的看法。因此, 我们在本文中建议不要使用“一般群体” (MEAD, 1934年) 一词, 因为这一概念并不完全符合拟讨论的内容。

也许“形而上学的群体”, 也可以被称为幻想 (暗指奇美拉, 一种拥有蛇尾、山羊身体和狮子头的神话生物)。这些群体将是主题的寓愿者, 指的是对某一时间/空间的感知, 并与我们情感和认知的片段和痕迹产生各种相互作用。即, 它们是始终与某些背景或模拟对象相关的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点是群体中主体的复杂互动形式。互动产生越来越复杂的现实 (CAMPOS, 2017年)。

不言而喻, 现实的形成并不意味着这是真的, 因为我们根据我们的生物生命阶段, 我们的社会生活, 对真实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些群体通过对现有每个主体行为

的陈述共同创造现实，其存在与他们融为一体。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同理心，我们在下面讨论过。

2.3.2.3 改变和同情

阿戈拉是一个拓扑分析（"顶部"：希腊地方前缀）的主体作为一个功能，对自己和群体的看法，相对于一个表示对象及其分组。思考一个ALTER假设，作为一个前提，人类的能力与情感的感觉，我们通常称之为同情。它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情感，可以理解为我们大脑中根深蒂固的东西（DAMÁSIO, 2004年, 2009年）。

在狼、海豚、猴子等一些动物身上，社会情绪是可以欣赏的，这使我们相信，这些情感在我们大脑的形成中也根深蒂固，而不仅仅是文化的表达（DAMÁSIO, 2004年）。同情的情感在人类中产生同理心的感觉。

大脑也很有可能在内部模拟身体的某些情绪状态，就像在"同情"的情绪变成"同情"的感觉的过程中发生的那样。试想一下，读者，例如，谁刚刚告诉你一个可怕的故事，一个众所周知的人严重受伤。一会儿，读者可能会感到疼痛，甚至恶心，在他自己的头脑中，代表有关的人可能的痛苦和恶心。...根据故事的规模及其与受伤者的关系，这种感觉将或多或少地强烈。（达米西奥，2004年，第92页）

在实践中，同理心的力量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在社会群体中产生表现的适应过程的线索。考虑到"情绪是评估我们周围环境的自然手段

"（DAMÁSIO, 2004年，第45页），我们理解，在相互作用中，可以评估自己和他人的感知。因此，改变在痛苦中的位置意味着对i与另一个思想的分析，也植根于人类的同情特征。环境反应不一定带来准确性，而只是对自我与ALTER相关的看法。

2.3.3 阿戈拉假说

让我们总结一下：一个阿格拉将是一个系统的典范，一个互补的社会表现——活力和活力——

一方面，我们有"EGO的代表性"，即一个主题由一个主题组成，另一个主题由"EGO对ALTER的表示"组成，即一个主题对另一个主题的所谓表现。鉴于在 EGO 和 ALTER

之间的关系方面可以找到不同的方法，我们制定了一个假设。在它中，两个维度不同于阿布里克在自由召唤方法中预测的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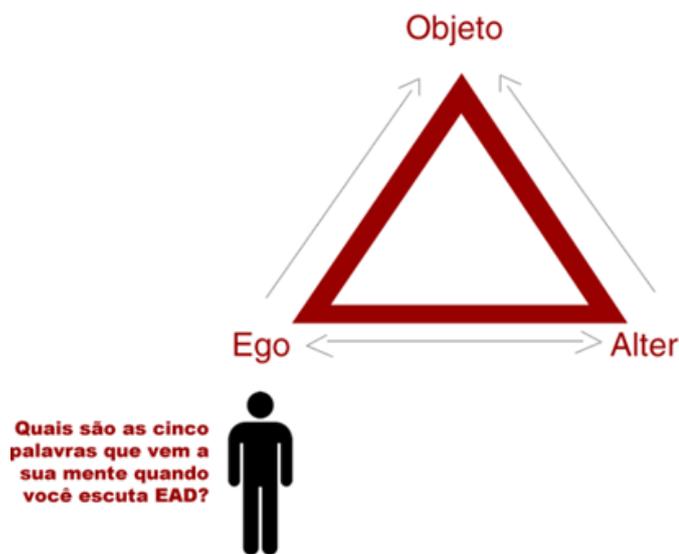
(a) 召唤旨在澄清问题：

b) 考虑自我和自我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动态。

关于提取社会代表的召唤方法，本研究建议的演变情况：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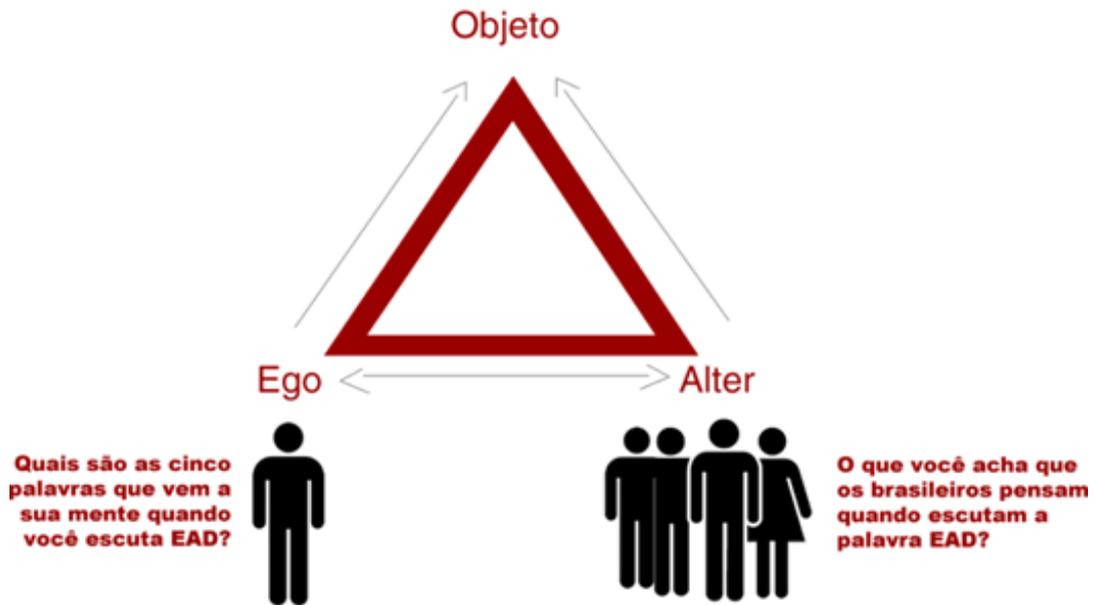
当问题只指向EGO，第13图——当问题提交给EGO和ALTER时。我们提醒您，图 13 说明了我们的建议。

图 12 - 关注 EGO 的 E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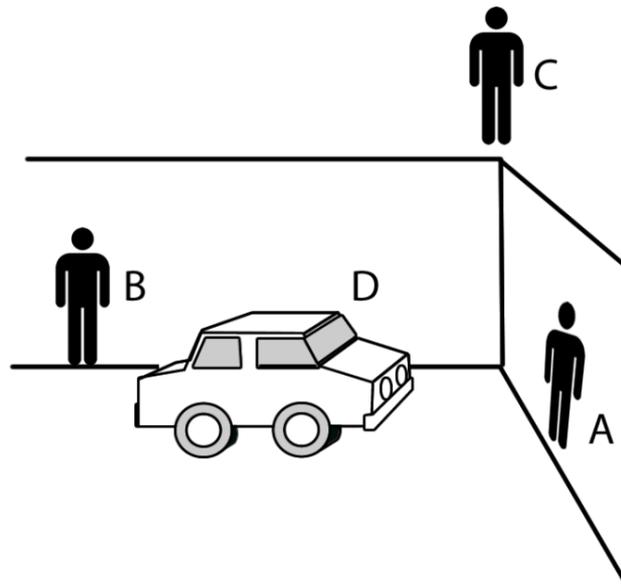
我们假设，关于自己的 EGO
 声明和将它投射到另一个声明之间可能存在重要差异。据了解，关于《论语》的陈述是对话性的，构成这些陈述的维度假设是三重和不可分割的相互关系，因此，提出主要问题以从理论上确定主题的形成性表示的想法不仅可以是EGO的总和，而且可以是预计的ALTER的总和。，如下图 13
 所示。从这个角度看，北方问题将有两个领域从主题开始，即与给定对象有关的EGO和ALTER领域。虽然对于这个论文，他们不被认为是社区互动，我们将有至少一个EGO镜子在ALTER。这种方法论观点的前提是上述字段的不可分割性。

图 13 - EAO 关注 EGO 对 ALTER 的看法



这种解释提供了一种贡献，符合社会表现理论，也符合感官的生态学，因为它侧重于三个代表性层次：a) 我们在一个主题上对自己的表现，b) 我们对另一个主题所作所作所作所作的表示，c) 主题的理想表现，作为一种语言的可能参照物。正如彼得·伯杰（2001年第108页）所言，"人不能是人。如果社会环境是象征性的共同产生者，那么从将主体从其思想中产生的代表性与他从另一种观念中构建的代表性结合起来的角度出发，来捍卫理解社会表现的重要性是可行的。当然，对一种现象的看法可以根据观察者的观点从几个方面来解释。作为基于视觉感知的表述示例，我们说明了人类感知物体"汽车"的能力，并考虑到位于不同点的几个观察者（图14）。

图14- 观察汽车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从 4 点看到对象。观察者 A 在车前，B 在车边，C 在顶部，D 在里面，如图 14 所示。每个观察者的观点领域是不同的，但对象是相同的。在处理象征性物体时，社会动态由另一个人的表示过程共同产生

（马尔科维、林尔、格罗森和奥维格，2007年;齐姆克，塞明，史密斯，2002）。

简言之，本论文的EGO所唤起的社会表现不仅为每一个，而且围绕每个主题的表达系统。即，我们不仅会有另一个人的表示，而且会有其他陈述的预计表示，这将共存于相同的认知情感-

道德空间的主体，就像硬币可以有两面，甚至给定的棋盘游戏可以有不同的表面，即使如此，保持其单位。据了解，它们具有不同的方面，这一事实并没有解构构成它的实体，而是将其构成为一个实体，并可能同时在几个州，在一个相对论述代表叠加或并列的原则中反映了几个环境条件，在一种情况下，在话语和社会建设中，代表不能只有一个答案。这将加强表示的塑料性质，因为它们是定向，重定向，复制，根据不同的环境点破碎。

因此，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和理解，即主体在相互作用中共同理解现实，基于将他的世界形象（CAMPOS, 2017）配置为社会表现的基本领域的生活和认知情感-道德结构。实际上，根据每个观察者在空间/时间（CAMPOS, 2017年）的说法，在同一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可能存在几种代表的可能性。即，在主题的认知-情感-

道德剧目中所固植的众多表现可能性（GRABOVSKI：坎波斯，2014;格里泽，1993;莫斯科，2000年）可以被认为是叠加或并列。

在我们的例子中，读者会发现，一旦指南问题发布，研究对象在某个时间点并以答案的形式实现。因此，我们的研究只揭示了一个时刻，一个闪光，一个瞬间的评价对象（EAD）在这里探索。

2.3.3.1 物理学的一个例子，说明了阿戈拉假说

1935年，一些理论物理学家试图了解原子物质的状态，因为在一些实验中，有迹象表明观察者会影响物质在原子水平上的行为。即，有人看或不看实验的事实会影响其结论（罗森布卢姆：库特纳，2017）。不久，一些物理学家提出，原子尺度上的物质状态将是概率性的，这被称为对哥本哈根的解释，由尼尔斯·波尔和沃纳·海森伯格提出。据她称，原子级别的事件将由“运气”来定义，而不是由拥有观察者会使原子状态改变的绝对或逻辑和简单事实的原因来定义。这场辩论导致了两次诺贝尔物理学奖和一次智力对抗。关于这个话题，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说了他的名言“上帝不掷骰子”。对此，据报道，波尔说“停止谈论上帝应该如何指挥宇宙”（罗森布卢姆;库特纳，2017，第124页）。

鉴于这场争论，物理学家欧文·施吕丁格提出了一个心理实验，让一只猫被困在一个盒子里。这个容器中含有放射性元素，有50%的概率杀死或不杀死猫。这位物理学家问的问题是：猫对外界的观察者是死是活？接下来的答案是：猫既不活也不死：他同时处于生死叠加状态。当观察者打开盒子时，猫的这种状态会崩溃，它只会是一种状态，要么活着，要么死亡（罗森布卢姆;库特纳，2017）。叠加是一种无法观察的现象，我们只能看到衡量标准和最终结果。在它，相同的原子可以在几个状态，将不需要只适应其中之一。即使这个主题被辩论到今天，事实上，它没有完全定义的轮廓是基于感知，同样的一个，使我们想象在对方的头上发生了什么。

我们对这一点的兴趣是提出一项辩论。管理物理学的原则与社会心理学不同，但物理学的讨论激励我们思考以下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思考社会表现很重要：

- 表示不需要只适合一种状态：它可以从不同角度构建多个感官，最终被“叠加”：

- 无法观察代表的形成，我们将在以后给出我们在研究我们"拍摄"的"即时"时获得的容貌的测量和最终结果：
- 由于它基于对 AOS
的理解，符合感官生态学作为一个发生相互作用的社会环境宇宙，因此观察者可以在交流中影响物体的状态，并在环境中采取行动，对我们起作用（即使我们在研究中没有研究过一个社区及其交流）：
- 被调查者有时甚至可能没有回答提问的反驳，但它会在他们日常观察的最可能假设中产生答案：
- 每个研究人员的观点可以改变理解同一现象的逻辑。例如，在实践中，在爱因斯坦，这个体系是由绝对的方案给予和形成的：对于波尔来说，这个系统是随机的。

2.3.3.2 在另一个领土上

放弃物理科学的推测，把我们的命题带到人类和社会科学领域，在实际语境中，当向EGO提出一个问题时，这表现在研究人员通过沟通反应来提出他特有的结构时。然而，关于ALTER的问题需要领土化，其中主体预测对方代表权。在这个象征性的领域，并限制改变"[。。。]标志和包括它的社会状况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该标志不能脱离社会状况，看不到其符号性质的改变"（BAKHTIN, 1981年，第58页）。

这使我们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文字是播音员和对话者的共同领域。（巴赫廷，1981年：雅克等人，2013）。因此，它们是共享的，加强了与EGO和ALTER之间的对话中指出的因素相容的互动表示的假设（GRIZE, 1993年：马尔科维，2003）。重要的是要强调，Ego的领土对阿尔特领土的心理变化可以影响物体的可塑性和理解（ZIEMKE：塞米恩;史密斯，2002）。

应用到THE中，我们提出的分析假设可以通过假设来看待EGO的正面和对ALTER的负面，或者相反。从这一观点来看，不能不否认社会代表制度在人际交往的性质以及微观和宏观因素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ALTER的干预，至于对象，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复调，因为"这些不同的立场被纳入的声音，建立对话关系，内部和外部，与其

他声音。 *自我* 和社会都由辅音和不和谐声音的复调组成，包括对话流关系（LOOTS：缔约方会议;SERMIJN, 2013, 第110页）。

2.4 研究问题：阿戈拉假说

我们现在可以更清楚地提出我们的研究问题，其中一方面包括（1）阿戈拉问题，另一方面（2）核实与研究社会表现有关的差距。

（1）

从前者的角度来看，我们相当概括了阿格拉的假设：在互动游戏中产生的社会表现中，我们一方面有"EGO的表示"，即某一主题对任何主题的表示，另一方面，即"EGO对ALTER的表示"，即某一主题对另一主体产生关于同一主题的所谓代表。在这种理解中，EGO和ALTER不是分开的，而是同一社会表现体系的两种功能的互补性，是活生生的和动态的。我们通过假说申明，痛苦问题不仅适用于社会表现的研究，而且因为它扩展了它，因为它规定，不能仅仅从寻求了解一个主体的想法，而是从如何将其置于与他人相关的意义上，即它发生在社会代表制度领域。在感官的生态中运行。

（2）

从第二点来看，正如第1.12点所解释的那样，我们假定，通过远程系统寻求获得高等教育的个人，作为假设，与当代教育形式的偏见和反抗罪有关的社会表现。然而，我们对这些与这些人有关的陈述以及使其他人作出表述的世界形象的发挥一无所知。

这是我们打算在论文中验证的两个假设。因此，我们的研究问题是：

-作为能够扩大社会表现理论范围的模型，阿戈拉是否相关？

-

能否对受试者自己和他人的社会表现所构成的"痛苦"进行验证，是否扩大并有助于了解这一领域，是否与文献中所证实的与所验证的"社会陈述"有关的偏见和阻力点头？

3 方法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介绍研究的方法。我们将从关于（1）AEd社会表现研究中使用的各种方法方法的简短书目审查开始：（二）研究方法，遵循研究对象的抽样策略：（4）用于数据收集的文书以及分析程序的（5），侧重于为分析结果而动员的理论概念（Agora）。

3.1 方法方法

3.1.1 在 EAD 中 SScs 研究中使用的传统方法

我们不会在这里探索为研究社会表现力而开发的所有方法，因为它们反映了几乎所有可能的方法方法——定量、定性、逻辑论证和混合方法——这些方法将远远超出这项工作的目标。然而，应当强调的是，为了研究诸如"THE"等主题的社会表现，接触能够表达对主题意见的主体似乎是最相关的（例如，研究报纸和媒体话语中发表的各种文本的社会表现）。我们建议在这里介绍一些已经在 THE 中根据社会表现形式开发的数据收集方法，因为它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定义了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实践。

根据一些作者（REIS：BELLINI, 2011），获得关于广告的社会表现数据的最常见方法，涉及观察，数据收集和分析程序。观察对应于适用于特定群体或社区的系统过程，寻求了解事实或现象（SPINK, 1996年）。

信息收集包括参与研究过程的小组的注释，建议始终根据每个小组保持内容和背景的自然对话。通常，还使用重新分析口头表达的技术，被认为是调查这些技术的常见方法（REIS：贝利尼，2011年），因为它们包括给被采访者发声，避免强加研究人员的可能成见（JODELET, 2005年；乔夫切洛维奇，2014；国王；贝利尼，2011）。这些技术与主题有关的一些例子是：（1）参与者通过注释收集社区交流的数据：（2）访谈开放式或半结构化脚本（REIS：贝利尼，2011；斯宾克，1996；（3）

重点小组，即基于小组互动的集体访谈，目的是产生数据和见解（MARKOVÁ等人，2007年）；国王；贝利尼，2011）。

与语音收集和分析相关的其他技术和方法（REIS；贝利尼，2011）是：（1）那些采取各种形式，如研究修辞结构和感觉，可能从文本中出现（JACQUES等人，2013年等；正如前一章已经指出的，（2）EVOC-

自由结社或自由召回（将纳入本研究：见下面的项目3.2.1）

其中，从少数刺激词中，确定了社会代表，并在它们之间建立了自由联系（ABRIC，2004年；国王；贝利尼，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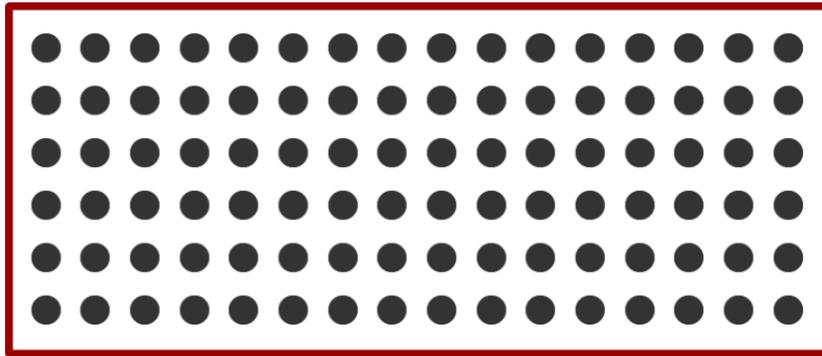
最后，许多关于社会表现的研究都利用了官方人口普查和民意调查的定量和定性数据，如文本、图纸、文件、个人数据、小册子等（REIS：贝利尼，2011；斯宾克，1996）。

3.1.2 根据阿戈拉模型的应用，为研究SR提出了补充方法

在若干研究中，一般来说，被研究群体的方法划分是通过人口划分的，这只不过是调查者的一个共同点（BOOTH：科伦布；威廉斯，2007）。例如：投票选举特定校长、大学生、电影观众、特定学校的学生等。在实践中，研究人员根据一个观点对研究进行框架，跟踪和划定其边界，如图15所体现的那样。

。

图15 - 根据研究人员制定的标准划分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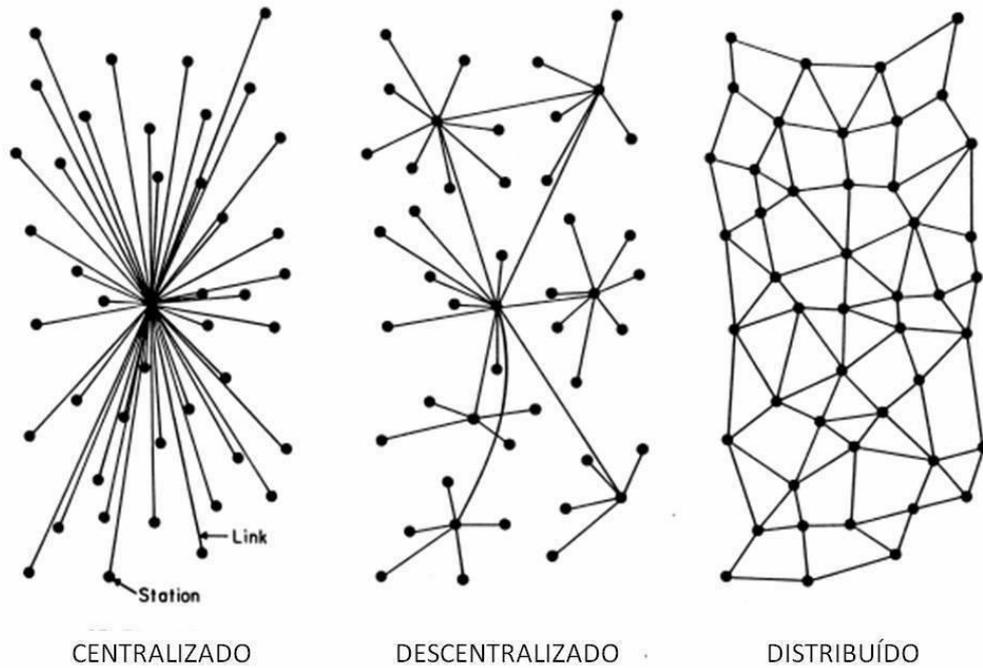


然而，当涉及到象征性的对象，如表示，从社会学习的前提下，通过互动（VYGOTSKY, 1991年）与小组（MARKOVÁ, 2003年）：皮亚格特，1975年;VYGOTSKY, (1991)，并考虑到感官生态学建议捕获的相互作用宇宙中交流的复杂性（CAMPOS, 2015, 2017），我们不再谈论人口。这些，在象征性的领域，不一定有共同的历史或相互作用，因此，甚至不能产生领域，锚定和对象化的过程可以赞赏（莫斯科VICI, 2000年）。

因此，假设有这种观点，我们想提出我们打算从Abrie (1997年) 开发的召唤方法的改编中找出痛苦，这一方法将在本章的下一节中提出。

作为导言，我们希望从网络研究开始，因为了解网络有助于理解这一研究的机制。例如，对于巴兰（1964年），网络的形成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进行：集中、分散和分配（MARTELETO, 2001年；雷奎罗，2002年），如下图16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个网络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交互点或节点，生成一个**群集**，即建立一组关系的节点。

图16 - 根据巴兰建立可能的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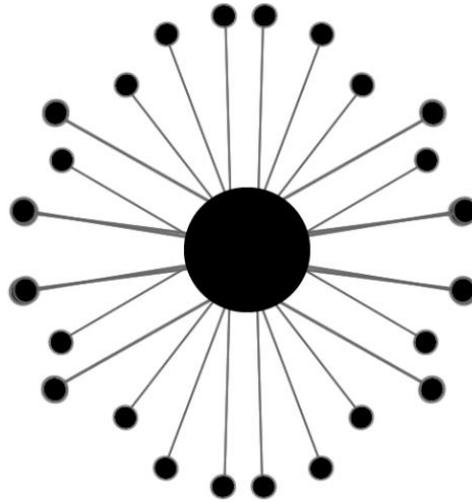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巴兰，1964年）

在中央节点的"集中"部分，在"分散"几个节点中可以产生关系，在"分布式"中，所有节点都与相邻节点相互连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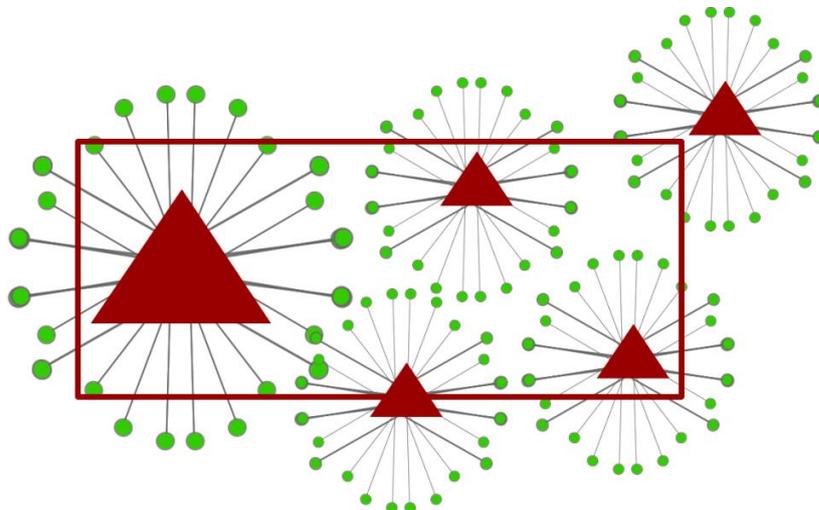
作为一个模型，Agoras可以被理解为表示体共同构建形成*集群的结构*。这些节点由关系网络所涉及，表明有类似表示的人、团体、社区或社会。作为一个模型，阿戈拉斯从网络的角度说明了社会表现。此模型可以通过采取多种配置来呈现，例如"集中式"*集线器*（KAUFMAN，2012年），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图 17。

图 17 - 以集线器形式形成集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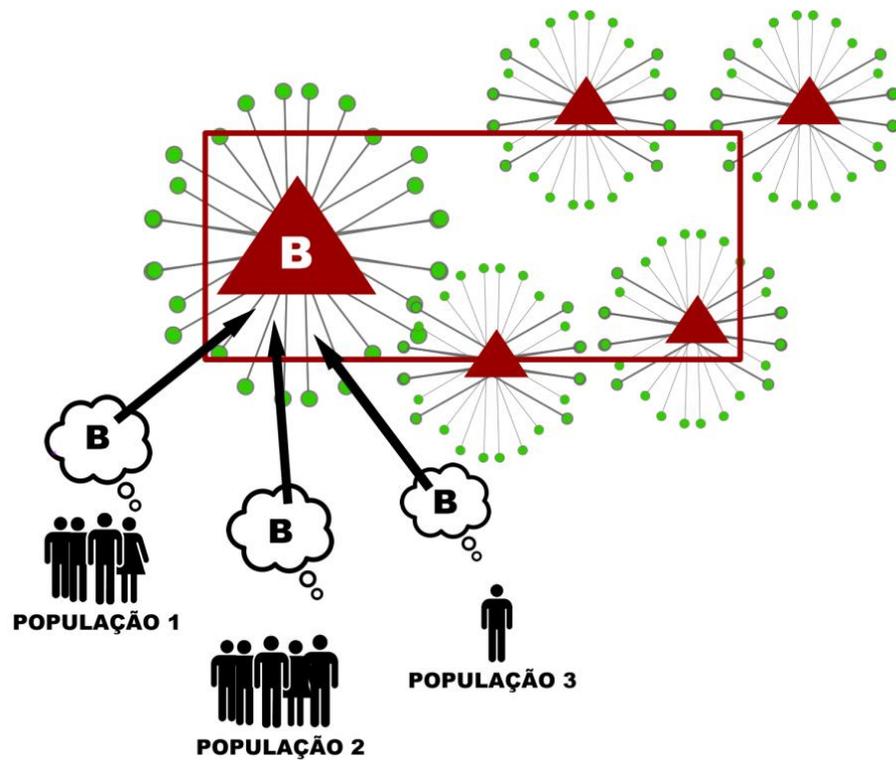
虽然在这里，我们的目的不是探索集群在网络中可以采取的各种配置，但上图 17 说明了我们要经历什么。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建议的分析社会表现的建议，我们在下面（图 18）中介绍了一组集线器的中心形式，其中三角形表示产生共享 RS 的节点。虽然神经元可塑性与中心形网络不相符，但插图是意义生态学中产生的关系模型。

图18 - 阿戈拉斯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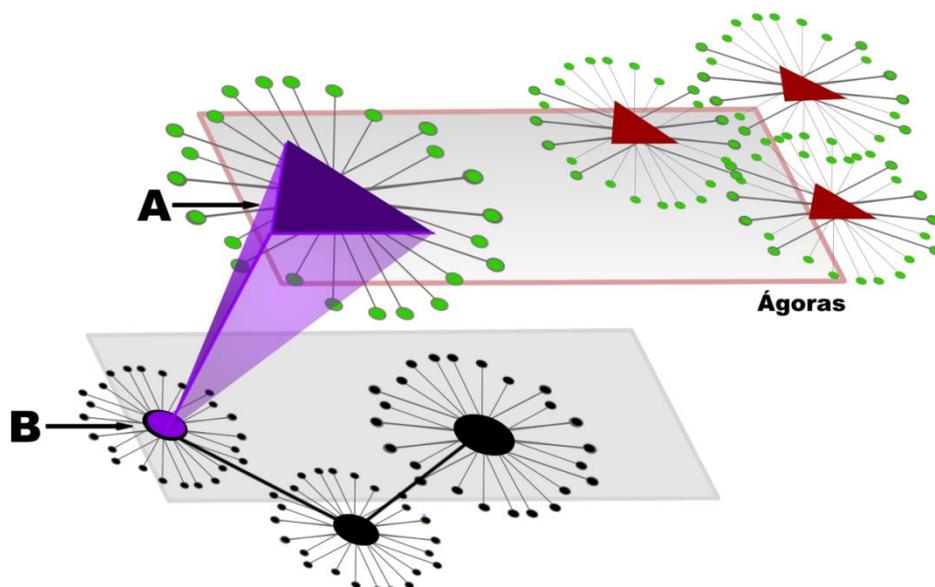
在下图19中，人口1、2和3在EGO (B) 方面有着相似的社会表现，形成了痛苦。特定人群的痛苦可以部分或全部地分享其他痛苦的意识形态领域。

图19 - 不同群体的阿克拉斯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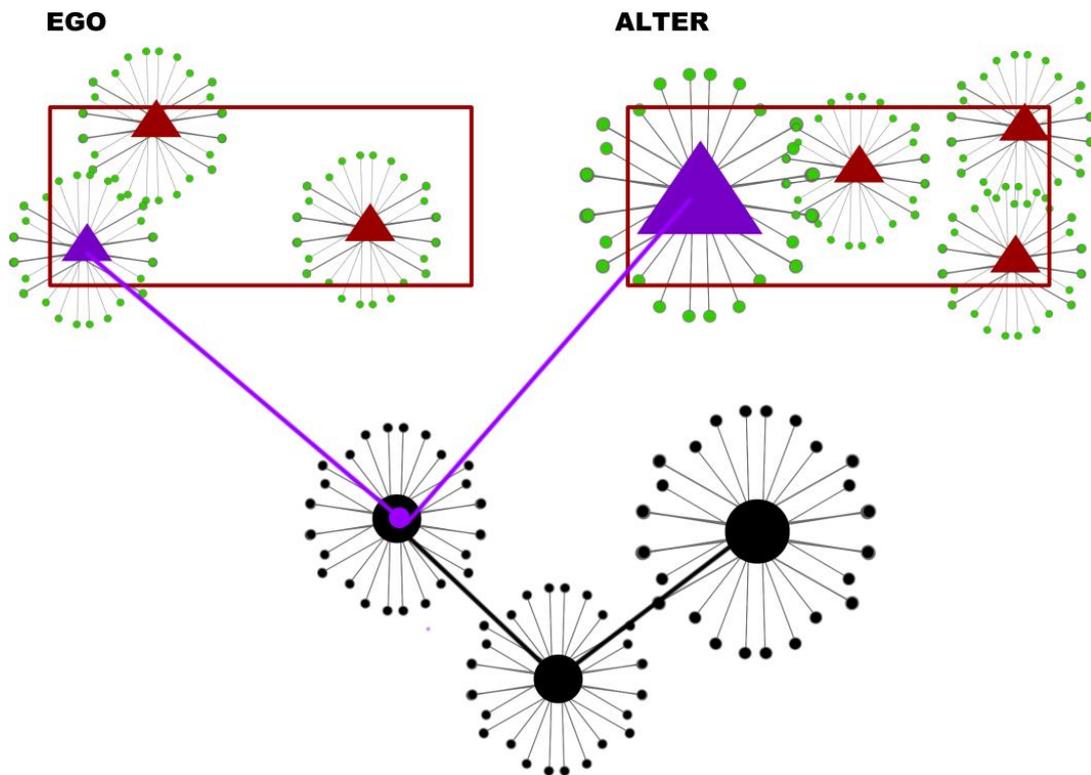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应用了Abric（1994年）开发的召唤方法，这些痛苦是由研究的RS形成的。在图20中，人口作为中心形式的社会表现集群的生成者，通过投影分享不同的痛苦：那些来自EGO并产生ALTER代表的群体。

图 20 - 组的投影



除此表示外，我们在同一插图（图 21）中对 A（改变投影）和 B（Ego 反向保护）进行建模。

图 21 - 阿戈拉在理解自我和改变



我们认为，这项分析解释性建议将使我们能够通过构建Aras，一方面回答上述研究问题（项目2.4），另一方面探索关于偏见和抵制AEd的社会表现。

3.2 方法

3.2.1 召唤

这项工作采用了定量方法，通过召唤方法进行测量。这种方法包括从一个问题中向研究的答辩人询问少量的刺激词。因此，从他们，如上面已经探讨，我们可以建立所谓的自由协会或自由召唤（EVOC），通过创建数据，可以经验地工作

（REIS：贝利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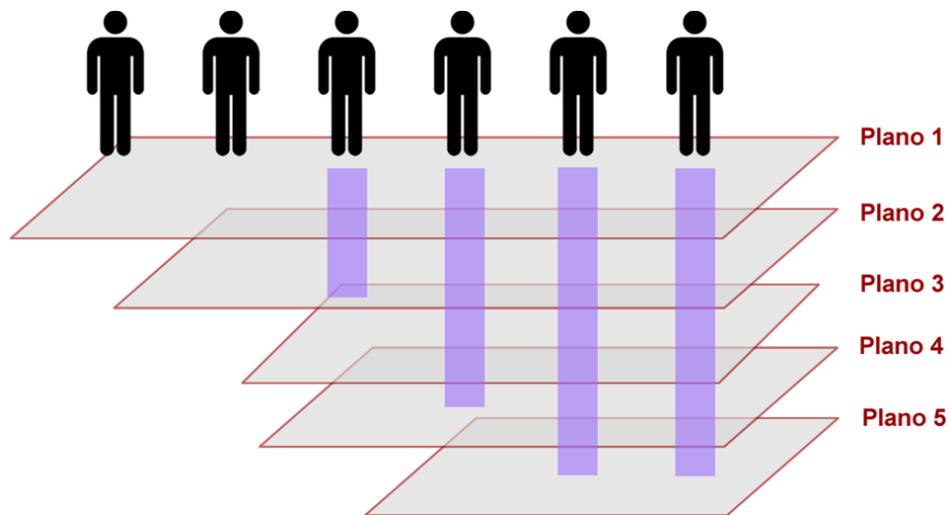
2011）。单词的召唤技巧包括询问与他们在研究中想知道的内容相关的受试者问题，假设在相关主题之前出现在他们头脑中的单词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表示他们对对象的表示

（BARRETO：梅内塞斯;莫斯康，

2016;概念：美国西尔瓦;欧盟，2011年;马尔基索蒂等人，2017年;桑托斯，2006）。

我们将两个过程与此过程关联在一起。(1) 首先考虑在 agora 模型的基础上扩展它，即将其理解为 Ego 和 ALTER 的唤起词捕获。(2) 第二种情况与观测阿戈拉斯的方式有关。我们认为，有可能确定从 EVOC 应用中产生的社会表现之间的亲和力计划。也就是说，组织大量具有相同含义的陈述，可以在个人之间分组，形成相同含义的二、三、四、五个单词。在实践中，我们获得的分析包括给定人群或多或少地坚持类似的表示。有了这个，我们在方法上能够根据巧合的召唤数量，在主体之间建立思想联系点。由于在研究中要求了五个关键词，因此有可能在受试者之间创建最多五个同时表示的亲和力计划。当我们试图解释上面，从1到5的重合含义的单词数量将把主题放在同一水平上，正如我们通过下面的图22所示。

图22 - 阿戈拉亲和力计划



3.2.3 主题采样策略

一旦我们采用了定量方法来应用召唤方法，现在有必要介绍研究的主题是谁：18岁以上的人，从CERDERJ前庭的选择过程，这是通过数字形式接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与 CEDERJ 建立了研究伙伴关系，后者授权转让该车辆获得的信息。

为了组成样本，向前庭竞赛的全体候选人发出邀请，邀请人数为42, 626, 000人，但不包括那些不想参加或表示违反UFRJ道德证书条款的人。³统计学中的一次人口集中在具有共同点的要素上，即可以根据年龄、职业、性别或主题亲和力来定义有效的人口（ANDERSON：斯威尼，斯威尼，斯威尼，威廉斯，2007）。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被认为是CERDERJ前庭的所有参与者。

3.2.4 数据收集工具

用于我们研究的数据收集工具是一般社会人口调查表（用于了解性别、种族、年龄、学校教育等数据），与两个基本问题相关：一个用于 EGO 数据提取，另一个用于 ALTER 数据提取。这些答案被认为是引起社会反响的指示（ABRIC, 2004年；麦哲伦，2014；马尔科维，2007，2017；南非，1996）。

召回测试中提出的问题如下：

关于 EGO - 当你听到 "EAD" 这个词时，你脑子里想的五个字是什么？

与阿尔特有关 - 你认为巴西人听到 "Ead"

这个词会怎么想？引用五个单词或表达式。

3.2.5 结果的数据处理、分析和解释

获得的数据遵循了分三个阶段组织的几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定量处理。在第二和第三阶段（最后两个阶段），基于单词自由召唤技术处理定量数据，如下表8所示。

³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发表的意见 3.159.251 CAAE : 04553218.0.0000.5582

表8 - 分析解释过程的阶段

第 1 步	数据的编译和格式化
第 2 步	数据组织识别在文学和研究中没有 EGO 和 ALTER 的词语
第 3 步	根据感官生态学的维度分析轴1至5的阿戈拉和解释结果。

更详细地说，执行过程如下：

在第一阶段，人口被分割为消除不符合要求的数据，错误或不符合资格。空白答案、错误键入或毫无意义的的数据被视为不合格数据。

在第二阶段，汇编了上述两个指导问题的数据，以便根据理论提取社会代表的组织（ABRIC，2004年：展位，展位，2010科伦布;威廉斯，2007;坎波斯，2017;马佐蒂，2005：莫斯科，2000年：佩雷拉南非，1996）。

在第三阶段，我们组织了轴数据从1到5从前100个最引用的单词，由于观察痛苦（a）被认为是"负面的"，（b）可以与文学评论的结果，（c）亲和力计划，（d）关系分析和（e）前500个答案进行比较。在同一阶段，我们对痛苦进行了全球分析，并根据以下感官生态感解释结果：

a)

从受试者的性质（EGO和ALTER）的角度来看，具有认知意义的词语、具有情感意义的词语和指伦理道德问题的词语：

（b）从环境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可以提到 或建议环境的话：

c)

从世界图像的角度来看，主观解释基于理论体系，从研究人员的角度来看，暗示在世界的某些图像（或主题）。

4 结果分析和数据解释

4.1 结果分析

4.1.1 介绍

在第一部分，我们澄清，使读者有一个更大的一般性了解所收集的数据，我们从概述开始。这是理解一些阿戈拉地层所必需的，因为由于这一一般基础，由于另一个结果，发生这种结果的可能性会更高。

最初，从社会经济表格中抽取了60292份答案，其完成不是入学考试的必修课，也没有强制要求考生回答提出的所有问题。鉴于缺乏强制性填充，同意参与研究的群体由42626人组成。因此，这个小组是用于弥补研究工作的基础。

为了提出问题，使用了该机构（CEDERJ）的标准结构形式，但为了本研究的目的，增加了与\EGO和ALTER有关的问题。使用的问题是：

1. 你是怎么知道塞德杰的入学考试的？
2. 你在高中上过（或上过哪种类型的教育机构）？
3. 你进行了什么样的高中学习（或表演）？
4. 您在哪一年完成了（或完成了）高中课程？
5. 除了高中之外，你参加过任何参加入学考试的课程吗？
6. 你以前参加过入学考试吗？什么？
7. 你开始攻读大学学位了吗？
8. 你家的月收入是怎样的？
9. 如果你从事有偿活动，你对家庭经济生活的参与是什么？
10. 你住在哪里？
11. 除了书本，你平均每年读多少本书？
12. 您最常使用的媒体是什么？
13. 如果你看报纸，你最喜欢读哪一节？
14. 你用电脑吗？

15. 您每天有哪些学习机会？
 16. 您是否系统地参加课外课程？标记占用您时间最多的一个：
 17. 你掌握任何外语吗？
 18. 您占用了您最多的时间，下面提到哪些活动？
 19. 你对大学课程最期待什么？
 20. 你为什么选择远程课程？
 21. 你在远程教育方面有什么经验？
 22. 是什么对本课程的选择贡献最大？
 23. 离你的住所有多远，你正在参加的塞德里马球？
 24. 您需要前往塞德杰区域中心提供哪些服务？
 25. 当你听 Ead 时，你想到的五个字是什么？
 26. 你认为巴西人听到 Ead 这个词会怎么想？引用五个单词或表达式。
- 我们强调，最后两个问题（25和26）是我们作为形成社会代表的指南的问题。

4.1.2 数据处理

作为数据处理过程，这些信息在 Microsoft Access 2016 计划中汇编，形成了关于此系统的数据库。为了提取和查询信息，命令被用在一种称为 *SQL*（结构查询语言）的语言中。

在葡萄牙语中，结构化查询语言。提取的数据后来被导入到 Microsoft Excel 2016 系统中，并应用于各种性质的公式和过滤器，用于编译和创建图形。上述程序是为每个痛苦（具有共同社会表现的人群体）进行的。

4.1.2 关于公众

在论文的这一部分，我们概述了对总人数的统计，即42, 626名受访者。这个渔获物对于引导读者了解前方将看到的"阿克拉斯"的配置非常重要。由于阿戈拉是从思想中形成的一个群体，因此必须强调，所有痛苦的形成都是这一初始基础的基质，它产生推导，从而影响整个结果。由此可见，在此基础上，女性人数众多。因此，这种性别的人形成痛苦的可能性更高：这不是方法的问题。然而，有必要了解这个阶段的

读者，以便能够学习一些现象，因为阿格拉的最初想法来自通过他们的社会表现力自然提取一群人，即由他们的思想和概念组成的群体。然而，尽管有初步的统计数字，但从结果中可以看到，世界形象的紧迫性和初始数据的改变。

下表9显示参与者总数和平均年龄。

表9 - 数量

类型	数字
受访者	42.626
平均年龄	32岁

下面，我们介绍了本文基础对统计数据的全面概述。

在这次调查中，有关城市的参考将是指选择上大学的极点，不一定是被调查者居住的城市。唯一包含两个中心的城市是里约热内卢，在坎波格兰德和罗辛哈设有单位，其他城市只有一个单位。关于本文中调查的城市/中心，我们以里约热内卢大都市区为主导，居住在该州内陆地区的人数增加了6%，学生人数最多的城市是新伊瓜苏、坎波格兰德、圣戈尼亚洛、贝尔福德罗克索和杜克德卡西亚斯。在年龄差异方面，高峰期在18至20岁之间，但年龄差异较大的人群和大学年龄以外的人群差距仍然很大，平均年龄在32岁左右。在性方面，女性占56%左右。

从选择EAD模式作为教学形式的原因，大多数人说他们没有时间在传统大学实践的时代接受高等教育（33%）。其次，人们还观察到，在选择远程高等教育时，经济状况被认为很重要，为33%。关于休闲，近一半的公众（49%）说要娱乐与互联网，其次是阅读和体育在相同的比例（15%）。另据指出，本论文的大多数公众，超过半数（54%），家庭收入在1至3最低工资之间。关于远程教育的经验，超过一半（51%）以这种方式参加的没什么可说的，但是，仍然有一大群人在线课程的经验。关于导致选择课程或职业的因素，大多数人说，这是由于个人技能充足的原因（37%），其次是出于职业原因需要获得学位。大多数被调查的公众没有高等教育（82%）。还证实，大多数是公立学校的学生（66%）和谁不工作（32%），但从家庭获得经济帮助。有许多人在家工作或在经济上提供帮助，这两种情况占总数的47%。可以确定的是，大多数人说他们每年读一到两本书，44%的

公众和互联网（82%）是信息的主要来源。关于报纸阅读，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人说不读（29%）然后，我们可以观察到，那些阅读的人大多对文化、教育和休闲领域感兴趣。几乎一半的观众（48%）家里有互联网接入。绝大多数观众（72%）不参加任何形式的课外课程。

以上数据只是读者对本研究受众稍有了解的基础，但正如已经说过的，在按想法分组人员时，这些统计数据会像下面分析的阿戈拉斯一样发生改变。

4.1.3 陈述概述

根据定义，阿戈拉通过社会表现将群体聚集在一起。因此，在第一时间，我们选择了一个单词列表来弥补研究。为此，我们选择了发病率最高的前100个单词，以便我们进行分析。这份名单的划分如下：EGO多引用50个单词，而ALTER引用最多的50个单词。请参阅下表 10 中的列表：

表 10 - EGO 和 ALTER 的 100 个最引用的表示

自我		改变	
表示	人数	表示	人数
机会	10539	缓解	8918
时间	10372	时间	6772
缓解	8551	机会	6238
实用性	8384	实用性	3764
灵活性	6667	困难	3417
学科	6553	经济	3146
奉献	5852	灵活性	3126
经济	5061	方便	2718
可用性	4551	困难	2553
方便	3718	学科	2406
知识	3412	可用性	2069
重点	3379	奉献	1999
责任	3066	懒惰	1909
组织	2993	偏见	1670
承诺	2567	知识	1286
学习	2444	容易	1286
质量	2398	质量	1246
辅助功能	2374	坏	1175
形成	2103	重点	1164
测定	1970	培训	1138
努力	1720	辅助功能	1116
成就	1453	责任	1085
承诺	1452	组织	1080
教育	1435	时间不足	1035
舒适	1289	工作	1034
自治	1271	距离	1002
工作	1236	怀疑	947
增长	1211	学习	941
研究	1206	努力	885
未来	1077	教育	826
学习	1076	承诺	803
承诺	1039	钱	786
困难	973	恐惧	784
敏捷	965	舒适	767
成本	938	研究	732
意志力	938	互联网	722
距离	931	成本	713
需要	913	测定	649
钱	905	需要	634
毕业	869	迅速	628
挑战	860	复杂	618

互联网	858	实际	614
资格	854	怀疑	610
安全	842	无知	594
包含	809	弱	570
健身	797	承诺	564
科技	791	增长	552
访问	760	科技	507
将	714	访问	501
培训	687	敏捷	501

本文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尽管单词在一种结构中和另一种结构中重复过，但从一个列到另一个列的重复次数差异很大。例如，“机会”一词在第一列中引用超过 10,000 次，在另一列（ALTER 列中），重复次数接近一半。在 ALTER 和 EGO 中，您还可以查看下文中尚未复制的单词。在 100 个单词中，每个类别（ALTER 为 15 个，EGO 为 15 个）没有重复，如下表 11 中可见一斑。

表 11 - 在 ALTER 和 EGO 中没有重复的单词

自我	改变
访问	便宜
健身	复杂
学习	怀疑
自治	无知
挑战	困难
承诺	怀疑
意志力	容易
未来	时间不足
毕业	弱
包含	恐惧
自由	实际
资格	偏见
成就	懒惰
安全	迅速
将	坏

下面的表 12 也可以在表 12 中观察到，该表 12 是 EGO 和 ALTER 中复制的关键字：共 35 个。

表 12 - 在 ALTER 和 EGO 中重复的单词

电子政务和阿尔特
辅助功能
敏捷
学习
方便
承诺
承诺
舒适
知识
增长
成本
奉献
测定
困难
钱
学科
可用性
距离
经济
教育
努力
研究
缓解
灵活性
重点
培训
互联网
需要
机会
组织
实用性
质量
责任
科技
时间
工作

在 ALTER 和 EGO 中都产生了共鸣的词语稍后将以阿戈拉形式呈现。

4.1.4 概述数据的讨论

通过揭示前 100 个最令人唤起的单词（50 个 EGO 和 50 个和 ALTER），可以观察一些有趣的思考词。在100个被引用最多的词中，有50个ALTER显示负面表示，而在EGO的50个词中没有负面。他们按照以下表13，按召唤顺序排列。

表13 - 由ALTER的负面词列表

阿尔泰的负面表示
恐惧
偏见
容易
坏
怀疑
努力
复杂
怀疑
无知
弱
懒惰

为了进行全球分析，本文使用了坎波斯感官生态学的维度（2017年），每个词在进行社会表现时，都关联了以下维度：认知和情感结构：良心，意志和道德，以及存在的物质条件。为了评估社会代表性的性质，我们使用了第一个100个单词，50个EGO和50个ALTER。

在图表14中可以注意到，诸如坏、懒惰、恐惧和怀疑等词语与受试者与他人相关的世界形象有关。至于良心、意志和道德，也有可能从意义上看到负面的词语，如"偏见"、"不信任"、"无知"和"困难"。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责任"和"承诺"等词语暗示了相反的含义。在物质存在的条件下，我们验证了，对于ALTER来说，有一个没有正面或负面含义的词列表，如"工作"和"形成"。此外，其他可能与受试者的日常生活有联系的词语，如"实用性"、"轻松性"和"经济性"。

表14-在感官生态函数中的ALTER表示

表示（世界图像）- 改变		
认知和情感结构	良心、意志和道德	存在的物质条件
知识	偏见	缓解
坏	困难	时间
学习	学科	实用性
教育	奉献	经济
恐惧	重点	灵活性
研究	责任	方便
弱	困难	组织
质量	怀疑	辅助功能
无知	承诺	培训
复杂	测定	工作
	普雷吉卡	时间不足
	容易	距离
	承诺	钱
	增长	舒适
	机会	成本
	可用性	互联网
	努力	需要
	怀疑	迅速
		实践
		便宜
		科技
		敏捷

在 EGO 的表述（图 15 中），可以注意到与主体的认知和情感结构相关的积极性质的词语为"知识"、"实现"、"意志"和"自由"。关于意识、意志和道德，我们观察到具有更多复制的词语，如"机会"、"轻松"和"奉献"。关于存在的物质条件，我们发现更贴近ALTER结构的词语，在数量上是最巧合的词。

表15 - EGO在感官生态学中的作用表示

代表（世界形象）自我		
认知和情感结构	良心意志和道德	存在的物质条件
知识	机会	时间
质量	学科	实用性
学习	奉献	灵活性
成就	可用性	缓解
教育	重点	经济

研究	责任	组织
学习	承诺	辅助功能
毕业	测定	培训
将	努力	舒适
	承诺	工作
	自治	方便
	未来	敏捷
	承诺	成本
	困难	距离
	意志力	钱
	安全	需要
	挑战	互联网
	资格	科技
	包含	健身
	增长	访问
	自由	

"轻松"和"困难"这两个词似乎暗示了不同的含义，因为前者可能有一种感觉，即"容易"或"容易"进入。第二种可能表明，学习科目是困难的，或者远程学习比亲自学习更难。这两个词都存在于EGO和ALTER中。提请注意它们可能表示的陈述的是，它们在引用的同一语境中（ALTER中的"易"和"困难"以及EGO中的"易"和"困难"）中对其含义的对抗。此外，这些可能的表述的一个特点是，当在同一语境中提及时，它们可能反映积极和消极。例如，很容易将研究与工作（积极感知）调和，并容易通过一年（消极感知），以至于后一种概念可能表明，THE是坏的，因为它"容易通过"。

4.1.5 总体数据分析

在第一个总体结论中，我们在对数据总量进行肤浅分析时采用了agora，汇总了观测结果。在接下来的项目和子项目中，将对表示进行分析，并针对痛苦本身。可以指出，正如已经解释的那样，负面词语与ALTER有直接关系，强化了偏见概念的假设。还有人指出，从感官生态学的角度看，消极的话语与认知和情感方面有关，也与主体的良知、意志和道德有关。人们还认为存在与与"恐惧"有关的偏见的词语，例如与"恐惧"和"坏"一词有关的词语。像"机会"这样的词似乎是EGO (i) 引用最多的词。同一个词出现在引文排名的中位数字段中的ALTER（另一个）中。另一种认为远程教育可能与负面术语联系在一起的感觉是导致对AEd产生偏见和抵制的因素之一。以上数据使我们对和其他人的社会表现进行

了无数的思考，表明人类思想理解的本质是多么复杂。这并不奇怪，因为它们反映了为讨论本论文的主题而进行的书目调查的一些作者的立场。在下一章中，我们调查了由于第一次全面分析数据时已经发现的偏见而可能出现的负面陈述。

4.1.6 分析阿戈拉斯和研究的五个轴

我们采用了五个分析轴，这里通过"表示"一词来理解，这些词语被认为表示社会共享的表示：

1- 轴 1 - 分析被引用最多的负面陈述的痛苦。

2- 轴2

与其他作者最常提到的陈述相比，对最令人唤起的陈述的分析，如书目调查所示（第1章）。

3- 轴 3 - 分析阿戈拉亲和力计划。

4- 轴 4 - 阿戈拉斯的关系分析。

5- 轴 5 - 分析应用问卷的前 500 个有效答案。

在分析中，我们提出阿戈拉斯的结果，作为它们对每个地层可能解释的函数，以及EGO和ALTER之间的比较。

4.2 轴 1 - 分析被引用最多的负面陈述。

4.2.2 简介 - 负面陈述的痛苦

在这个轴心中，我们分析否定词主要是因为本文的目的与对偏见和对远程教育的抵制有着广泛的联系。

在前 100 个单词中，50 个词是 EGO 单词，50 个单词是 ALTER 单词，只有检测到 ALTER 中的所谓负面表示（图表 16）。然而，从研究中收集的重要数据库中获益，可以评估的是，除了前50个引文外，还有可能从EGO所表现的消极情绪中识别出一种痛苦。因此，即使数据的暴露超出了预期的范围，我们还是决定将其全部显示出来，以便产生相关差异，即使它们不在前 100 个引文中。

通过思考在复杂的意义生态学中唤起的术语，可以感知到，在个人存在的物质条件下，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认知和情感结构中，并集中在意识、意志和道德的过程中。

表16 - 感官的负面表示和生态学

代表（世界形象） 内加特瓦斯		
认知和情感结构	良心、意志和道德	存在的物质条件
弱	怀疑	
恐惧	怀疑	
坏	困难	
复杂	偏见	
无知	容易	
	懒惰	

4.2.1 阿戈拉恐惧

关于与"恐惧"一词相关的"恐惧"一词的形成，起初我们可以注意到EGO和ALTER之间的巨大差异，后者会重复更多（大约5倍于单词）。对于EGO来说，与"恐惧"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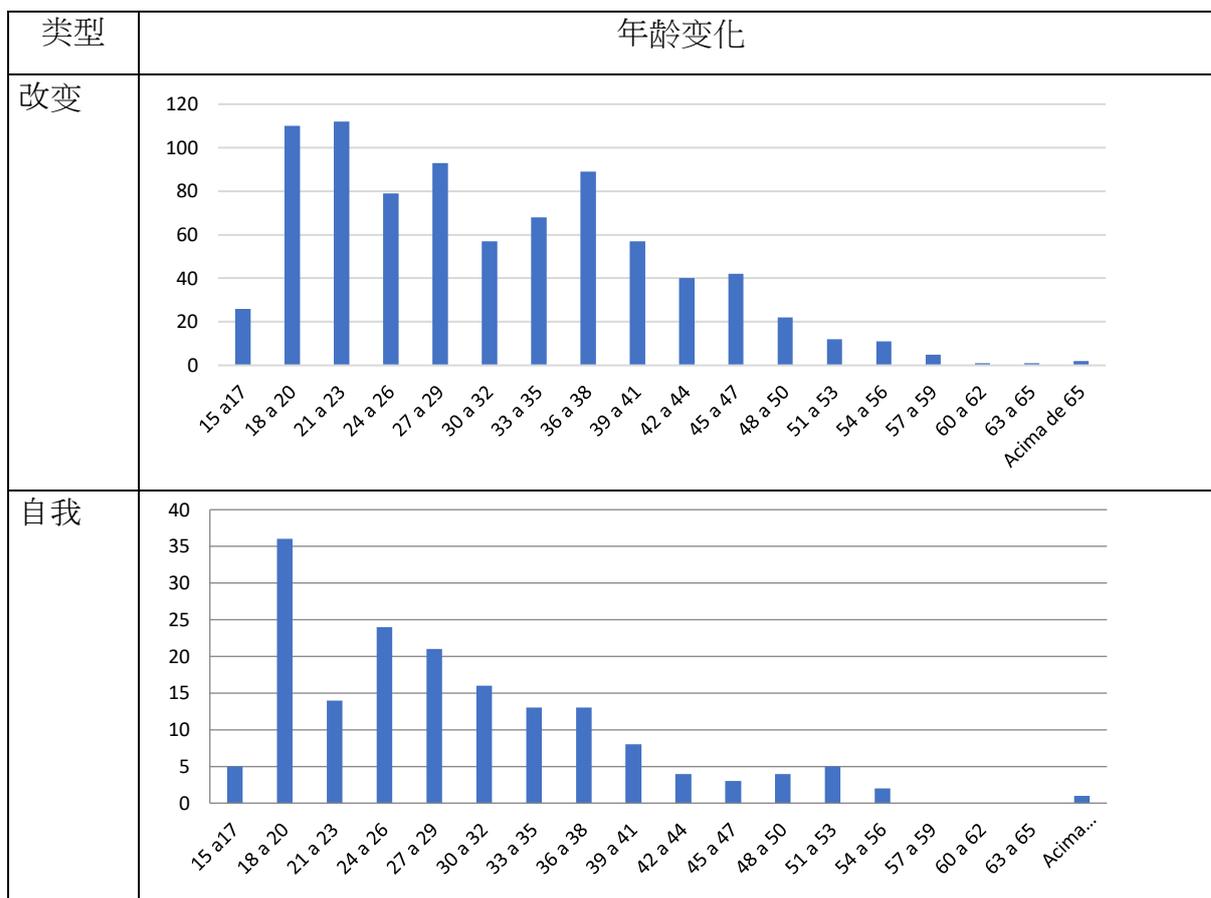
词相关的可能的社会表现出现在被引用最少的人中，这与ALTER的情况相反，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在前50个引文中都出现了这种表示（图17）。

表17 - 与EGO和ALTER有关的召唤 - 阿戈拉-阿戈拉·梅多

阿戈拉	人
自我	157
改变	7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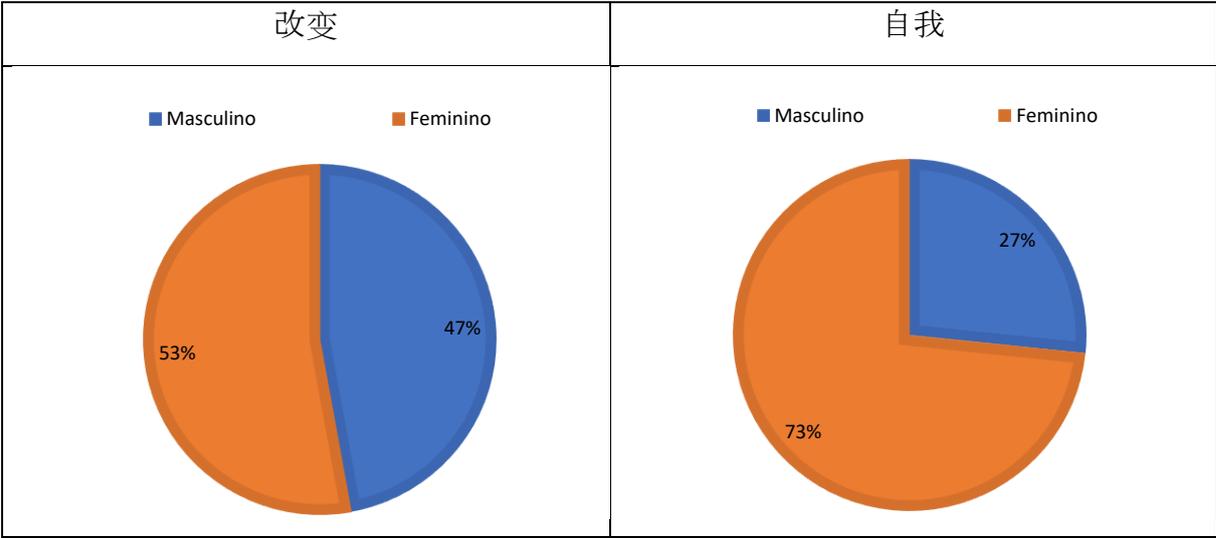
表18指出，21至23岁的年轻人在"恐惧"一词的形成中占主导主导比，也接近18至20岁的范围。不久之后，从24岁到26岁，从27岁到29岁，从36岁到38岁，有三个高峰。然而，如图18所示，在提到EGO的列中，一个数字在减少，只有21至23岁的年龄在21至23岁之间。

表 18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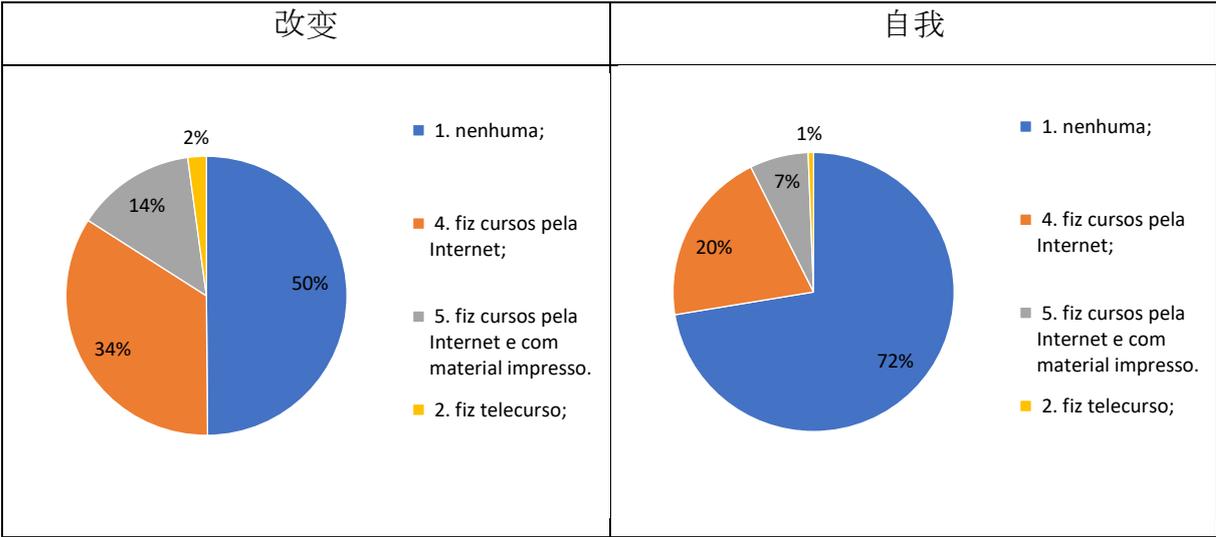
在性方面，可以观察到女性占主导性。然而，当"恐惧"一词集中在EGO上时，它就会加深。即，更多的妇女认识到害怕远程教育，如下表19所示。

表19-性-阿戈拉恐惧



也可以指出（图表20），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人谁从来没有经历过远程教育，但谁有可能表示恐惧有关（72%在EGO和50%在ALTER）。

表 20- 与 EAD 的经验 - 阿戈拉梅多



关于里约热内卢各城市对大多数报告害怕远程教育的城市的分布，在EGO和ALTER（图21）方面有相反的感觉。例如，我们可以注意到，人们最相信对方害怕 EAD 的城市是贝尔福德紫色。然而，关于EGO，在里约热内卢州内陆，最令人恐惧的所谓

代表权的城市是伊塔佩鲁纳。人们还注意到，关于ALTER，在大都市地区，恐惧占主导比（图22）。当涉及到在州内占优势的EGO时，这种情况是逆转的。

表21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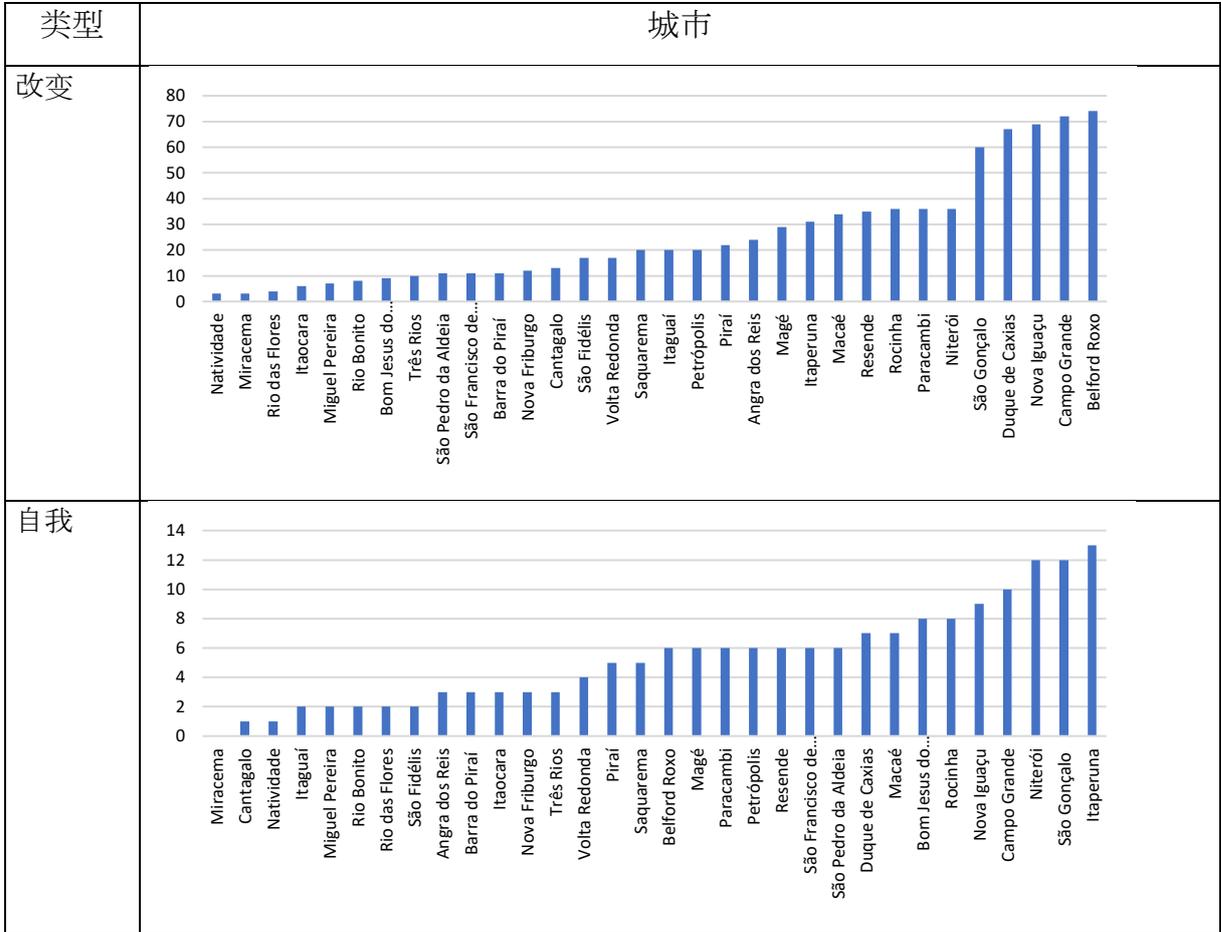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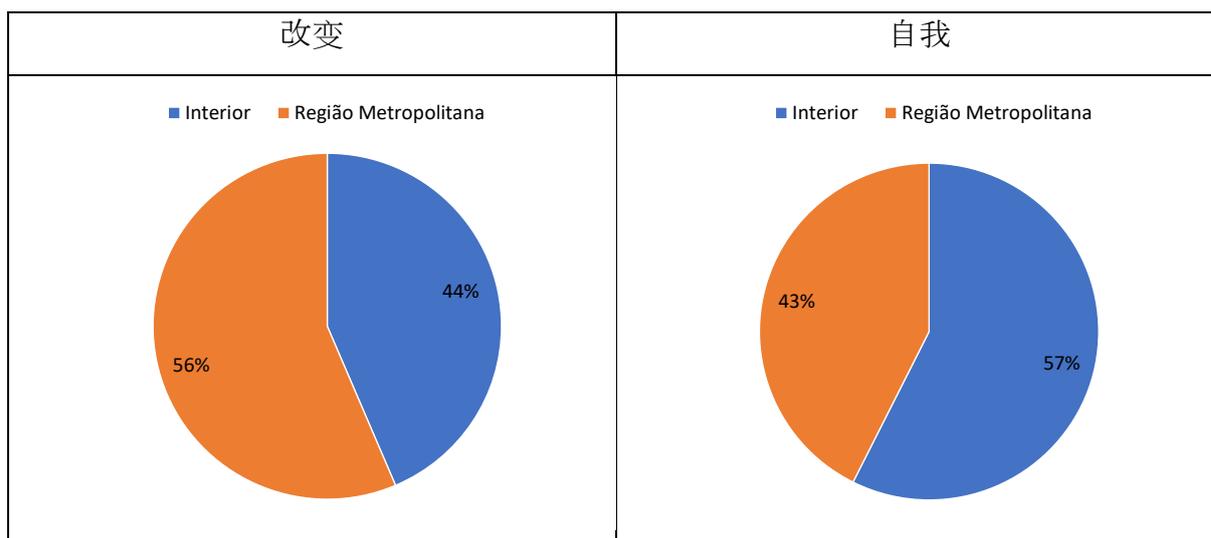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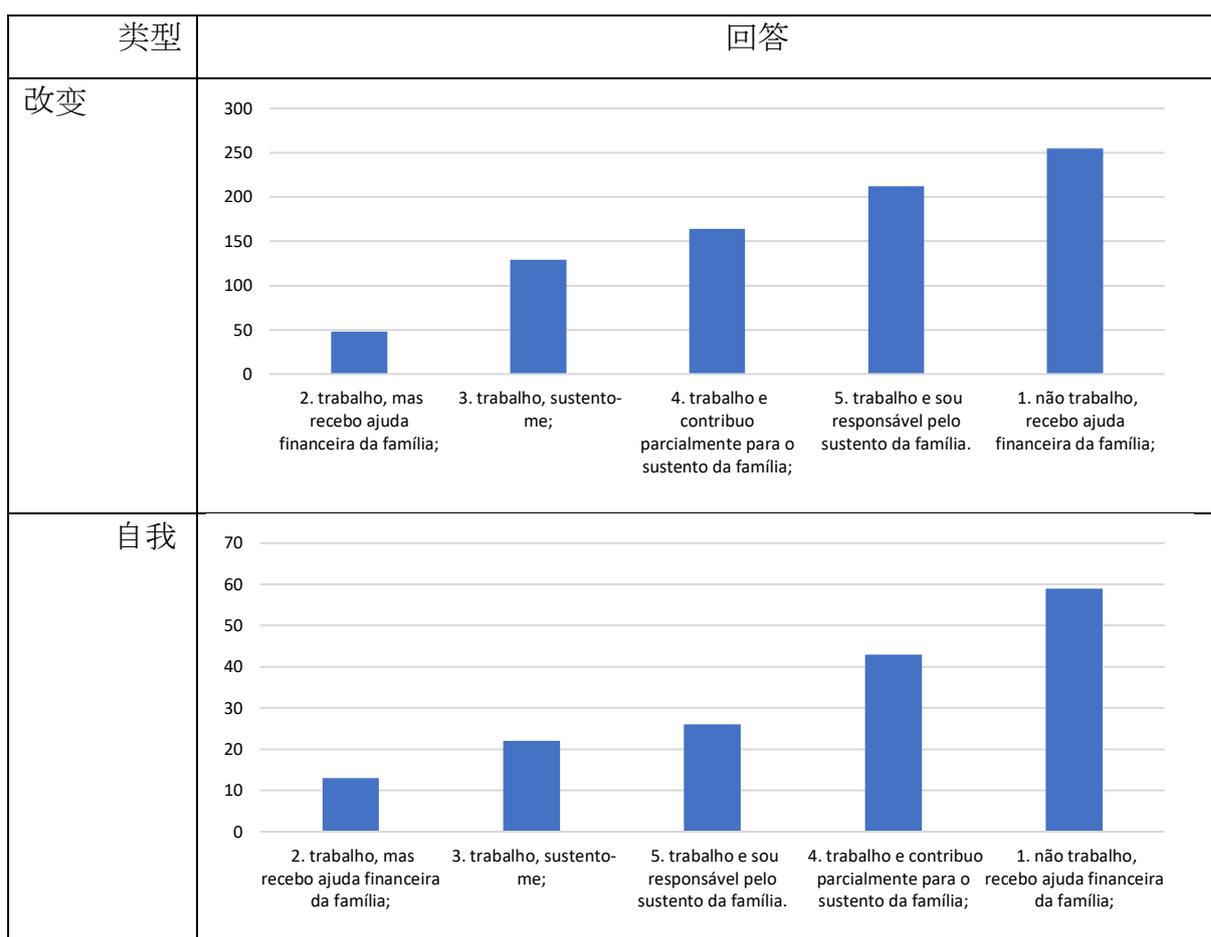


表22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梅多



关于经济参与，大多数答复者来自这个政府，他们的代表权被赋予他失业和接受家庭的经济援助，其次，作为家庭风险，如下表23所示， EGO的情况也是如此。

表23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梅多



4.2.2 阿戈拉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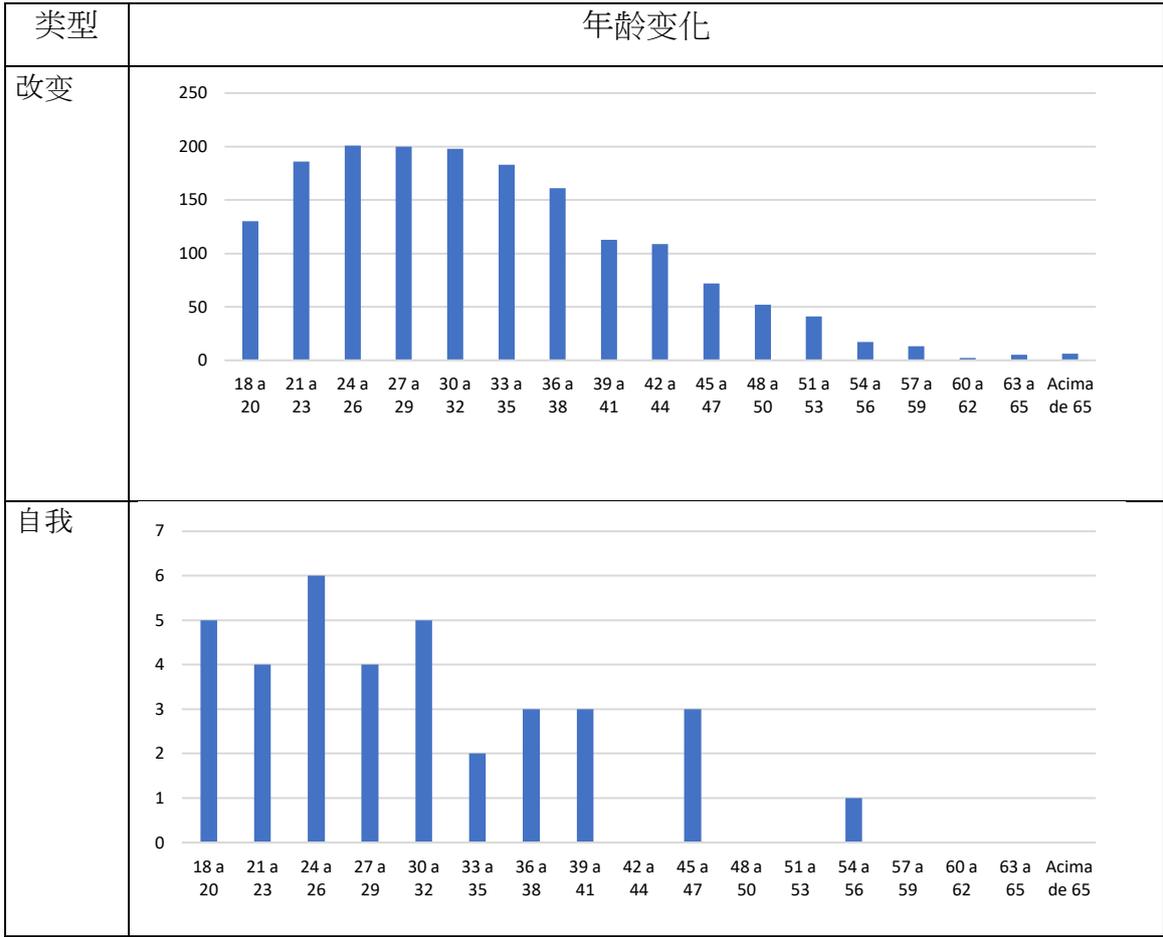
关于与"偏见"一词有关的"痛苦"一词的形成，可以在第24图中注意到EGO和ALTER之间的巨大差异：后者重复量大，第一个重复量较小，一个和另一个的差异近50倍。

表 24 - 埃戈和奥尔特 - 阿戈拉 - 阿戈拉偏见

阿戈拉	人
自我	34
改变	1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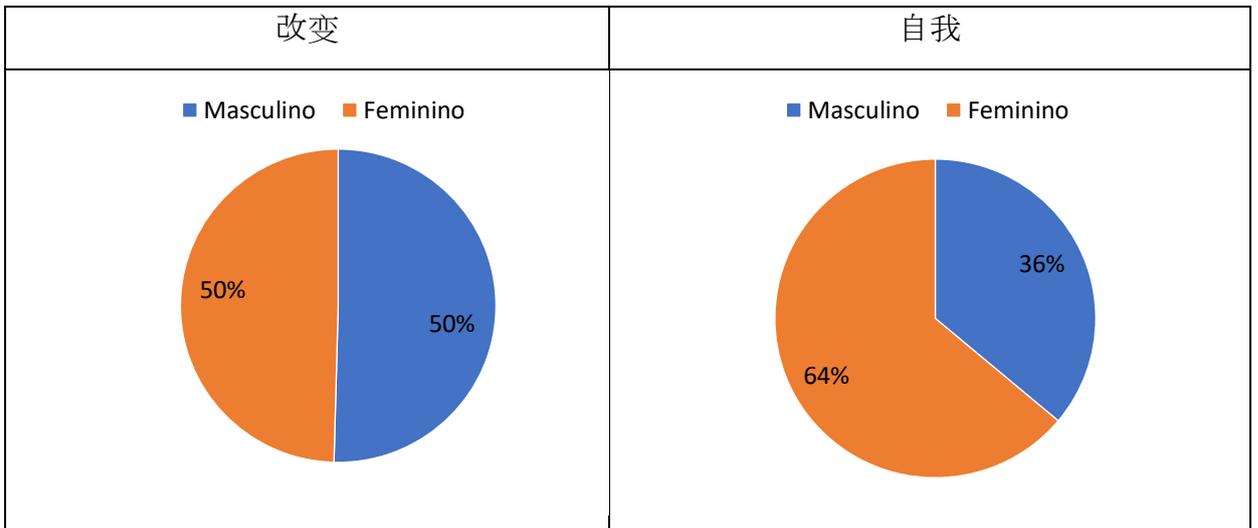
表25也可以看到，从24岁到32岁左右达到一定稳定的人数有所增加。这意味着，有相当多的老年人可能具有对ALTER的偏见的社会代表性。在图表25中，尽管人数要少得多，但可以注意到，在EGO方面，18至20岁和30至32岁的年龄组差异较大，最高年龄在24至26岁之间。

表25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普雷康西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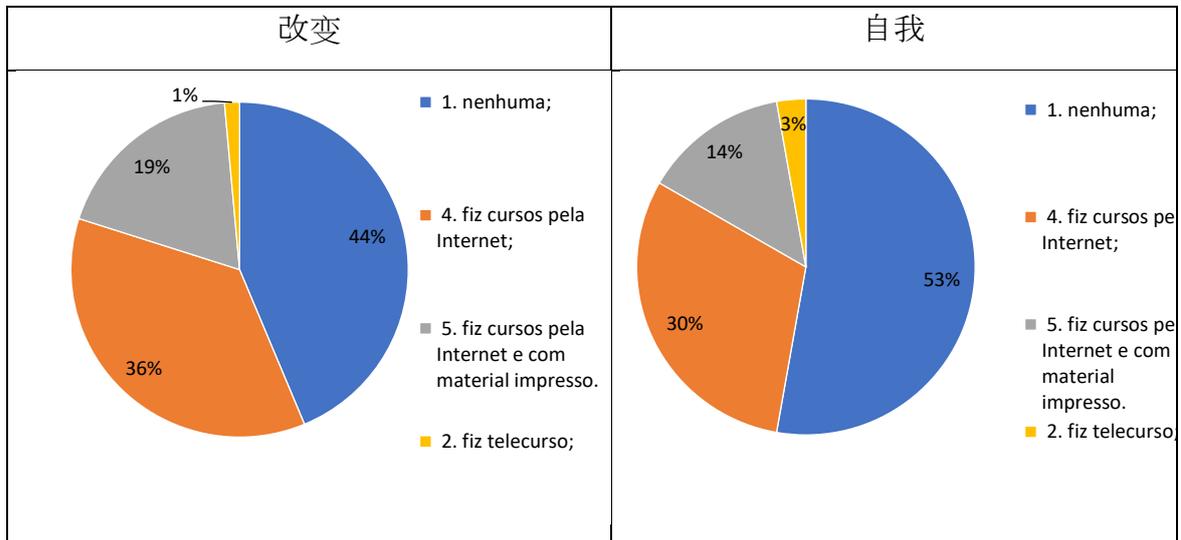
关于性别，如图26所示，男女之间在ALTER方面是平衡的。然而，当涉及到EGO时，这种平衡已经结束，EGO是一个呈现给大多数妇女的领域。

表26 - 性 - 阿戈拉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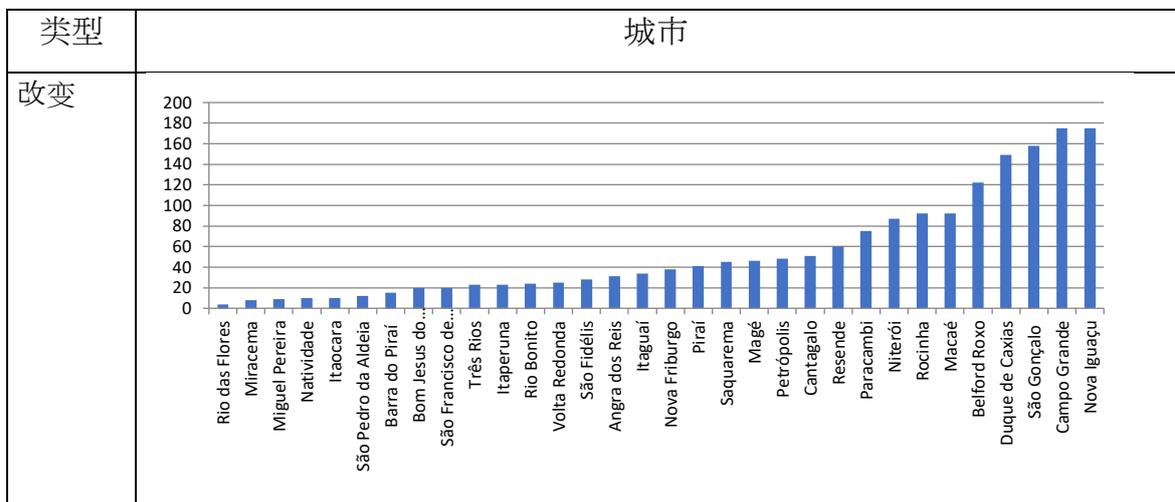
在图表27中，关于ALTER，关于AEd的经验，可以注意到，大多数人没有这种教学经验。然而，许多人说，他们已经通过互联网经历了教学学习的经验，仍然加强了对ALTER的偏见可能的社会代表性。拥有AEd的经验并不能改善此人认为对方拥有的形象。

表 27 - 与 EAD 的经验 - 阿戈拉·普雷康西托



关于大都市区（图28），我们观察到偏见的可能社会表现的发生，在EGO和ALTER中都有着强烈的标记。在比较这个和内陆的州，我们看到在图表28，一个较高的发病率的前者在大都市地区。

表28-城市地理分布-阿戈拉·普雷康西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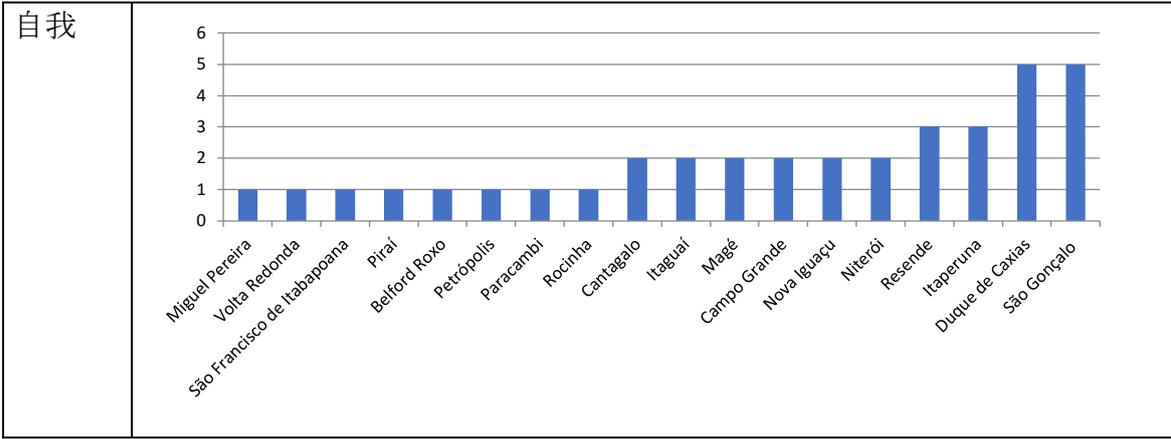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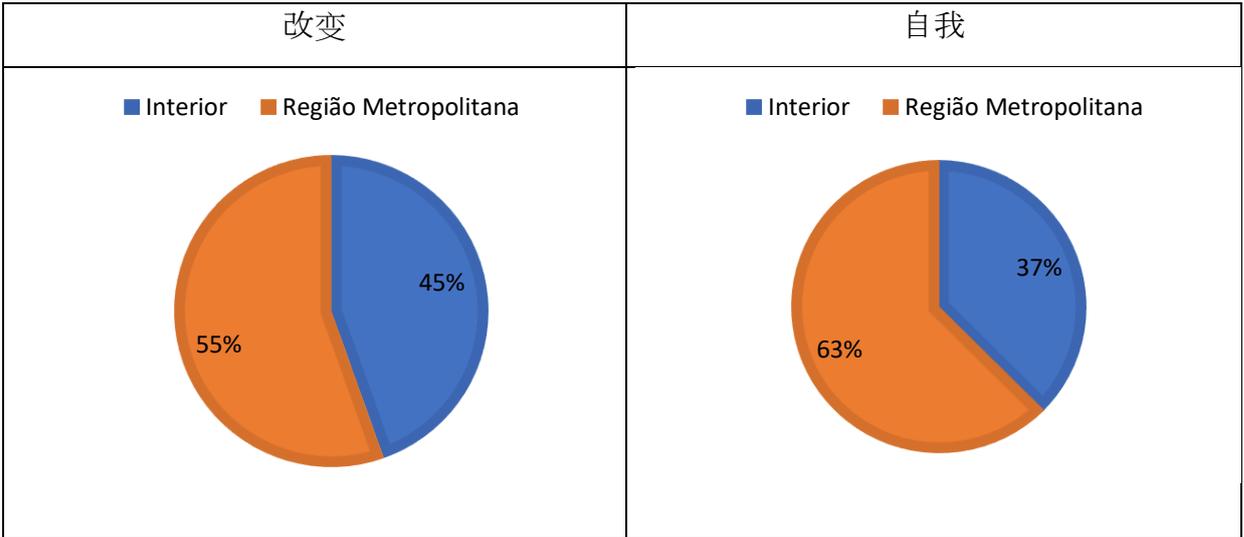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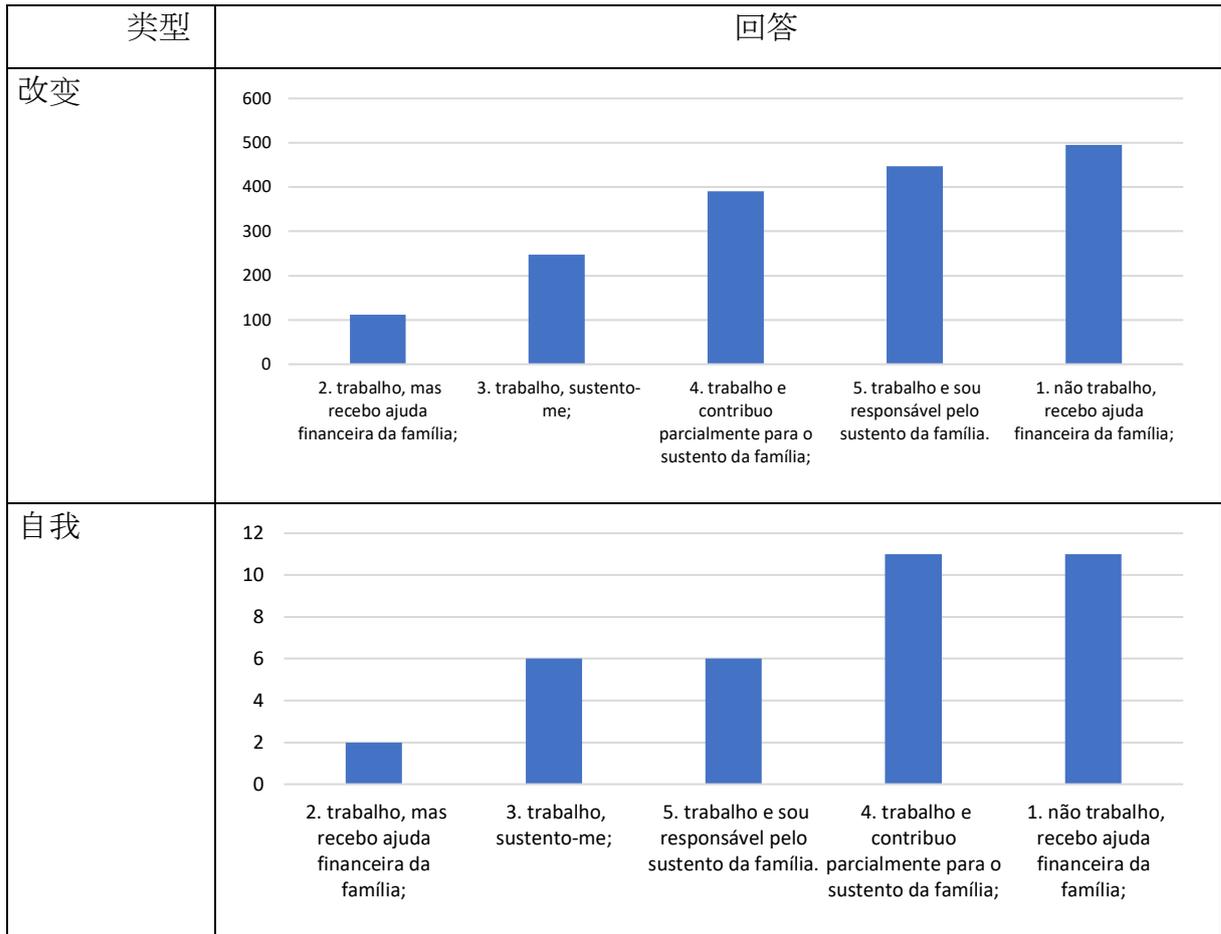


表29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普雷康西托



关于与ALTER有关的经济参与，大多数受试者得到其家庭的支持，不跟随那些作为其家园主要提供者的人工作。当召唤与EGO有关时，作为主要提供者与那些不工作和接受经济援助的人之间有一个平衡点。

表30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普雷康西托



4.2.3 弱阿戈拉

表31可以被看作是EGO和ALTER在与"弱"一词有关的"弱"一词的建设方面存在明显差距。这个比例大约是78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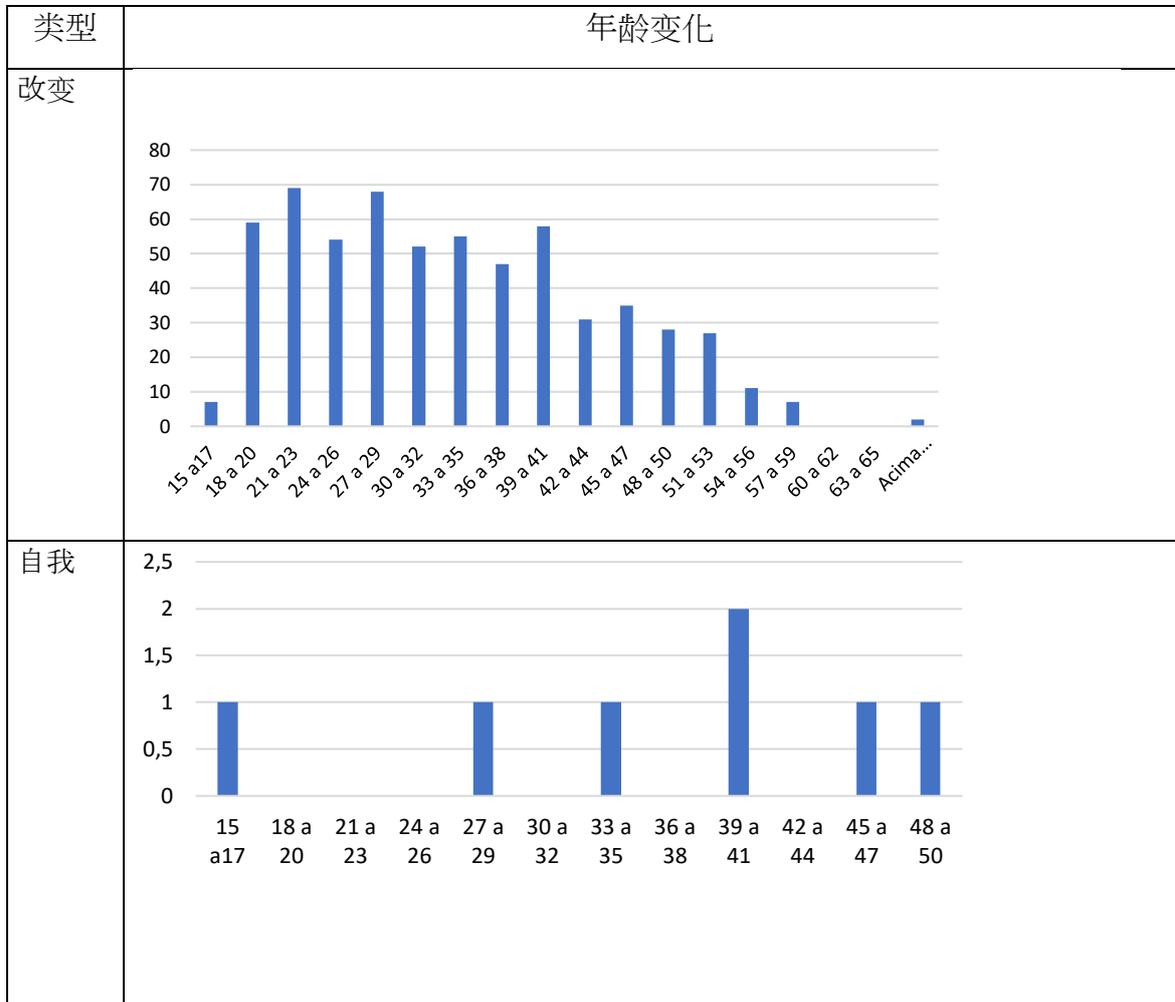
表 31 - EGO 和阿尔特召唤 - 弱阿戈拉 - 阿戈拉

阿戈拉	人
自我	6
改变	570

在 ALTER 中，可以观察到，在表 32 中，与"弱"一词的发生相比，21 至 23 岁之间的峰值，随后在 24 至 26 岁之间略有下降，在 27 至 29 岁和 39 至 41 岁之间呈上升趋势。我们注意到在18至20年之间，然后在30至38年之间有一定的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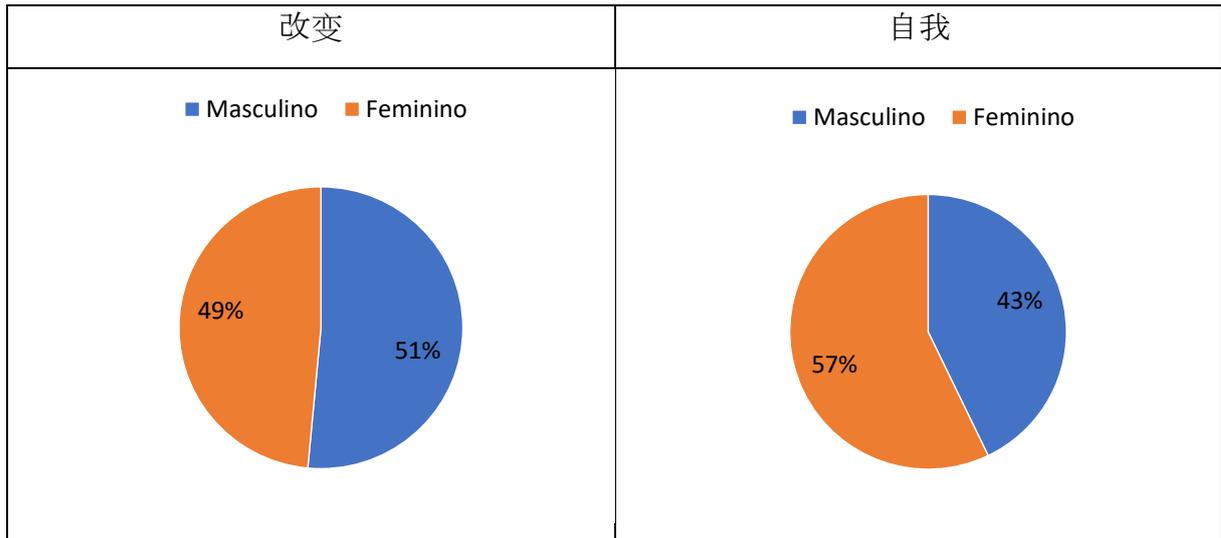
性。在表32中，关于EGO，由于答复者人数少，无法发表声明。我们仍然观察到39至41年的峰值。

表32 - 年龄变化 - 弱阿戈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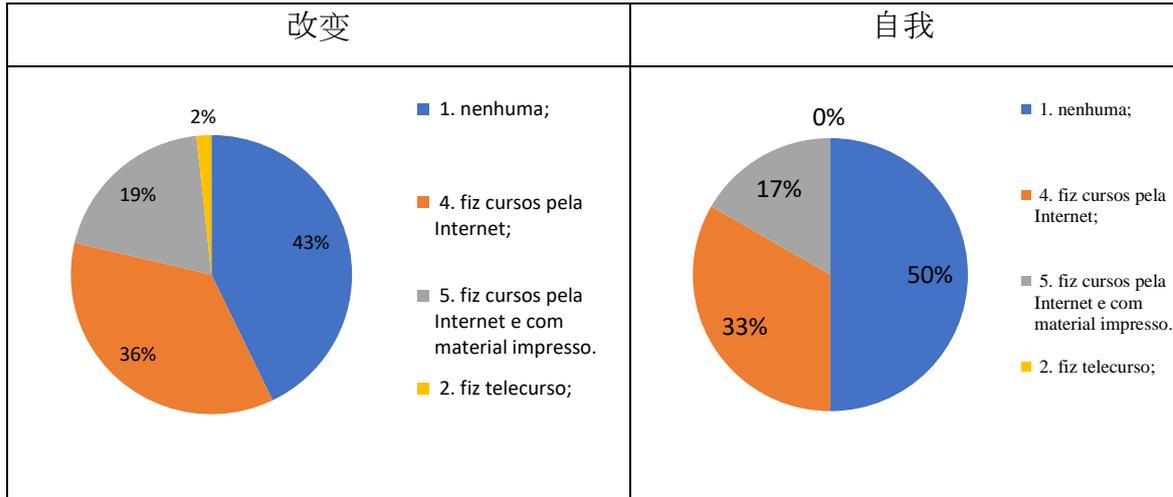
至于性，如图33所示，“弱者”的可能社会代表性为男性。当与EGO有关的观念被唤起时，这一多数被女性受众所逆转。

表 33 - 性 - 弱阿戈拉



至于远程教育的经验，如表34所示，“弱者”一词的召唤没有显著差异。然而，与ALTER相比，EGO形成的“阿戈拉”有更多的人从未有过这种教学经验。

表 34 - 与 EAD 的经验 - 弱阿戈拉



远程教育主要被生活在大都市地区的人认为是薄弱的。正如我们在图35中看到的，可以注意到，ALTER，来自新伊瓜苏、圣戈尼亚洛和坎波格兰德等城市的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当我们观察表35的结果时，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显示内陆城市中“弱”一词的唤起率最低。

表35-城市地理分布-弱阿戈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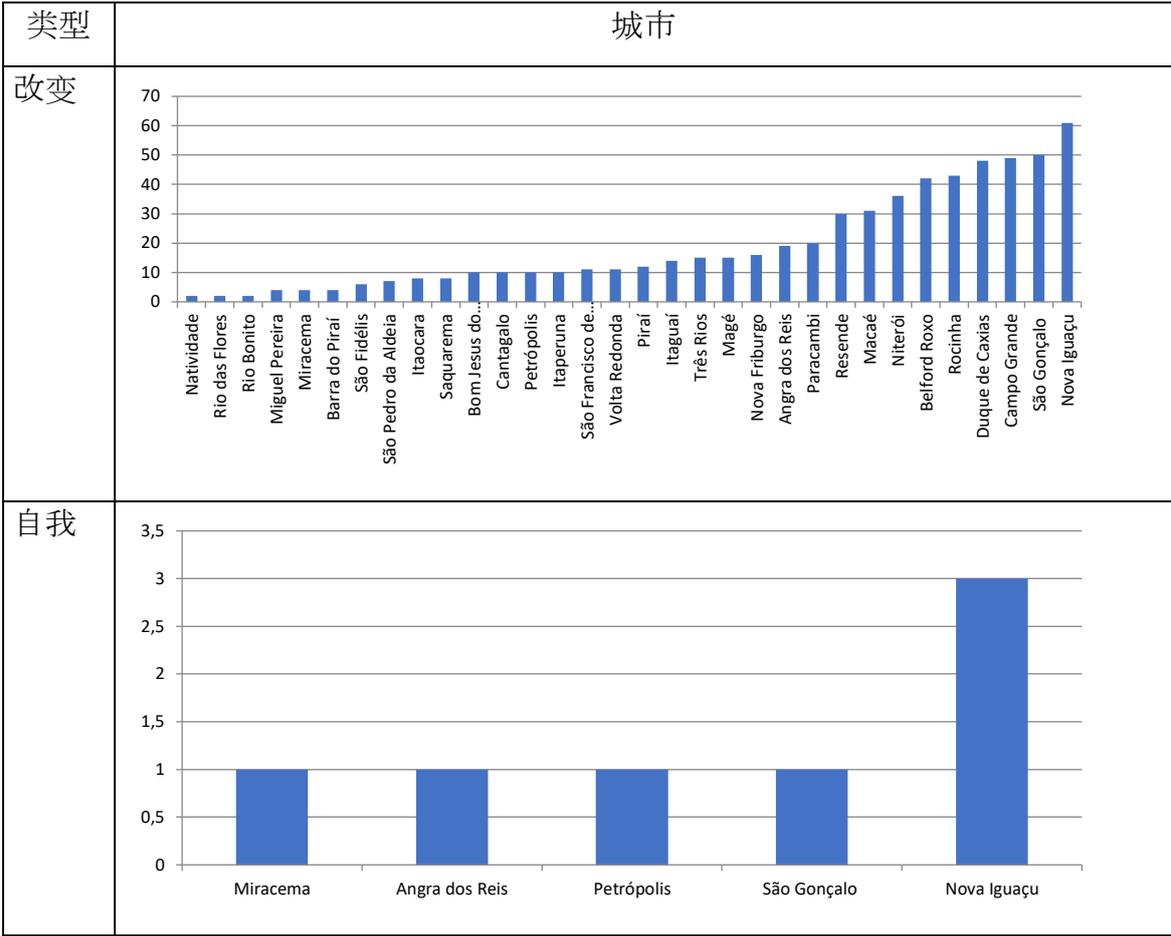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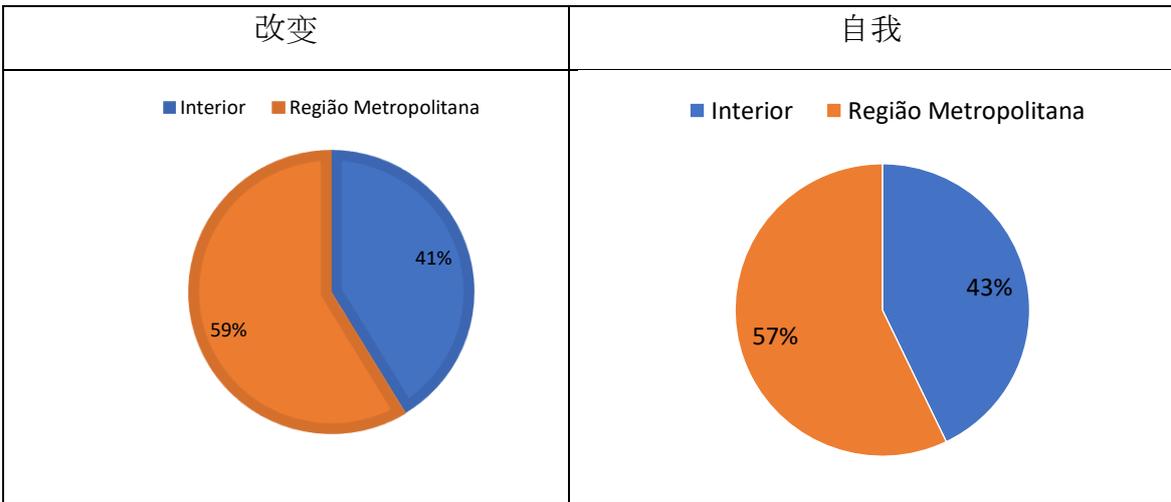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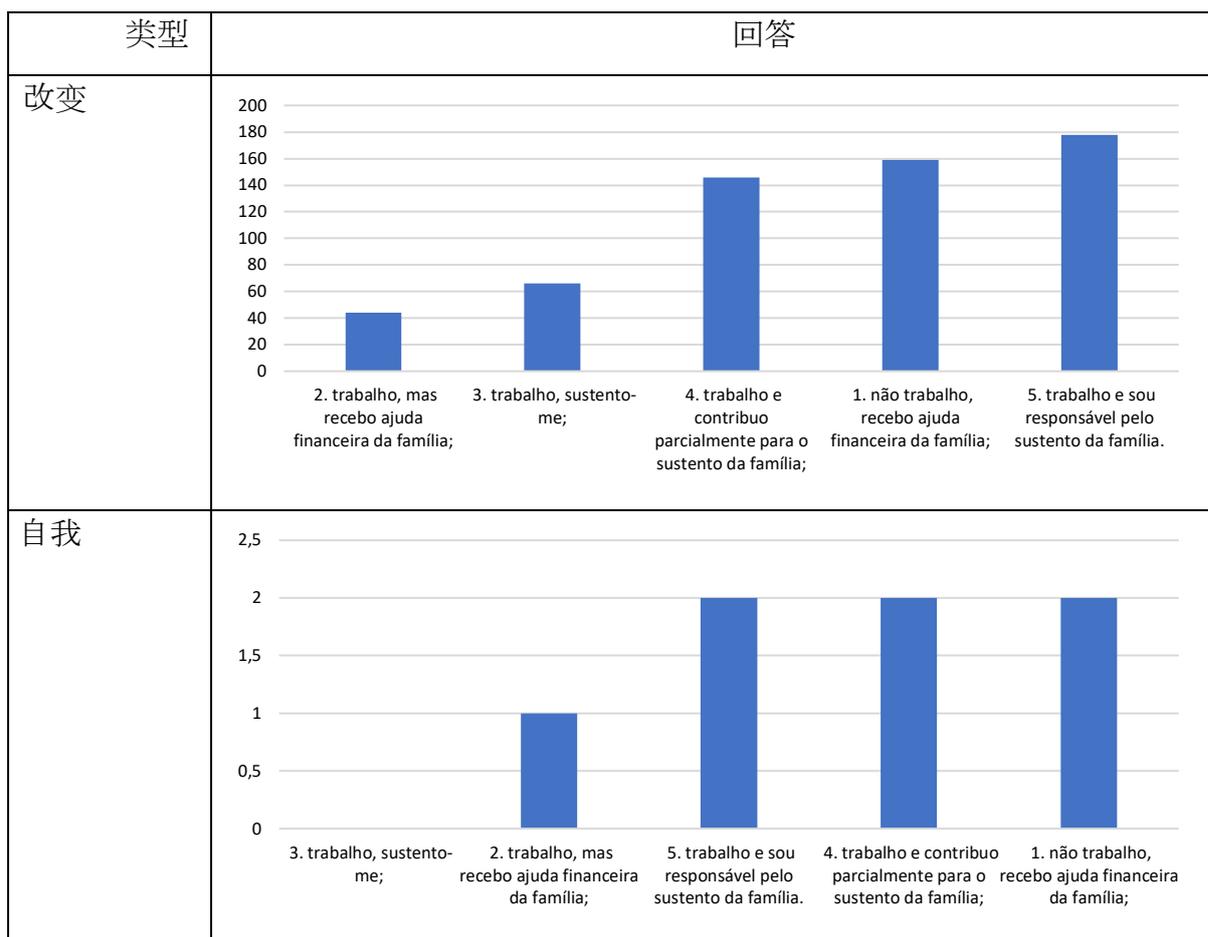


表36 - 区域地理分布 - 弱阿戈拉



在经济参与方面，大多数答复者表示，ALTER将其视为家庭风险，其次是不工作和得到家庭支助的情况。然而，关于EGO，作为主要、部分提供者和接受家庭的经济帮助之间存在着联系，如下表37如下：

表37 - 经济参与 - 弱阿戈拉



4.2.4 坏阿戈拉

在与"坏"一词的召唤有关的阿戈拉案例中，我们在表37中观察到，最初，EGO和ALTER之间的分布存在巨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它达到约74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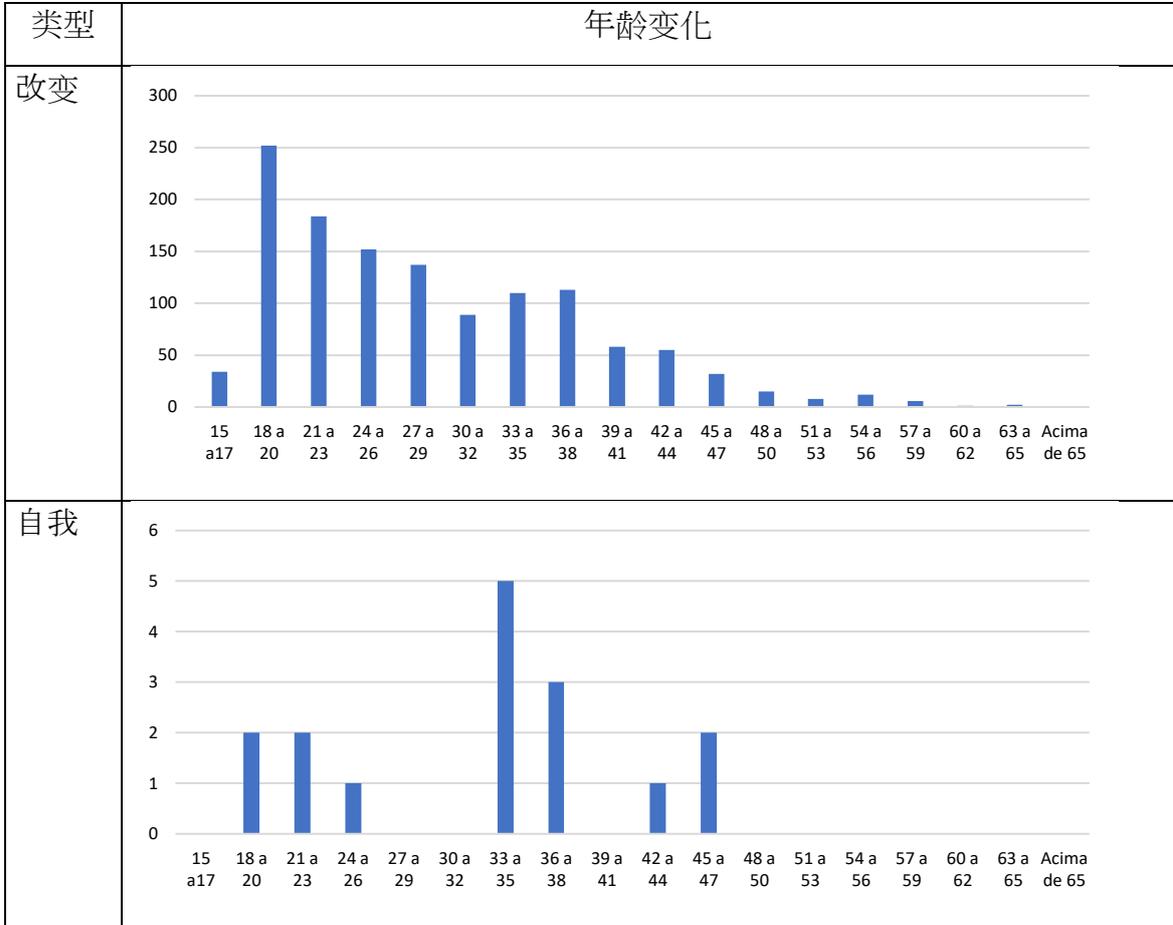
表37 - 埃戈和阿尔特 - 阿戈拉-阿戈拉·鲁伊姆

阿戈拉	人
自我	17
改变	1175

在下表38中，关于ALTER，也可以观察到，青年似乎在远程教育方面建立了另一方的社会代表性，这是一种不良模式。这种可能代表的高峰期发生在18岁年龄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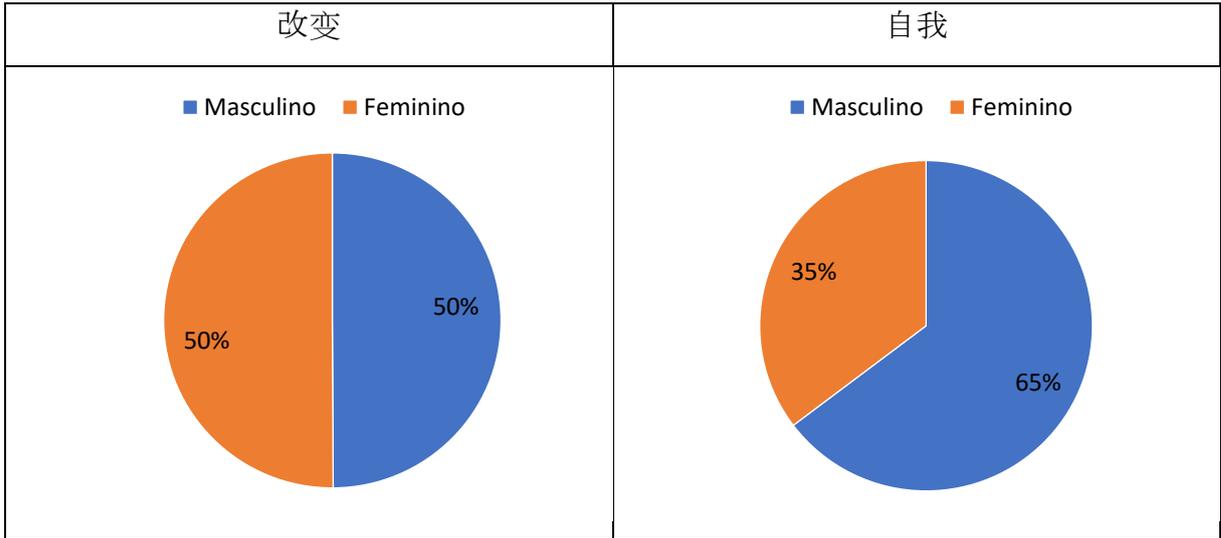
老年组下降。在35岁左右，召唤增加，然后保持稳定，从39岁到44岁。关于EGO，尽管受访者人数很少，但我们观察到大约35年来的峰值。

表 38 - 年龄变化 - 坏阿戈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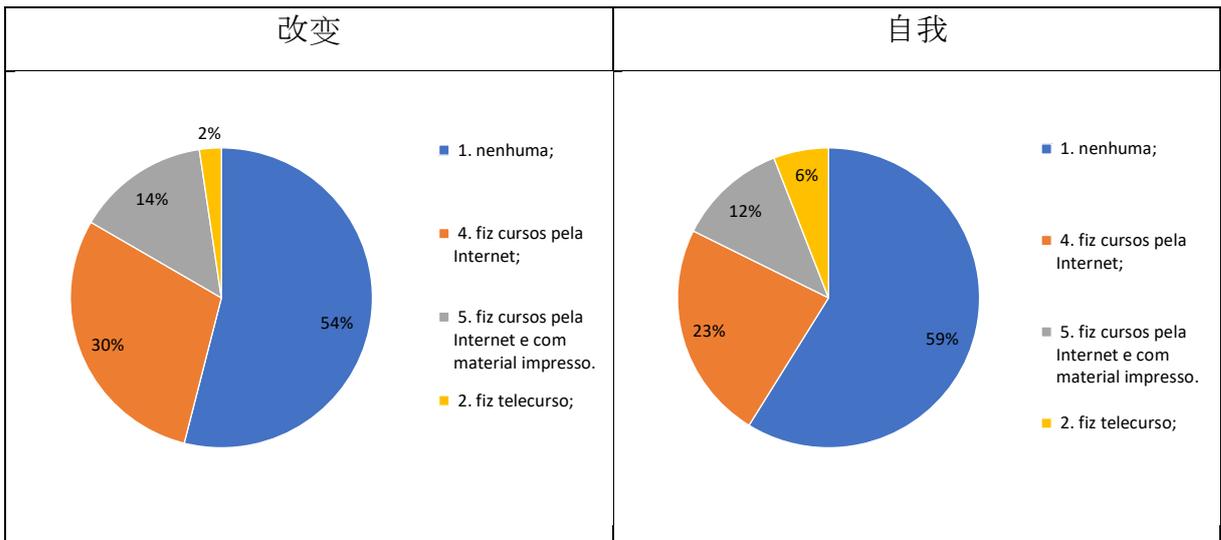
至于性，在图表39中，可以注意到ALTER的平衡。但是，当谈到EGO时，引起"坏"一词的观众大部分是男性，大约65%的人相信远程学习质量差。

表 39 - 性 - 坏阿戈拉



关于经验，我们可以在下表40中看到，无论是在ALTER还是在EGO，我们都可以注意到在远程教育方面缺乏经验。在这两种情况下，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没有远程教育的经验。

表 40 - 与 EAD 的经验 - 坏阿戈拉



关于地理分布，在新伊瓜苏市和坎波格兰德市，大多数远程教育的社会代表性可能较差的人都位于下表41中。关于这些地区，下表41表明，里约热内卢的大都市区是绝大多数"坏"的召唤与ALTER有关的地方。然而，在EGO中，这一术语的召唤主要在内部。

表41 - 城市地理分布 - 坏阿戈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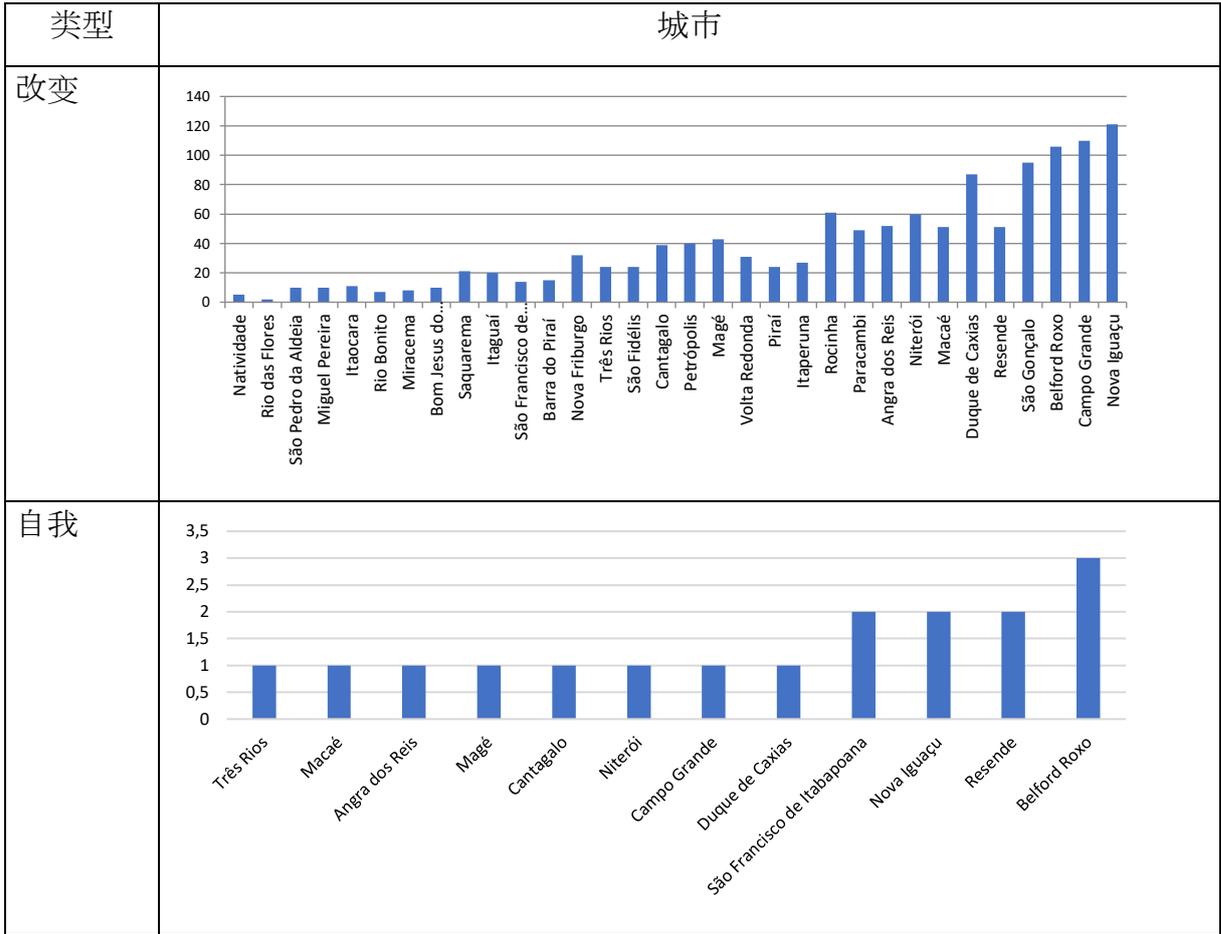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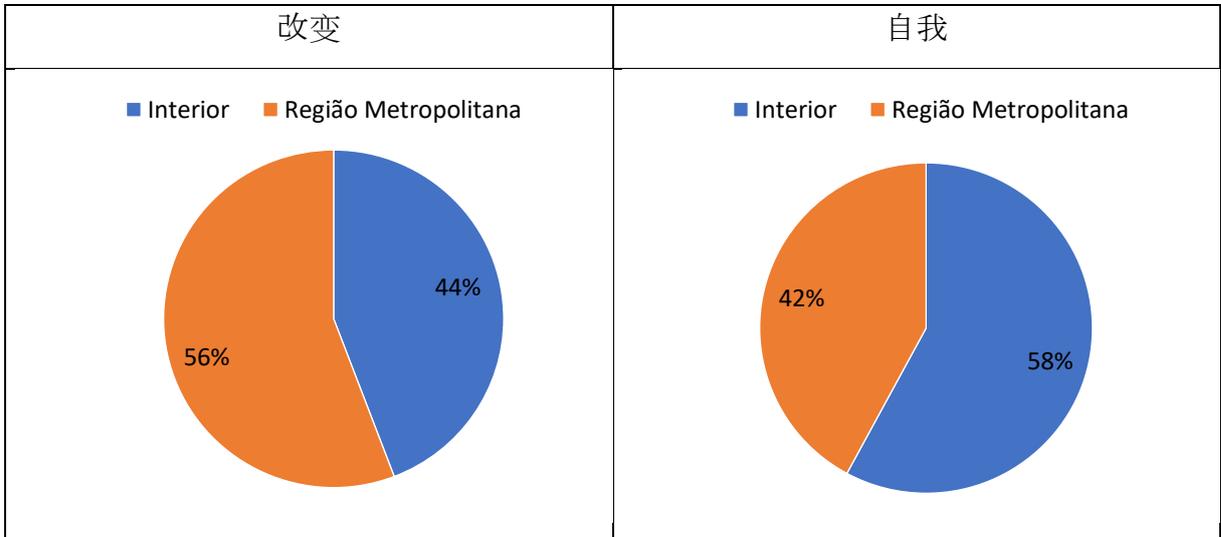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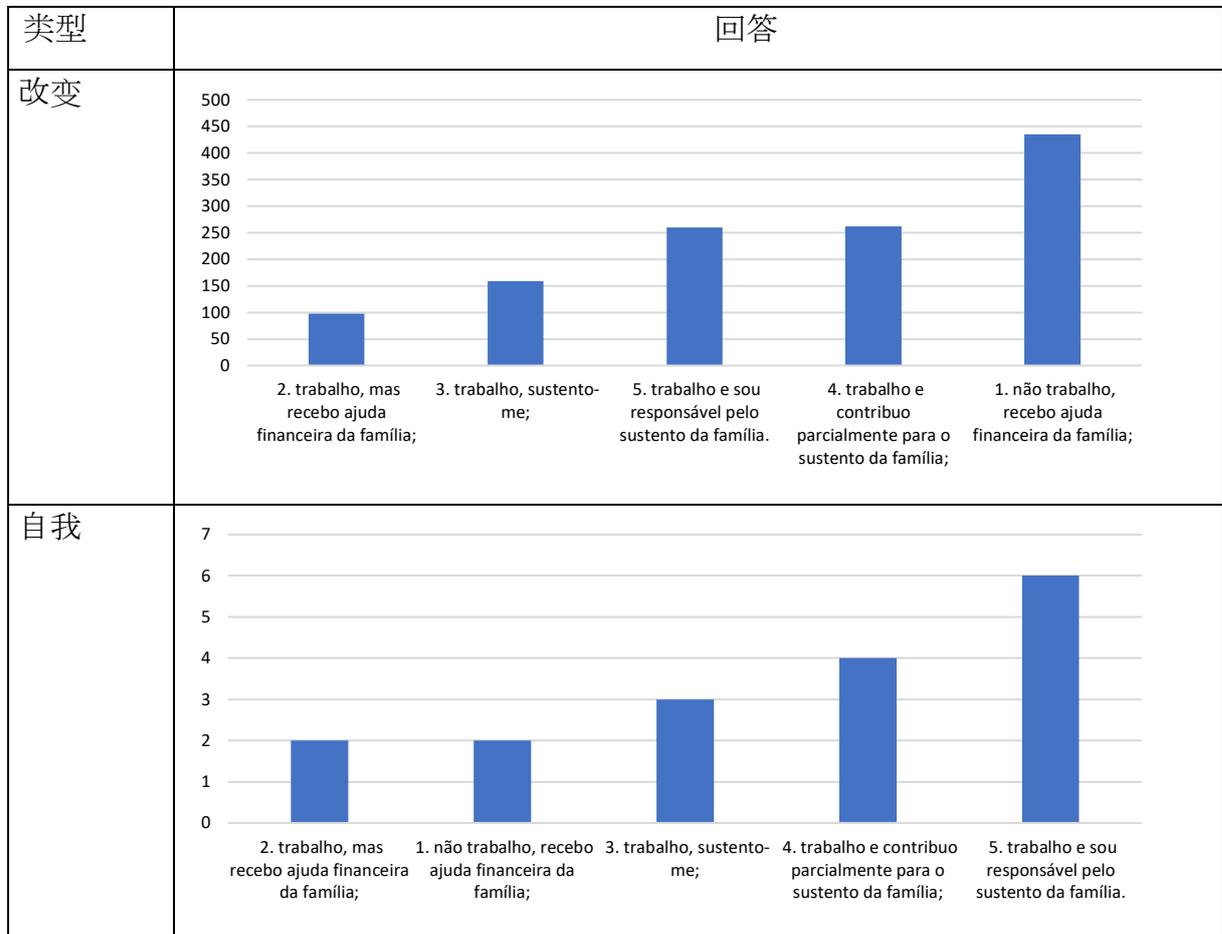


表42 - 区域地理分布 - 坏阿戈拉



在经济参与方面，对于ALTER来说，大多数人不工作，并得到家人的支持，不久之后，他们几乎注意到，那些回答自己是阿里莫人并部分缴纳了房屋费用的人之间存在着联系。关于EGO，情况发生了变化，主要是那些主要提供者，如下表43所示。

表43 - 经济参与 - 坏阿戈拉



4.2.5 阿戈拉不信任

与 THE 相关的不信任可能的社会表现实际上仅限于更改召唤，提及 EGO 的频率非常低，如下表 44 中可见一斑。两个召唤场之间的差额是ALTER的147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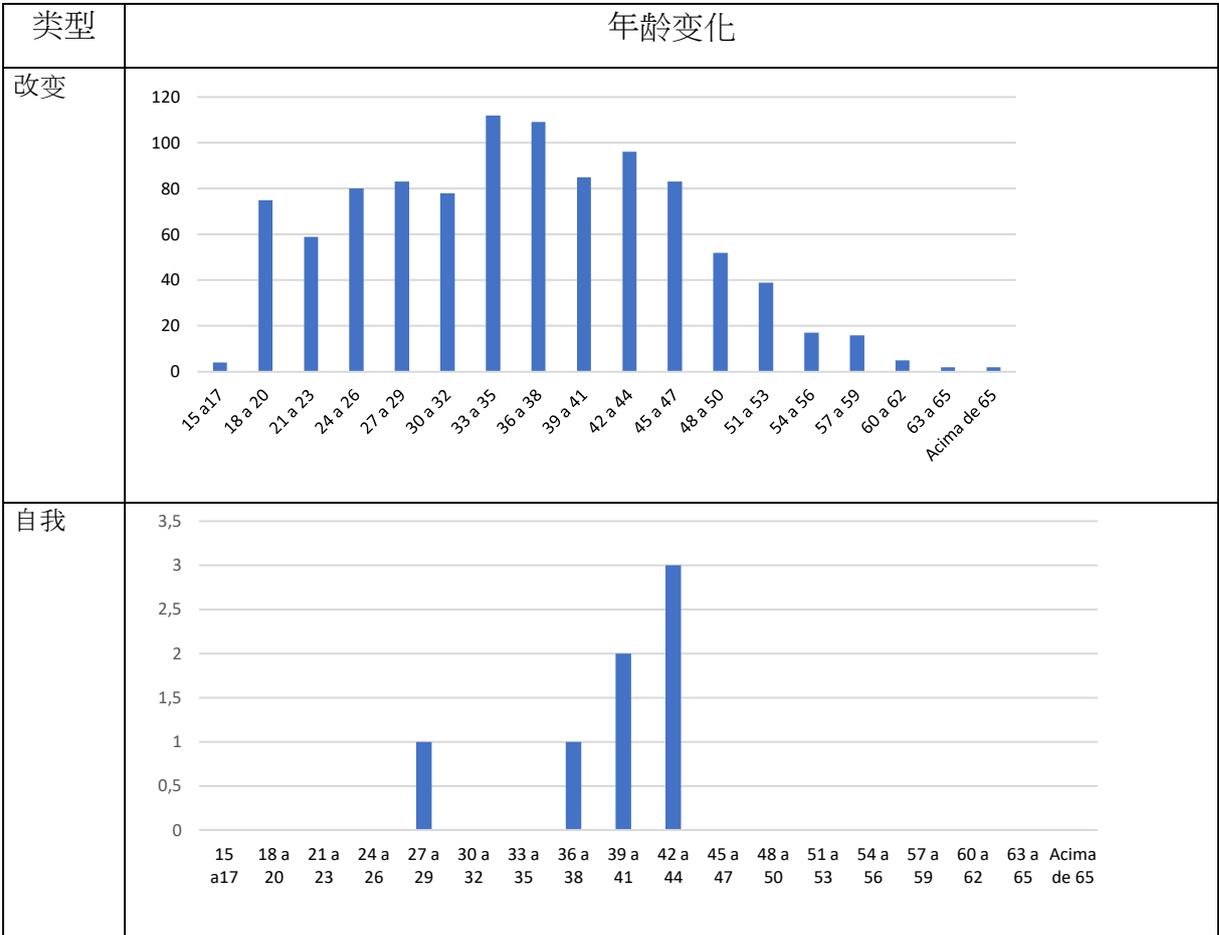
表44-与EGO和ALTER有关的职业-阿戈拉-阿戈拉不信任

阿戈拉	人
自我	7
改变	947

关于年龄分布，如图45所示，36至41岁的老年人有更大的不信任感，这是臭名昭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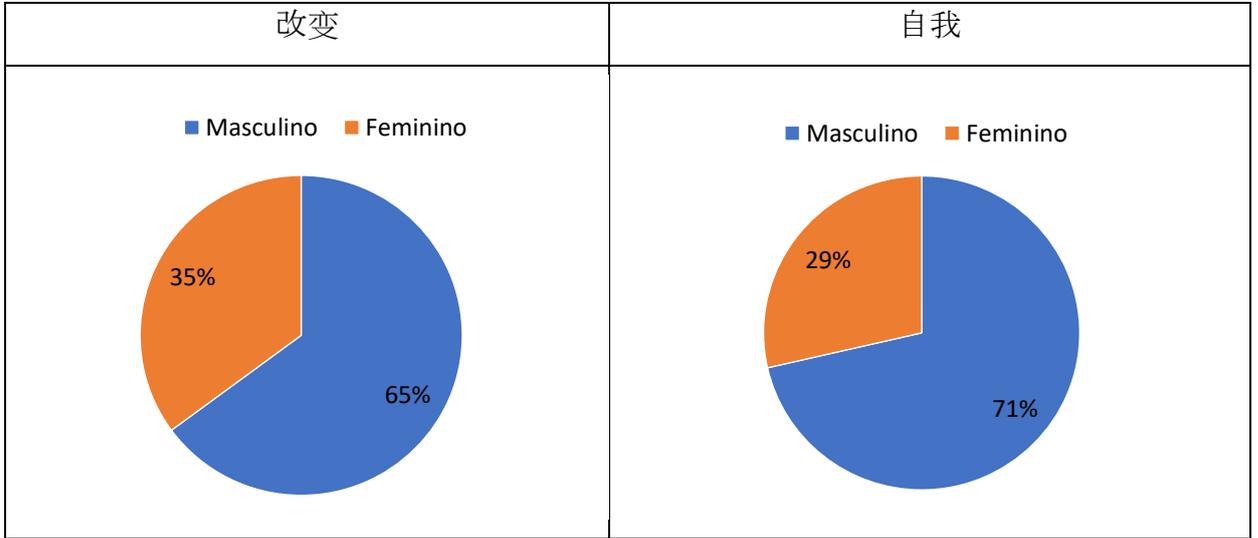
ALTER：从39岁到41岁略有下降，从42岁开始增加。这些数据使我们假设，公众年龄越大，对彼此（ALTER）的不信任感就越大。尽管 EGO 的召唤数量非常少，但在 42 至 44 岁的年龄组中，不信任的社会代表性仍很普遍。

表45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不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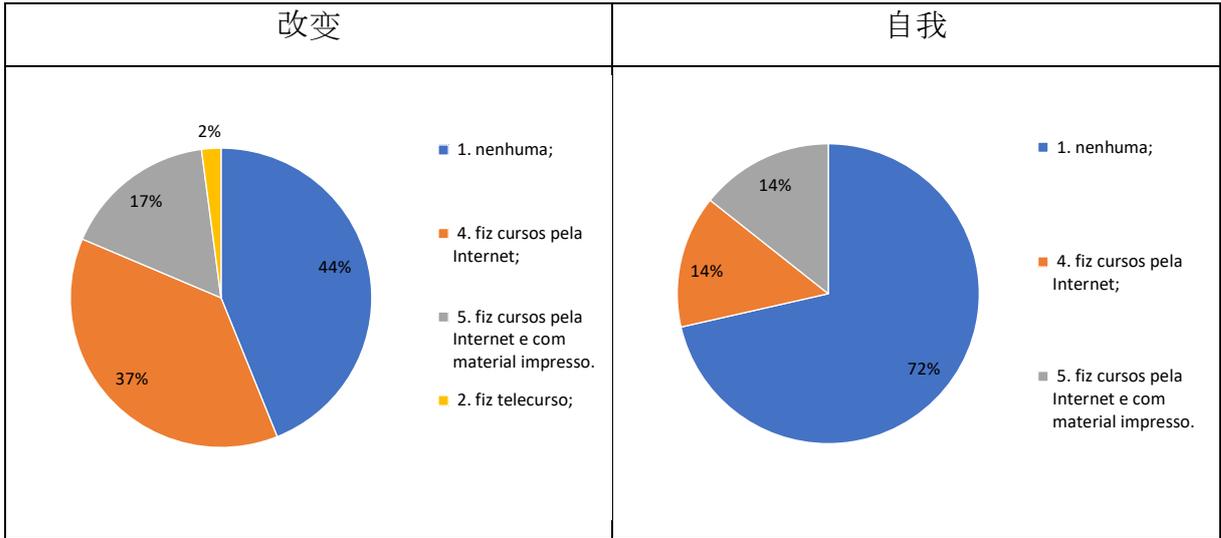
我们还注意到，如表46所示，“不信任”一词在男性头脑中比女性头脑中出现得更多，无论是在ALTER还是在EGO中。构成这种痛苦的绝大多数不信任感是由男性受访者形成的。

表 46 - 性 - 阿戈拉不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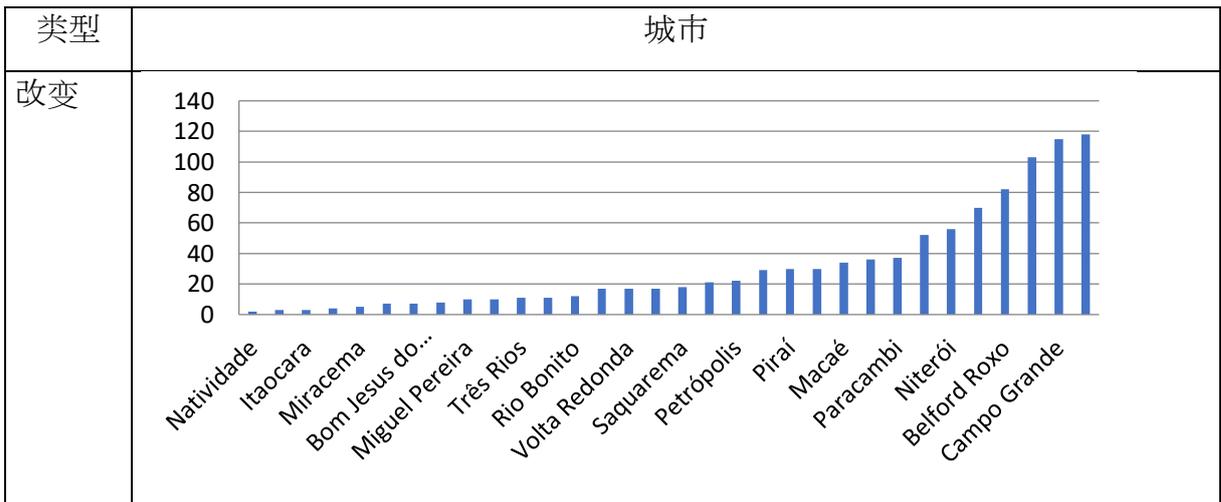
我们可以在下图 47 中观察到的另一个方面是，大多数受访者（44%）在构建关于不信任的 ALTER 的可能表示时，从未直接接触过远程学习。与EGO（72%）相比，这一数字有所增加。有趣的是，尽管在EGO中，我们获得了1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通过互联网学习课程的声明，但他们相信其他人（ALTER）做得更多。

表47 - 与 EAD 的经验 - 阿戈拉不信任



关于这个词的召唤中的地理分布，大都市区是迄今为止大多数人认为ALTER有"不信任"的地区，65%的受访者将这种看法归结于以下表48。EGO的召唤是平衡的，内部和大都市区域在区域中均匀划分，如下表48可见一斑。

表48-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不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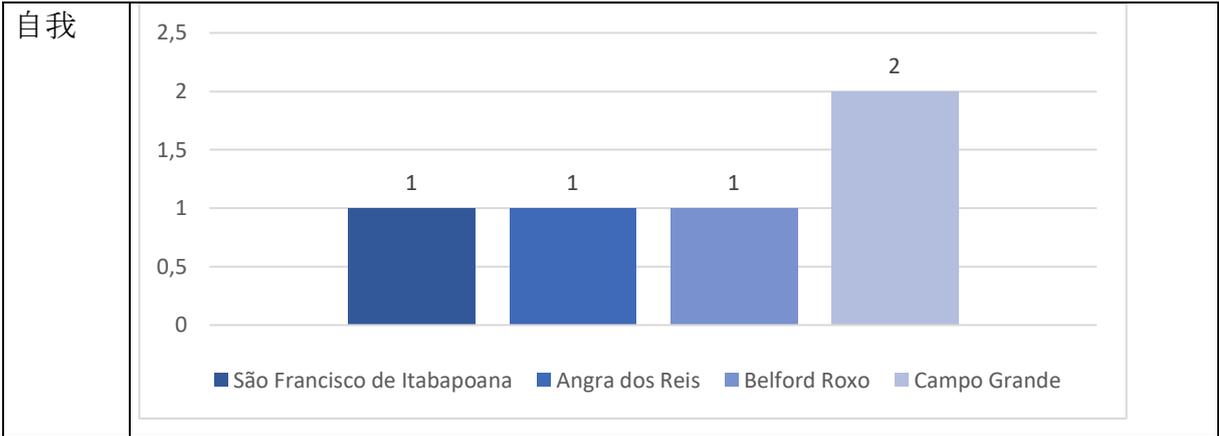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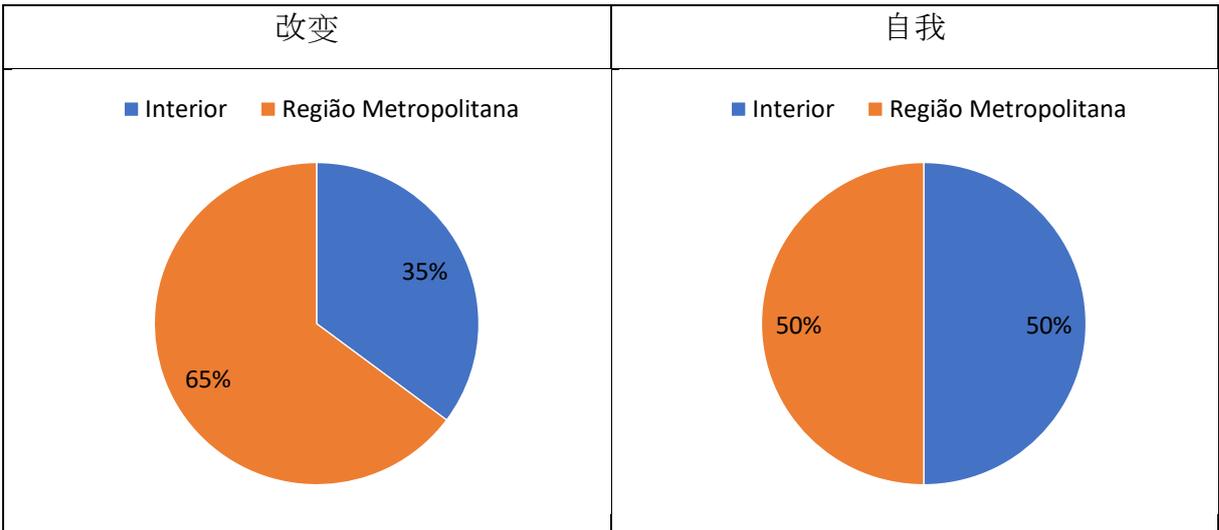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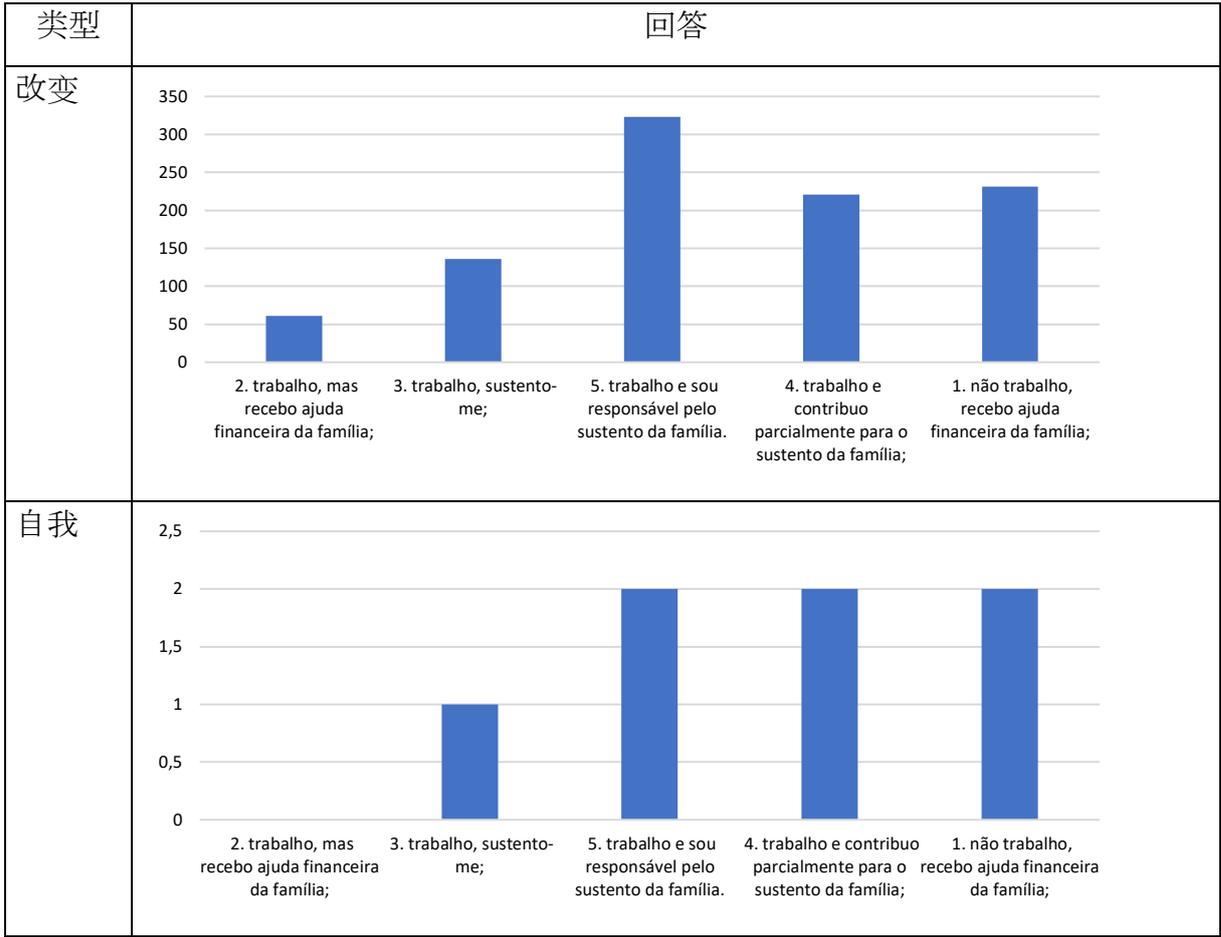


表49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不信任



关于经济参与问题，大多数来自这个政府的代表ALTER要求他成为这所房子的主要提供者，如下表50所示。当召唤与EGO有关时，主要提供者、部分或非工作者之间有一个平衡，并接受财政援助。

表50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不信任



4.2.6 复杂的阿戈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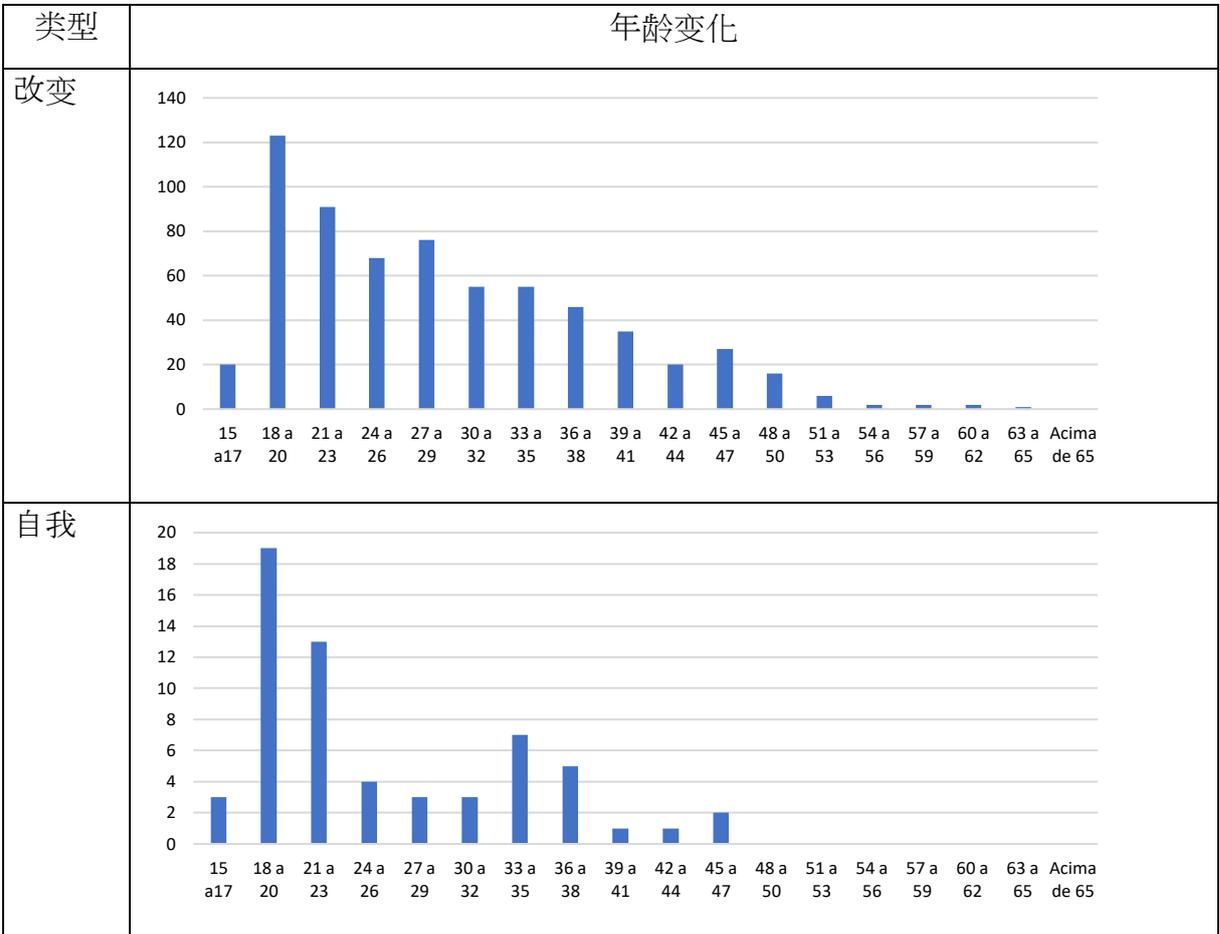
与"复杂"的可能社会表现有关的召唤的发生，可以看出，少数人唤起了这种想法——EGO——，这种想法与另一种观点无关，是改变的。我们注意到 EGO 和 ALTER 之间的差异约为 10 次，其中大多数都忽略了 ALTER 发现"复杂"的信念，如下表 51 所示。

表 51 - 埃戈和阿尔特召唤 - 阿戈拉 - 复杂的阿戈拉

阿戈拉	人
自我	56
改变	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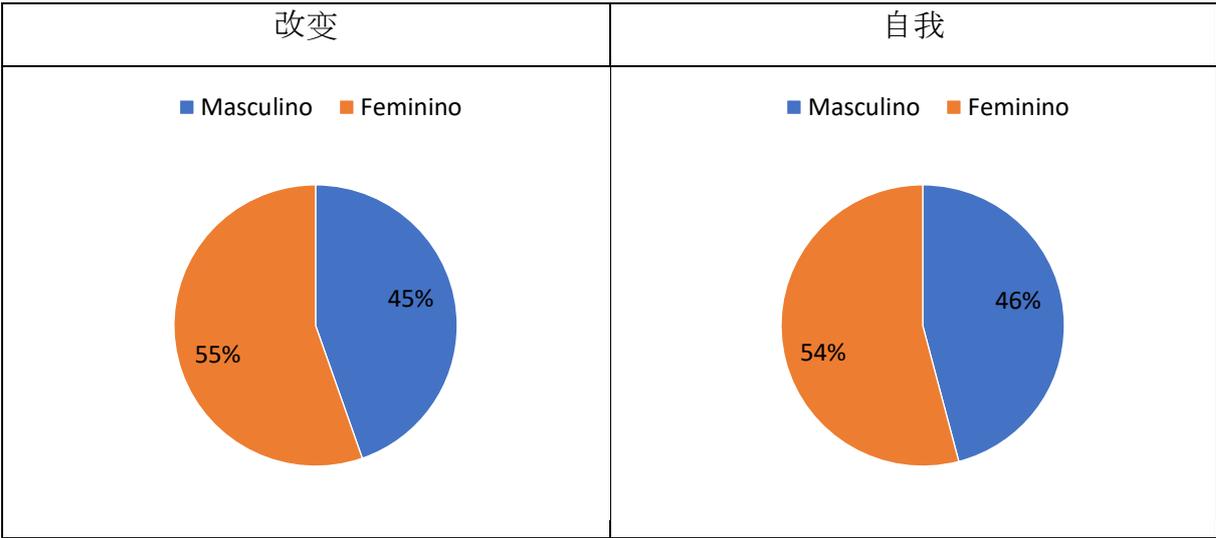
提出"复杂"召唤的人的年龄差异主要由年轻人组成，包括EGO和ALTER，形成了从年轻到年长的梯子下降的视觉效果，如下图52所示。年龄越大，就越不可能唤起"复杂"一词。在 EGO 中，可以只注意到 23 年后的初始峰值超过下降。

表 52 - 年龄变化 - 复杂的阿戈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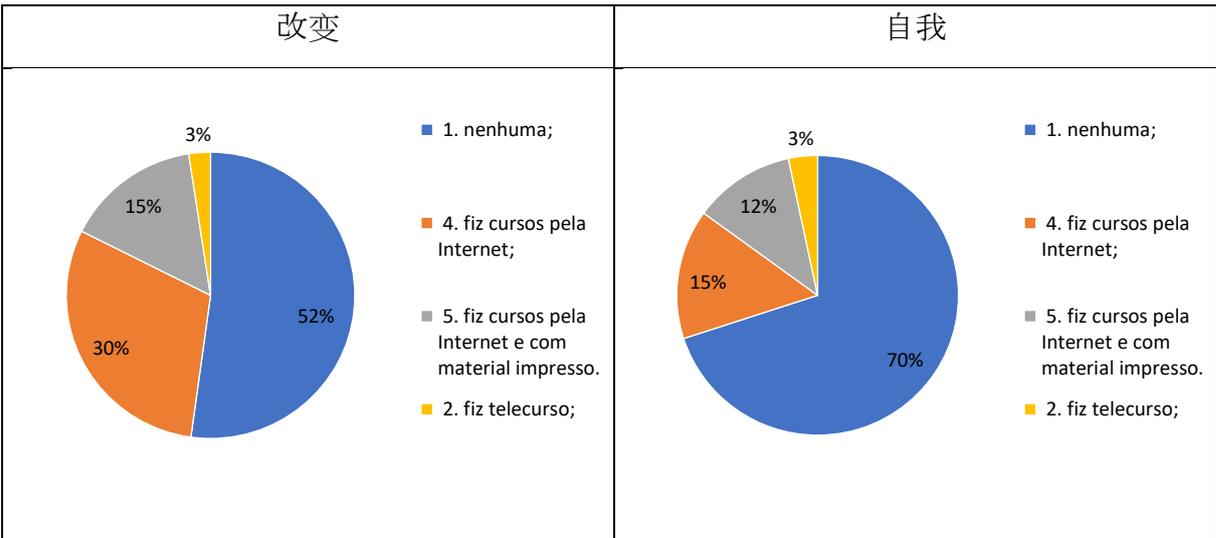
在 ALTER 和 EGO 中，关于性别的"复杂"一词主要由女性唤起，如下图 53 所示。

表 53 - 性别 - 复杂的阿戈拉



关于经验，这个词的召唤，无论是关于EGO对ALTER的看法，还是关于EGO本身，都表明缺乏。缺乏远程教育的经验可以解释，如下表54所示，EGO本身的"复杂"理念的份量更大。

表 54 - 复杂 EAD-阿戈拉的经验



关于ALTER，我们注意到，来自大都市区的绝大多数受访者——主要由坎波格兰德、新伊瓜苏和圣戈纳洛组成——认为"复杂"的EAD，如下表55所示。在这种情况下，EGO的想法被颠倒了，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复杂"一词来自里约热内卢州的内部，特别是位于里约热内卢南部的雷森德市和里约热内卢北部的马卡埃市（下表55）。

表55 - 城市地理分布 - 复杂的阿戈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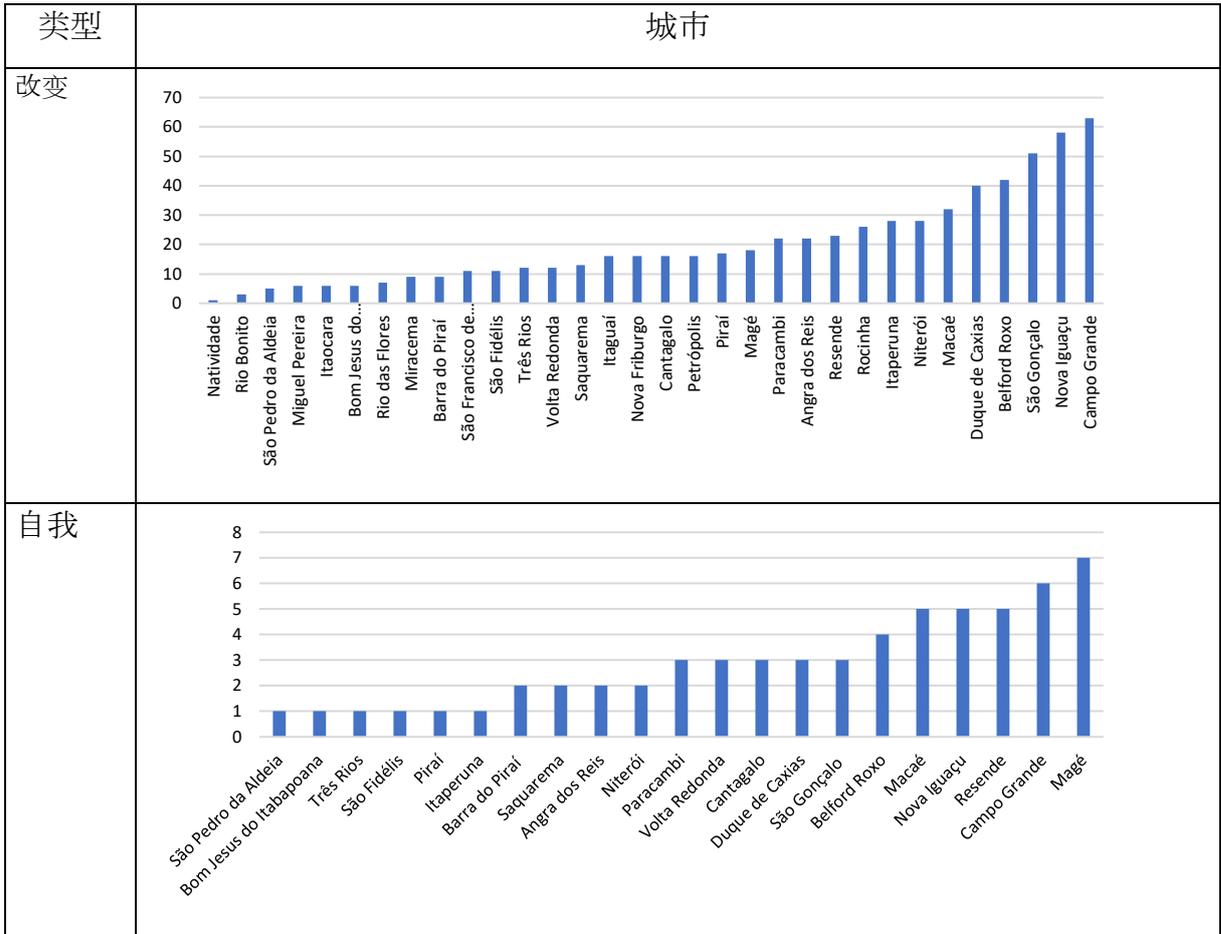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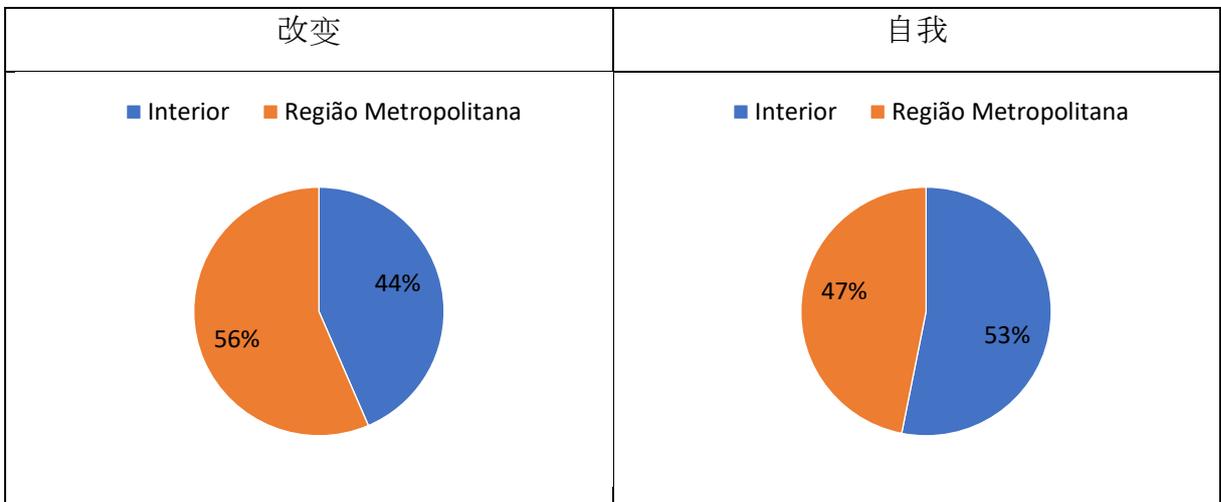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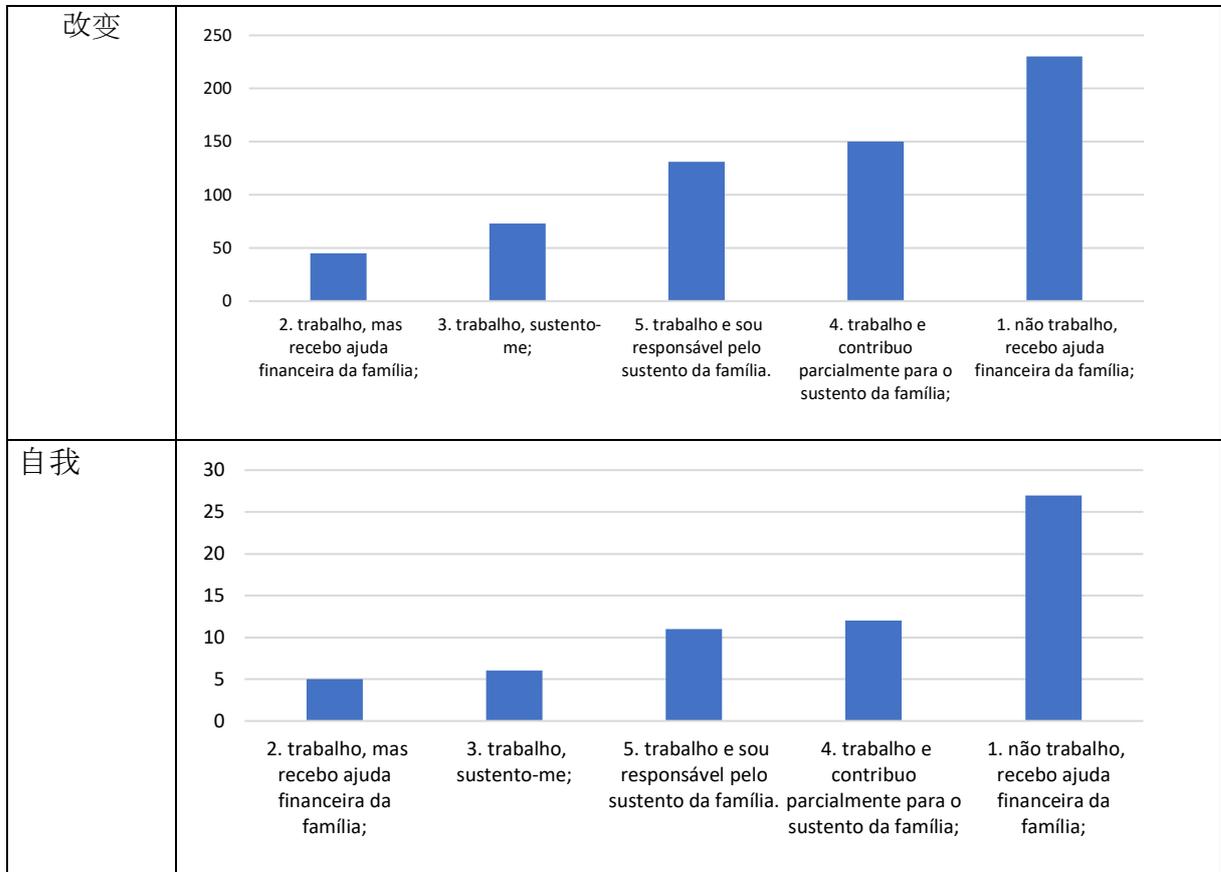


表56 - 区域的地理分布 - 复杂的阿戈拉



关于经济参与问题，也有大多数答复者（下表57），其中对家庭经济援助的依赖性进行了说明。这既是一个想法，一个自己 - Ego - 和一个他与其他人 - 改变。

表57 - 经济参与 - 复杂的阿戈拉



4.2.7 阿戈拉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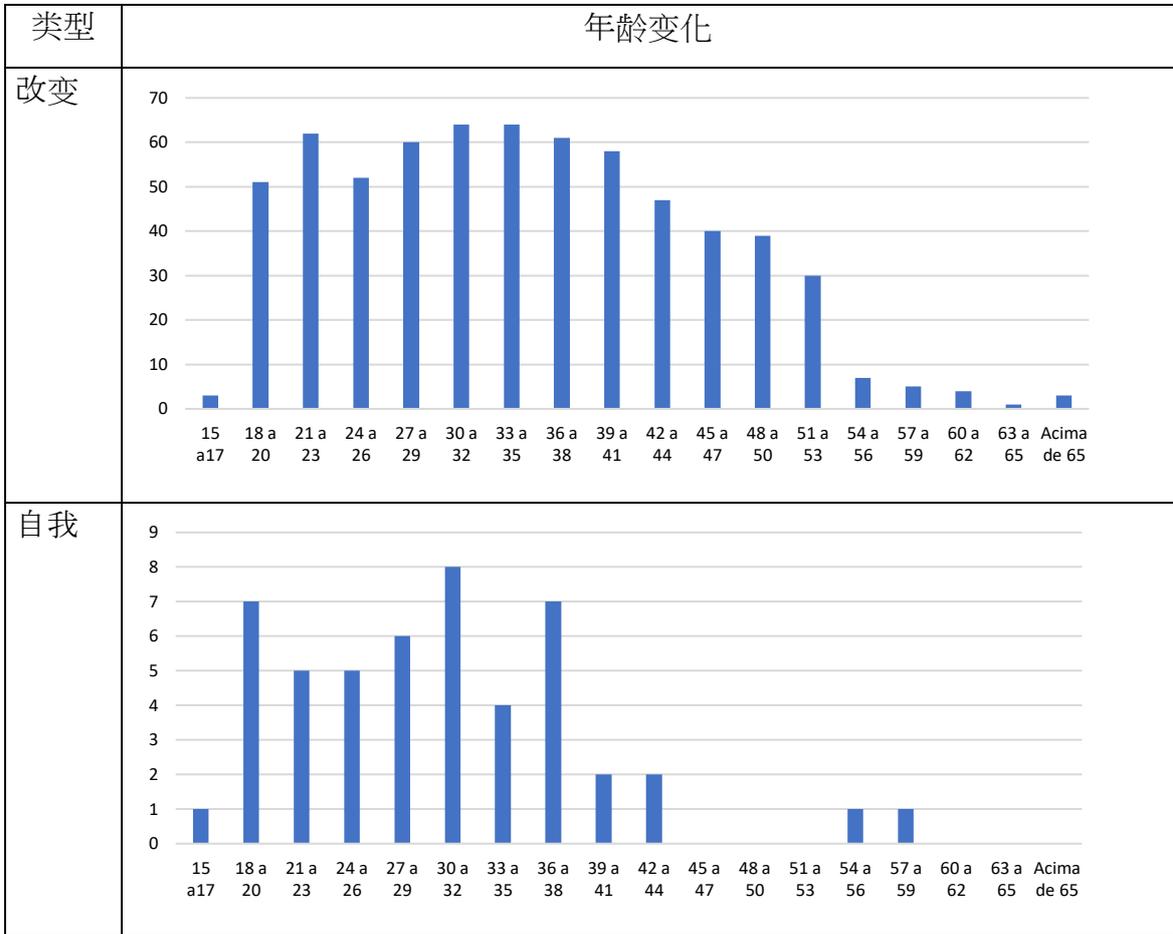
关于导致提到“怀疑”一词的召唤，我们发现EGO和ALTER之间存在差异，就像以前发生在其他痛苦中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表58，下），差异大于13倍。

表58 - EGO和阿尔泰 - 阿戈拉 - 阿戈拉·达维达

阿戈拉	人
自我	45
改变	6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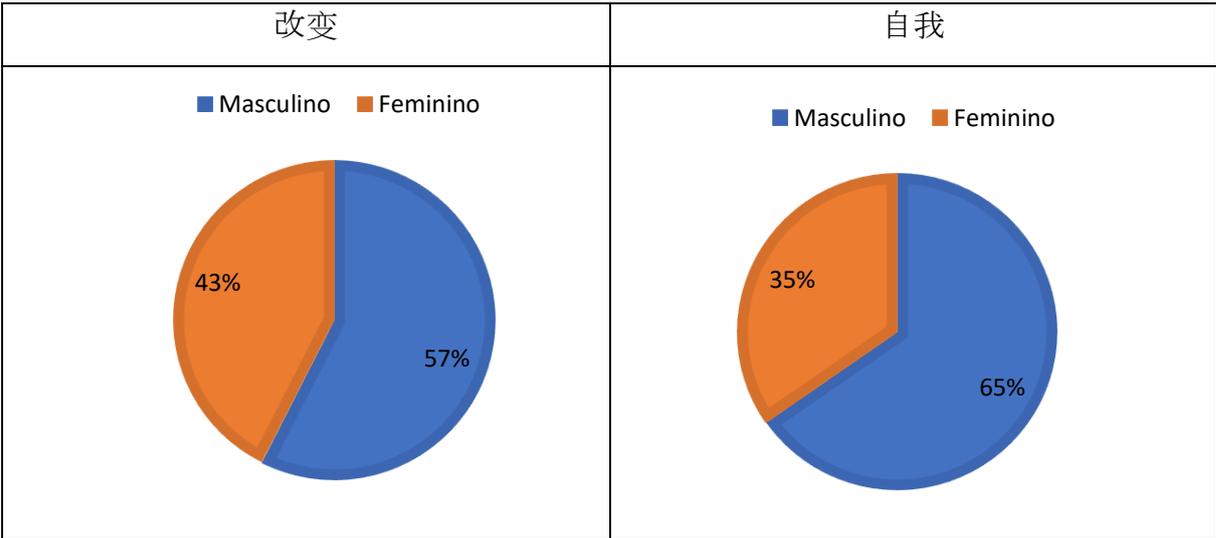
关于变化的年龄差异似乎表明，社会对“怀疑”的表示一直存在，从21岁到41岁结束，24至26岁之间略有下降。如图所示（下图 59），与 EGO 相关的是 18 至 20、30 至 32 和 36 至 38 岁之间的急性峰值。

表 59 年龄变异 - 阿戈拉·达维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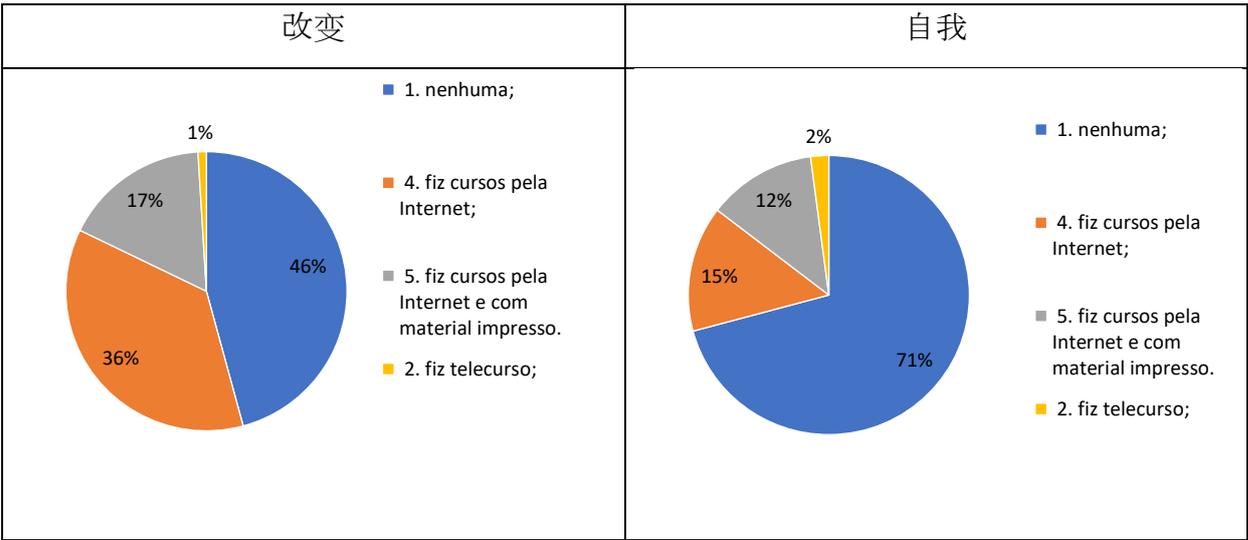
关于性，由于这个词的唤起，“怀疑”的表示似乎与ALTER和EGO的男性受访者联系得更多。然而，被调查者更把自己归因于自己——EGO——对EAD产生怀疑的可能性，而不是与改变有关的可能性，如下表60所示。

表60-性-阿戈拉怀疑



关于这次经历，超过70%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没有“怀疑”一词。在他们构建的关于其他人的表示的情况下，ALTER 达到 46% 的显著较低水平，如下表 61 中可见一斑。

表 61 - 与 EAD 的经验 - 阿戈拉·达维达



关于EGO对ALTER的看法，与前一个案例一样，我们发现大多数来自大都市区代表“怀疑”高峰的新伊瓜苏（下图62）。就EGO在EAD能带来什么方面与他接触的感觉而言，大多数引起“怀疑”的人来自里约热内卢州内部（下表62）。

表62 - 市政地理分布 - 阿戈拉·达维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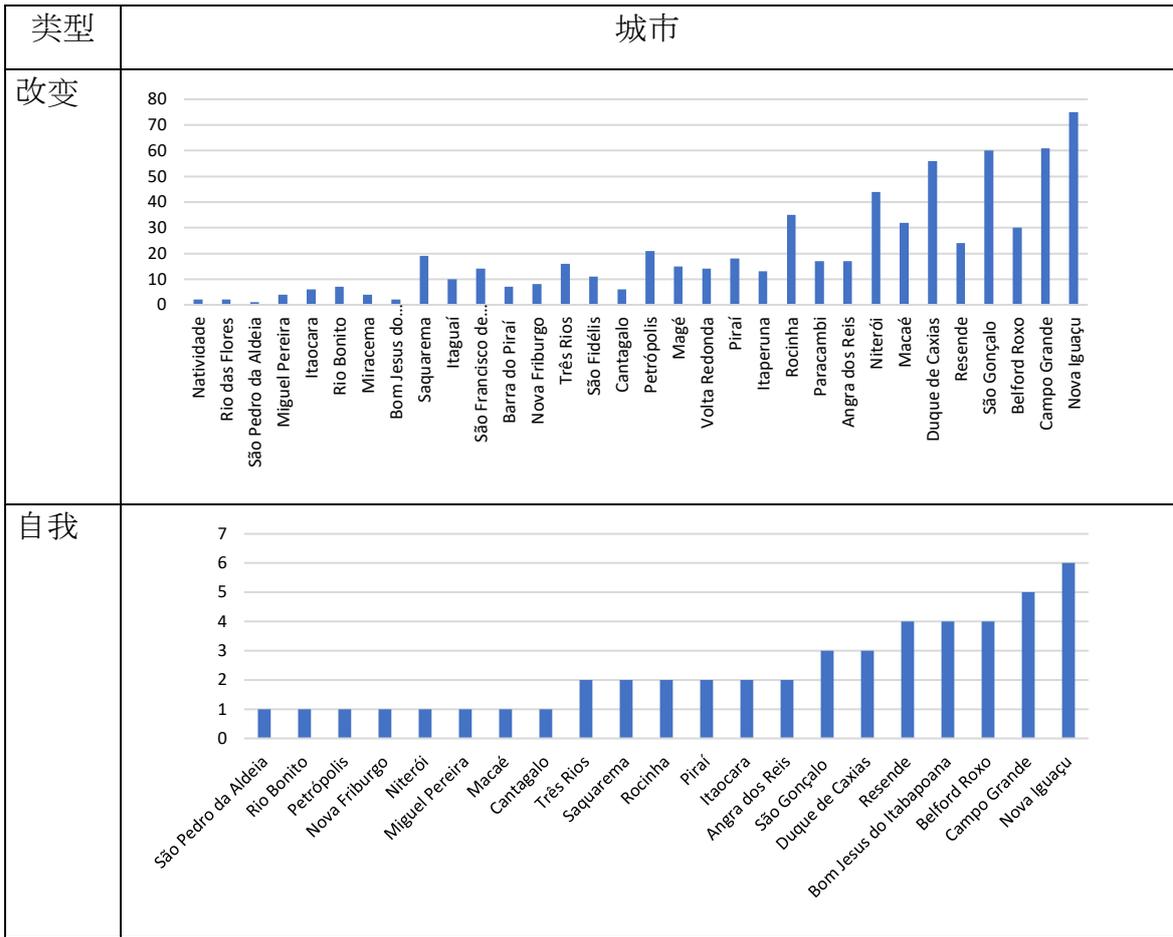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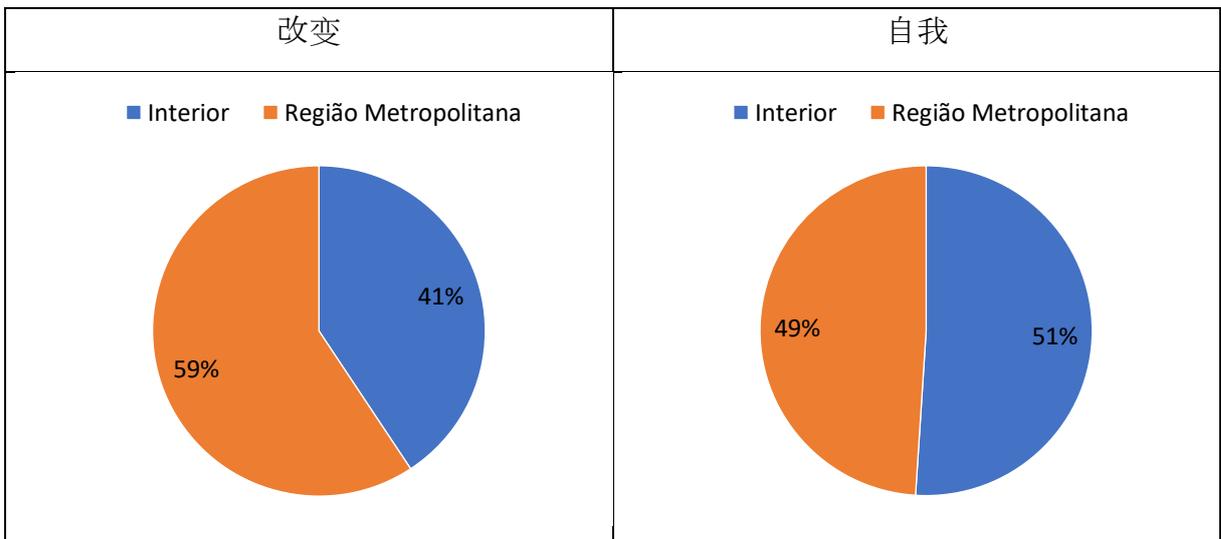


表63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达维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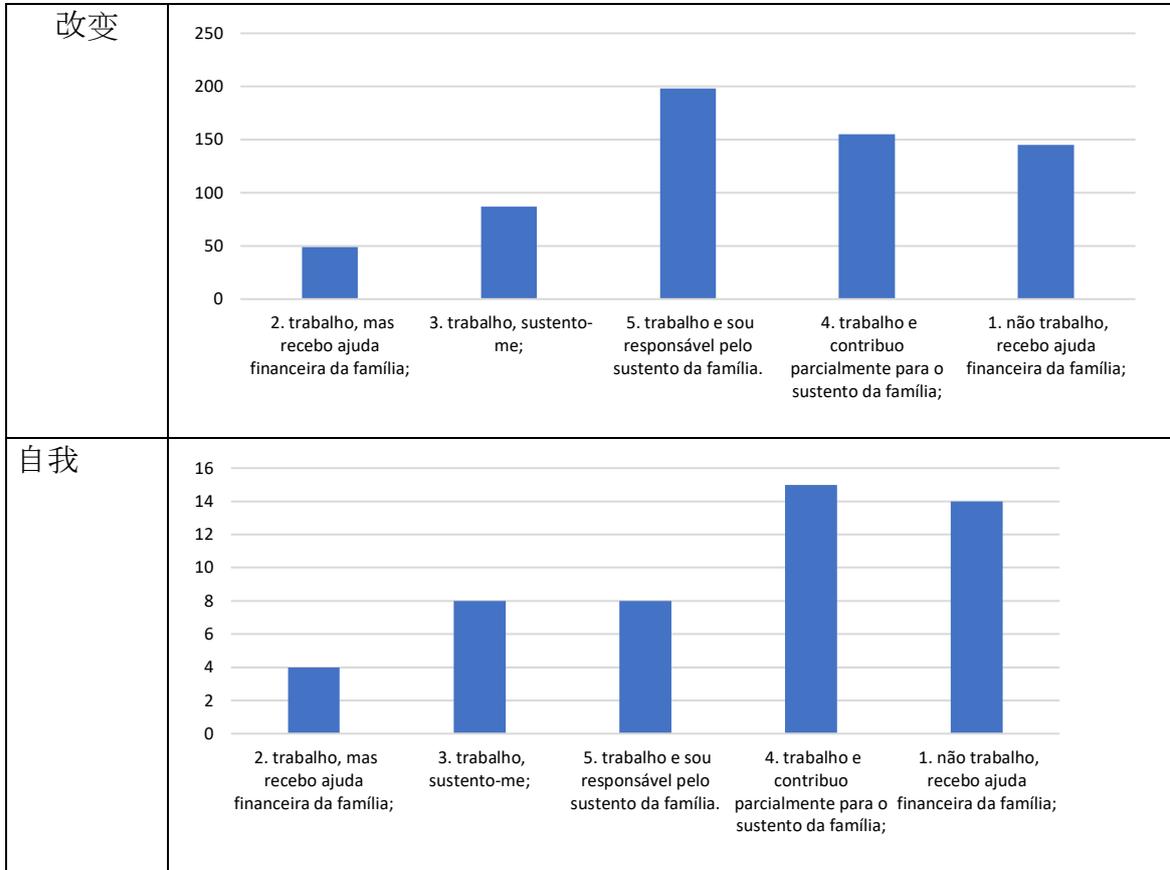


对于EGO来说，大多数EAD受众——ALTER——唤起“怀疑”一词，是对其家庭的支持负责的，包括整个或部分，甚至一小部分人将得到经济援助（如下表64）。当

描绘自己时，召唤主要针对那些为家庭支持做出部分贡献或不工作和得不到帮助的人

。

表64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达维达



4.2.8 阿戈拉无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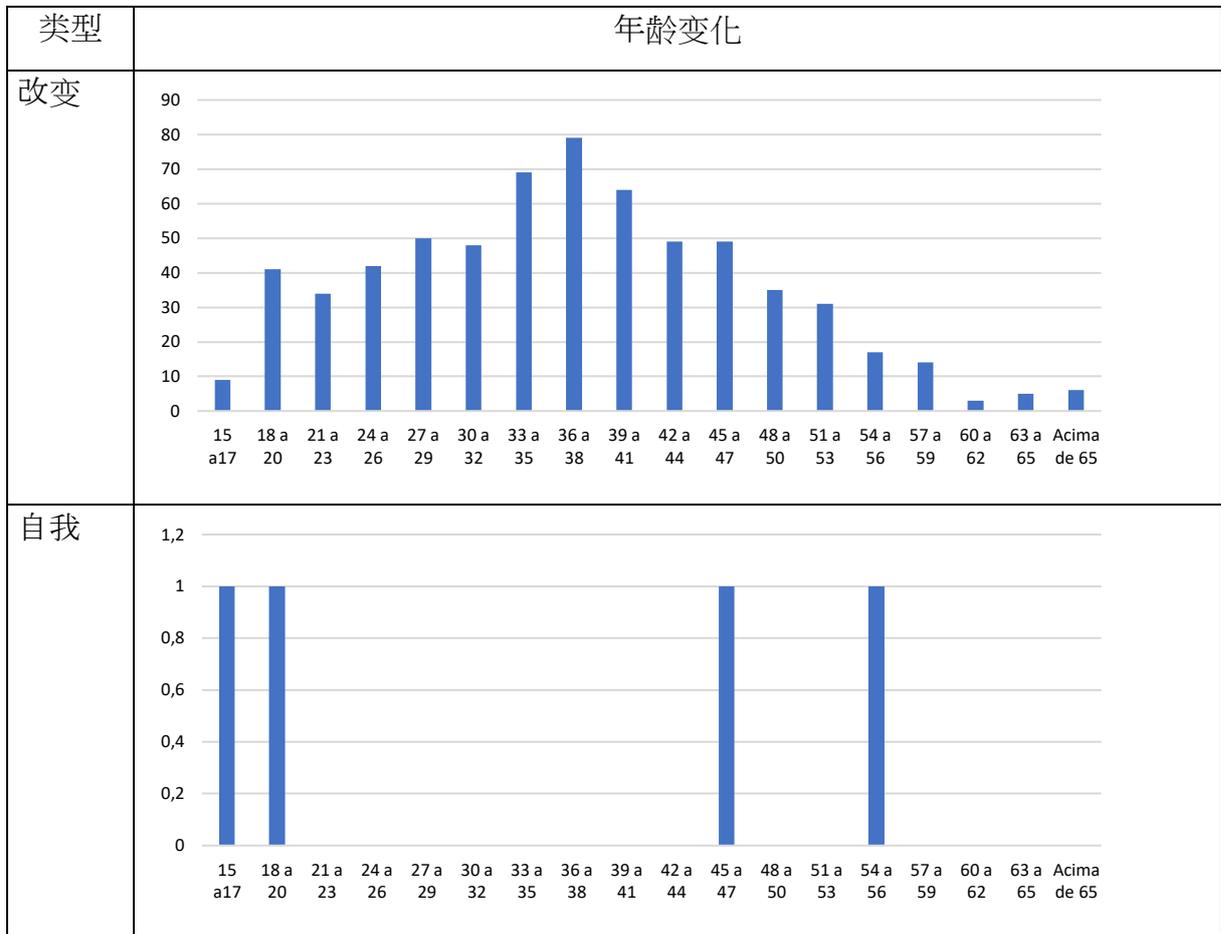
"无知"一词的召唤主要由EGO归因于ALTER，如前几例（表65，下）。另一方面，EGO唤起自己的那些几乎不存在，这带来了约160倍以上的不平衡，相对于EGO的可能代表ALTER。

表 65 - 埃戈和阿尔特 - 阿戈拉 - 阿戈拉无知

阿戈拉	人
自我	4
改变	5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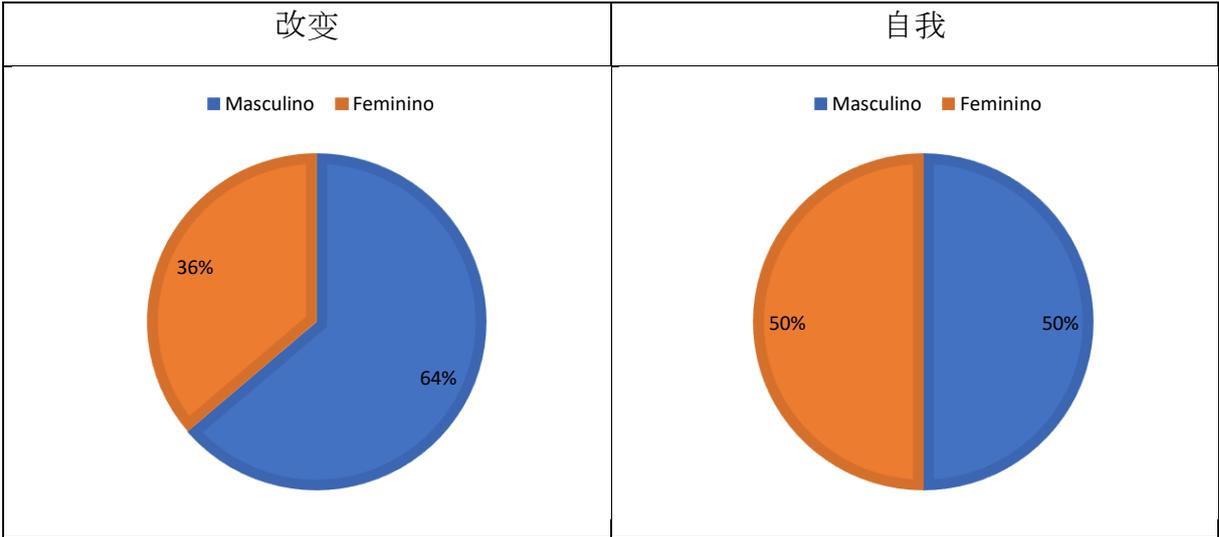
关于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差异，主要值得指出的是，EGO对ALTER的召唤（如下表 66 所示）逐渐从 36 岁到 38 岁达到峰值，后来有所减少。就四个单一的EGO召唤而言，他们是最年轻和最年长的人之一。

表 66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无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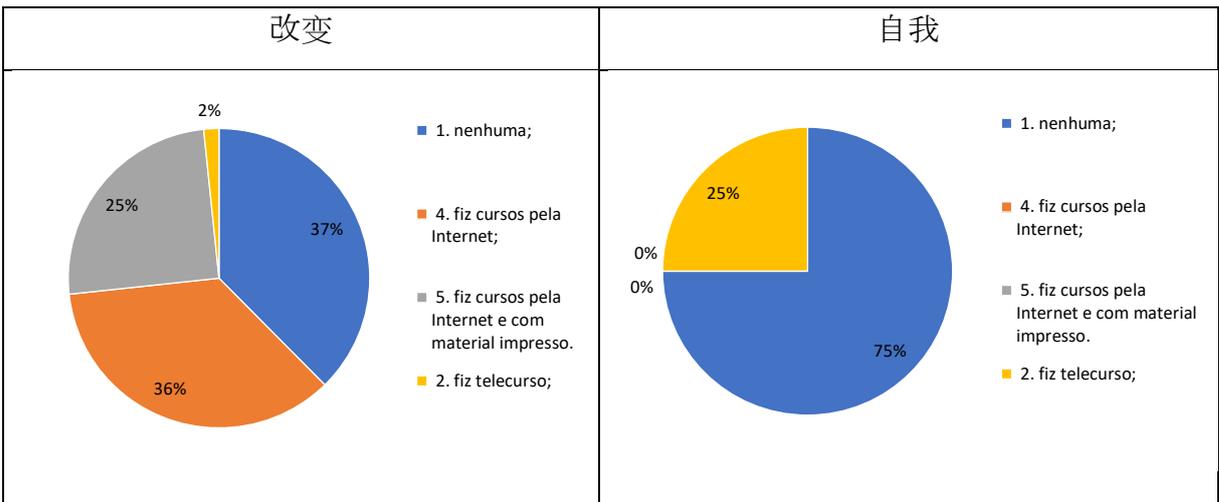
我们还注意到，如下表67所示，男性在ALTER中占多数，而64%的人认为"未知"一词的召唤。关于 EGO 有一个平衡点，再次突出非常低的人数。

表 67 - 性 - 阿戈拉无知



关于以前在远程教育方面的经验，在ALTER，我们注意到，那些从未使用过远程教育的人和那些通过互联网学习过某些课程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如下表68所示，关于"未知"一词的召唤。除了这些组，我们达到了 73% 的人在 DS 有某种经验。与EGO有关的案件，由于其数量，是无关紧要的。

表 68 - 与 EAD 的经验 - 未知的阿戈拉



在提到表明人们不知道"THE"一词的人中，在表格69中观察到，关于ALTER，与这种可能的社会代表性有联系的人分布在全州，集中在大都市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强调坎波格兰德和新伊瓜丘。与上一项目一样，EGO对"未知"一词的召唤几乎为零，不应考虑到内部/大都市地区在EGO和ALTER方面的数学分布，因为EGO的答复者人数可笑（如下表69）。

表 69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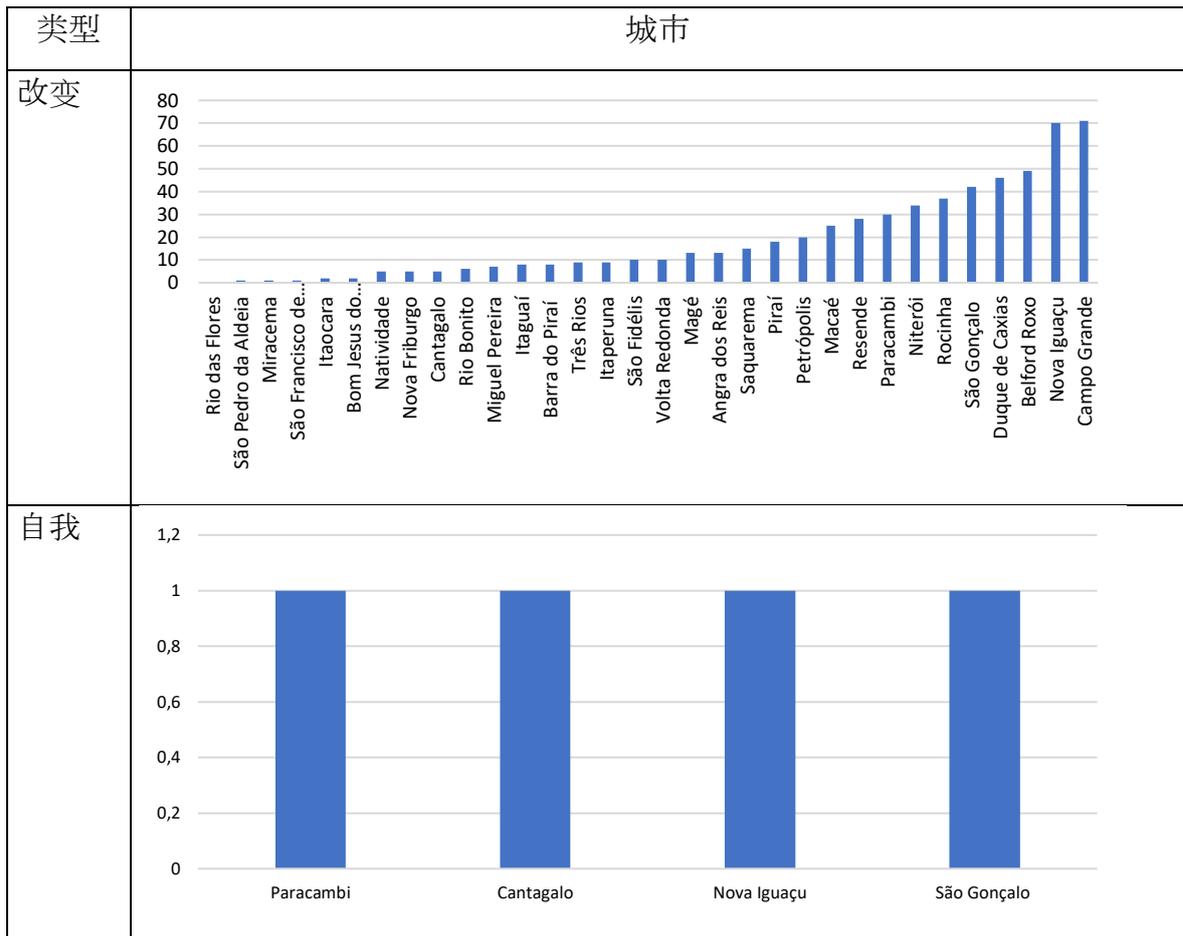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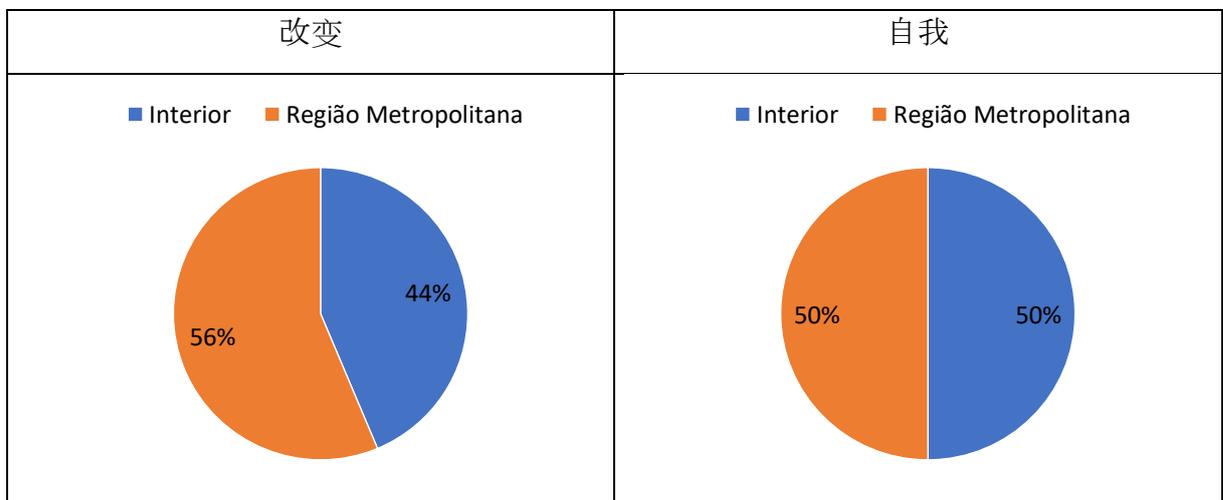


表70 - 区域的地理分布 - 阿戈拉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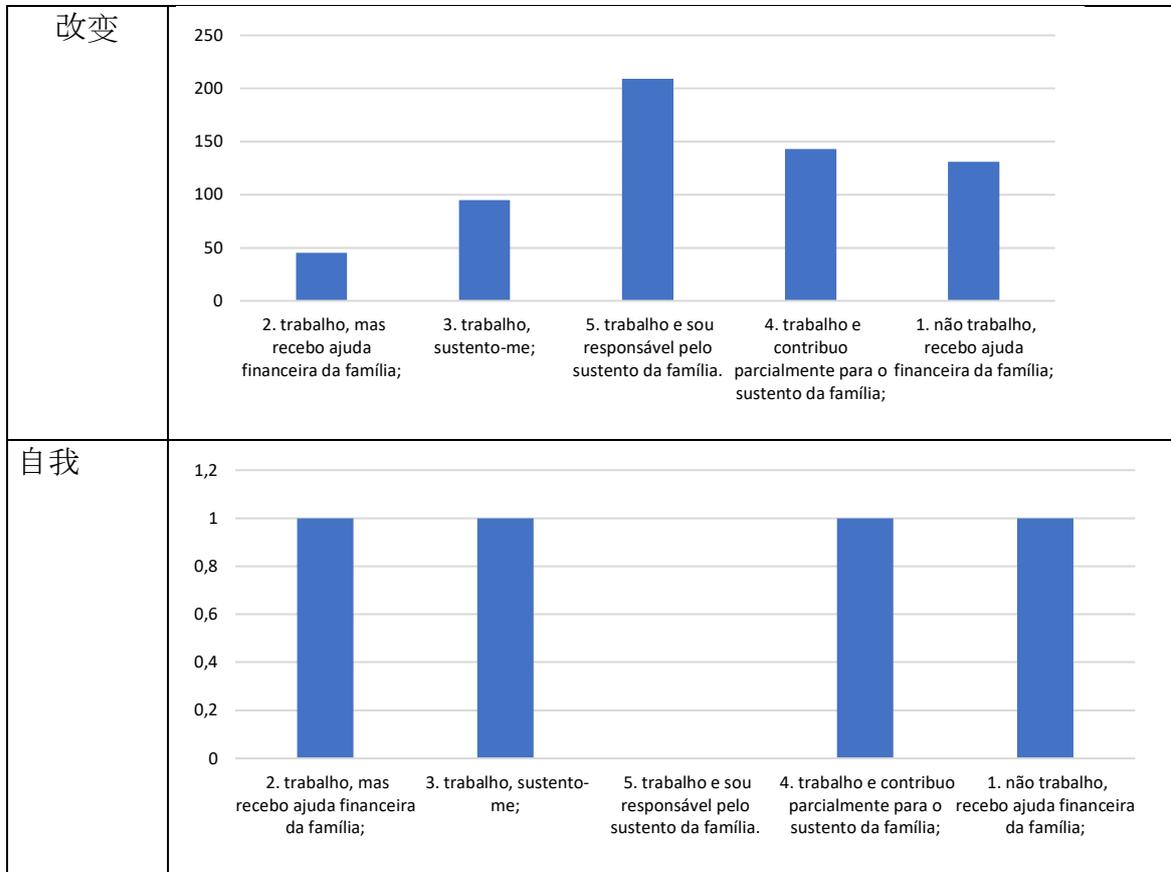


关于"未知"一词与EGO在经济参与方面对另一个——ALTER——的看法有关的召唤，我们注意到，多数人对家庭的支持负有全部或部分责任。下面

的表71也可以从相当多的人谁唤起"未知，以ALTER，谁要么为自己的生计工作或工作

。

表71 - 经济参与 - 未知的阿戈拉



4.2.9 阿戈拉懒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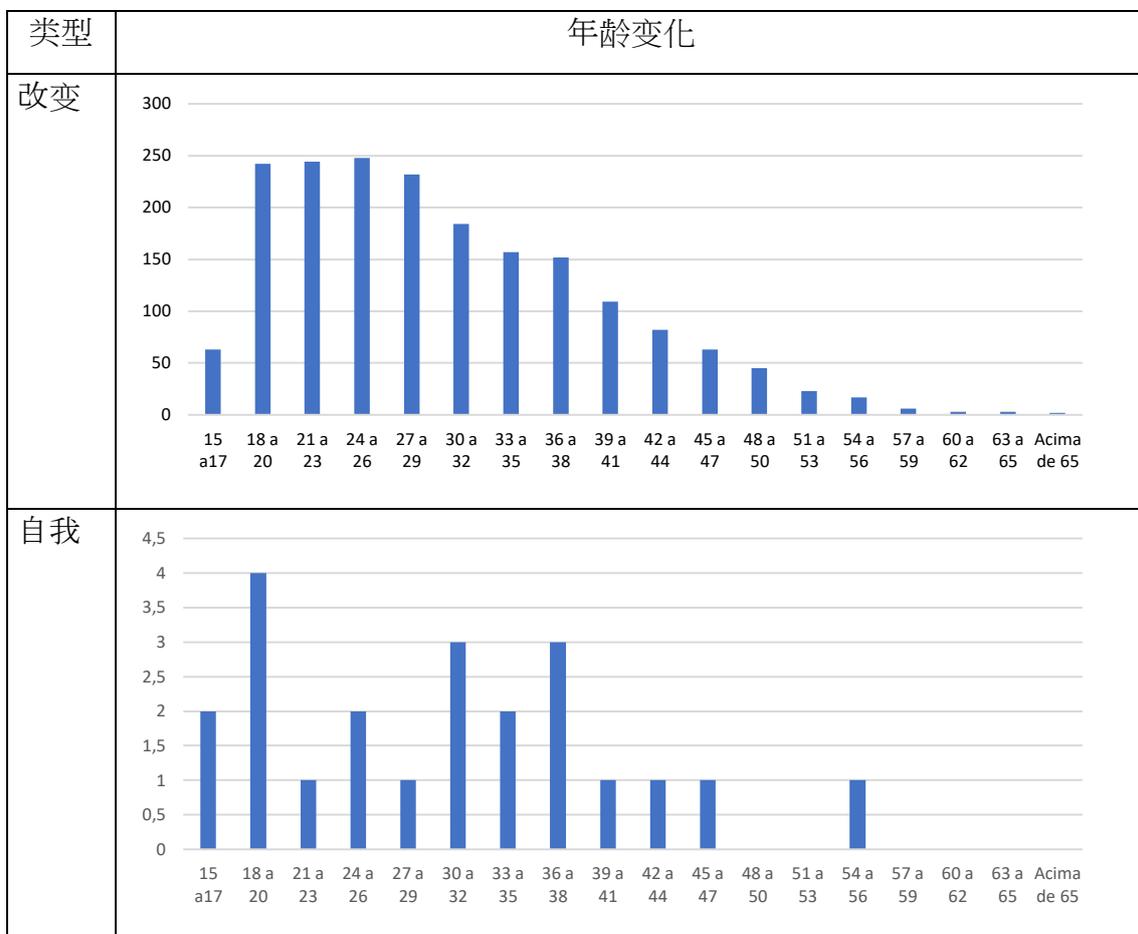
与 Ego 和 Alter 相关的召唤都用 "懒惰" 这个词来表达，暗示了关于 Ego 的可能负面社会代表性。如表 72 所示，EGO 的提及下方比为 ALTER 唤起的低 85 倍。

表 72 - 埃戈和阿尔特·埃戈斯 - 阿戈拉 - 阿戈拉·拉齐内斯

阿戈拉	人
自我	22
改变	19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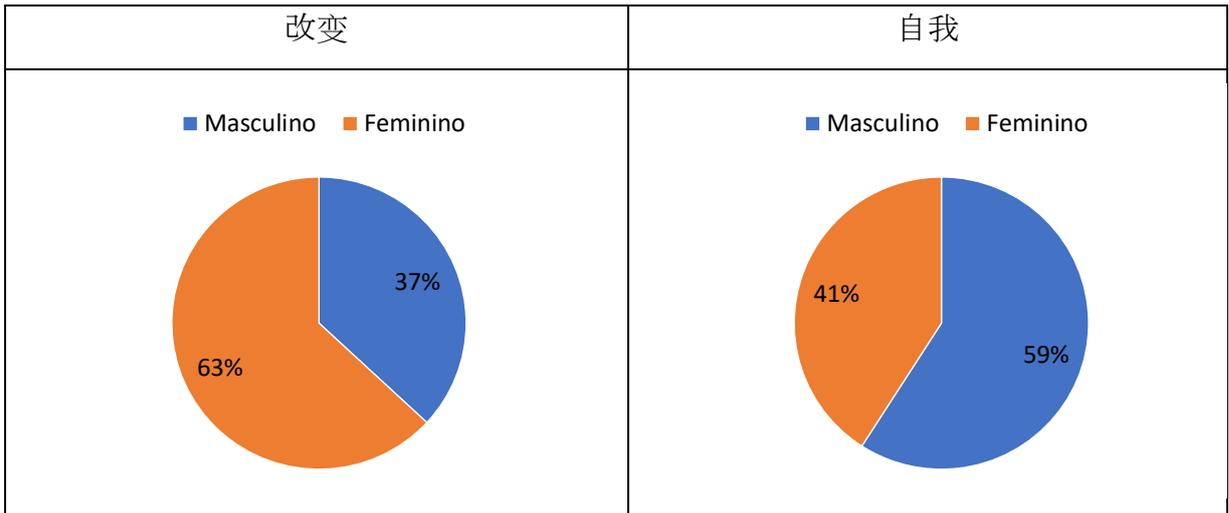
关于不同的年龄组，我们可以看到（表74，下）在18至29岁的青年中，与ALTE R有关的术语的召唤有一定的稳定性。从这个年龄开始，“懒惰”这个词就被唤起了。在EGO中，确定18至20岁和30至32岁的青年高峰期，除36至38岁高峰期外，不同年龄组的召唤保持相对稳定。

表74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普雷吉尼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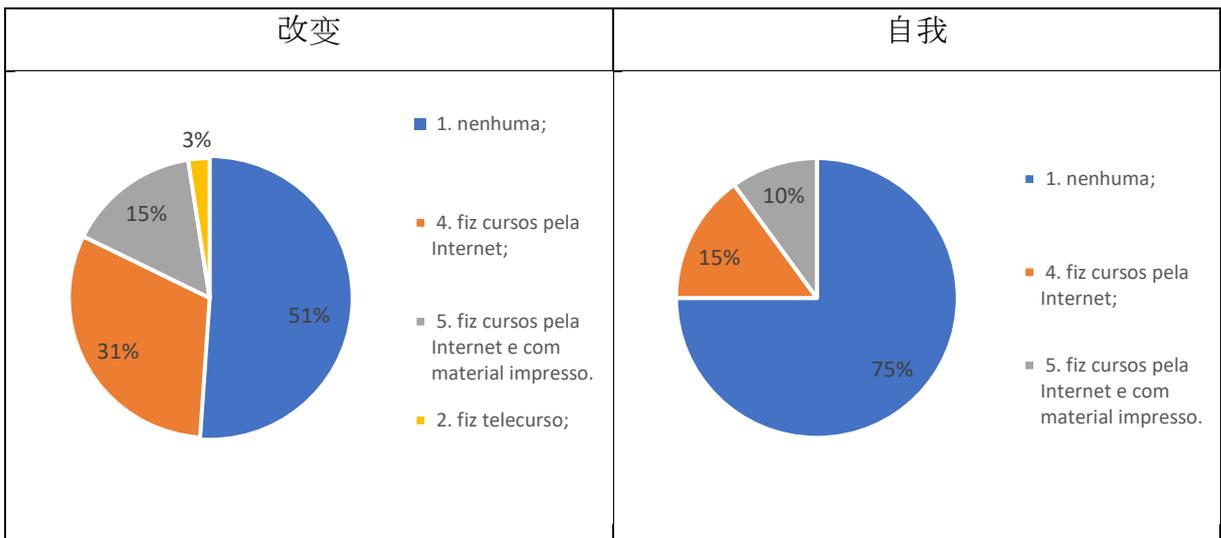
关于性，奇怪的是，我们观察到在EGO和ALTER中关于“懒惰”一词的召唤发生了反转（下表75）。我们注意到大多数妇女没有改变，这种情况变得与Ego有关。

表75 - 性别 - 阿戈拉普雷吉尼亚



在下表76中，我们注意到，在EGO和ALTER中，大多数唤起"懒惰"一词的人都没有远程教育的经验。51% 的关于 ALTER 的 "懒惰" 的召唤与另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有关，当 Ego 找到自己的经验时，这一点显著上升到75%。

表 76 - 与 EAD 的经验 - 懒惰



关于城市，可以注意到，EGO的"懒惰"的召唤主要来自里约热内卢郊区，而在ALTER，大多数的召唤以或多或少均匀的方式混合了首都、大都市区其他城市和内陆地区（图77，下图）。新伊瓜苏市提出了最多的召唤，表明社会代表的 "懒惰" 涉及，为阿尔特。在这两种情况下（EGO和ALTER），根据下图77，我们与内陆地区相比，具有与大都市区相关的召唤的流行程度。

表77 - 市政地理分布 - 阿戈拉普雷吉尼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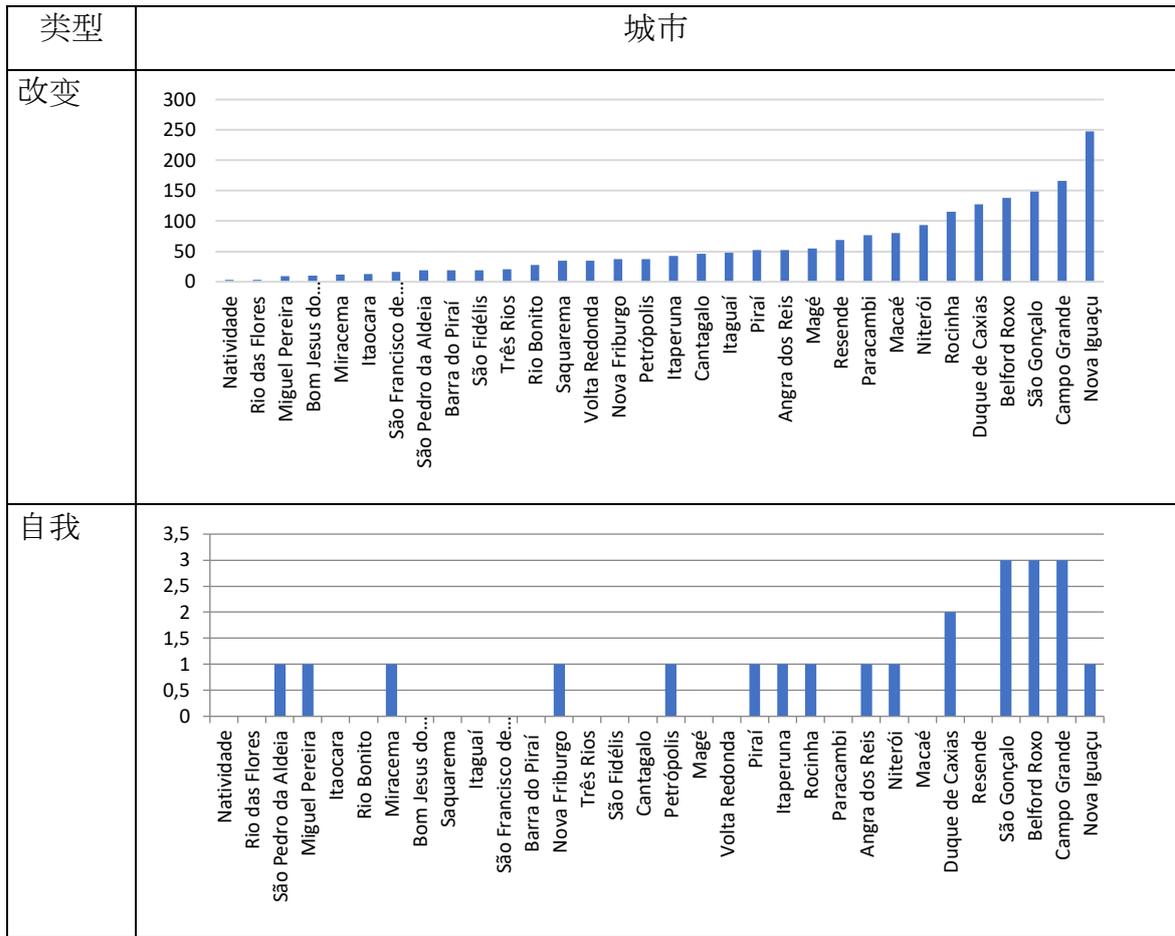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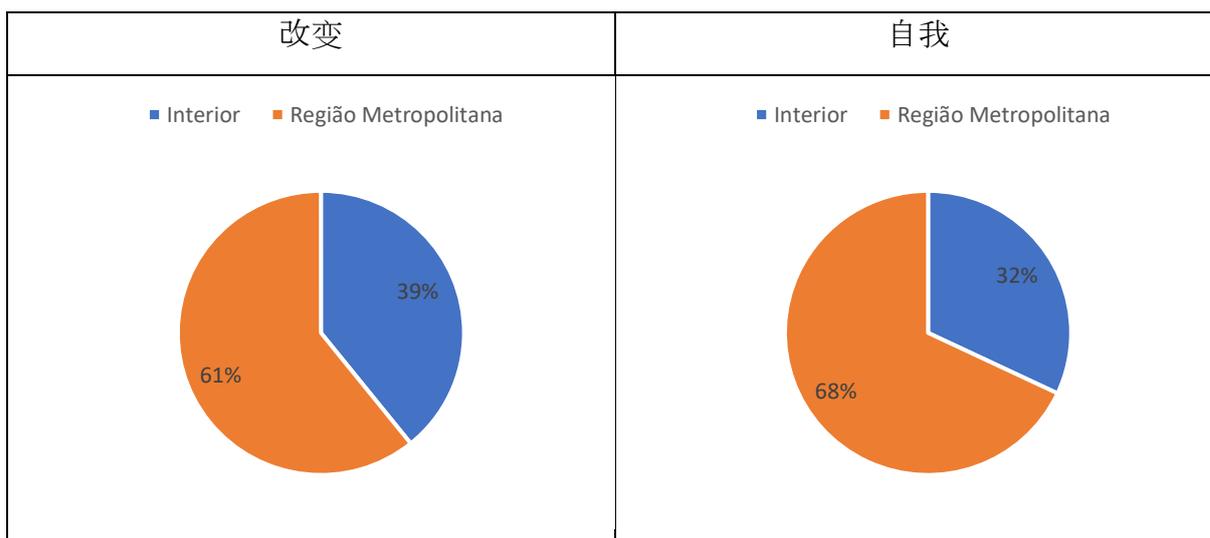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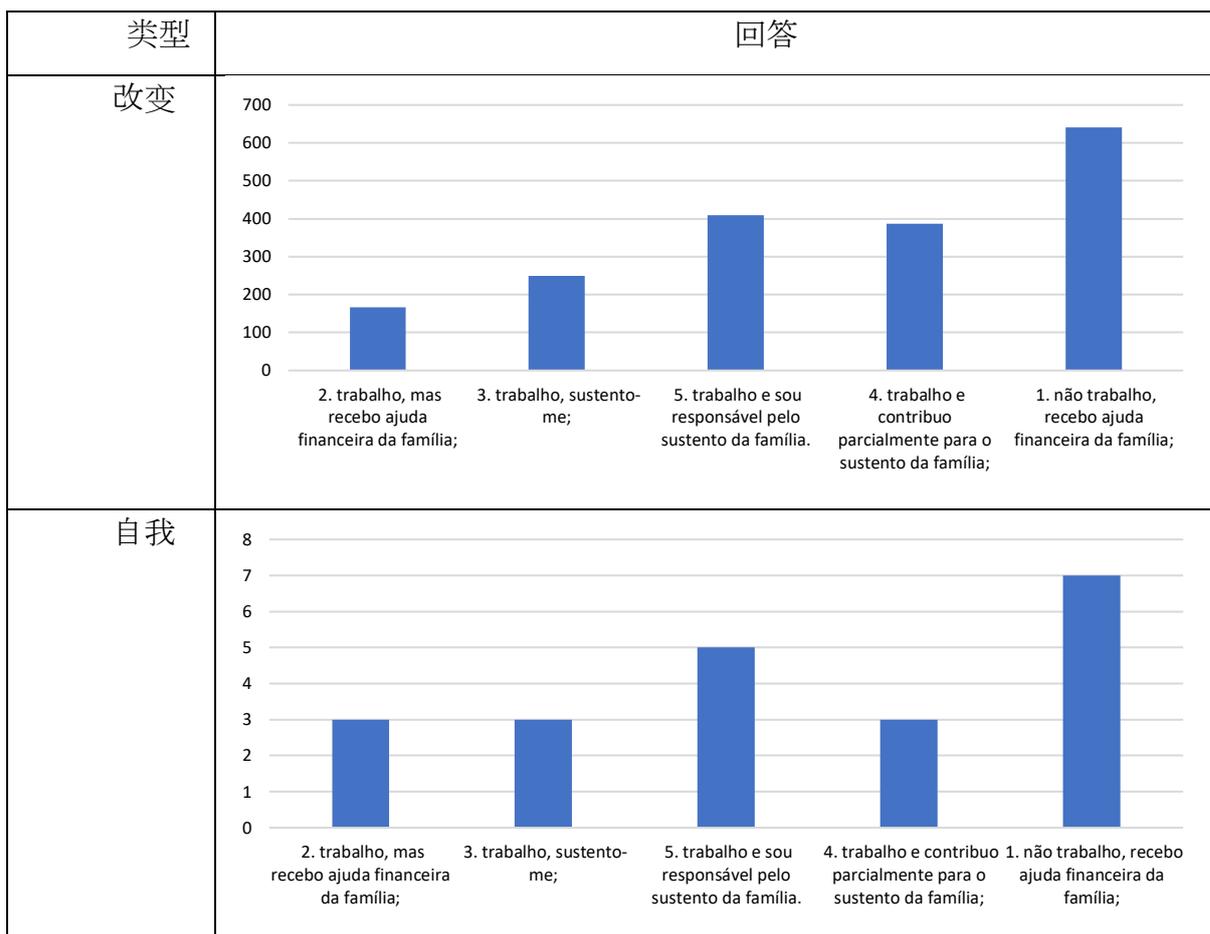


表78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普雷吉尼亚



关于经济参与，大多数受访者在改变和自我方面都表示，这主要是家庭风险，如下表79所示。

表79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普雷吉尼亚



4.2.12 可疑词语的阿戈拉斯

在前100个最令人回味的词中，有些词暗示了社会对《国家报告》的表述，有些则可能导致研究人员的负面和正面解释。换句话说，在提到与常识相关的社会实践时，它们具有可疑、模棱两可的特征。我们可以注意到，在研究这些事件及其情况时，这些召唤并没有在EGO和ALTER之间产生显著的区别，不像之前那些被认为对方认为（ALTER）比对自己（EGO）的看法更消极的领域。

我们在以下几节中介绍了我们认为模棱两可的这些痛苦。

4.2.12.1 困难阿戈拉

在我们看来，从"困难"一词的召唤中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痛苦似乎暗示着一种可疑的表示。这种模糊性转化为以下情况。一方面，它可能与选择远程教育的困难有关（假设它似乎更困难——

比面对面的方式更"严肃"，更"苛刻"）。另一方面，THE是困难的这一事实可能表明某些东西不一定是负面的，因为召唤可以朝着代表的方向发展，根据这种方向，一所高质量的大学不应该轻易得出结论。这就是说，这是"困难的"这一事实可以证明是积极的。这个词——虽然相对小于建立前几个部分的召唤——

在EGO中具有较少的召唤，大约是ALTER的5.8倍，如下表80所示。

表 80 - EGO 和阿尔特职业 - 阿戈拉 - 阿戈拉迪菲西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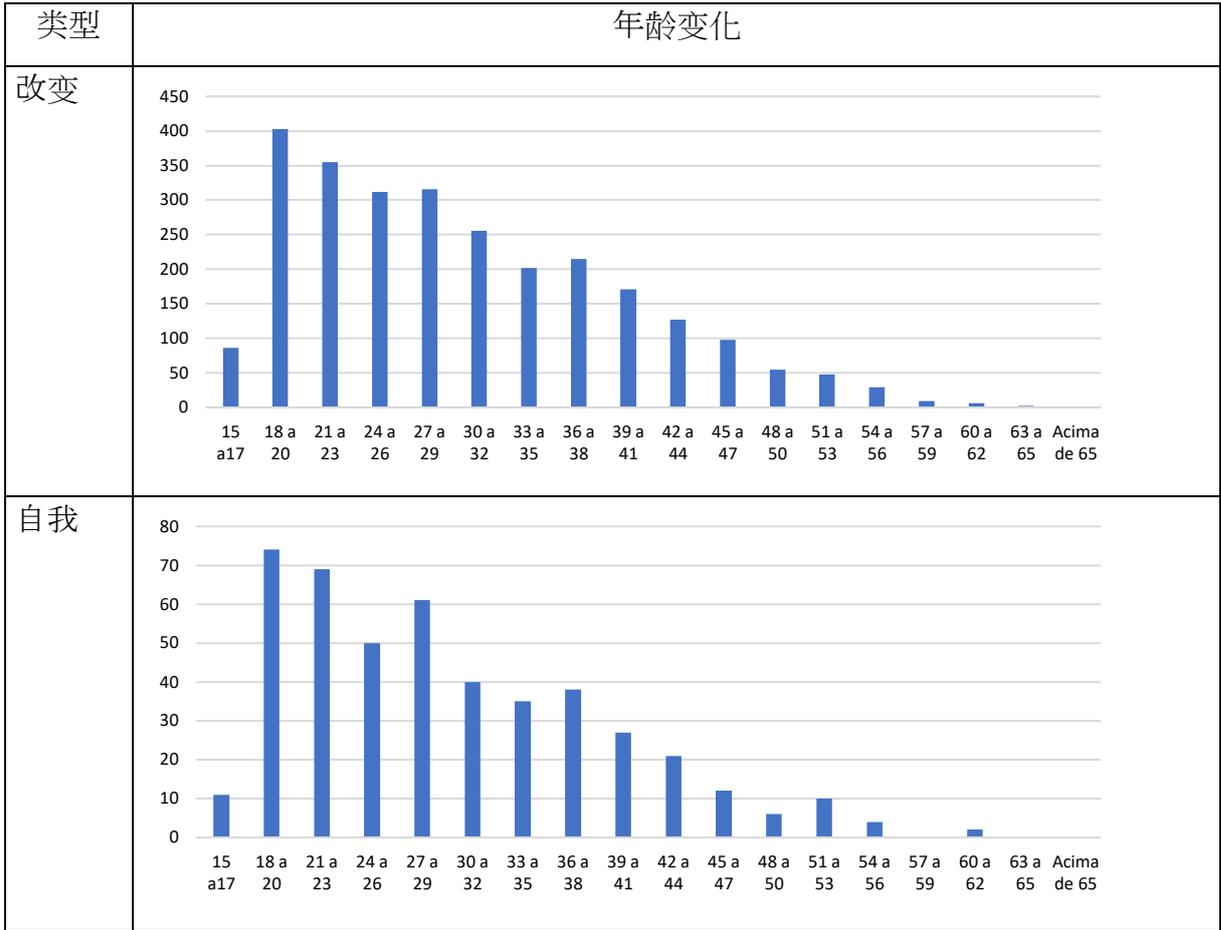
阿戈拉	人
自我	435
改变	2553

关于"困难"的召唤，这种可能的社会代表性——不知道是更积极还是更消极——在18至20岁的年龄组中具有提及的高峰，根据老年人的年龄逐渐减少（如下图81）。

这一特征反映在EGO和ALTER中，由于某种相似性，可以观察到两种召唤的图形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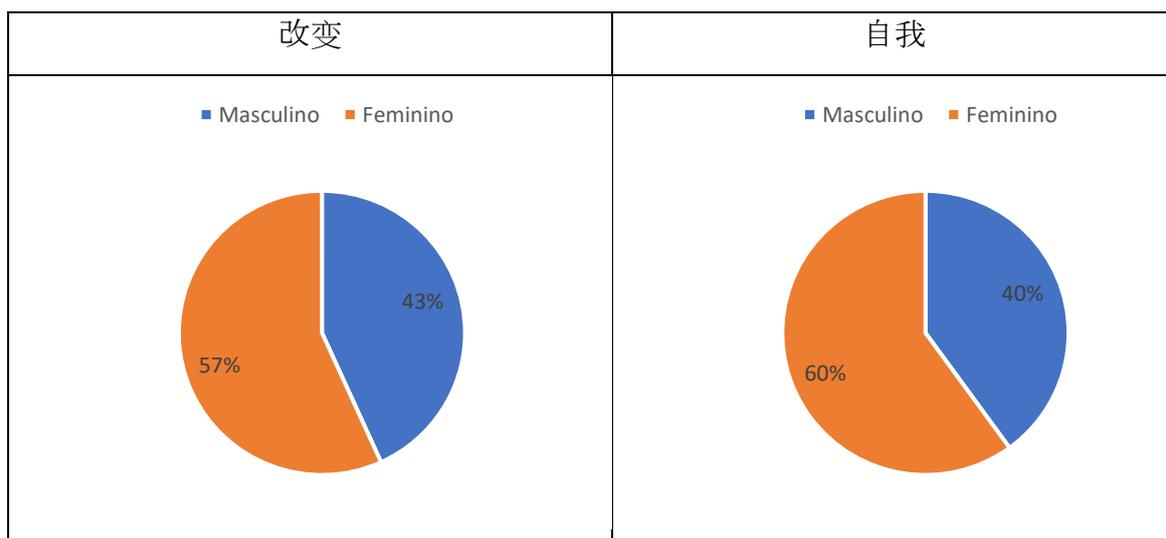
。

表81-年龄变化-困难的阿戈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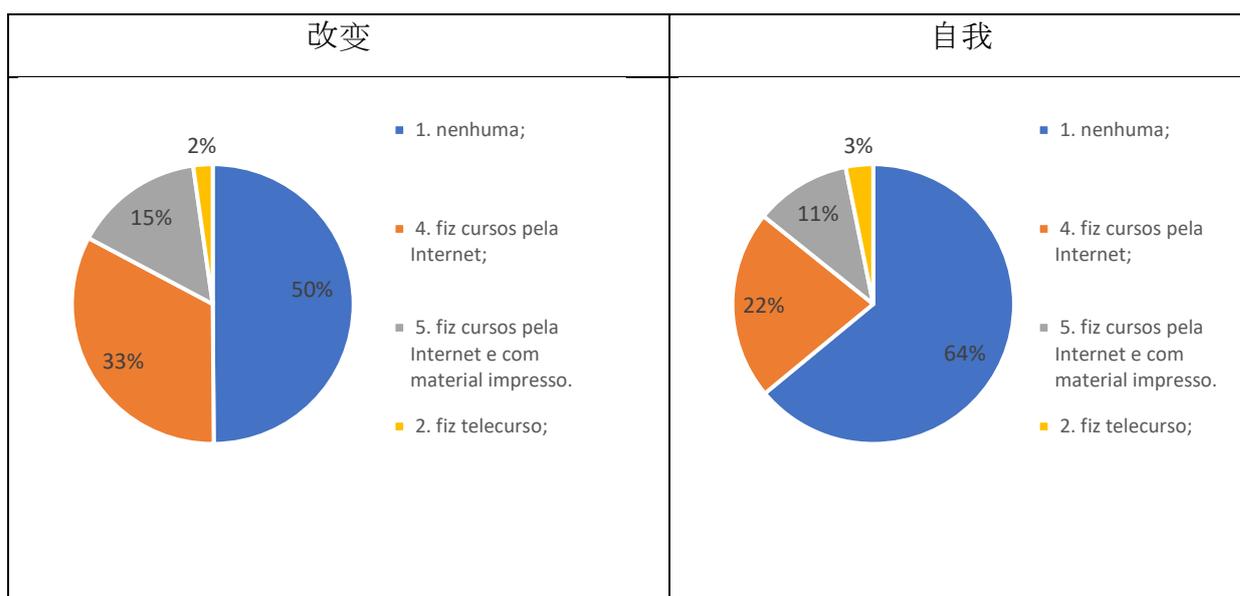
有趣的是，关于这种召唤，我们观察到EGO和ALTER在性方面有相似之处（如下图82）。在这两种可能的困难表现中（关于EGO对你的看法和对ALTER的看法），召唤大多由女性做出，约占60%。

表 82 - 性 - 硬阿戈拉



关于"困难"的召唤，我们发现一个类似于我们之前讨论的关于ED经验的"懒惰"的变体。EGO对 EAD 的困难可能的陈述大于在 ALTER 中。在这种情况下（表83，下）关于没有远程教育经验的事实。

表 83 - 与 EAD 的经验 - 困难的阿戈拉



关于"困难"一词的召唤的地理分布，可以注意到在EGO和ALTER中，里约热内卢州大都市区的市镇占主导位置（见下表84）。在EGO中，这些城市中还有安格拉多斯里斯（该州南部）和马卡（该州北部）以外的地区。在相对于ALTER的"困难"的召

唤中，出现了雷森德市（该州西部）。正如表84所示，在大都市和内陆地区之间有一定的平衡，后者的权重可能很大。

表84-城市地理分布-阿戈拉·迪菲西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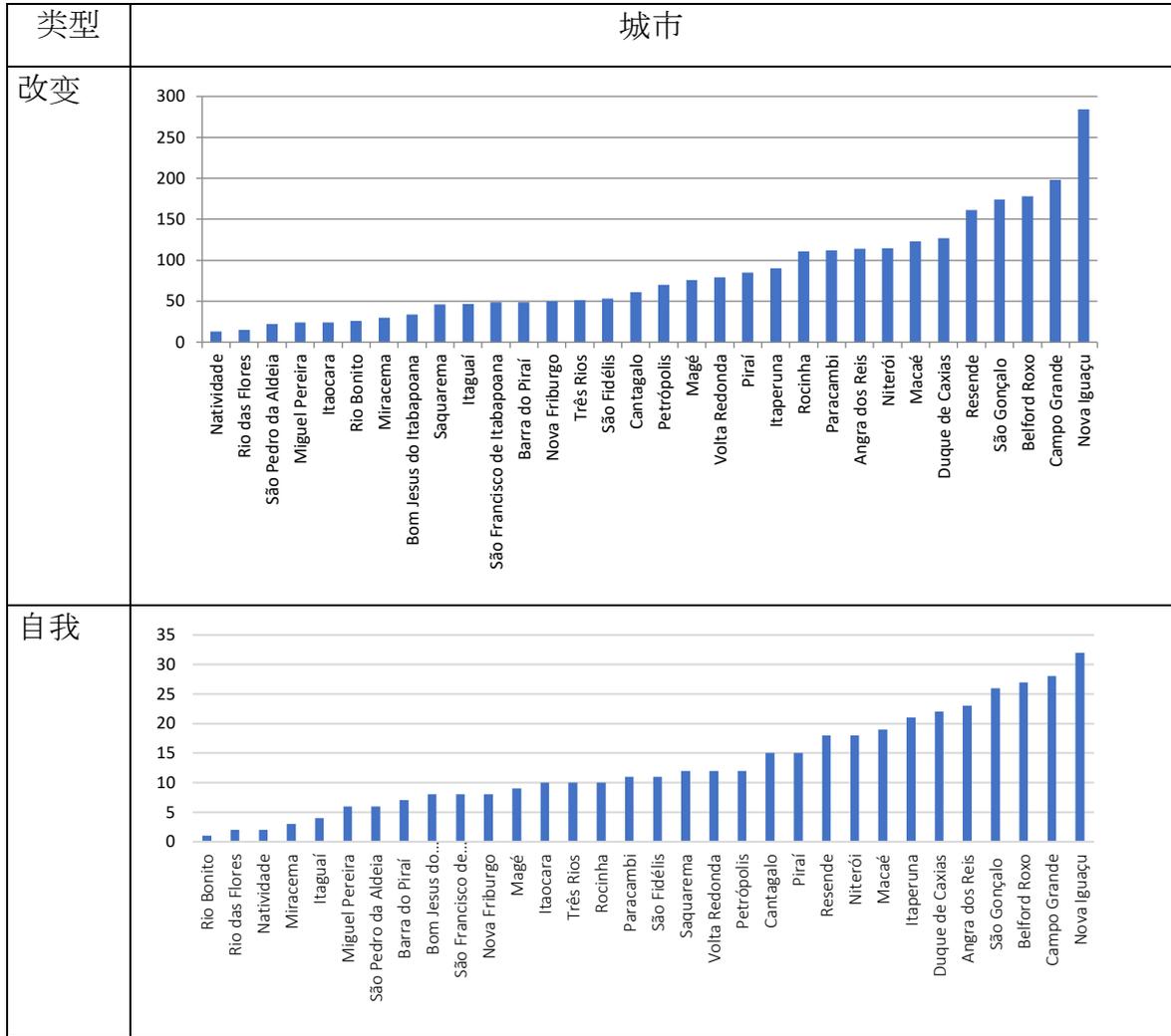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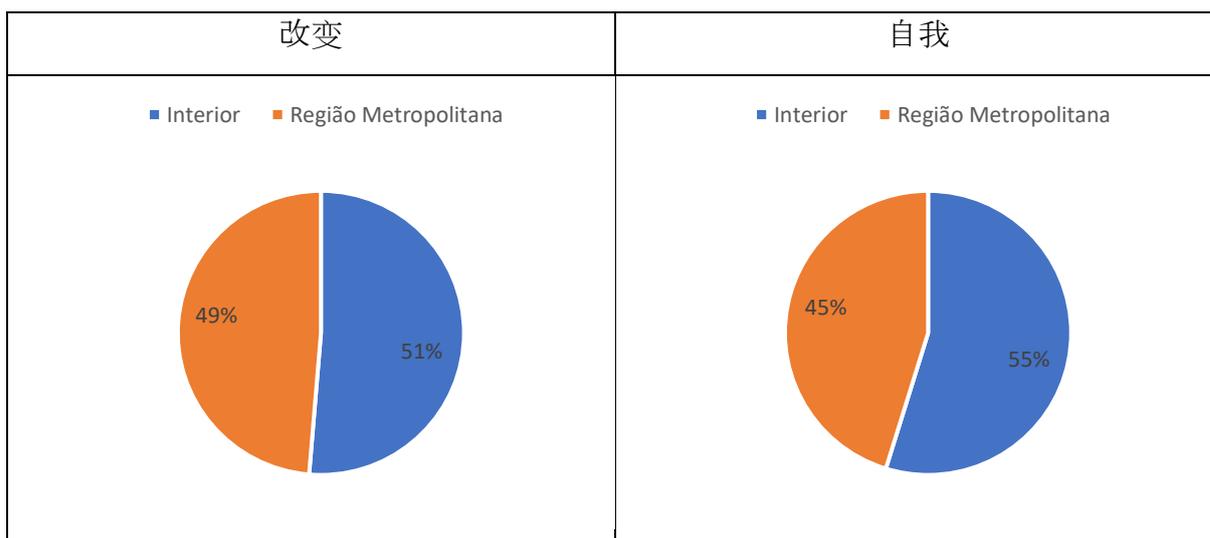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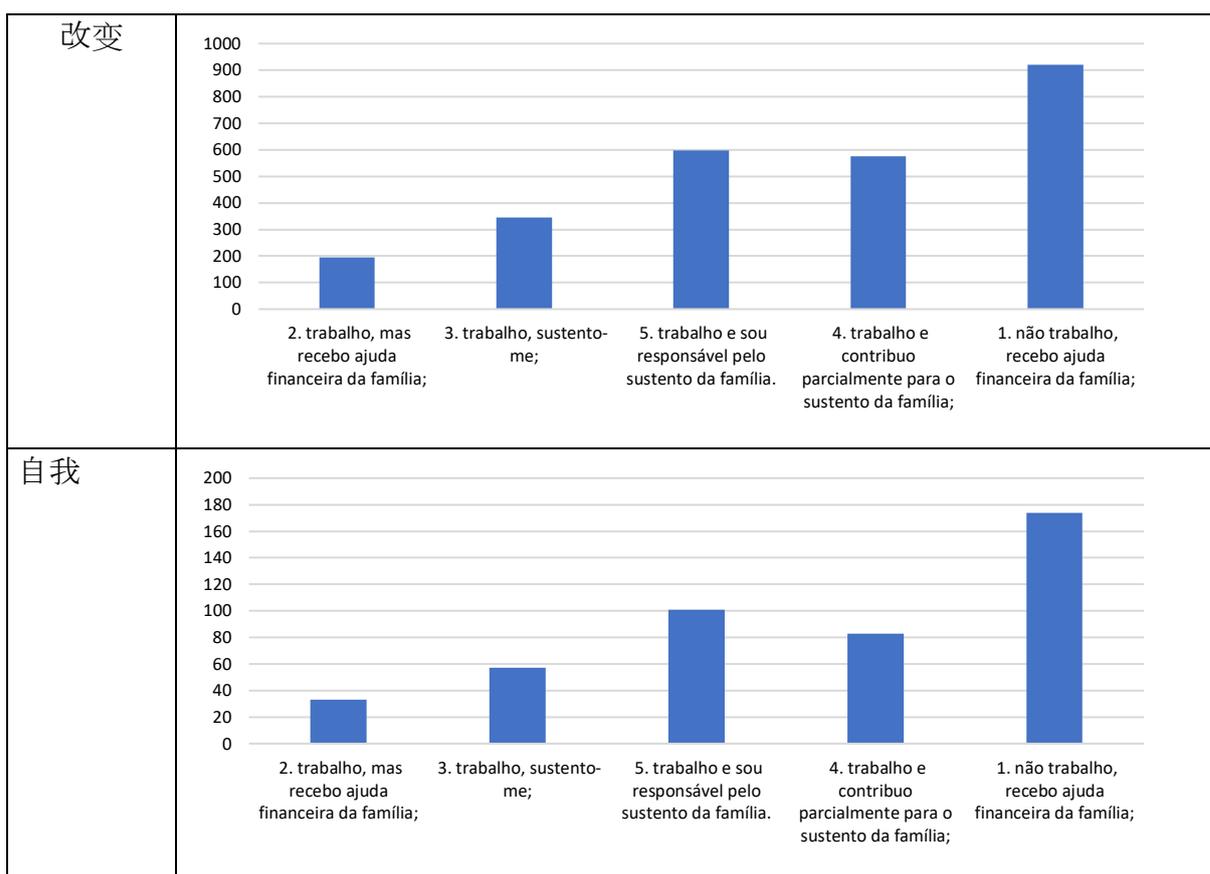


表 85 - 区域的地理分布 - 困难的阿戈拉



关于经济参与家庭与"困难"的召唤有关，关于EGO对自己的看法和对ALTER的看法，我们注意到，在他们两个家庭中，他们不工作和接受经济援助，如下表86所示。EGO和ALTER之间有相似之处。

表86 - 经济参与 - 困难的阿戈拉



4.2.12.2 现在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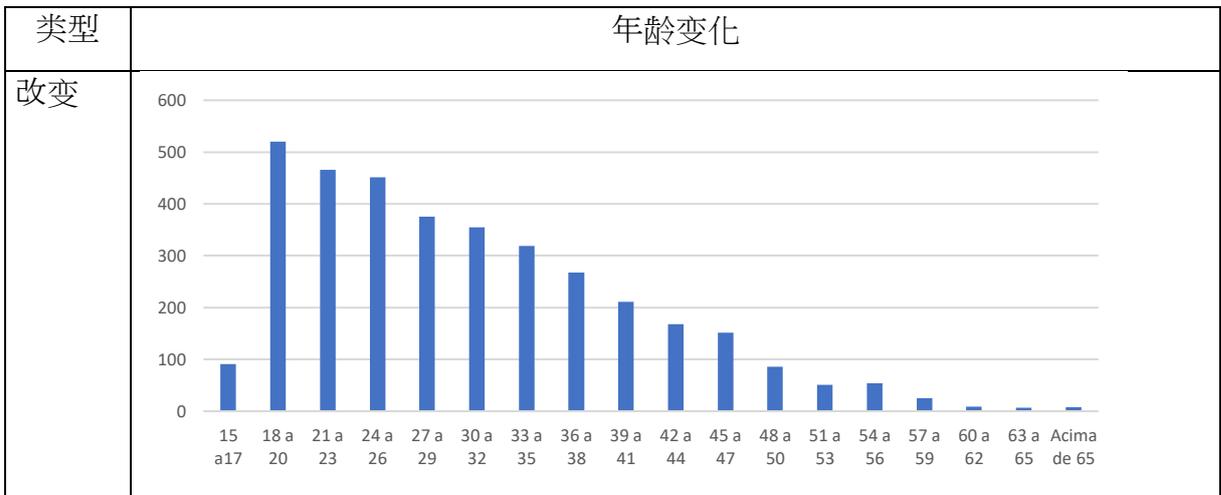
与以前的召唤（"困难"）有关，"困难"一词与项目4.2.12.2中提出的相同问题有关，含义可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会详细阐述它所解释的关于可能的两极性，表明积极和消极的一面，因为它们是相似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总体结果并不十分接近。关于EGO，"困难"一词被提及三次，如下表87所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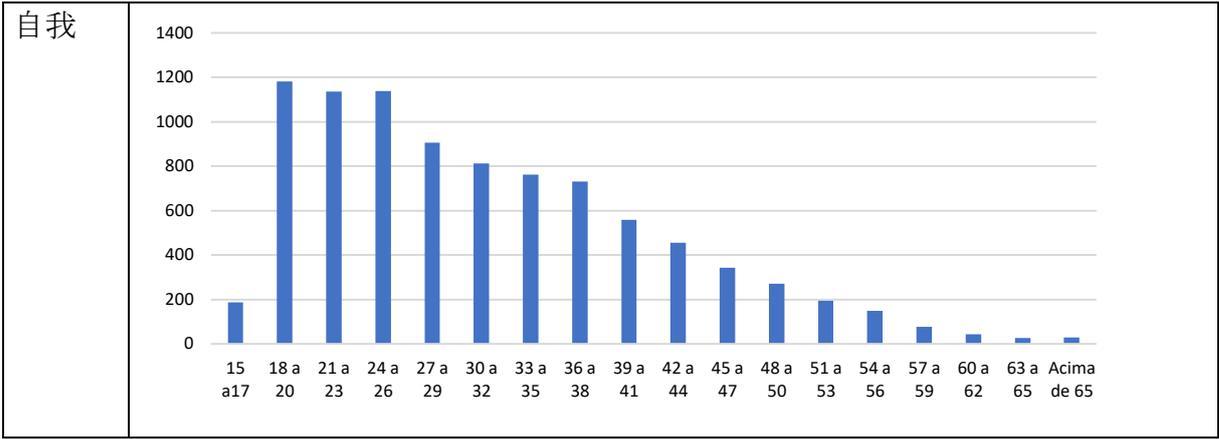
表 88 - 埃戈和阿尔特 - 阿戈拉 - 阿戈拉困难

阿戈拉	人
自我	973
改变	3417

在年龄组的差异中，正如我们在下面的第89表中看到的，"困难"一词的召唤在EGO和变化中都是相关的，特别是与年轻人有关。从18岁到20岁，随着年龄的增长，召唤逐渐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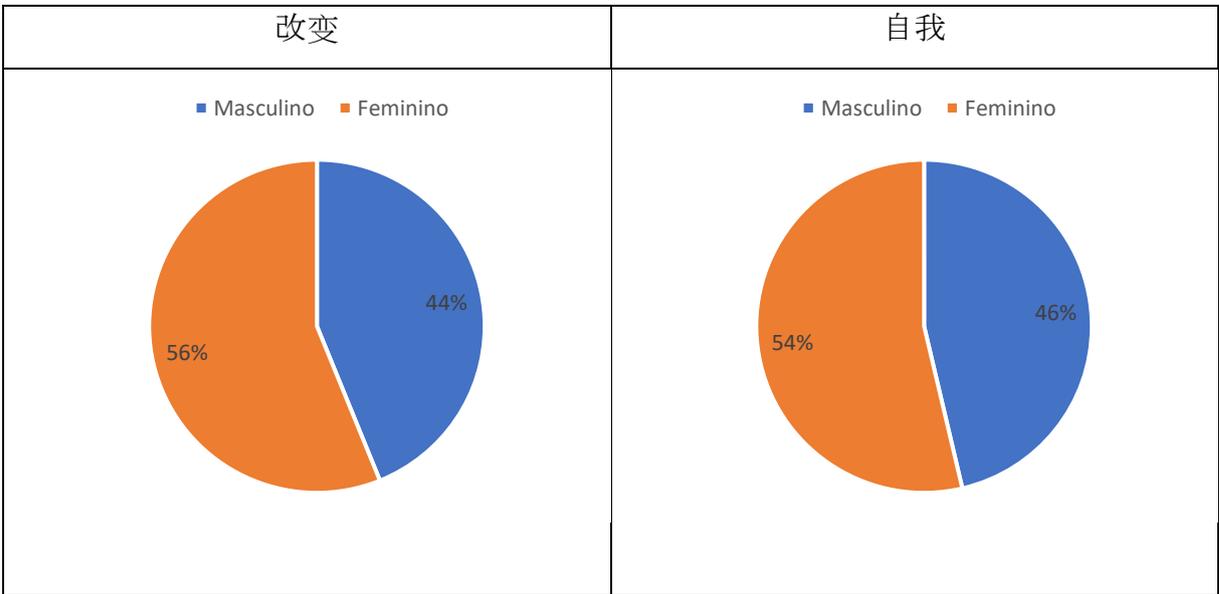
表89-年龄变化-阿戈拉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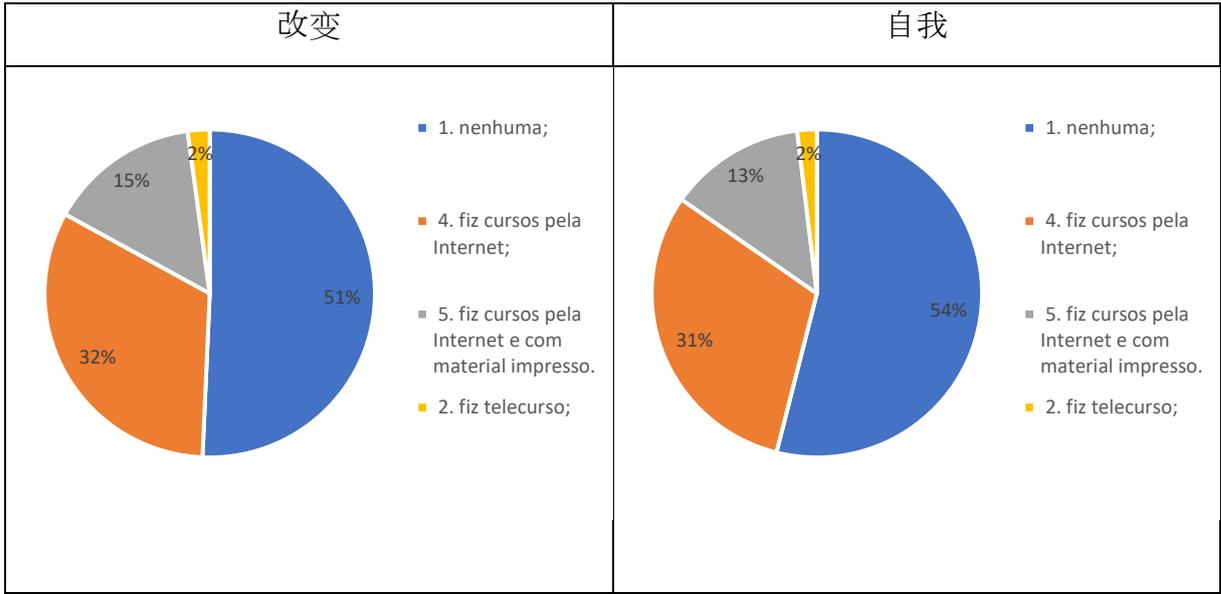
正如我们迄今所研究的大多数痛苦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关于"困难"一词的召唤，如下表90所示，妇女普遍存在。这种流行是由于EGO的表现和它对其他人的表述，即ALTER。

表90-性-阿戈拉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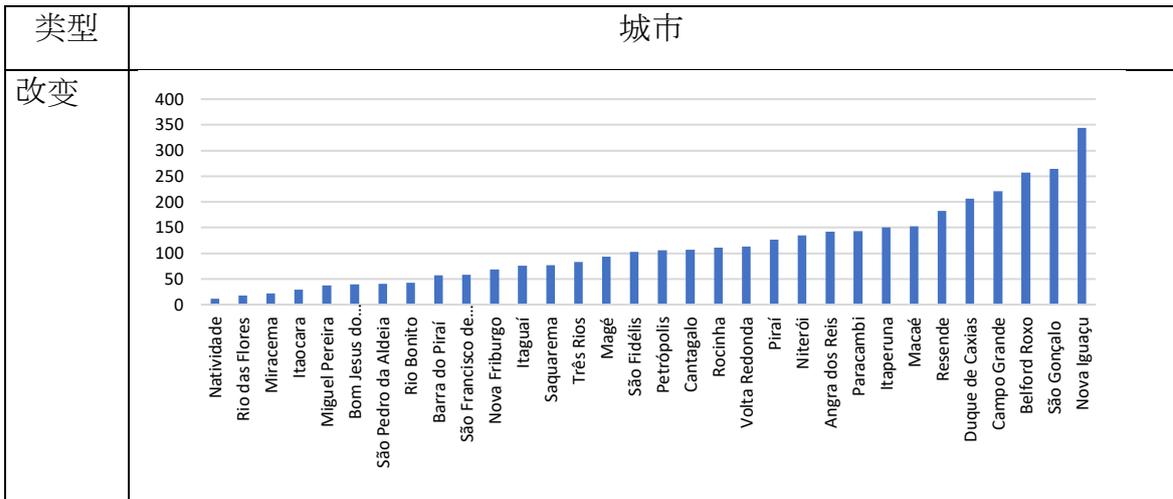
关于唤起"困难"一词的人的经验，正如我们在下表91中所证实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远程教育模式的经验。这个特征既发生在自我召唤方面，也发生在它使他人，ALTER。

表91 - 与艾德的经验 - 阿戈拉迪库尔达德



至于唤起"困难"一词的人居住的城市，可以注意到，在EGO和ALTER两个大都市区，城市明显占主导位置。除此之外，如下表92所示，该州西部地区的雷森德市和北部地区的马卡埃市脱颖而出。

表92 - 市政地理分布 - 阿戈拉迪普尔达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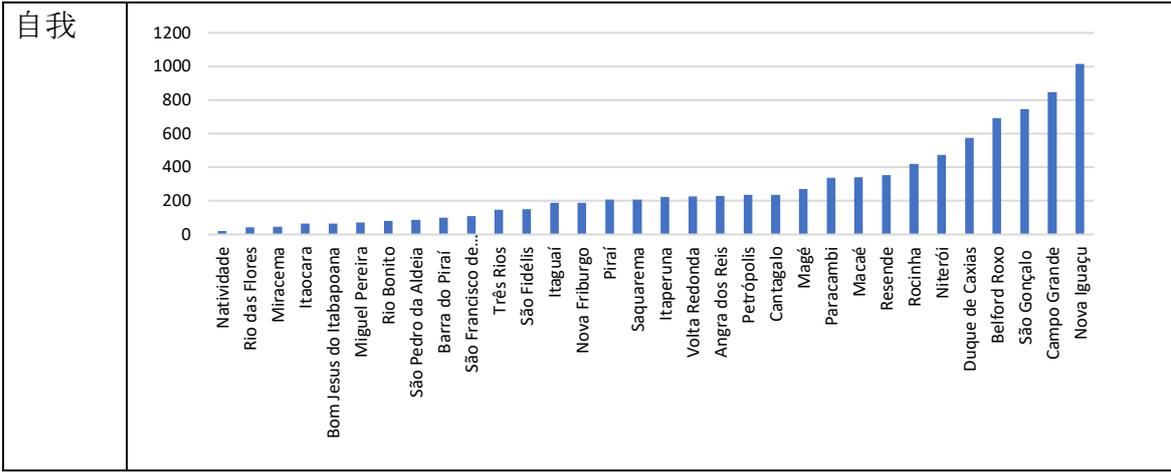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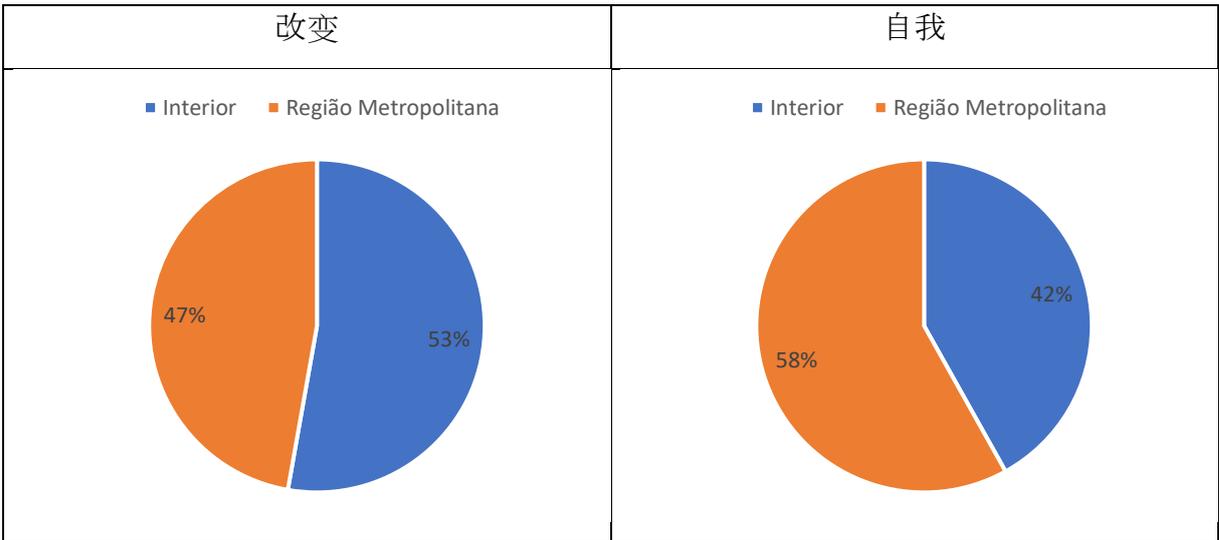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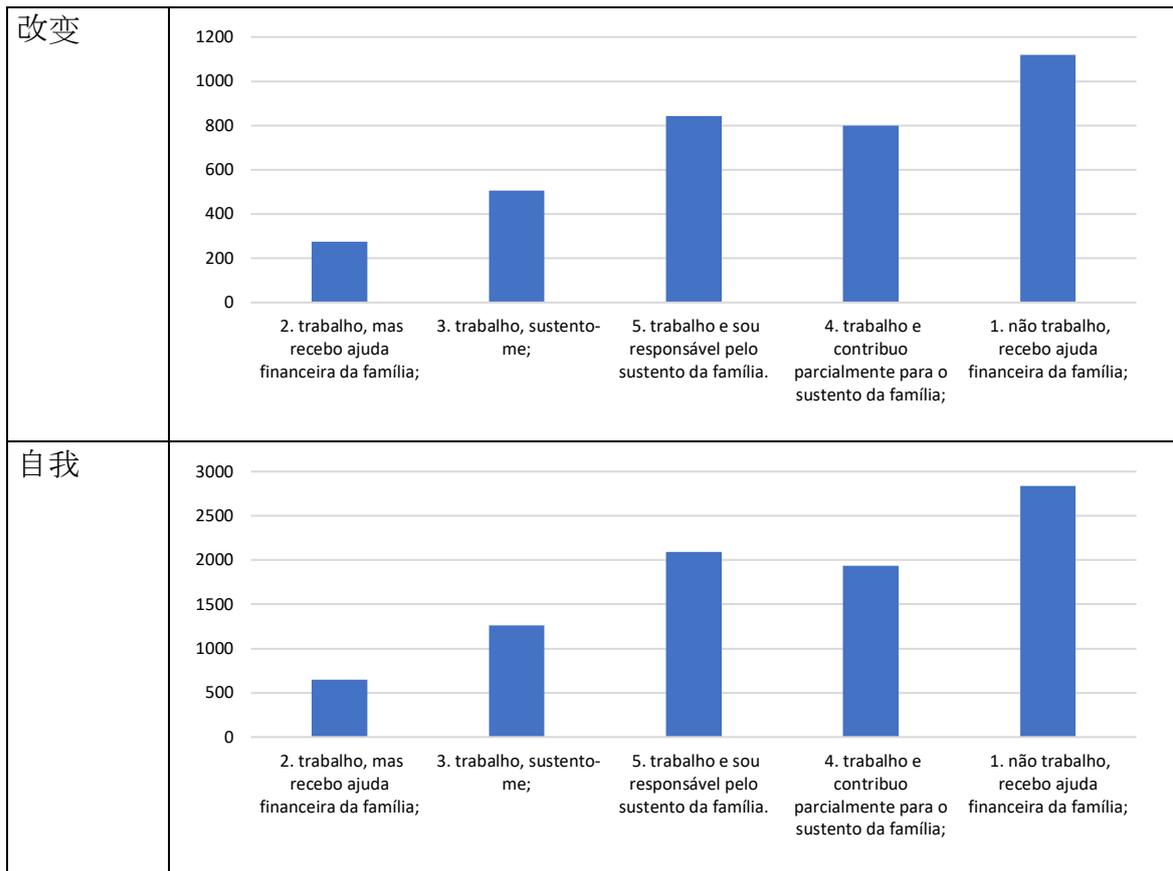


表93-区域地理分布-阿戈拉困难



关于家庭的经济参与，据观察，引起"困难"一词的人大多（下表94），不工作，并得到家庭的支持。这一发现既适用于EGO，也适用于ALTER，重点是大量部分或全部工作的人。

表94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迪普尔达德



4.2.12.3 阿戈拉设施

我们认为，“易”一词的唤起可能产生的社会代表性也是一个可疑的词，因为它可以以类似于“困难”和“困难”两个词的方式看待它。一方面，从消极的意义上说，THE比面对面的教育系统更容易（它的价值较低，是废话，很容易通过考试）。另一方面，人们可以理解它作为一个系统，促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个工具，扩大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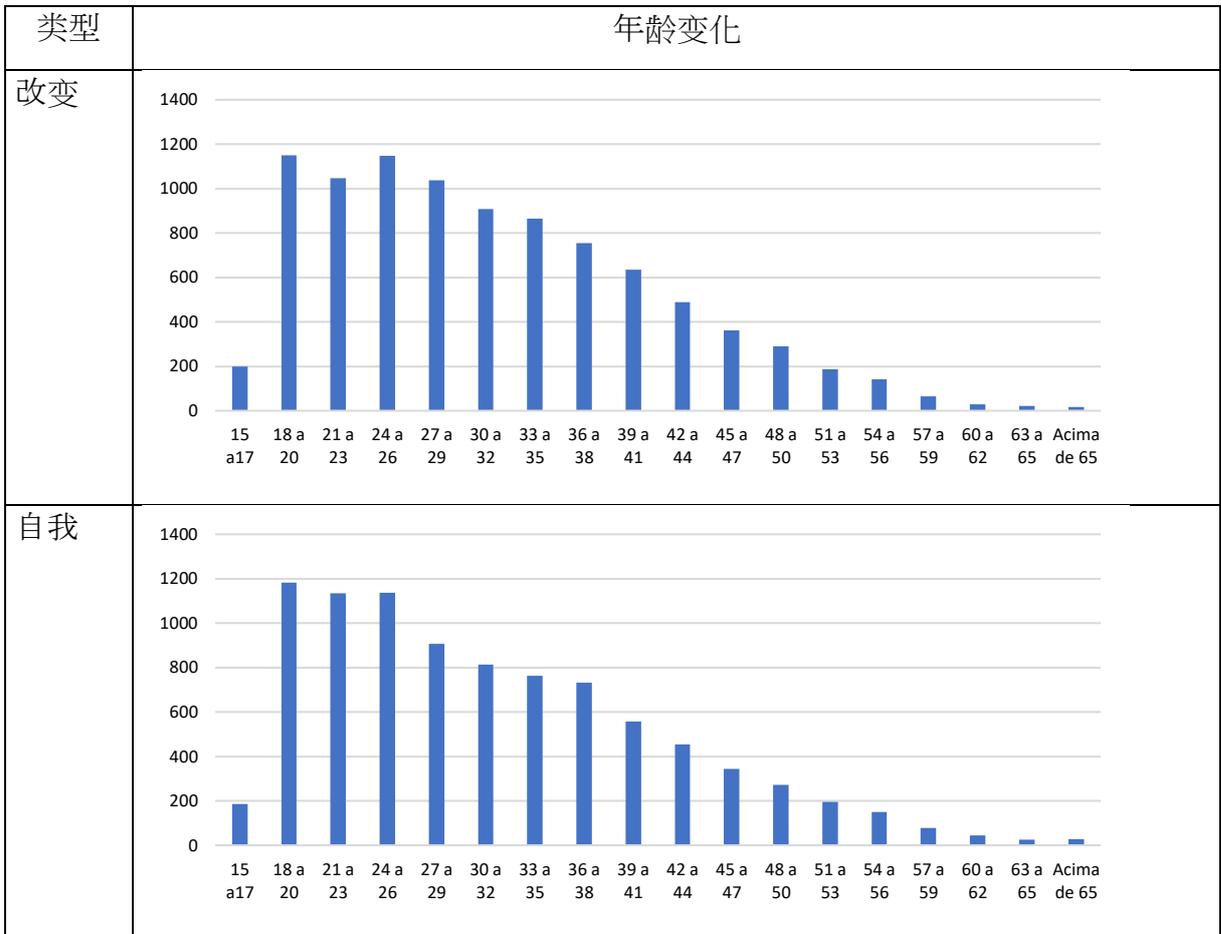
在召唤“轻松”一词（下表95）时，关于EGO对EGO的反应，以及你对ALTER的想法的看法，都有很大的平衡和提及的数量。

表 95 - 埃戈和阿尔特·埃戈斯 - 阿戈拉 - 阿戈拉·法西利达德

阿戈拉	人
自我	8551
改变	8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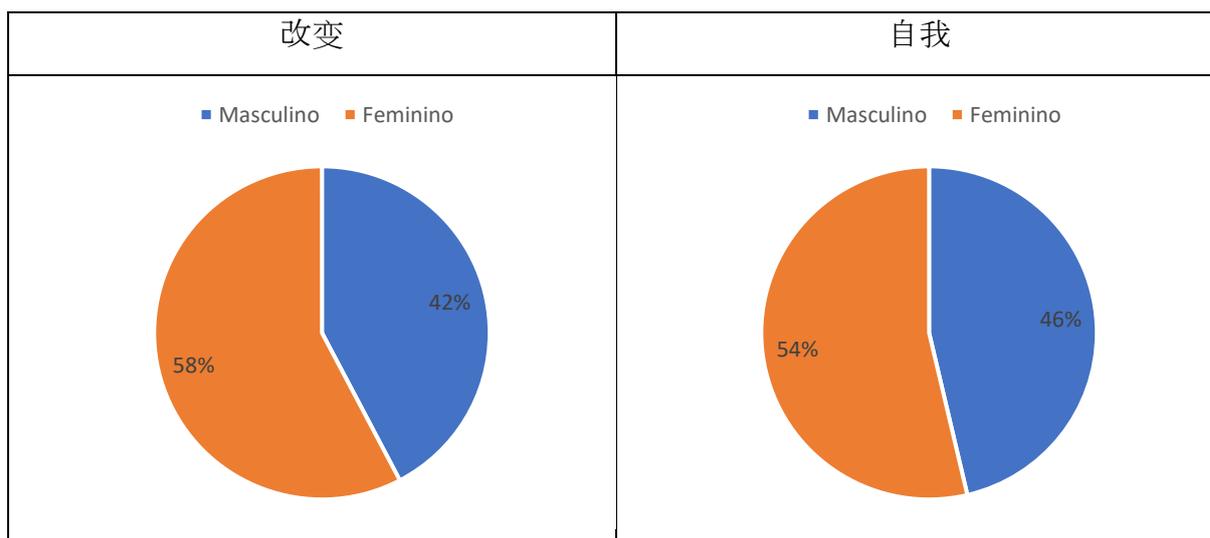
如前几届以前所观察到的，“轻松”表明，与EGO和ALTER的老年人相比，年轻人的召唤普遍存在（如下表96）。18至26岁的年轻人占主导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率会下降。

表96-年龄变化-阿戈拉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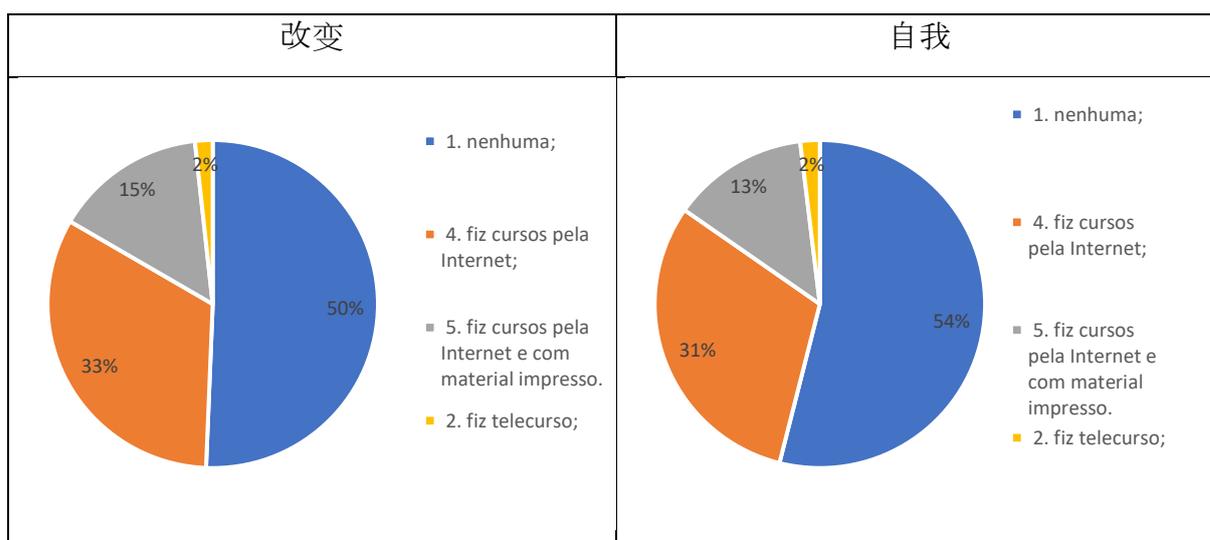
在性方面，在“轻松”的召唤之间几乎有一种平衡，与女性的召唤有更大的倾向（如下图97）。在这种情况下，EGO 的流行率略低于 ALTER，EGO 的“易感”感达到 54%，ALTER 达到 58%。

表97 - 性-阿戈拉设施



关于EDS的经验，"轻松"的召唤建议（表98，下面）大多数提到EGO和ALTER。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从与这类教学缺乏接触开始的。然而，与EGO召唤相比，存在更明显的差异。

表 98 - 与 EAD 的经验 - 阿戈拉法西利达德



至于与EGO和ALTER（下表99）的"易"召唤的市政当局有关的地理分布，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大多数来自里约热内卢州阿尔泰和EGO大都市区的城市。关于"易"一词的召唤的区域地理分布（下表99），EGO和ALTER都拥有类似的多数，使大都市区在内地的流行程度悬而过。

表100-城市地理分布-阿戈拉法西斯利达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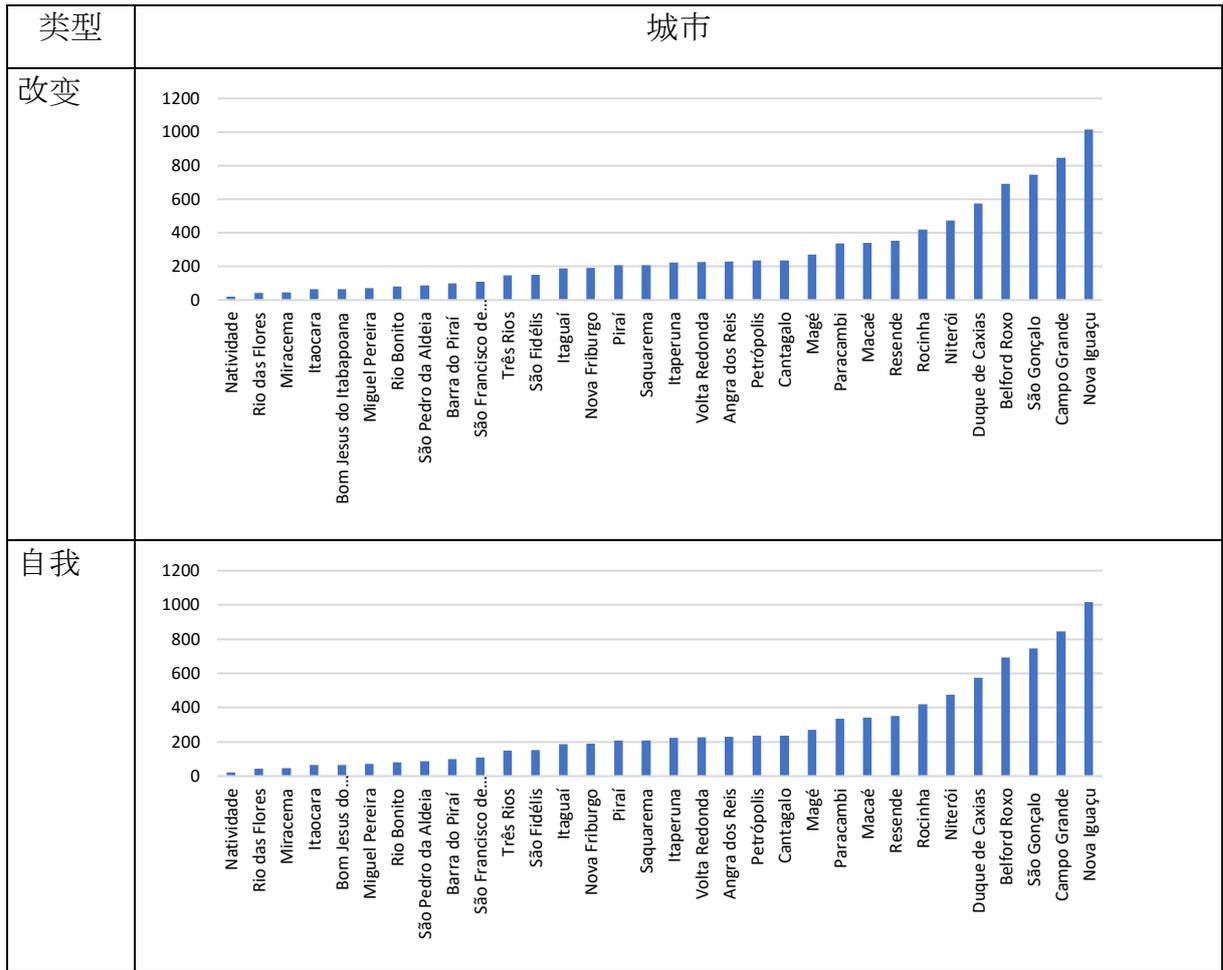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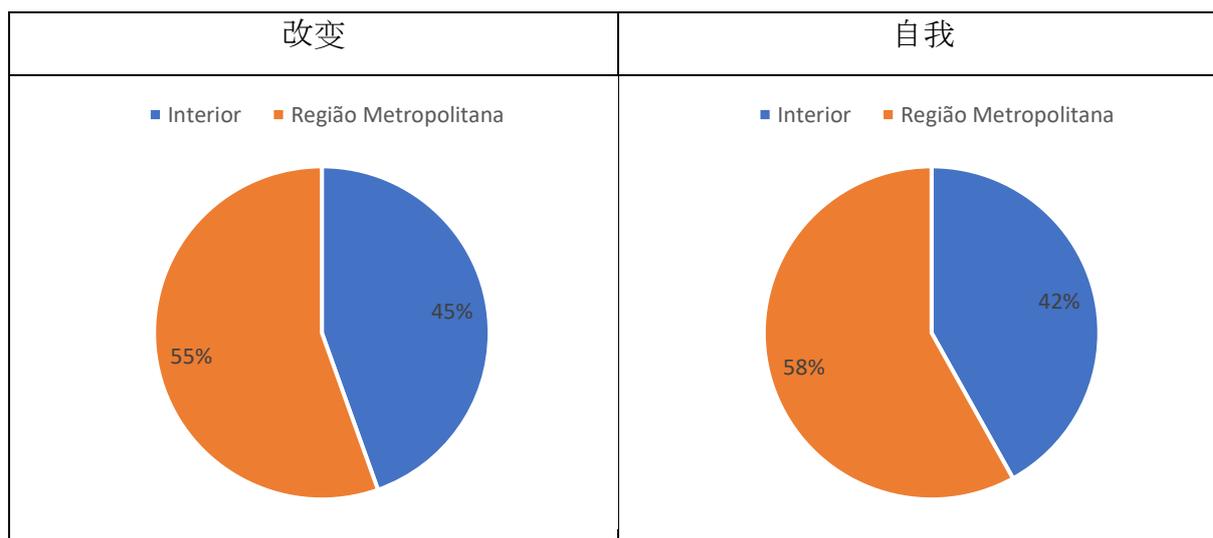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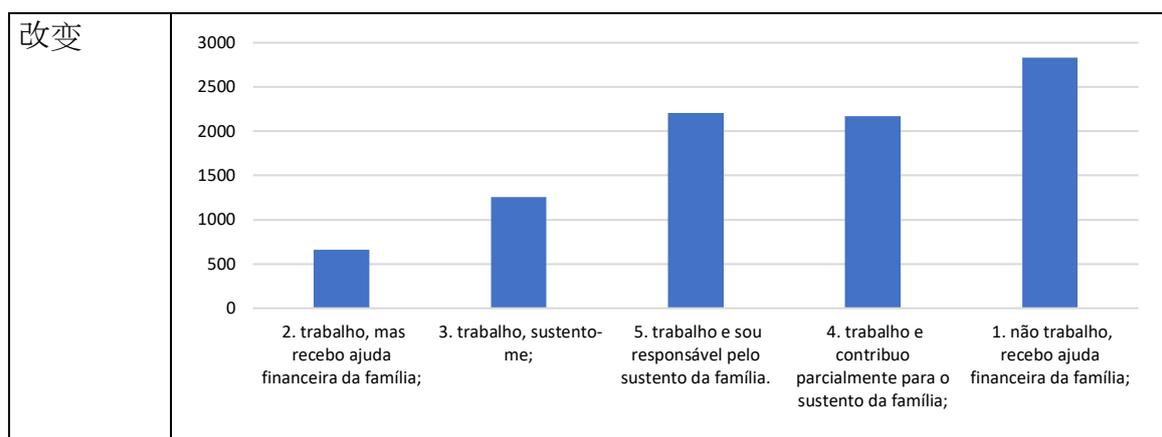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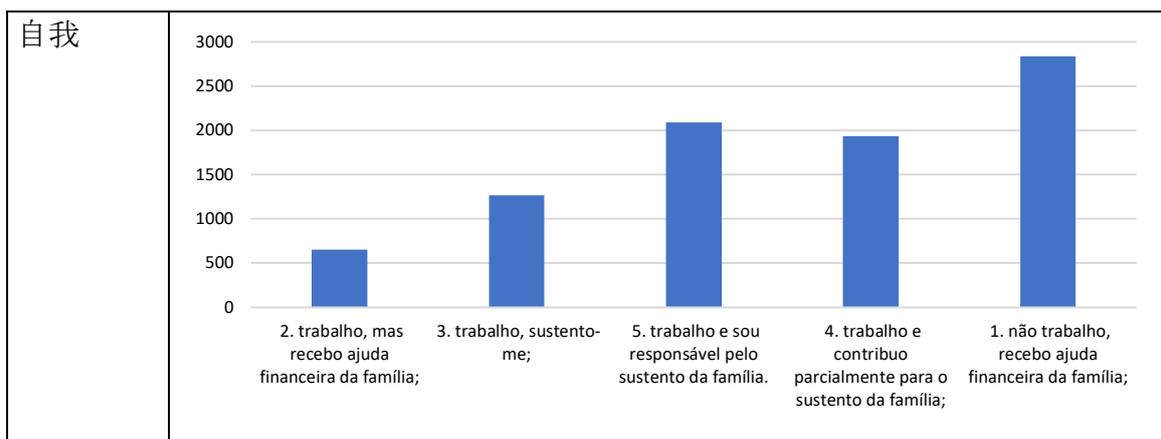
表101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法西利达德



关于"易"一词的召唤，与关于经济参与的社会人口调查表中所作的陈述有关。我们还注意到 **EGO** 对您的看法与您对 **ALTER** 的看法（表102）之间的相似性。在这两个人中，大多数不工作，从其家庭得到经济援助，其次是全部或部分地承担给予家庭需要的全部责任。

表102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法西利达德





4.2.13 轴 1 结果的整体分析 - 负阿戈拉斯

在观察了从暗示负面社会表现的词语中唤起痛苦的形成之后，我们此刻反思了涉及每一个问题的一些相关问题。在对结果的分析轴1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构建了与以下召唤相关的"恐惧"、"偏见"、"软弱"、"坏"、"不信任"、"复杂"、"怀疑"、"无知"、"懒惰"、"困难"、"困难"和"轻松"。

4.2.13.1 恐惧

在"恐惧"中，臭名昭著的是，关于EGO，里约热内卢州内陆的城市表现出这种与远程教育有关的感觉，在另一个城市——ALTER看来，它是大都市区。可以假定，这种情况，加上内地没有大型大学，学生寻求远程教育作为获得高等教育学位的一种方式，即使它滋养了对教育的恐惧。应当指出，那些对EGO表示恐惧的人是妇女。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对于EGO和ALTER来说，可以注意到，大多数年轻人详细阐述了恐惧可能的社会表现，即使它也发生在老年群体中（但程度较小）。"恐惧"一词的召唤也可以从所谓的缺乏EAD经验和同样被认为减少市场对文凭的承认来理解。这些假设（摩尔：KEARSLEY，2010）与众多研究人员的发现有关（贝洛尼，1999年；艾萨；桑托斯，2009；摩尔，2007；VIANA，2011）认为，事实，如教师形象在学习过程中的权力下放，除了担心教师失去工作或被导师取代，可以促进恐惧感。

4.2.13.2 偏见

至于阿戈拉的"偏见", 可以注意到, 在那些唤起这个词的人中, 年龄差异很大, 点头。这表明, 这种可能的社会代表性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 即许多寻求该学院的人不是传统大学年龄的人。另一个需要强调的要点是, 超越年龄的偏见与态度有着广泛的联系。例如, 在一次采访中, 拥有这种代表权(EGO中的偏见, 但发现对方可能也有)将证明一些态度是正当的, 例如, 在EAD中隐藏文凭的来源。偏见也可能表现为个人对劳动力市场等虚构实体的某种关注(《考试》, 2017年;KAHNEMAN, 2011), 除了满足一些理论提出的文学评论有关 Ae (BELLONI, 1999: 卡洛斯, 2007;艾萨;桑托斯, 2009;费雷拉, 2010;摩尔, 2007;桑托斯, 2006;维亚纳, 2011)。另一个需要强调的要点是, 在我们的书目调查中, 我们称之为"数字本地人"(PRENSKY, 2001年): 在信息时代出生和长大的人。关于这个年龄组, 黄金方面会有更多的偏见假设——ALTER-, 而EGO则不那么明显。但是, 与 THE 相关的负面偏见(我们还将轴心 5 中讨论这些偏见, 涉及对 cederj 前庭中注册的前 500 名单词的分析)。

4.2.13.3 弱

关于"弱"的阿戈拉, 一般来说, 可以指出, 作为所谓的对TER有偏见的一个原因, 答案将与关于模式距离为弱的判断有关, 正如我们在与ALTER有关的召唤中看到的。根据我们的分析, "弱"一词可以证实偏见(CARLOS, 2007年: 艾萨;桑托斯, 2009;桑托斯, 2006), 导致对远程教育的负面情绪出现。同样重要的是要强调, 远程学习薄弱的可能社会代表人数最多来自里约热内卢大都市区。也有人指出, 有许多人已经通过互联网学习课程, 包括使用印刷材料。事实上, 他们已经经历了经验与 THE, 仍然, 唤起这个词"弱", 与负面情绪有关, 加强了这种痛苦的重要性, 因为它是不同的判断, 不知道和判断后, 经历了AEd的形式。

4.2.13.4 坏

在"弱"与"坏"的构成中，我们怀疑是否将"弱"与"坏"联系起来。关于"坏"的阿戈拉，起初没有进行阻止，因为即使软弱感可以被认为是坏的，那些谁唤起每个这些词的特点是不同的。在评估"弱"的阿戈拉时，我们识别出比"坏"阿戈拉中观察到的年龄大的人的召唤。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那些发出召唤的人的特点的一般概述，就不可能阻止，因为其含义可能因社会群体而异。至于"坏"的阿戈拉本身，我们指出，它主要是由来自大都市地区的大量年轻人所唤起的，他们与大都会地区没有接触。与"坏"一词相关的重大负担强化了几位作者的这些内容（CORRÉA：桑托斯，2009）谁相信，仍然有一个负面的形象。当观察到大多数在 ALTER 和 EGO 中唤起这个词的人从未在远处接触过这种模式时，对偏见的理解就会得到加强。这实际上表明，鉴于与 The 的很少经验，"坏"与偏见有关。上述作者认为，在ALTER中预测这种可能的社会代表性强化了歧视的概念。

4.2.13.5 不信任

关于"不信任"，必须指出，它与老年男子（大多超过38岁）有另一种观点密切相关。我们还观察到，与ALTER相比，越年轻，就有一种不信任远程教育的感觉，这清楚地表明了一代人对与技术的关系的影响。我们还指出，引起"不信任"的人的经济状况是多种多样的。最后，有必要强调，认为该主题认为另一个不信任DA，加上绝大多数人没有参加远程教育的数据，强化了文献中记载的偏见观念

（CARLOS，2007年：艾萨;桑托斯，2009;桑托斯，2006）。

4.2.13.6 复杂

关于"复杂"的阿戈拉，我们发现大多数属于依赖家庭经济帮助的较大群体的年轻人。这种情况发生在ALTER，在里约热内卢市的大都市区更为反复出现。关于EGO，它是该州的内陆，重点是里约热内卢南部和北部。这里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与"复杂"召唤有关的表示将表明"困难"的中义：另一个可能的代表将链接到我们给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意义，这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偏见。如果我们考虑到年龄的变化，我们可以

看到这与"坏"的相似性。就我们所见，科学文献中没有"复杂"一词的记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可能就我们在这方面的结果和书目进行讨论。

4.2.13.7 怀疑

在"怀疑"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年龄变化不大，与年龄组有关，例如27至41岁的人，他们是家庭的主要提供者，而另一个群体的代表性是ALTER。然而，就EGO本身而言，尽管大多数人工作并有助于家庭的部分支持，但完全支持其家园的人很少。对《国家报告》作为可能的社会代表性有"怀疑"，可能表明对方式存在某种偏见，这证实了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注意到，在AD的经验有显著差异，在ALTER，超过40%的人谁唤起这个词没有经验，即使有些人有一些经验，在互联网上的课程。EGO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超过70%的人报告说从未接触过远程教育。如果他们没有经验的怀疑，最合理的假设是那些抵抗和/或偏见的假设。

4.2.13.8 无知

在"无知"的年代，这些召唤与绝大多数在经济上对拥有完全大学教育或在人生某个时刻离开大学的家庭负有经济责任的人有关。这一发现证实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表明远程教育是一种储蓄方式，除了作为第二次教育的工具（MOORE：卡尔斯利，2010；桑托斯，2006）。还有有趣的是，关于别人认为的"无知"一词的召唤——ALTER——占了那些已经与TH有过某种接触的人的主导，这表明了一种可能的矛盾。无论如何，阿戈拉的"无知"似乎更多的是与抵抗有关，而不是与偏见有关。

4.2.13.9 懒惰

至于"懒惰"，必须指出，这种召唤，表明一种可能的负面表现，反映了与坎波斯（2017年）属性为"意志和道德"的行为有关的行为。与ALTER有关，该学科对远程教

育的判断是，这是懒惰的人的事情，他们想要一些简单的东西为他们的生活。在我们为这项研究进行的书目调查中，不可能发现有人提到“懒惰”一词。然而，我们可以把它与这样一个事实联系起来，即关于常识，一些作者指出远程教育的方式是一种比面对面的教学形式更容易的教学形式。桑托斯，2009

.在这次调查中，懒惰的召唤，大多与ALTER有关，可以被认为是偏见的表现，以至于他们不信那些收养它的人。

双重作用的阿戈拉斯

4.2.13.10 困难

正如先前所澄清的，我们评估困难的Agora是双重解释，原因如下：答辩人可能将困难归咎于大学（从严谨和严肃的意义上说）或ED课程（从复杂的意义上说）。在引起困难表现的人的改变和自我中都有一个表现力的数字，几乎六倍于这种痛苦与改变有关。引起这种代表性的人是18至20岁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属于女性观众，其中大多数是来自里约热内卢州内陆的人。关于这最后一个特征，可以提出几个假设，但其中之一是，Cederj联盟已经在内陆城市很长一段时间，这可能对这个主题产生影响。

关于

EAD

经验水平与由此做出的艰难判断的交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事实。虽然在变化中，我们的平均值相当于已经提到的其他痛苦，大约45%到50%：对于自我来说，统计数据逃脱了平均水平，上升到64%，即那些从未参加过远程课程的人比那些有过一些接触的人更难。我们可以从感官的生态学中理解，在《教育学》中，困难的概念可能是通过与其他人的互动传递的，因为如果没有受试者自己的经验，我们不可能知道是否困难，这可能揭示出对远程教育的预先设想（CAMPOS, 2017年）。

4.2.13.11 难度

困难和困难之间有几个相似之处。这也可以指大学或EAD
课程的难度。这里的年龄组主要由18至20岁的年轻人组成，由不工作并得到家庭支助

的人组成，妇女发病率较高。此外，这个分组集中了超过50%的人谁从来没有参加过远程课程，无论是在自我和改变。

尽管与现在的困难有相似之处，但在地理问题上还是有区别的。虽然在困难的痛苦中，自我和改变大多由来自内陆的人组成，但在这个痛苦困难中，来自大都市地区的人在自我中占多数，从内在人，在变化中占多数。我们回到感官的生态学（CAMPOS, 2017年），我们将有不同的分析之间的物质条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和内部之间）和意识，意志和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判断）。

4.2.13.12 轻松

关于痛苦困难的同样考虑，也在第112页中提出了积极性和消极性，使得这种痛苦（容易）也出现在这个轴心1和轴心2。

如前所述，我们认为社会代表性的便利性也是不止一个解释的词，因为可以理解，在注意到日常任务的同时，很容易获得高等教育或处理学习问题，或者容易通过大学考试：这将建立，奇怪的是，甚至三重解释。我们强调，这些考虑与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是一致，只要我们能与感官的生态学平行（CAMPOS, 2017年）：将EAD作为日常生活的设施，将构成一种物质生存条件（作者感官配置的层次之一），以及研究对象提出的参与方式的便利性。将代表意识，意志和道德（另一层生态）。

这种痛苦——轻松——

无论在改变中还是在自我上，在召唤上都有平衡，每个表达方式都有八千多个。我们可以注意到，改变和自我之间的年龄差异相似，在18年中水平较高，一直居高不下，直到26岁，主要由来自里约热内卢大都市区的妇女组成，她们大多得到亲属的支持。

条件的缓解，当解释为主题的日常生活，可以直接与功能方面，以及许多其他的痛苦，特别是那些相关的文学评论，将在下一章看到。如果说对agora设施的解释是，在课程中毕业是多么容易，那么书目调查也可以看到它，对许多作者来说，这被认为是一种偏见。

观察 - 轴 1 - 负阿戈拉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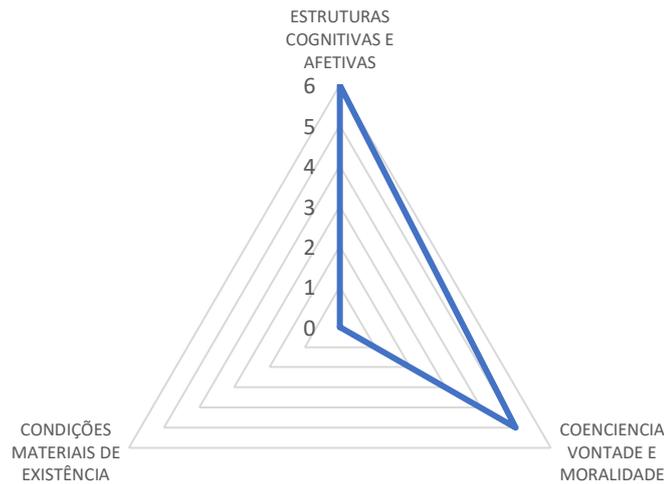
如果我们考虑社会上流传的关于 **THE** 的含义的生态学，我们可以说，负面词语在很大程度上与基于认知的情感情感有关，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认知被巩固为道德-道德判断。如果这些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是负面的）符合现实，则本论文不应讨论这一点，该论文只关注可能的社会表现，即使这些判断有原因，在这项研究中也未得到研究。这些判断中有许多可能与物质生活条件有关，正如我们在对参与单词发音过程的人的经济状况的观察中看到的（无论是在生活困难方面，还是在认为 **AE** 获得的文凭可能阻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观念中），而且从技术运作良好、需要更高的收入才能获得更好的设备和互联网信号。在这方面，我们也有一代人的效果，在年轻人中产生更容易处理数字技术。

桑托斯（2006年）和维亚纳（2011年）等作者谈到了与技术问题有关的对**AEd**的抵制，尽管这一方面并没有以有力但可能是间接的方式出现在本文中，因为人们唤起了诸如"恐惧"之类的词语，这些词可能与对技术的恐惧有关，也可能与对技术的恐惧无关。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感官生态学的信息和趋势，我们将在轴1和2中使用一种称为雷达的图表形式，这种方法可以从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定量来源呈现多变量数据，并有助于趋势观测。它被认为是内部数字是执行的召唤和图形的每一端感官的生态配置链之一。c在图 23 中可以观察到以下 c 形式，全球形态的召唤主要与意识、意志、道德、认知和情感结构有关，与涉及 **THE** 的物质循环无关。这一点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对受试者与"THE"有关的感知类型有一个概念，即本研究的消极面与物质方面直接无关，而与象征性或抽象方面有关。

（卡洛斯，2007年）。

图23 - 负痛苦感官的生态学



4.3 轴 2 - 与文献评论相比，对最令人唤起的表示方式的痛苦的分析

4.3.1 介绍

做好国家社会代表研究的审定工作。梅内塞斯;莫斯康, 2016;概念：美国西尔瓦;欧盟, 2011年;马尔基索蒂等人, 2017年;SANTOS, 2006年) , 我们确定了文献中提到的与主题相关的词语, 并从基于阿布里克的SS理论(1997年) 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在本案中, 所有召唤都来自调查巴西远程教育社会表现的作者确定的中心核心。我们从上述的召唤中创建了一个组织系统, 在下表103中显示, 在左侧指出我们研究中也出现了的国家文学的召唤(左侧: 研究中这些表现的发生次数)。在研究结果中, 我们提出了社会表现, 如方便, 在我们的研究中有四个事件, 设施有三个发生, 未来有两个发生等等。

表103—从文献中摘取的《AEs》中巴西所谓的国家文学的召唤

社会代表	事件
方便	4
缓解	3
未来	2
互联网	2

迅速	2
时间	2
自治	1
便宜	1
成本	1
困难	1
学科	1
经济	1
灵活性	1
灵活	1
时间	1
灵活小时	1
自由	1
机会	1
实用性	1
制备	1
老师	1
识别	1
孤独	1
肤浅	1

我们努力寻求理解这些被视为社会表现的召唤，这些召唤以水密和固定的方式呈现在文献中，根据感官生态学的动态以流畅的方式呈现（CAMPOS, 2017年）。为此，我们选择了下面表104中提出的一组与负面情绪相关的唤起词语。从我们所做的分类可以推断出，根据我们的解释，只有一个唤起的词与主体的认知和情感结构有关（"孤独"）。在这种孤独中，推断出与我们意志的意识有关的召唤，即道德判断，以及那些提到选择这些词的人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召唤。

表104—根据我们对文献评论中感官生态学的解释组织的可能社会表现的召唤

表示（世界图像）		
认知和情感结构	科恩西恩西亚意志和道德	存在的物质条件
孤独	未来	方便
	自治	缓解
	自由	互联网
	机会	迅速
	识别	时间
	肤浅	便宜

	制备	成本
	学科	经济
	困难	灵活性
		灵活
		时间
		灵活小时
		实用性
		老师

我们的阿戈拉命题作为一种理论构造，与中心核心的概念不符。尽管如此，我们在本文中用于说明和比较文献中报告的结果，以及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获得的结果，目的是使用我们可用于讨论的唯一参数。虽然基于召唤方法的不同过程，与远程教育有关，导致不同的结果（尤其是因为它们在其他时间，与其他科目等一起执行），他们仍然给我们有趣的参数，以反思这种教学方式的阻力和偏见。也就是说，意义的生态学因研究者“拍照”的历史文化时刻而异。在本案中，虽然这不是必要的，但我们以指示性的方式呈现这种解释性笔触，然后继续分析 EGO 和 ALTER，这些词与我们从数据库中获得的前 100 个最令人回味的单词中的发生有关。

因此，我们提出了建立可比较的标准的目标，我们在下表105中详细阐述了这些标准。它包括第一个引用最多的词，与从文献评论中提取的中央核单词相吻合。我们检查了这些表示是否同时出现在 ALTER 和 EGO 中。在我们提出“是”的地方，我们指出书目调查的表述与我们研究中单词的召唤相吻合，在前100个最引证的单词中。

表105-文献中唤起的词语与我们研究中关于EGO和ALTER的前100个单词

文献评论中的社会表现	自我	改变
自治	是的	
便宜		是的
方便	是的	是的
成本	是的	是的
困难	是的	是的
学科	是的	是的
经济	是的	是的
缓解	是的	是的
灵活性	是的	是的
灵活		

未来	是的	
时间		
灵活工作时间		
互联网	是的	是的
自由	是的	
机会	是的	是的
实用性	是的	是的
制备		
老师		
迅速		是的
识别		
孤独		
肤浅		
时间	是的	是的

因此，我们发现我们研究中引用最多的词的11个引文，与国家科学文献中报道的词语相吻合。这一点，在奥尔特的“是”和Ego的“是”中指出的。随着这十一个唤起的词的选择，暗示了与The相关的社会表现，我们建立了关于他们每个人的阿克拉斯。出现的“方便”、“成本”、“困难”、“纪律”、“经济”、“便利”、“灵活性”、“互联网”、“机遇”、“实用性”和“时间”等字眼。

4.3.2 阿戈拉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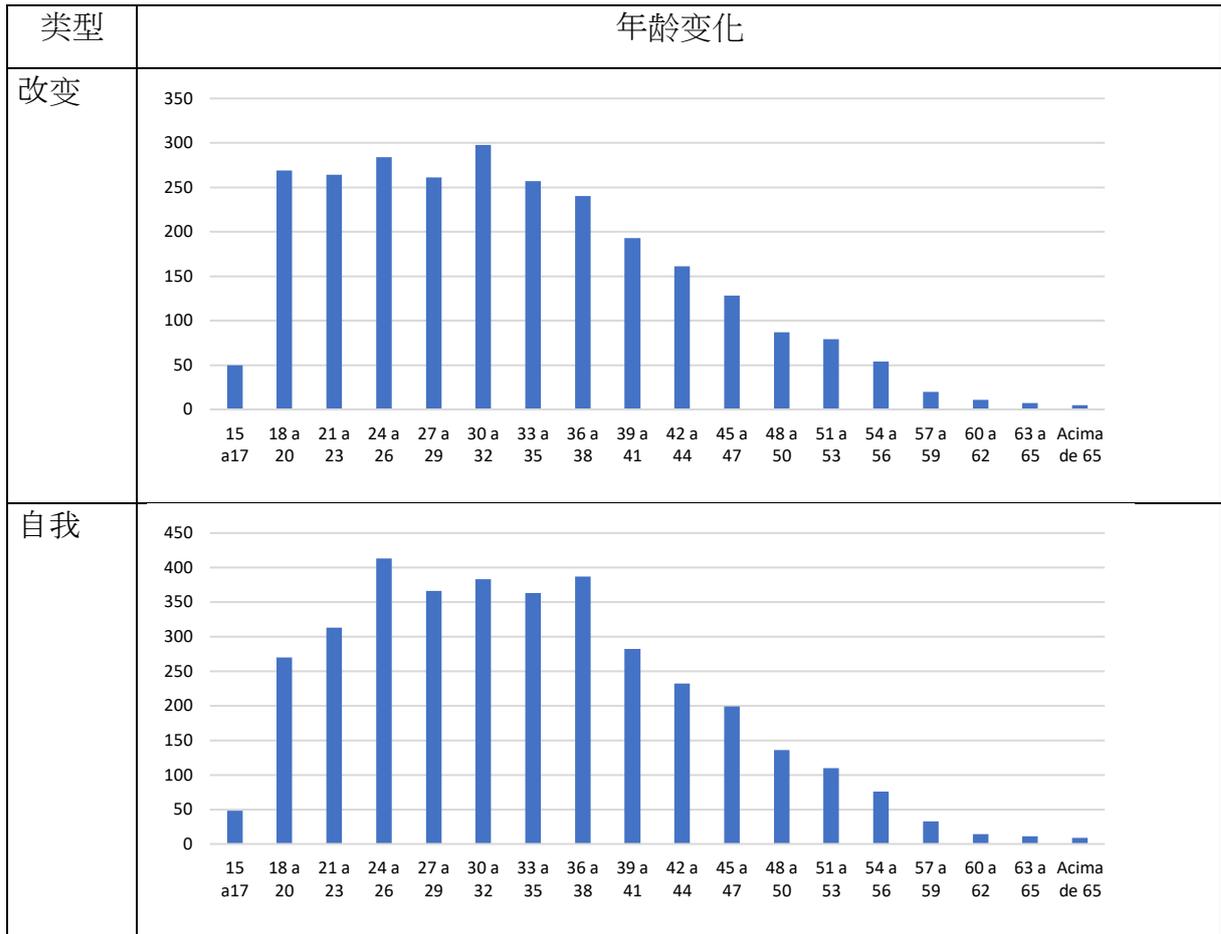
与迄今为止所研究的大多数前述不同，我们在EGO中对“方便”一词的召唤比在ALTER中有更多的召唤，正如我们在下面的表106中看到的。

表 106 - EGO 和改变使命 - 阿戈拉便利

阿戈拉	人
自我	3718
改变	27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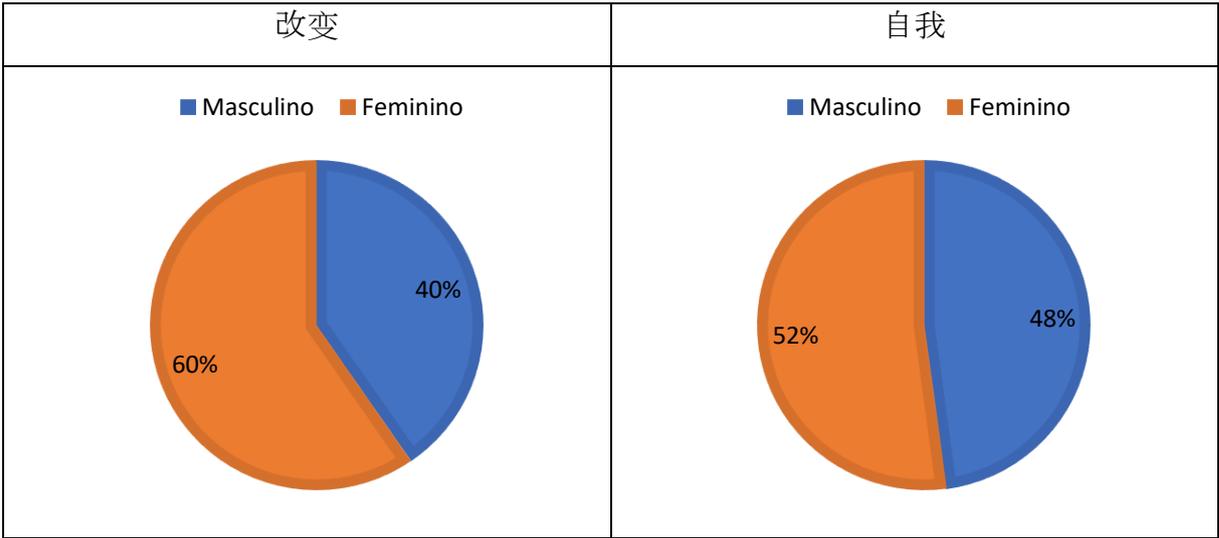
关于年龄差异，可以注意到在EGO和ALTER中，18至35岁的年轻人的召唤有一定的稳定性（如下图107）。在EGO，高峰期为24至26岁，27至38岁，在ALTER，高峰期为30至32岁。我们可以推断，对于年轻人来说，远程教育似乎是舒适的。

表107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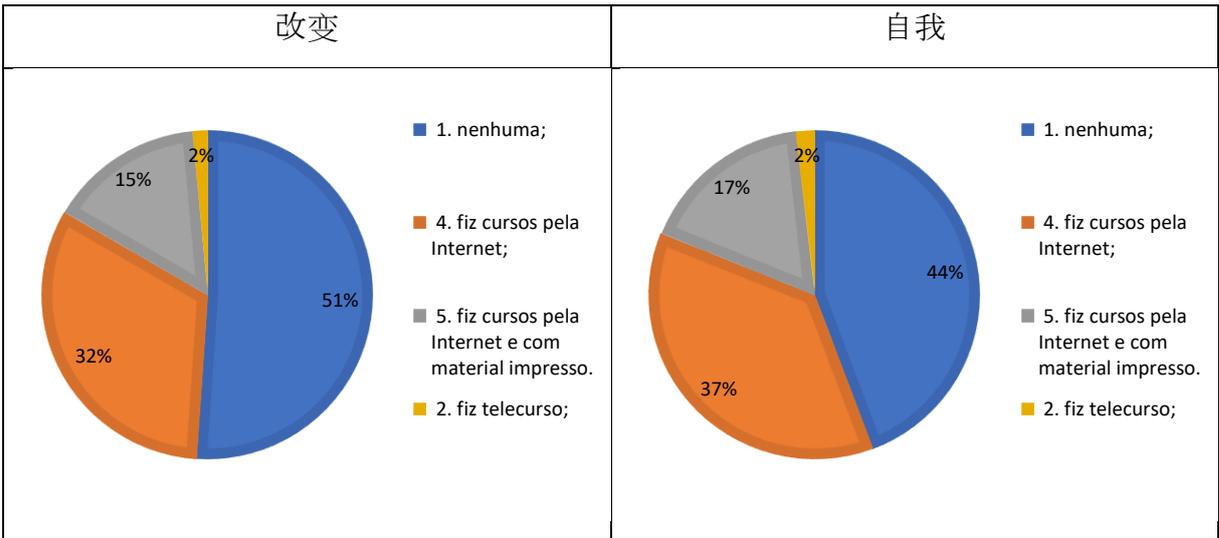
关于性，我们可以在表108中注意到，在EGO和ALTER中，大多数女性都认为EAD舒适。因此，在我所想的另一个比你想象的更明显。

表 108 - 性 - 阿戈拉便利



在那些唤起"便利"一词的人中，我们发现，与"距离"的经验相比，有一个镜像，EGO和ALTER之间有相似之处，正如我们在下表109中看到的。完全缺乏经验通过互联网与经验分享。

表109 - EAD体验 - 阿戈拉便利



里约热内卢州各市镇的召唤来源的地理分布表明，大都市区占主导位置。我们在 110 图表中观察到这一现象，在 EGO 和 ALTER 中都低于此现象，仅有 60% 以上的受众具有代表性便利性。

表110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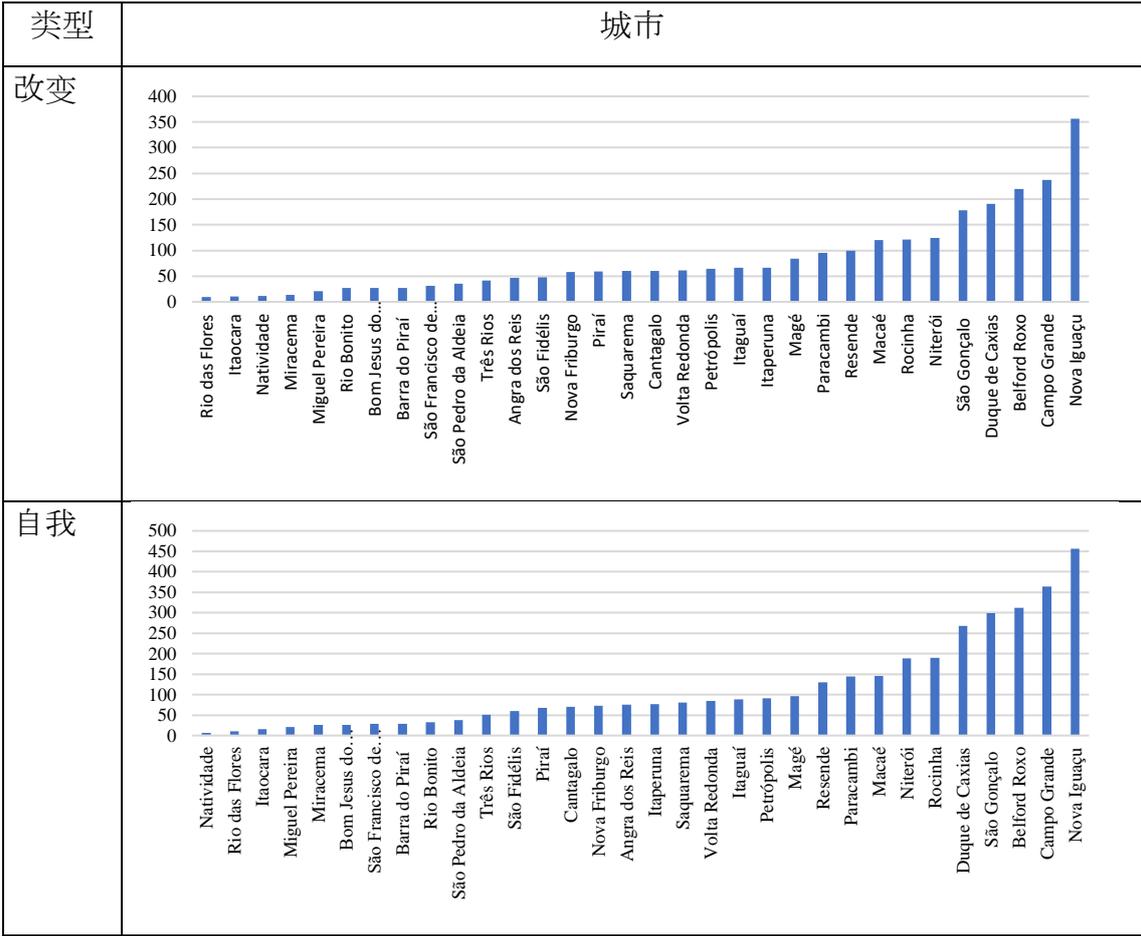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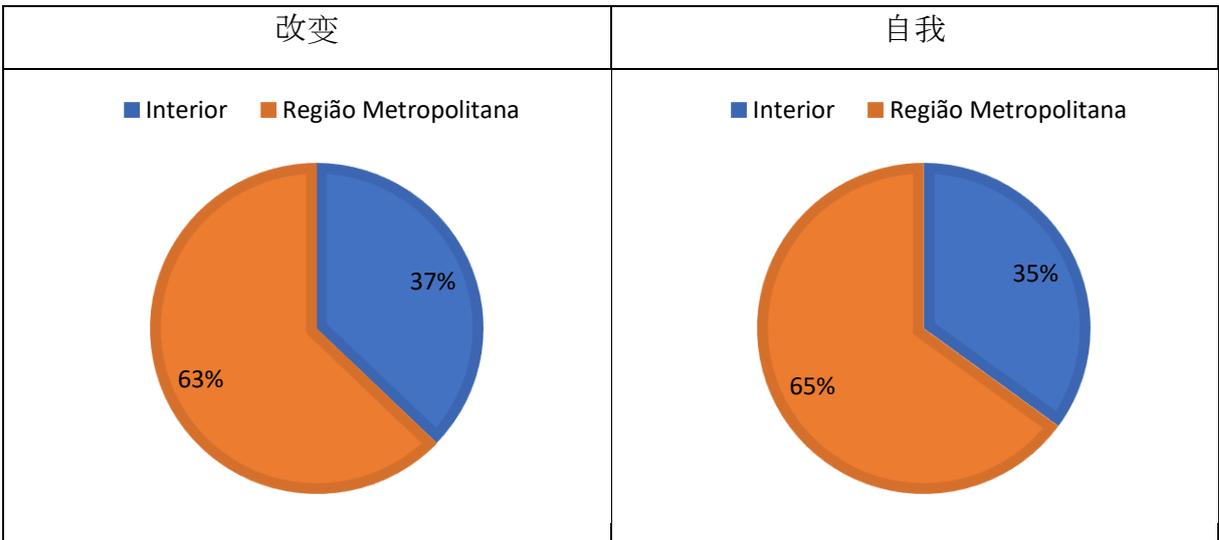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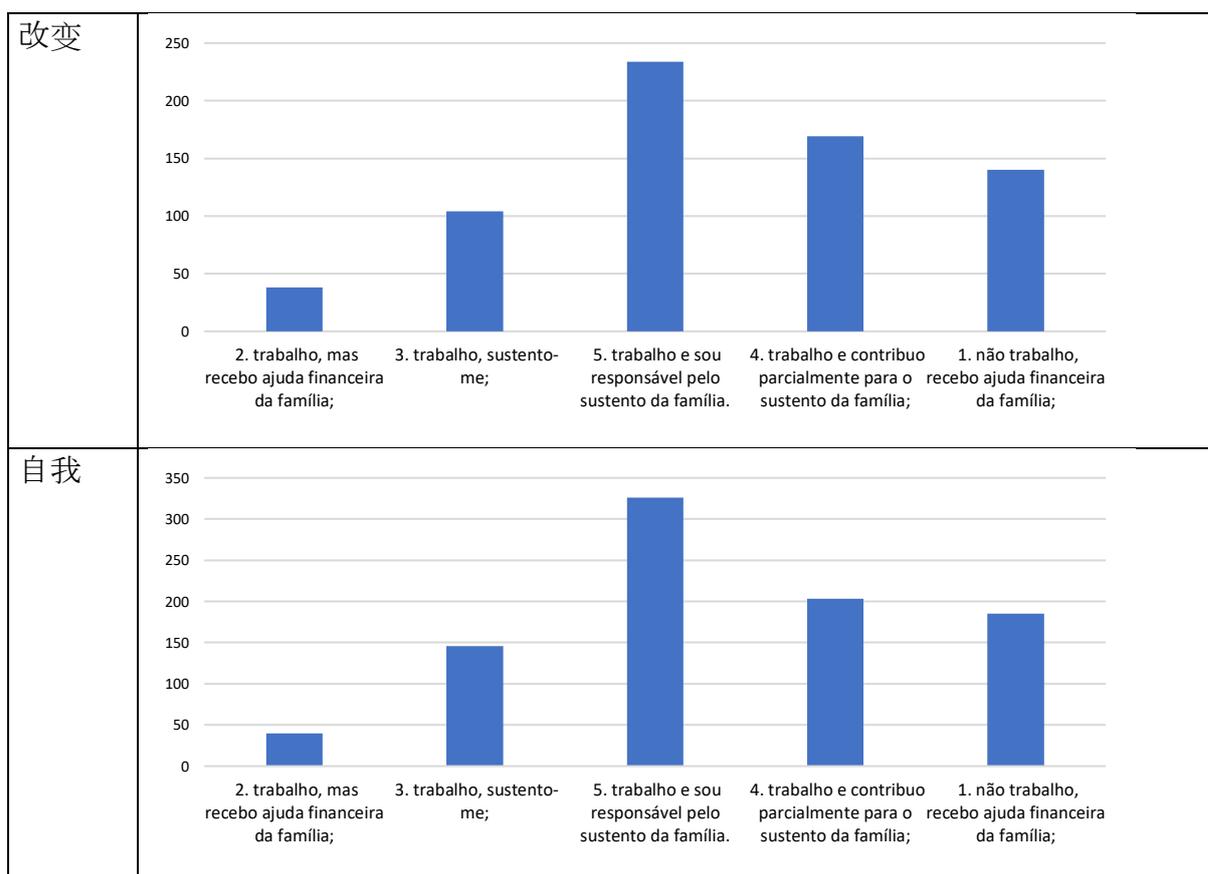


表111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便利性



关于家庭的经济参与，我们注意到，在EGO和ALTER中，唤起"便利"一词的人都是主要的提供者。正如我们在下表112中看到的，有一个密切的镜像，与其他形式的经济形势有一定的等价性。

表112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便利



4.3.3 阿戈拉成本

"成本"一词的召唤对我们来说似乎特别重要，因为经常与提供廉价教育的 THE 联系在一起。在数量上并不大的召唤中，与那些用其他词语表示的召唤（合并了其他痛苦）相比，我们在下图113中看到），其中大多数是EGO提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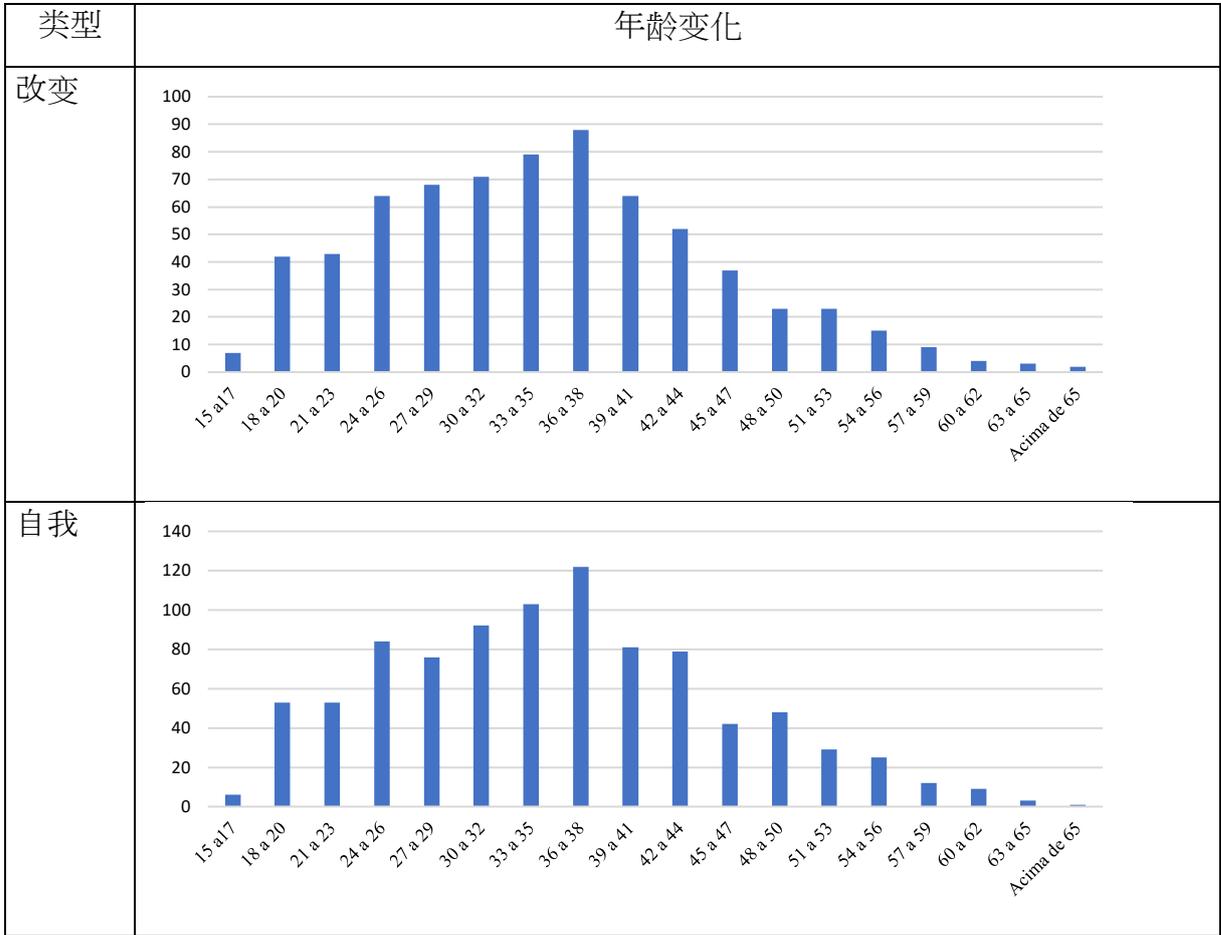
表 113 - EGO 和改变使命 - 阿戈拉成本

阿戈拉	人
自我	938
改变	713

关于年龄差异，我们注意到中年人的成本更为巨大，与EGO相关的召唤和ALTE R的峰值年龄在36至38岁之间。如下表114所示，人们对中年高峰期成本的担忧有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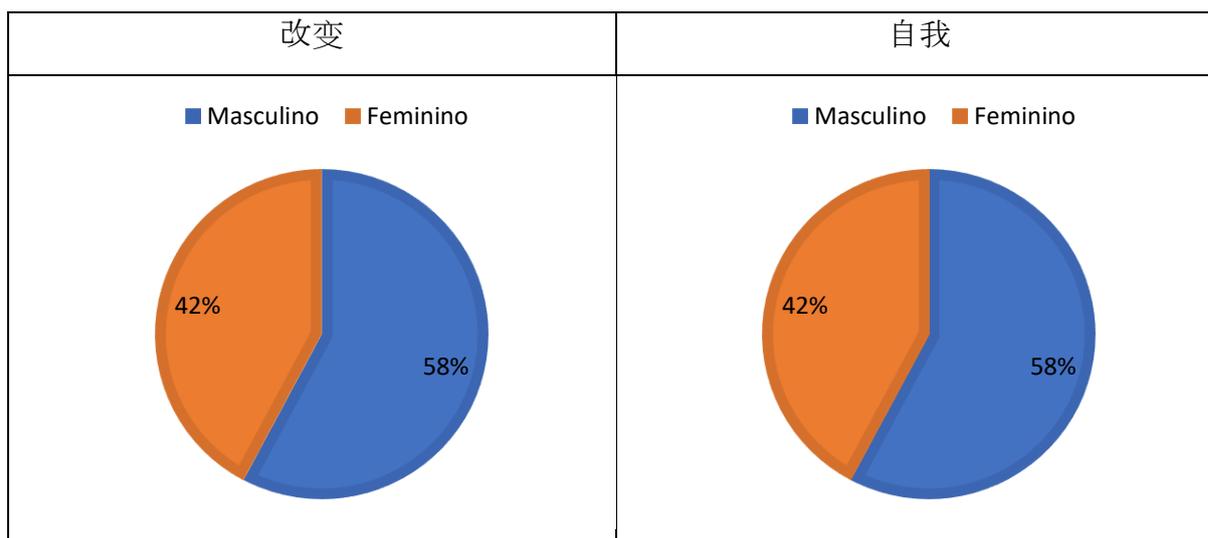
升，老年群体的成本或多或少会突然下降。因此，由此产生的曲线在 EGO 和 ALTER 中都相似。

表114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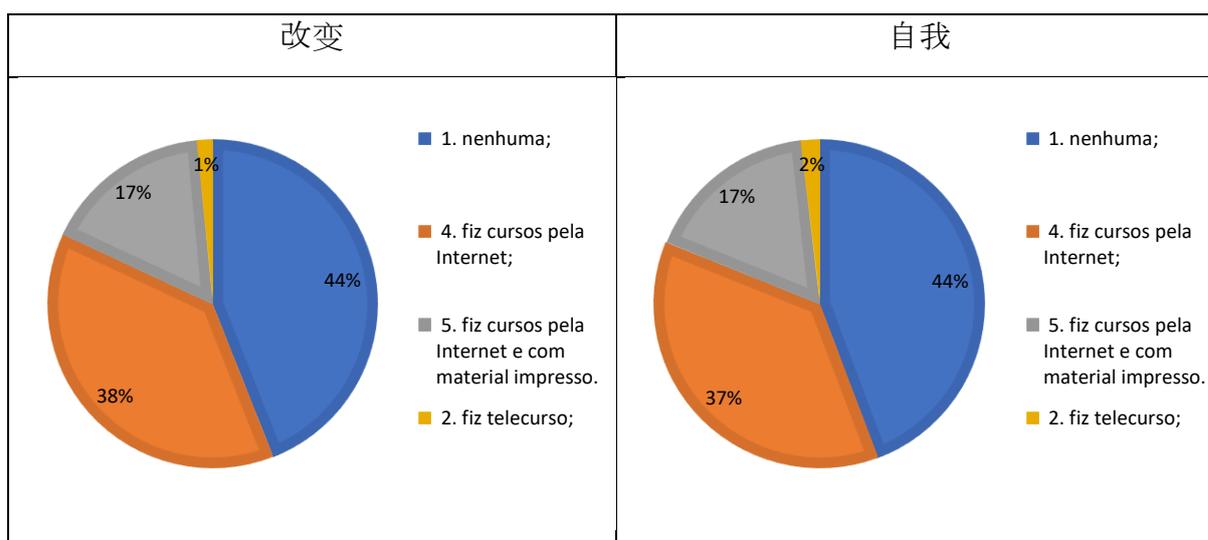
在成本召唤的情况下，我们发现一个痛苦的地方，不像以前的大多数，大多数谁提到这个词是男人，正如我们在下面的表115看到。从性别角度来看，Ego 和 Alter 中 eid6entica 的成本阿戈拉的形成。

表115 - 性别 - 阿戈拉成本



此外，关于"成本"一词的召唤，关于与AEd的经验，我们注意到，在其他情况下，EGO与ALTER的相似性，正如我们在下表116中看到的。大多数人在EGO和ALTER中，在那些不知道EGO的人和那些已经通过互联网学习课程的人之间意见不一。

表117 - EAD-阿戈拉成本体验



里约热内卢州各市对"成本"一词的召唤的地理分布十分集中，如下表118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大都市区各城市，作为新伊瓜苏、坎波格兰德和贝尔福德罗克索两个地区、EGO和ALTER的市镇的重点。唯一的区别在于EGO的章程，它在其第一个城市唤起了圣戈尼亚洛。与内地相比，从大都市区提及的118表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流行。

表118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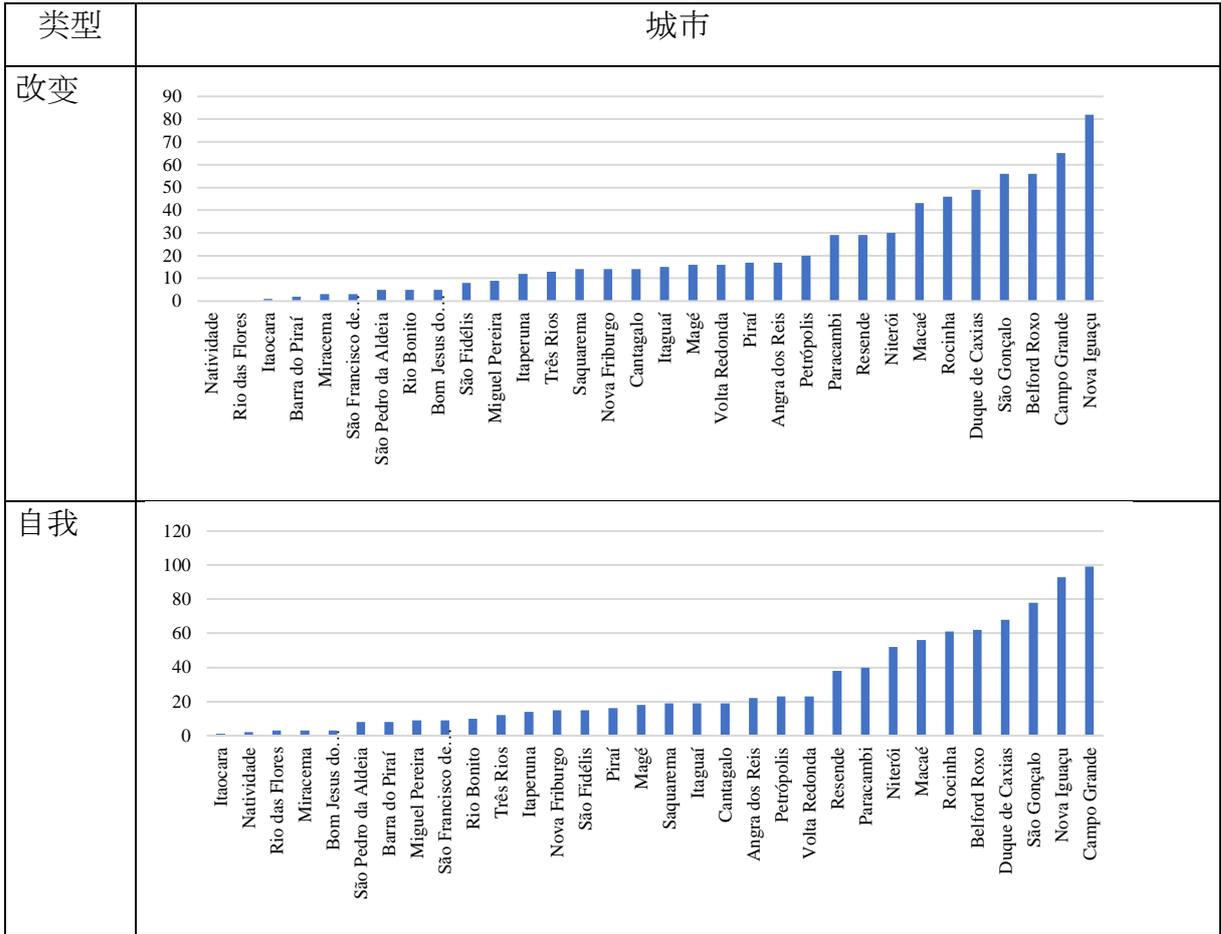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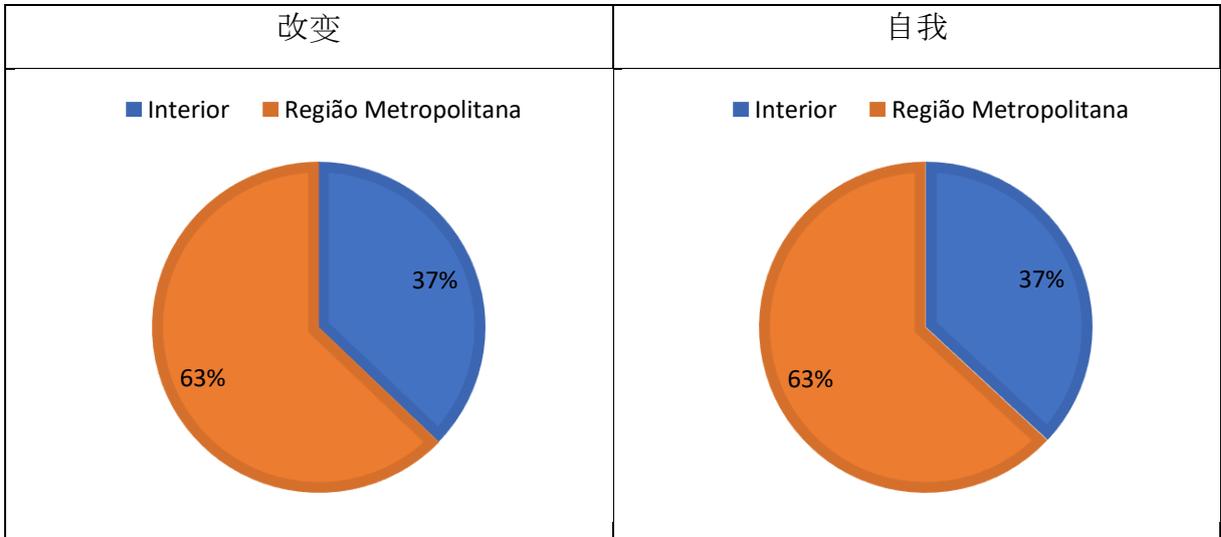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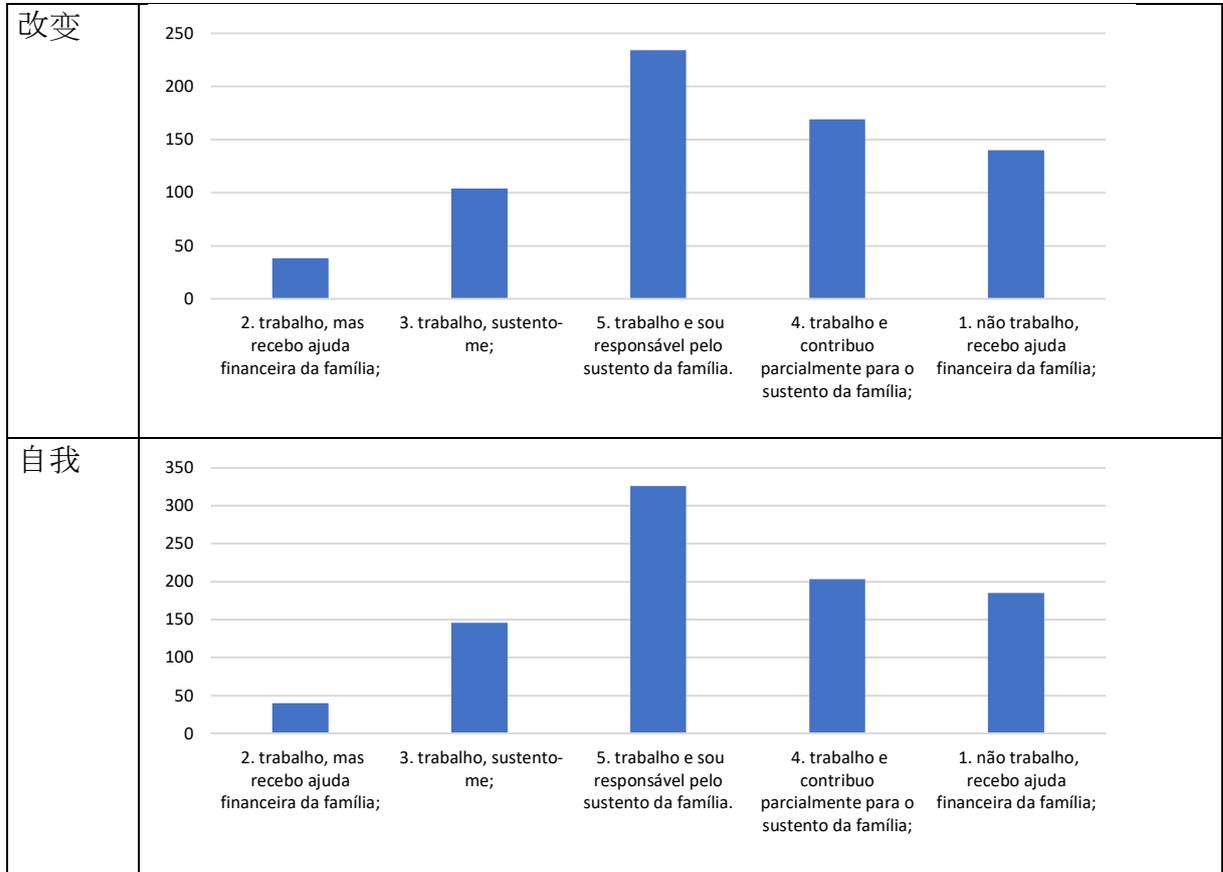
表119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成本



成本召唤在经济参与方面特别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如下表 120 所示，EGO 和 ALTER

之间具有等价关系。大多数提到“费用”的答复者报告说，这是家庭支助的主要责任。下列提及的是部分提供者和没有经济条件的人，取决于家庭。

表120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库斯托



4.3.4 阿戈拉难度

就这种痛苦而言，我们向读者介绍我们在安讯士1中关于可疑词语的分析。

4.3.5 阿戈拉纪律

正如我们在下面的表121中看到的，在EGO中，阿戈拉学科比在ALTER中更为普遍。与第二个比例相比，这一比例比第一个比例高近8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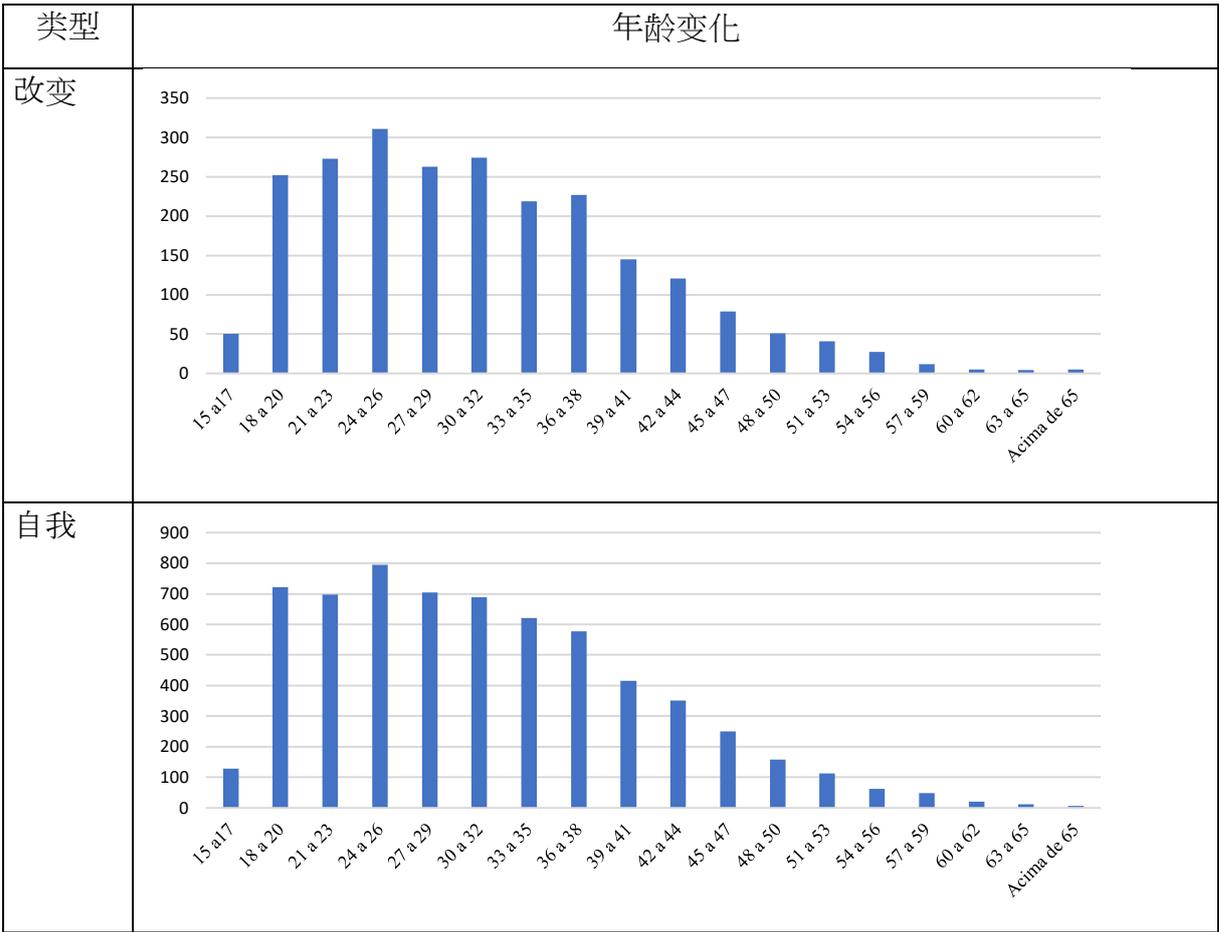
表 121 - EGO 和阿尔特职业 - 阿戈拉纪律

阿戈拉	人
-----	---

自我	6553
改变	24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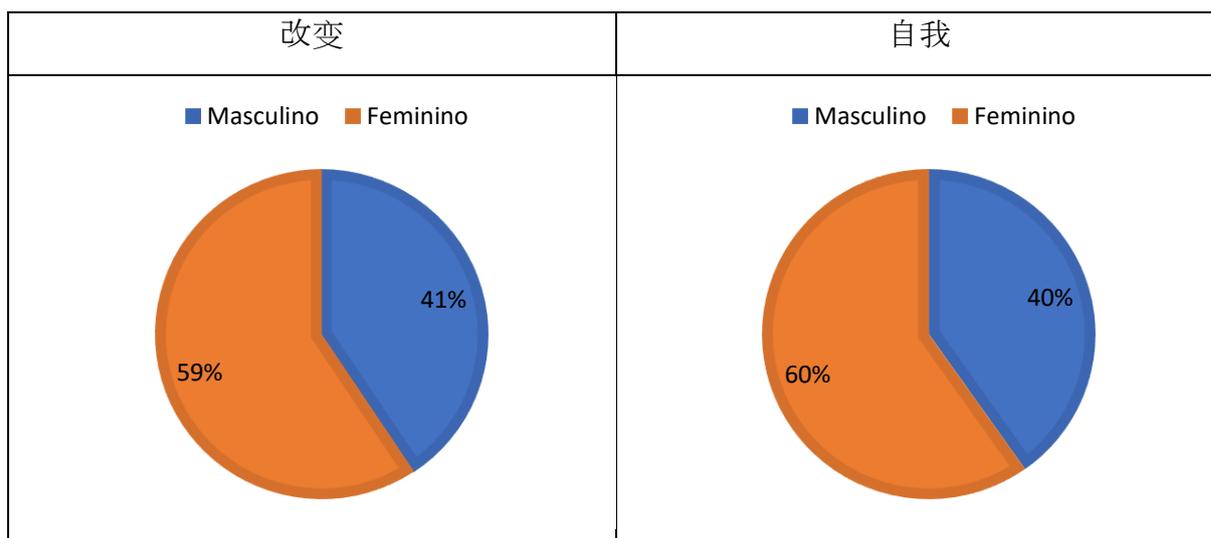
在EGO和ALTER中，可以注意到，青年在召唤"纪律"一词时很普遍。24至26岁的年龄组在召唤数量中占据顶点，如下图122所示。

表122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纪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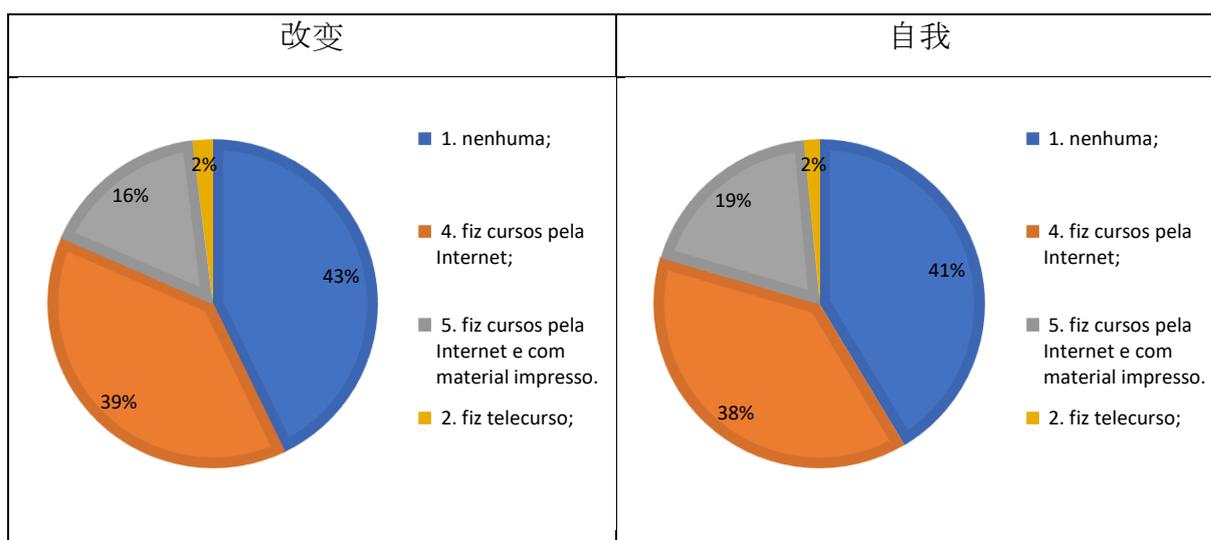
关于性，纪律的召唤绝大多数是妇女，如下图113所示。在 EGO 和 ALTER 中，提及的百分比都非常接近。

表123 - 性 - 阿戈拉纪律



关于与AEd的经验，如下表124所示，我们发现自我和改变之间在"纪律"一词的召唤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在这两种情况中，大约40%的人没有远程教育过程的经验，也没有通过互联网学习课程的经验。

表124 - EAD经验 - 阿戈拉学科



关于市政地理分布，还可以注意到EGO和ALTER在"纪律"的召唤中取得平衡，重点是里约热内卢大都市区的城市，包括该州北部的马卡市，包括EGO和ALTER（下表125）。就这种痛苦而言，如下表125所示，在EGO和ALTER的内部，大都市区的流行程度也有所提高。

表125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学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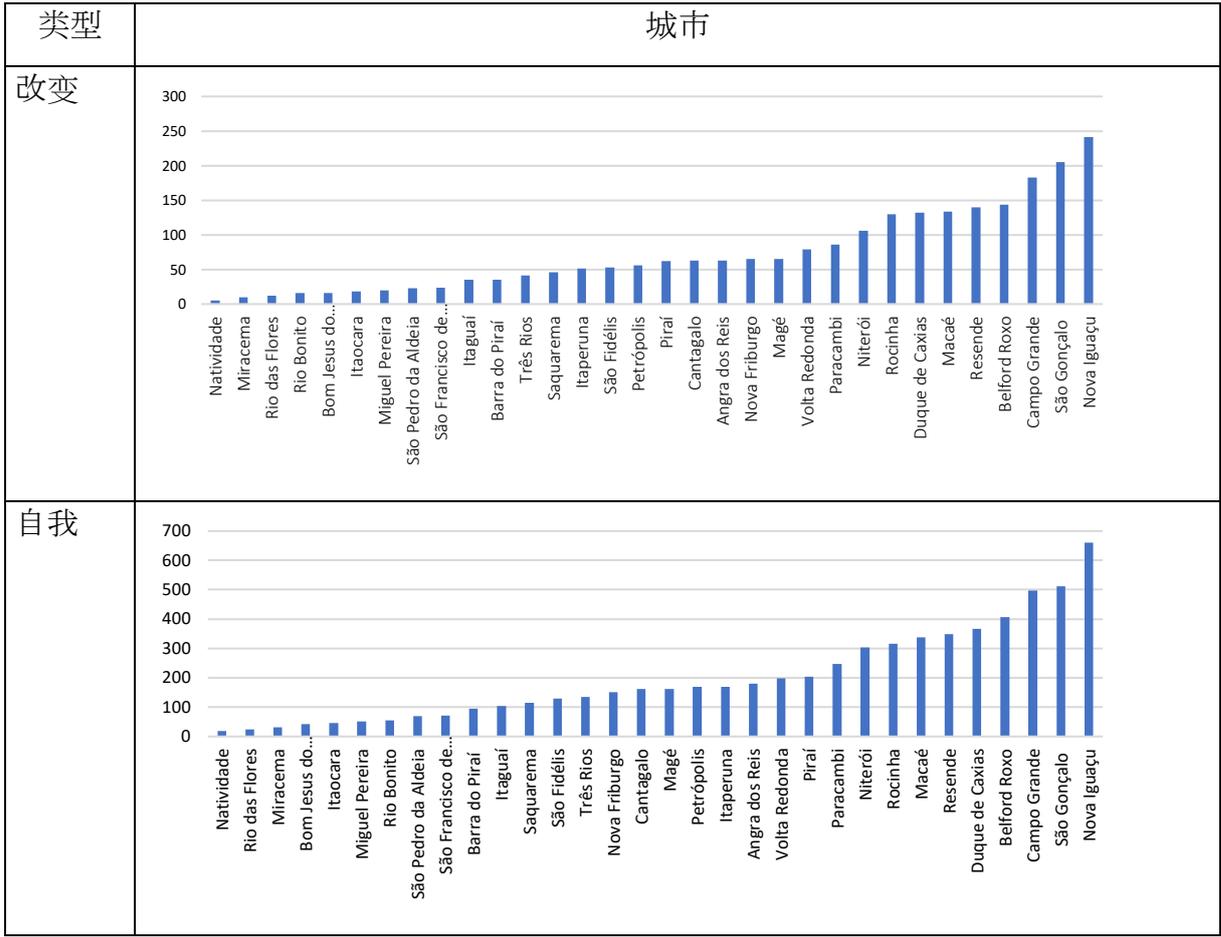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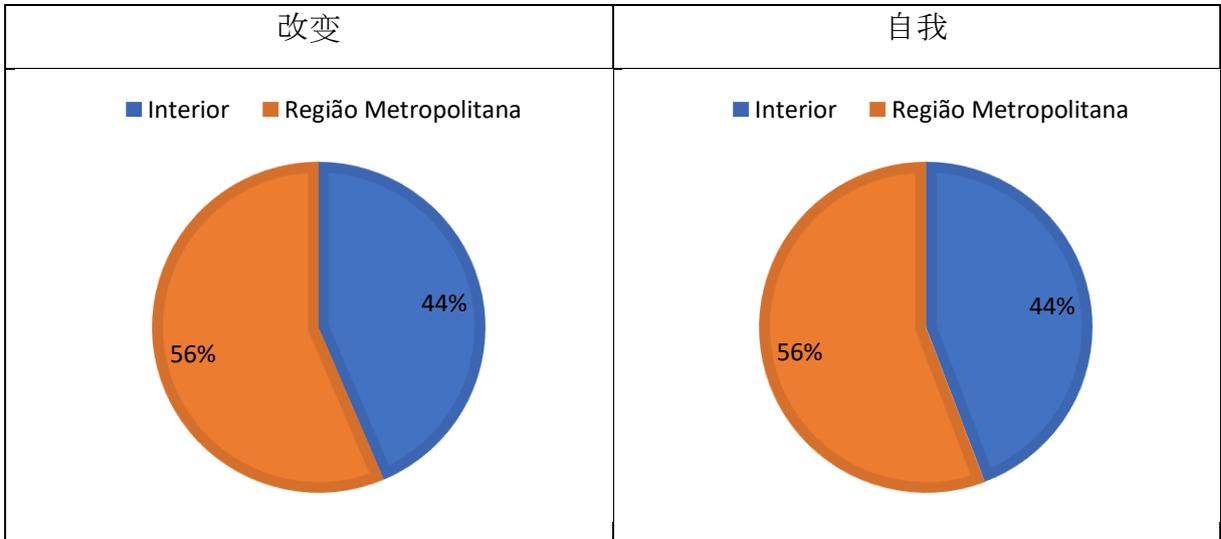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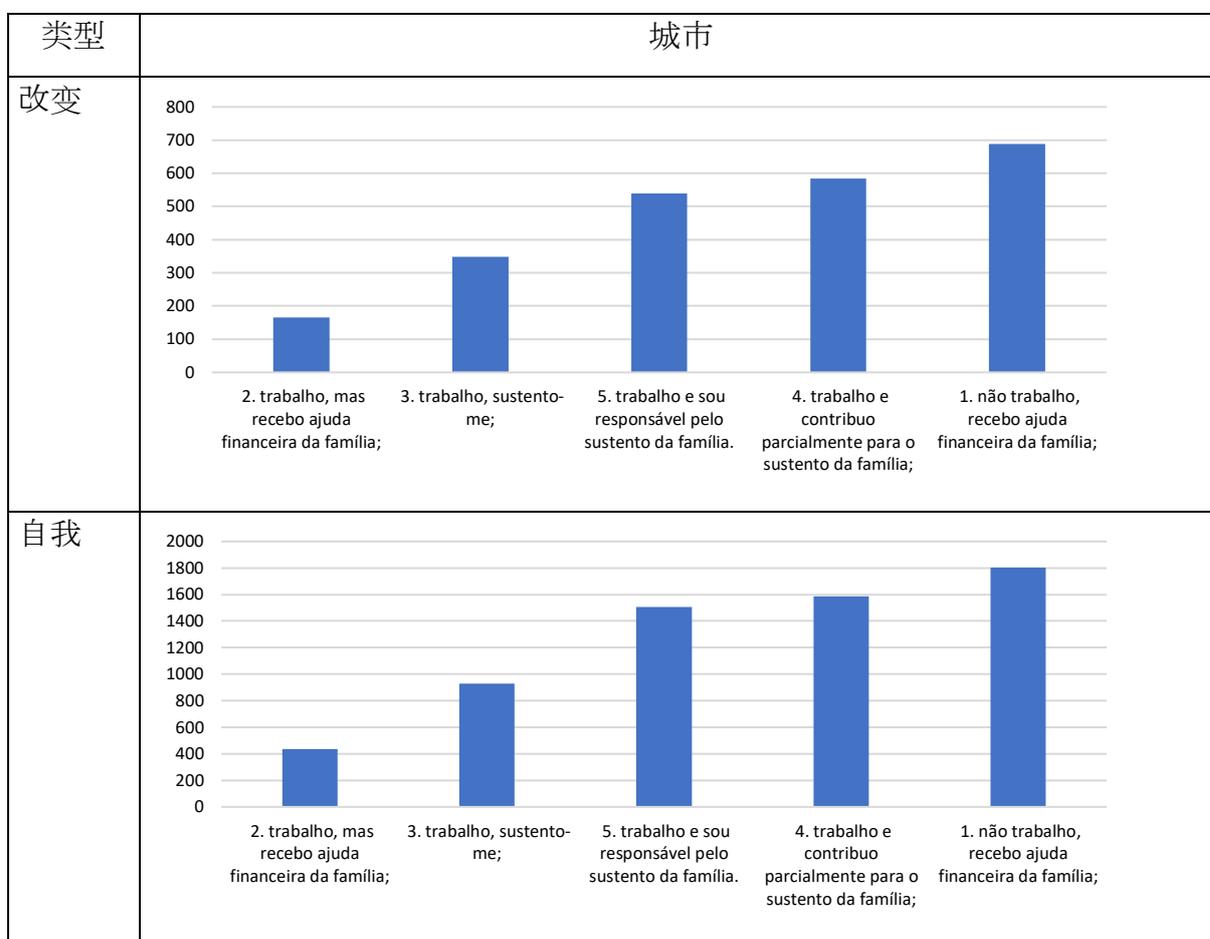


表126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纪律



大多数唤起了"纪律"一词的人，好奇地不工作，没有收入，并得到家庭在自我和改变表现方面的支持，如下图127所示。虽然是多数，但这种情况紧随其后的是部分或完全养家糊口的人。

表127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纪律



4.3.6 阿戈拉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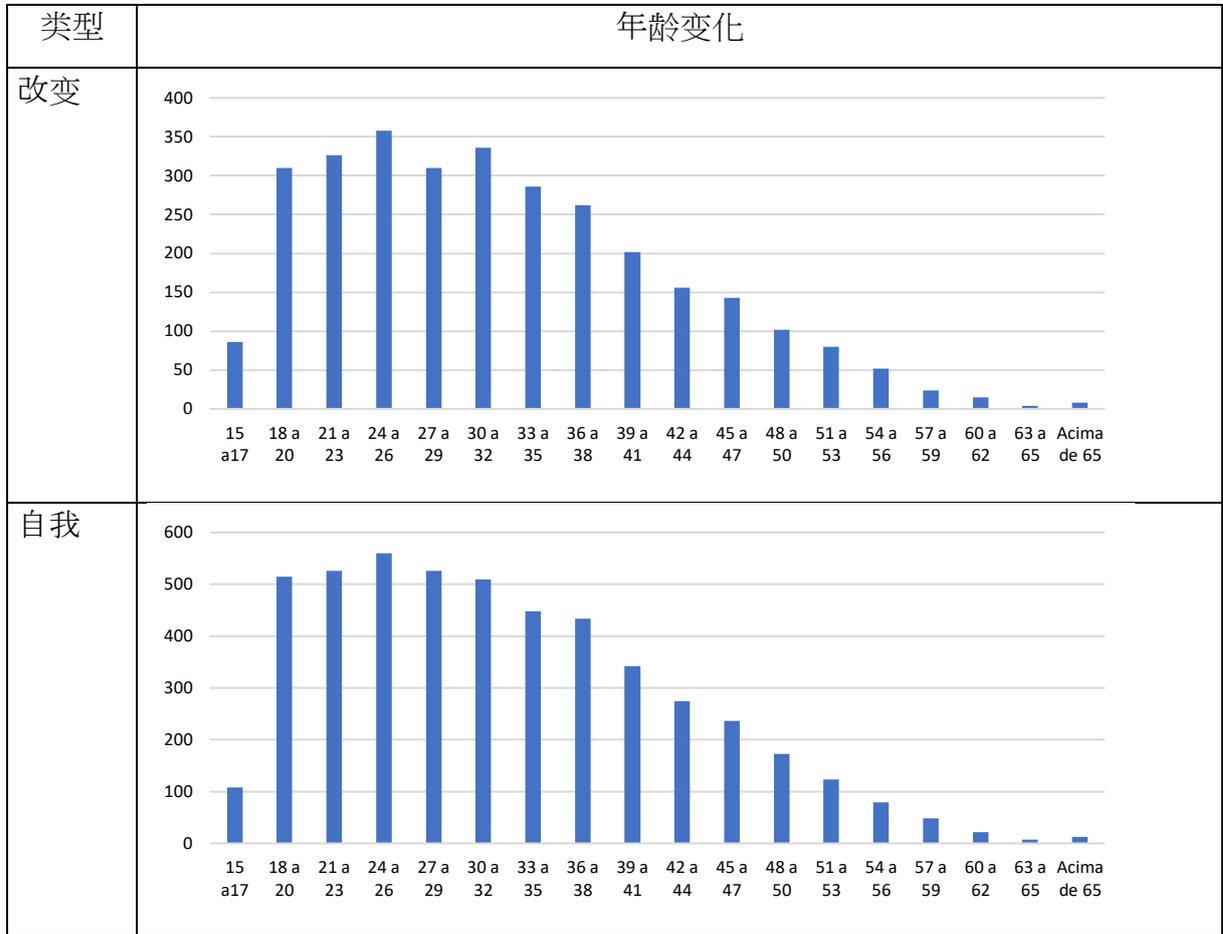
关于"经济"一词的召唤，大多数提及来自EGO，如下表129所示。

表 129 - EGO 和阿尔特职业 - 阿戈拉经济

阿戈拉	人
自我	5061
改变	3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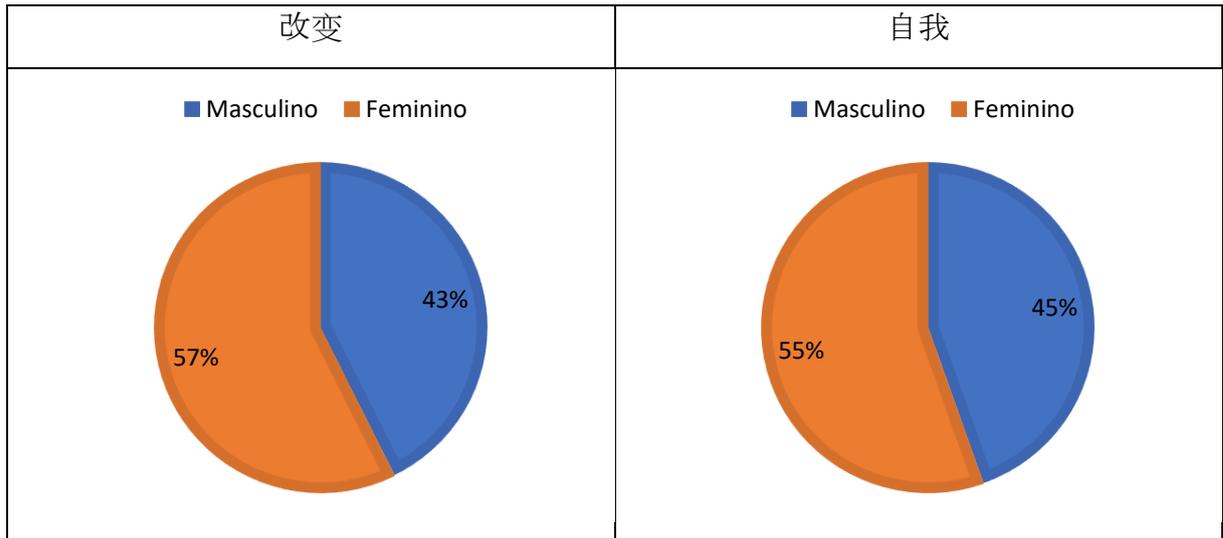
与迄今为止所研究的绝大多数痛苦一样，在这个痛苦中，青年对"经济"一词的大部分召唤负有责任（下表130）。在 EGO 和 ALTER 中，顶点都在 24 至 26 岁之间，根据受访者的年龄，这一年龄在下降。

表130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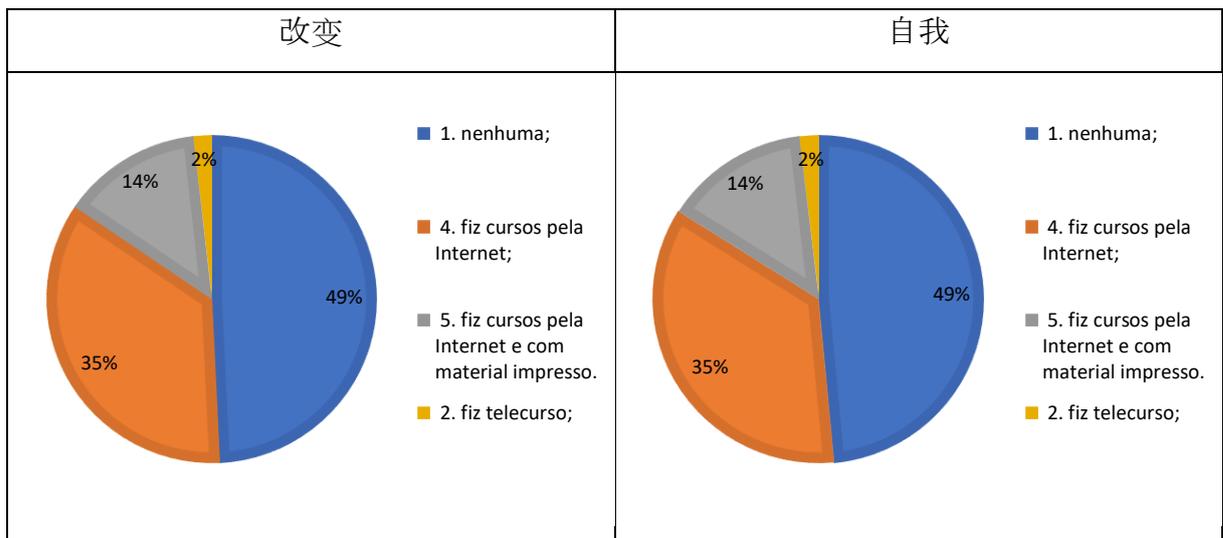
关于唤起"经济"一词的人的性别，可以证实，正如下表131所示， 妇女主要提到它。在 EGO 和 ALTER 中， 召唤的数量都接近百分比。

表131 - 性 - 阿戈拉经济



关于远程教育模式过程的经验，我们有一个相同的镜像EGO和ALTER，关于"经济"一词的召唤，正如我们在下表132中看到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几乎绝对多数的人从未经历过远程教育过程，其次是已经通过互联网学习课程的团体，无论是否得到印刷材料的支持

表 132 - 与 EAD 的经验 - 阿戈拉经济



关于城市地理分布，下图133表明里约热内卢大都市区EGO和ALTER的城市普遍存在。在区域地理分布（下表 133），我们观察到 EGO 和 ALTER 中平均有 65% 的"经济"一词来自大都市地区，而内陆地区的平均召唤率为 35%。

表133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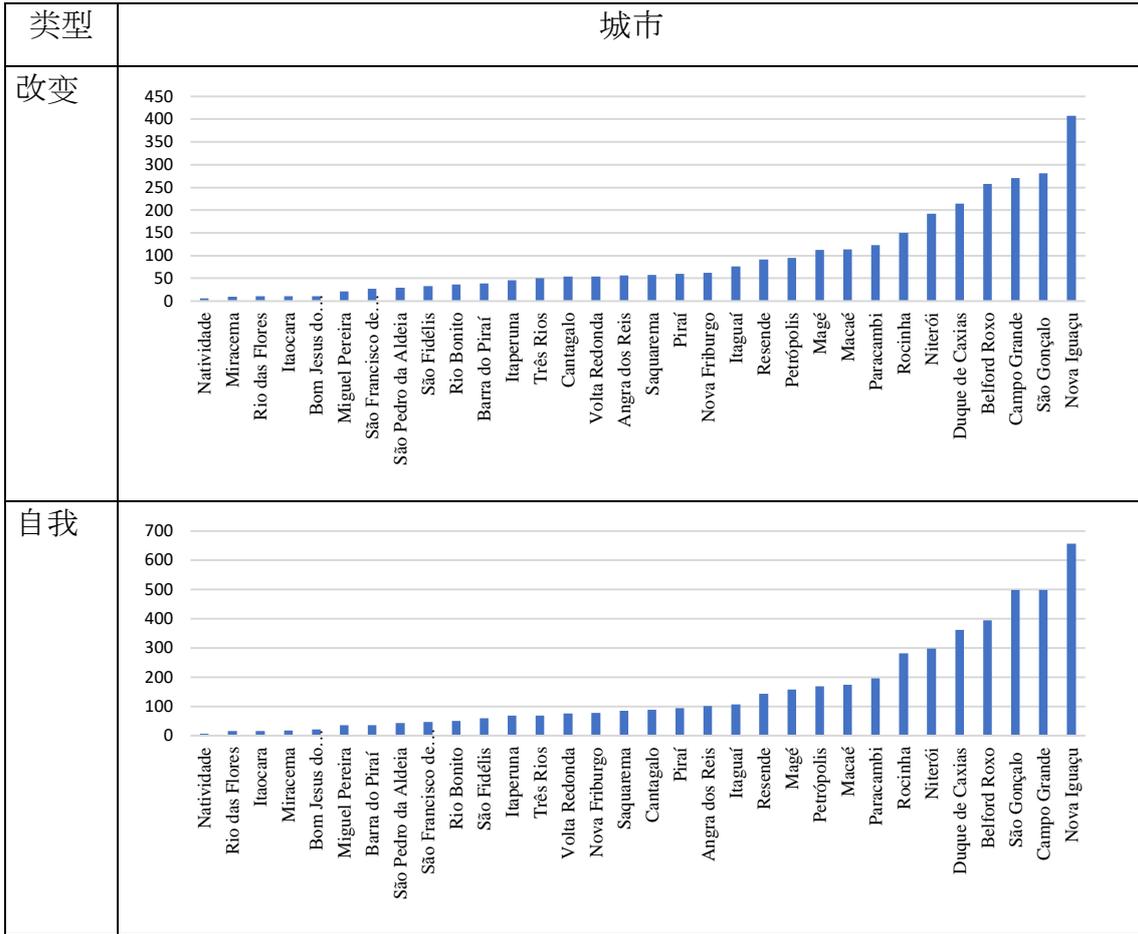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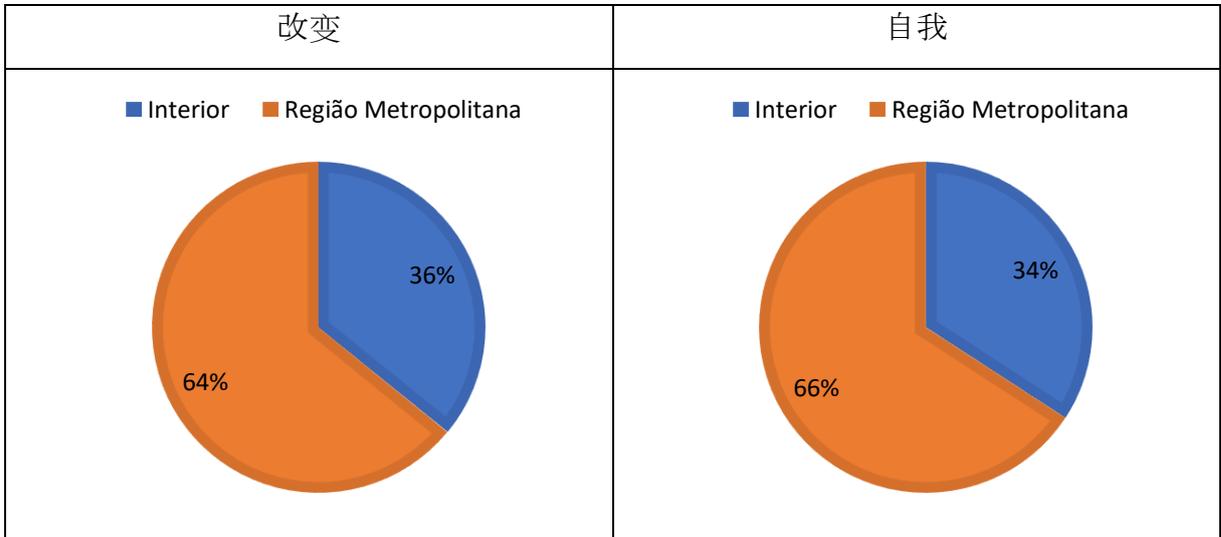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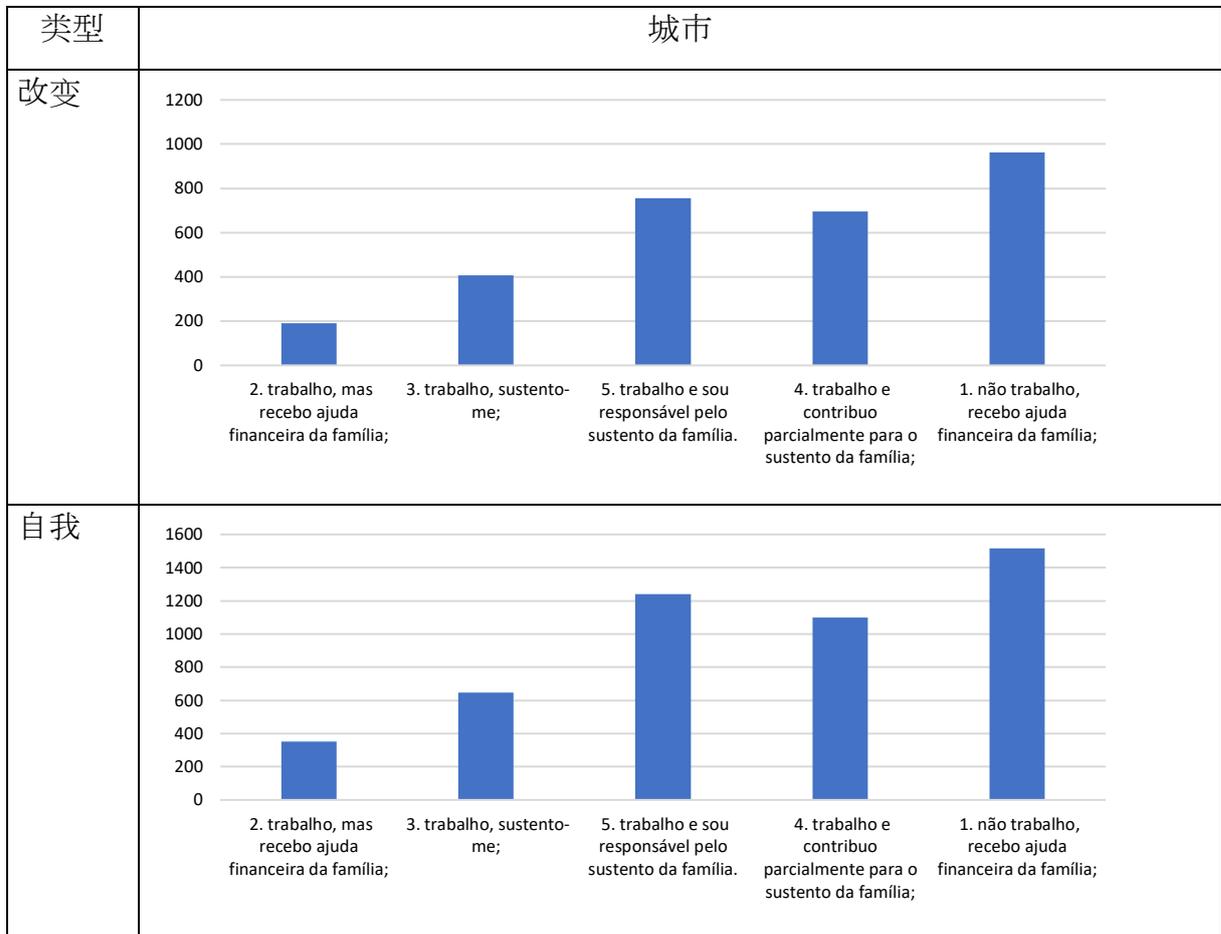


表134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经济



唤起"经济"一词的人，无论是否参与其家庭需要的赠款，主要依靠EGO和ALTE R（下表135），这说明确了对财务问题的关注的有力理由。以下是完全或部分提供者的召唤。

表135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经济



4.3.7 阿戈拉设施

在讨论安讯士1中提出的痛苦清单中可以看到对这种痛苦的分析，它涉及被理解为可疑或模棱两可含义的词语的召唤。

4.3.8 阿戈拉灵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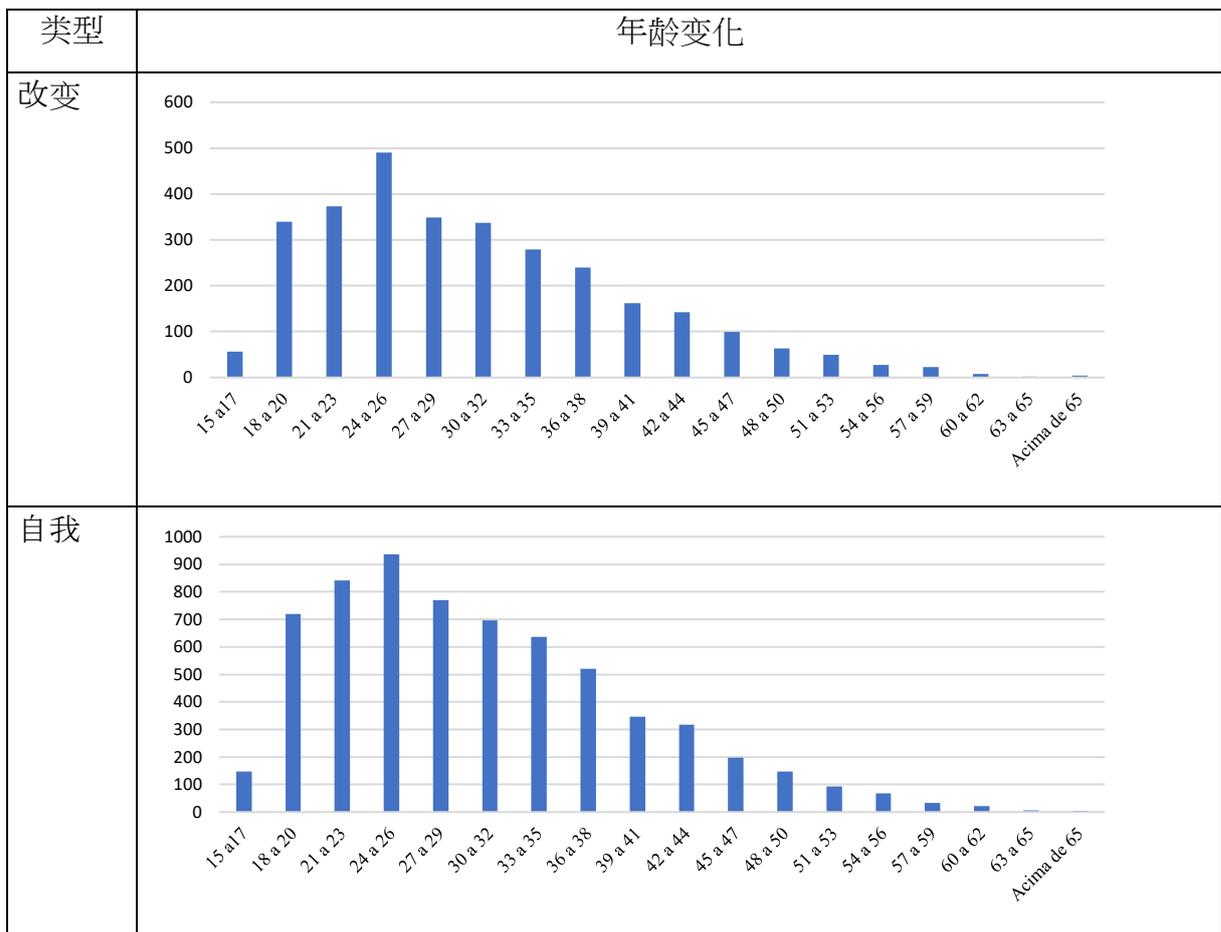
建立在"灵活性"一词的召唤基础上的agara的构建表明，THE的这种可能的质量主要由EGO来感知，而较少归因于ALTER，正如我们在下面的表136中看到的。EGO中的召唤次数是ALTER的两倍多。

表 136 - EGO 和阿尔特职业 - 阿戈拉灵活性

阿戈拉	人
自我	6667
改变	3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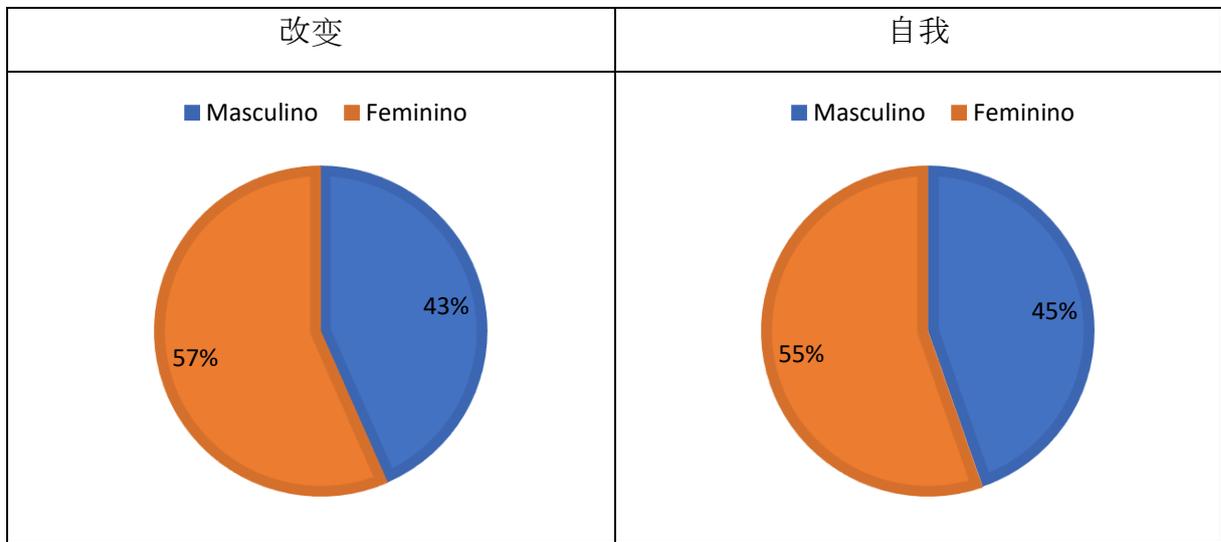
这些"灵活性"的召唤是由大多数年轻人提出的，他们来自EGO和ALTER，如下表137所示。在这两种情况下，相似性都很明显，在24至26岁之间的高峰期，根据被调查者的年龄，这一程度有所下降。

表137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灵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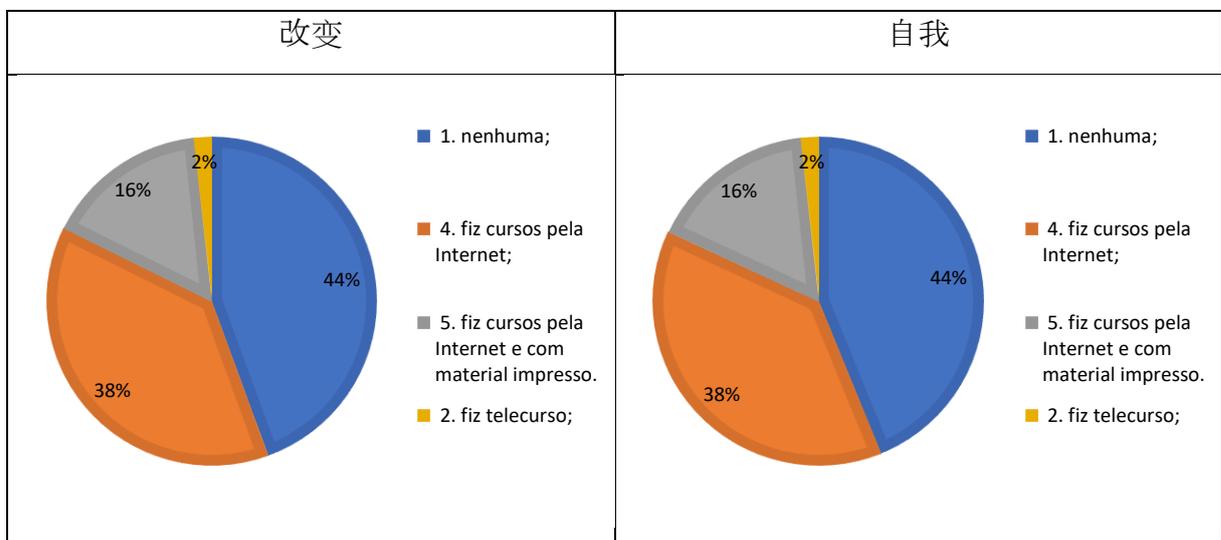
关于提出"灵活性"一词的答复者的性别，我们观察到，正如我们在下表138中看到的，大多数是EGO和ALTER中的妇女。

表138 - 性别 - 阿戈拉灵活性



44% 的唤起这个词的人从未接触过远程教育，无论是在与 Ego 相关的提及中，还是在改变中，（如下图 139 所示）。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互联网课程与 EAD 有过接触。

表 139 - EAD 体验 - 阿戈拉灵活性



关于城市地理分布，无论是EGO还是ALTER，唤起"灵活性"一词的人都与里约热内卢市大都市区的市政当局有联系，如下表140所示，该州北部海岸的马卡市和雷森德市的外观较小。关于区域分布，与内陆地区相比，我们的大都市区普遍存在，如下表140所示。

表140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灵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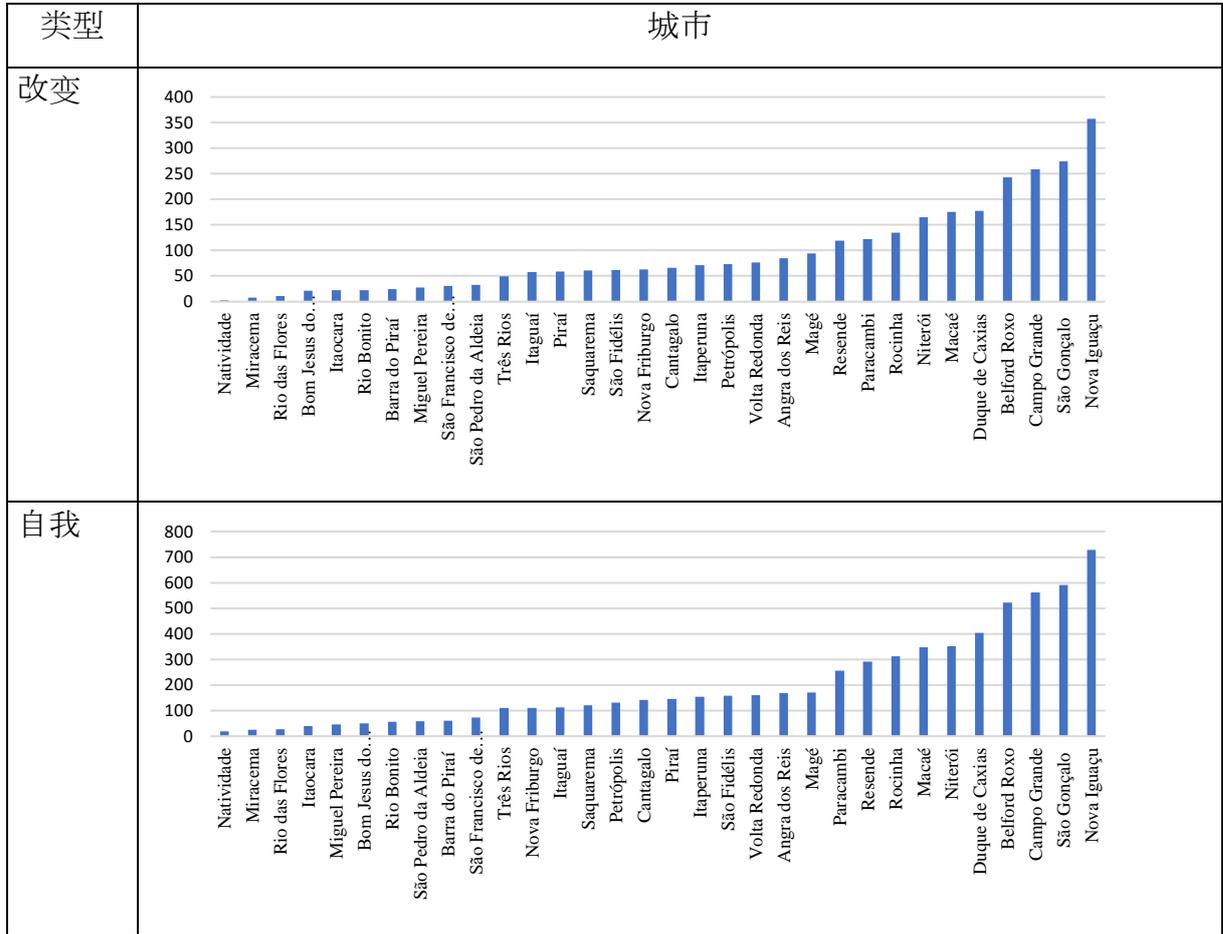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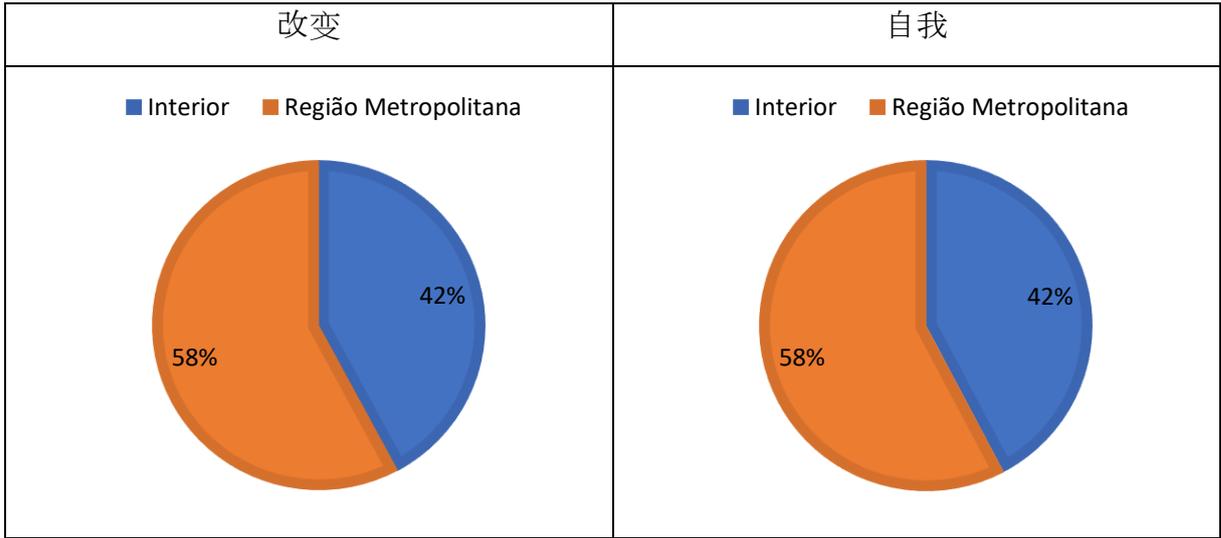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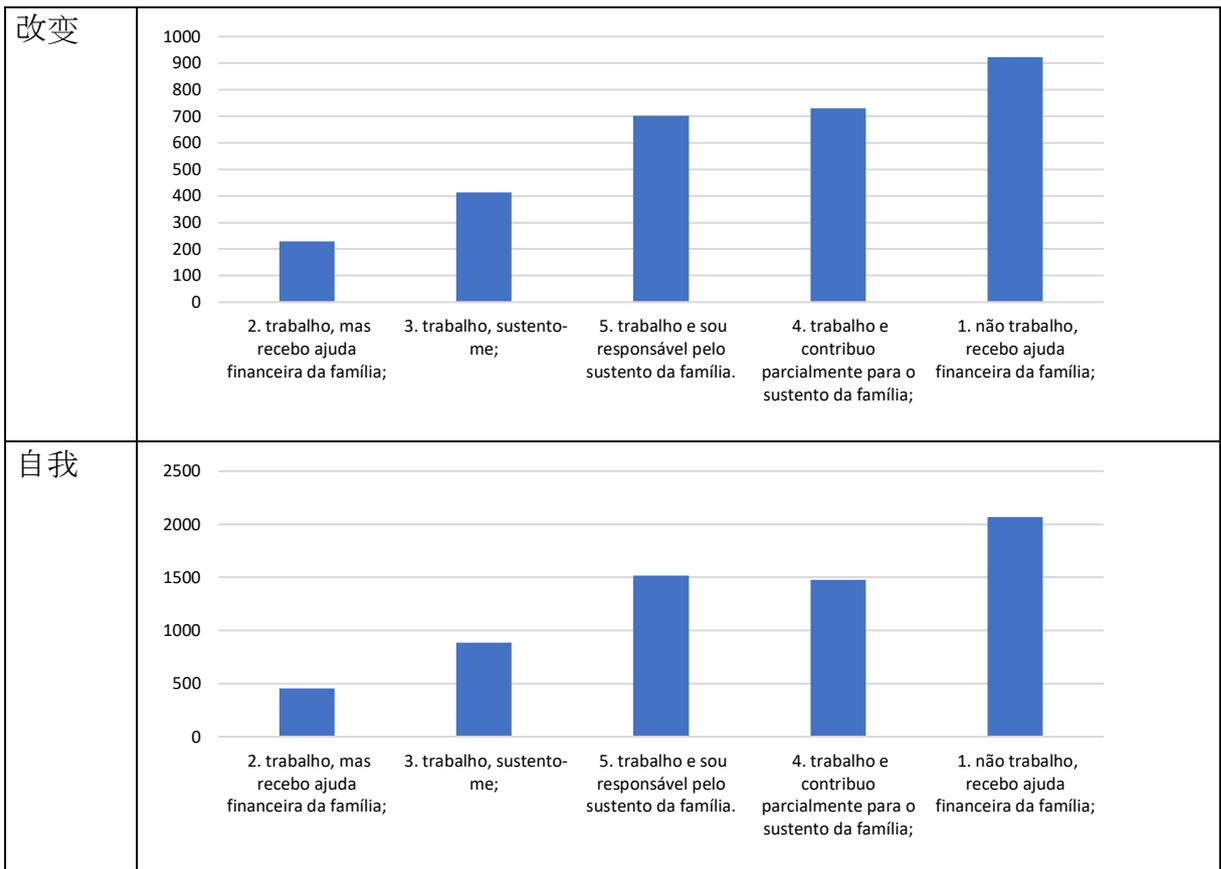


表141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灵活性



在大都市地区普遍存在的大多数提到"灵活性"一词的年轻人包括大多数失业人口，他们依靠家庭谋生，包括自我召唤和ALTER，如下图142所示。尽管如此，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整个或部分家庭的提供者。

表142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灵活性



4.3.9 互联网阿戈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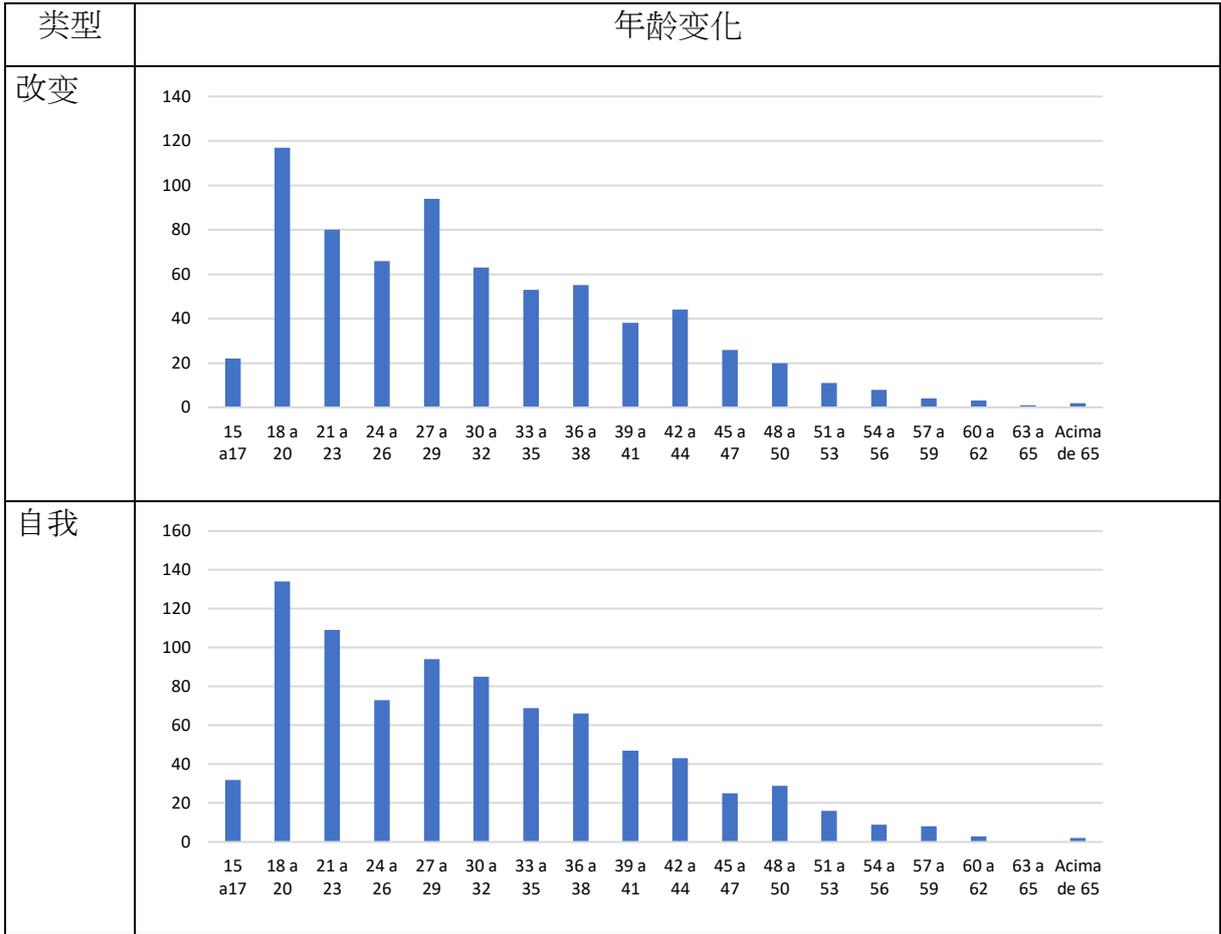
奇怪的是, "互联网"一词与其他被唤起的词相比, 在EGO和ALTER中都呈现了少量的发生, 尽管它们在第一个案例中出现得更多(下表143)。可以观察到, 在EGO中, 唤起互联网社会代表的人数比在ALTER中唤起的人多。

表143 - EGO和阿尔泰 - 阿戈拉互联网

阿戈拉	人
自我	858
改变	7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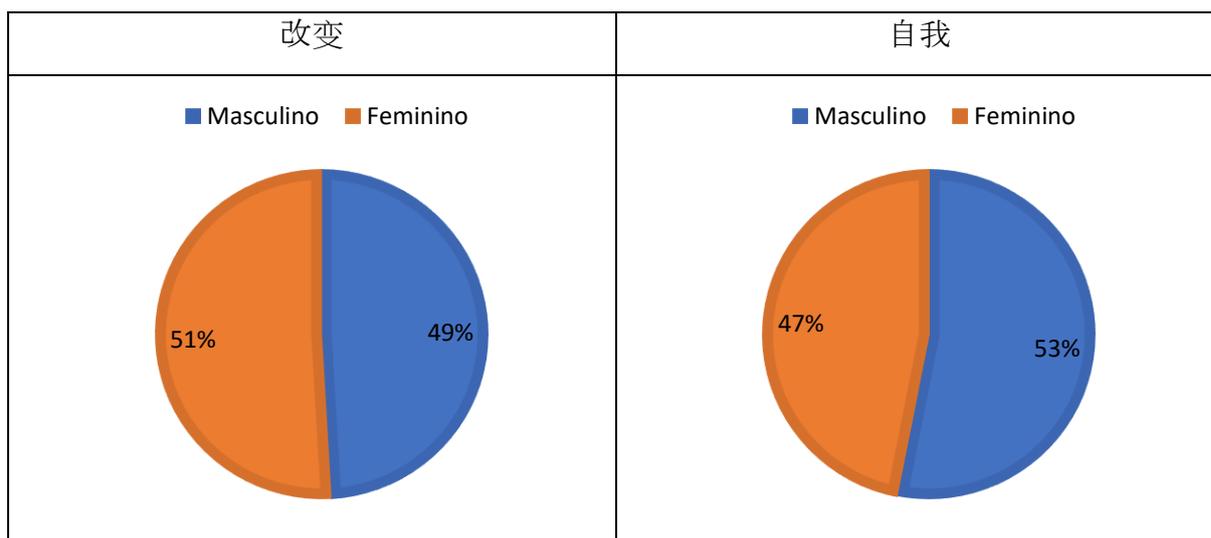
一旦青少年被移除, "互联网"的召唤就会在年轻人中显示出力量, 在18至20年中, 与EGO和ALTER相关的峰值, 如下图144所示。年龄有下降的趋势, 高峰期在21至23岁之间, 高峰期为27至29岁。

表144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互联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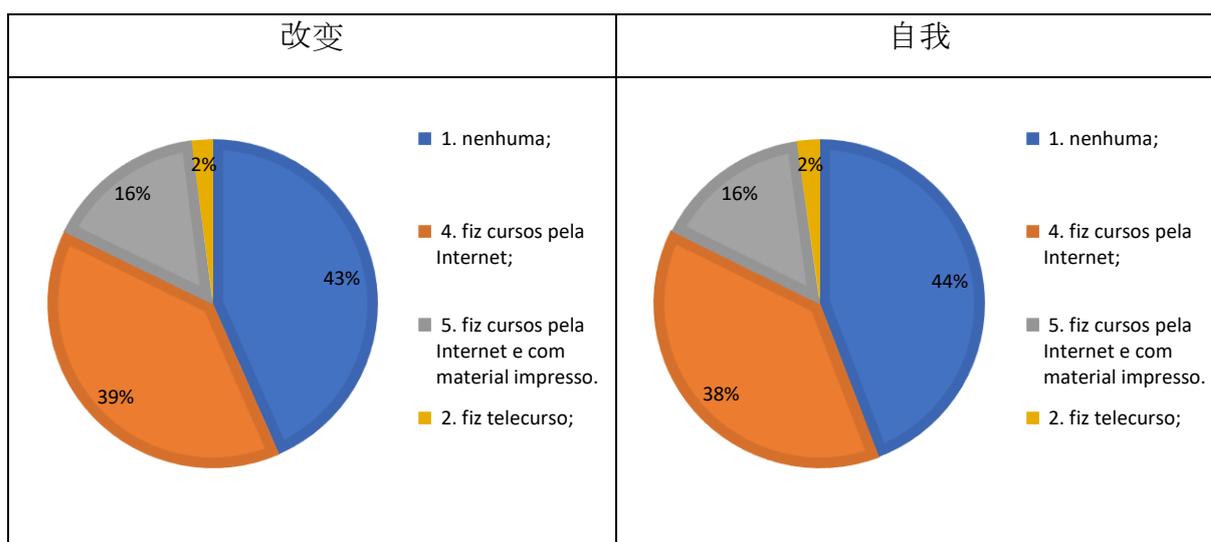
关于唤起互联网的人的性别，有一个反向平衡，如下表145所示。在那些离开EGO的召唤中，有一小部分人已经离开。然而，这种情况与ALTER的情况相反，因为ALTER占少数妇女的多数。

表 145 - 性 - 阿戈拉互联网



关于远程教育的经验，EGO和ALTER中"互联网"一词的召唤呈现了相似性和接近性，如下表146所示。在这种情况下，以前已经证实的趋势是，没有任何AE经验的人普遍存在，其次是通过互联网通过课程接触远程教育的人。

表146 - EAD体验 - 阿戈拉互联网



关于城市地理分布，我们看到在里约热内卢大都市区的EGO和ALTER城市中占优势，该州北部海岸的马卡埃出现"互联网"一词的召唤次数较少（如下表147）。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在表147，下面，关于区域地理分布，更多的召唤发生，无论是在EGO和ALTER，来自大都市区相比，内部。

表147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互联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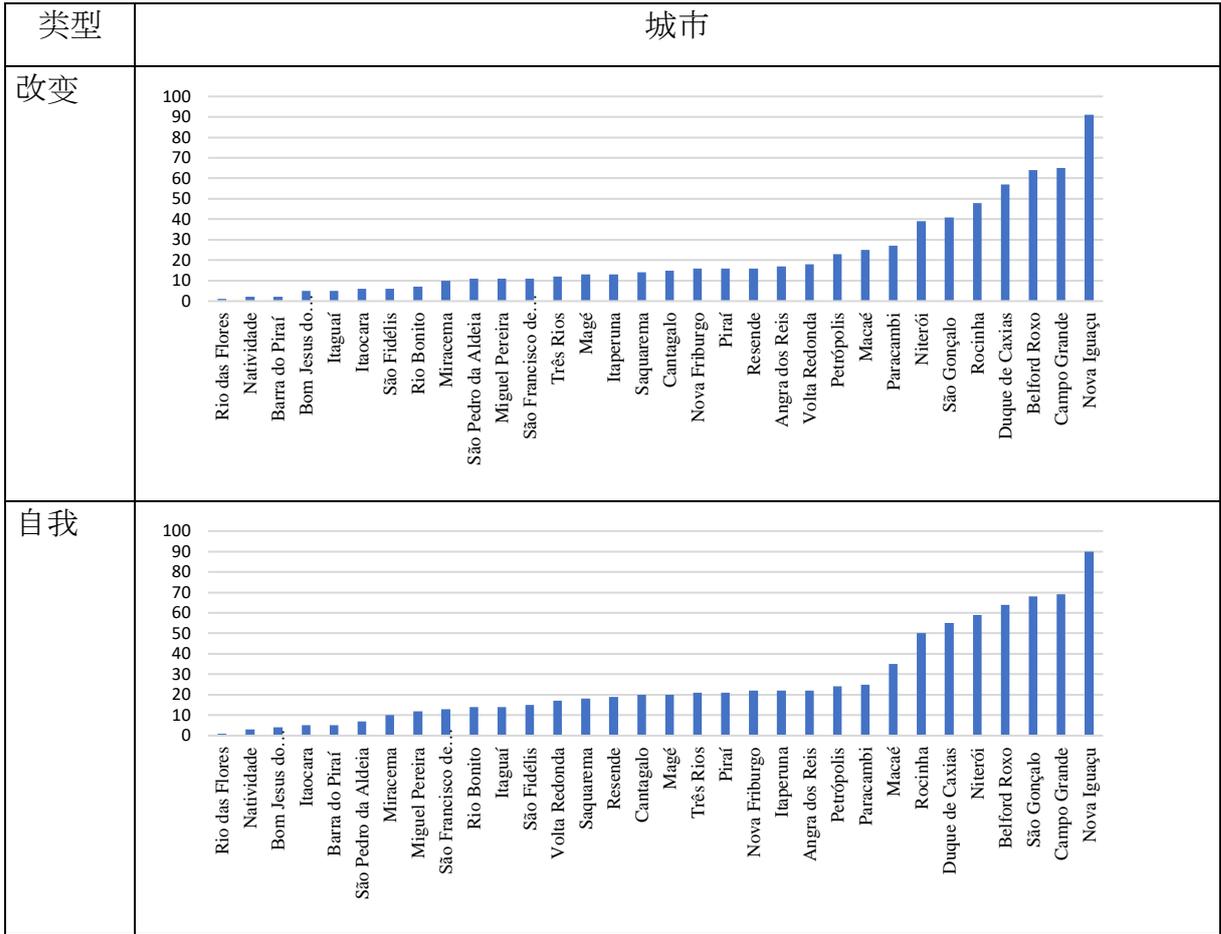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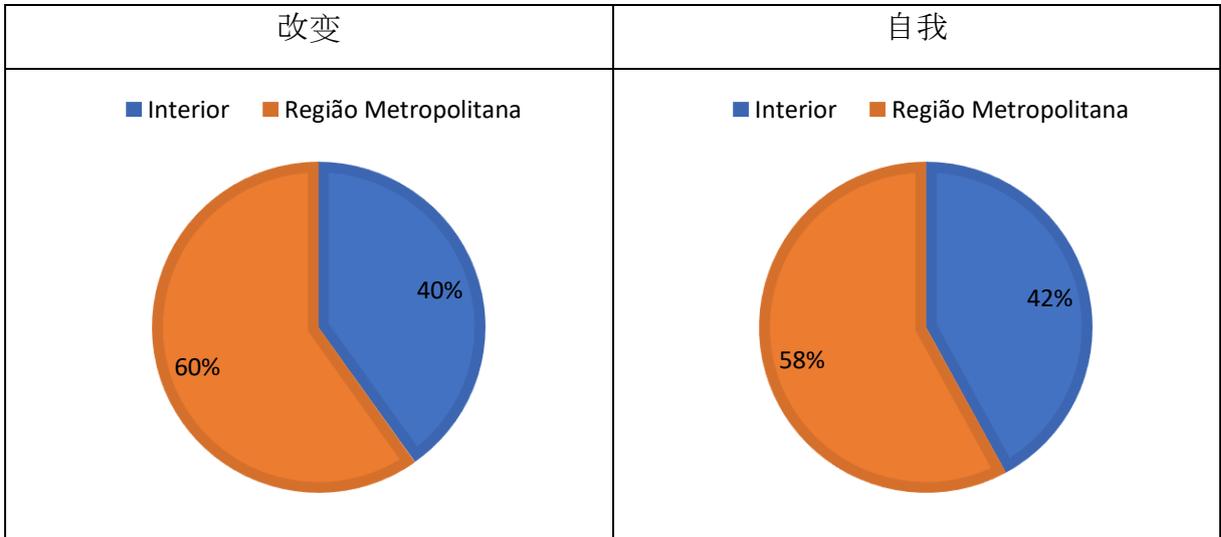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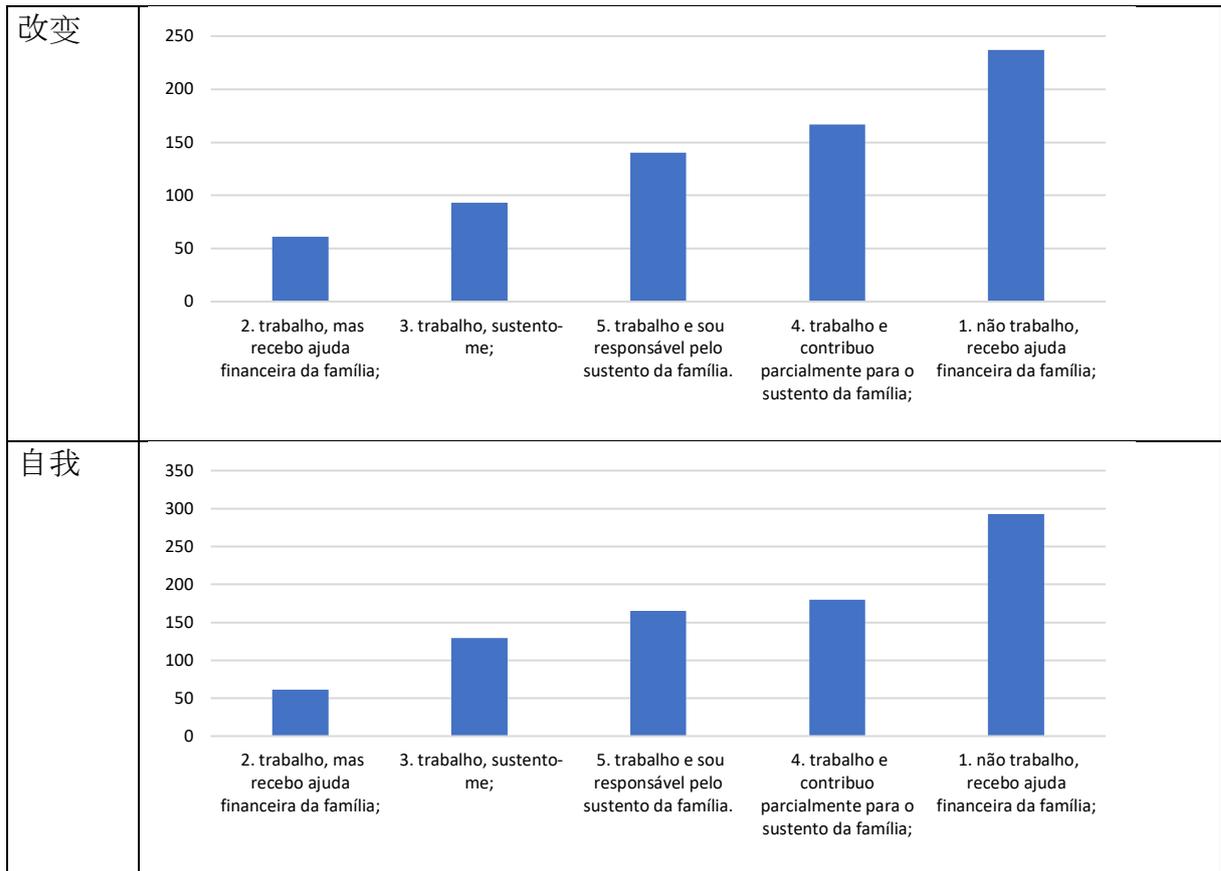


表148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互联网



与以前的“因特林”一词类似，“因特网”一词与依靠家庭的人有关，包括自我召唤和ALTER召唤（下表149），然后是对家庭负有全部或部分责任的人的召唤。

表149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互联网



4.3.10 阿戈拉的预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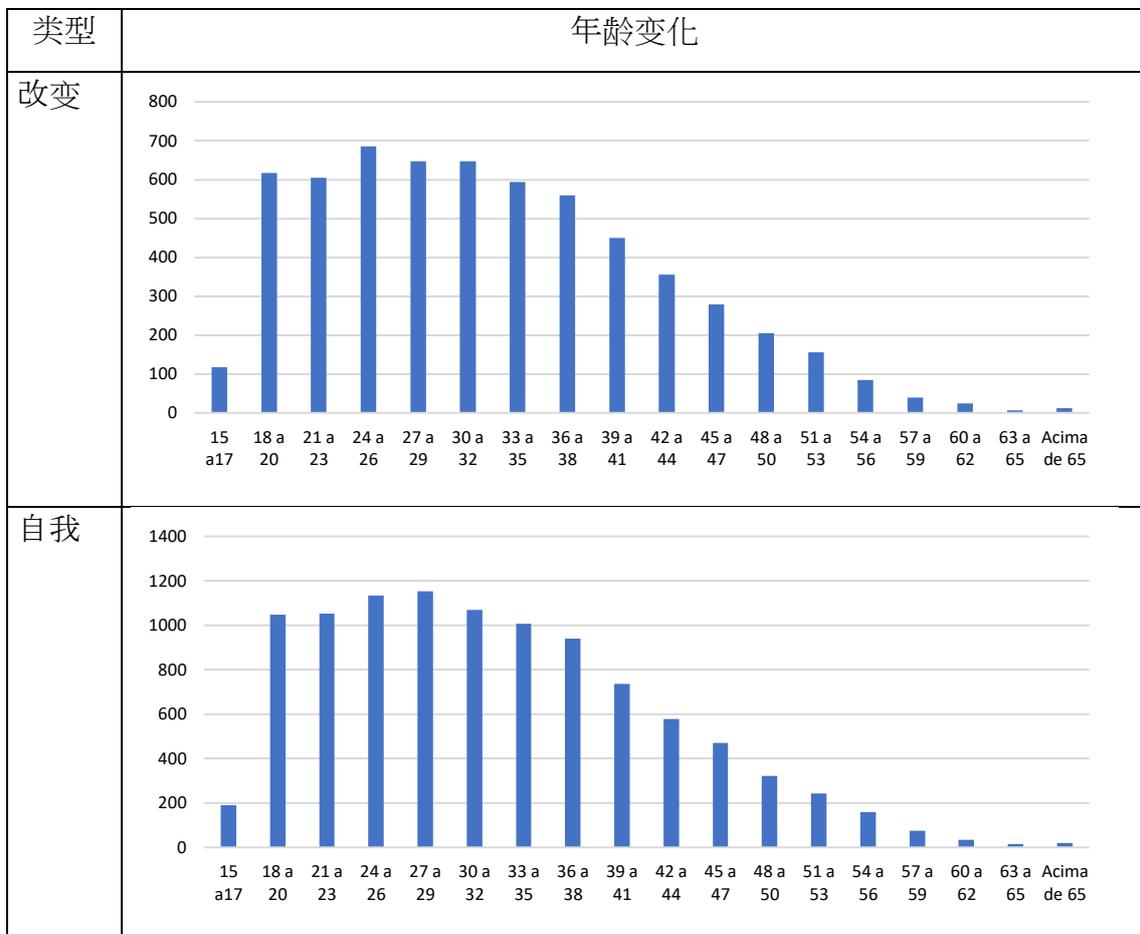
"机会"一词的召唤所形成的"阿戈拉"无疑是我们研究的一万多名受访者中引用最多的，他们将其与EGO有关，正如我们在下面的图表150中所强调的那样。对于ALTER来说，它也影响大量的召唤。还应当指出，在ALTER中，虽然它不是引用最多的，但它是前50名之一。

表 150 - EGO 和阿尔特职业 - 阿戈拉机会

阿戈拉	人
自我	10539
改变	62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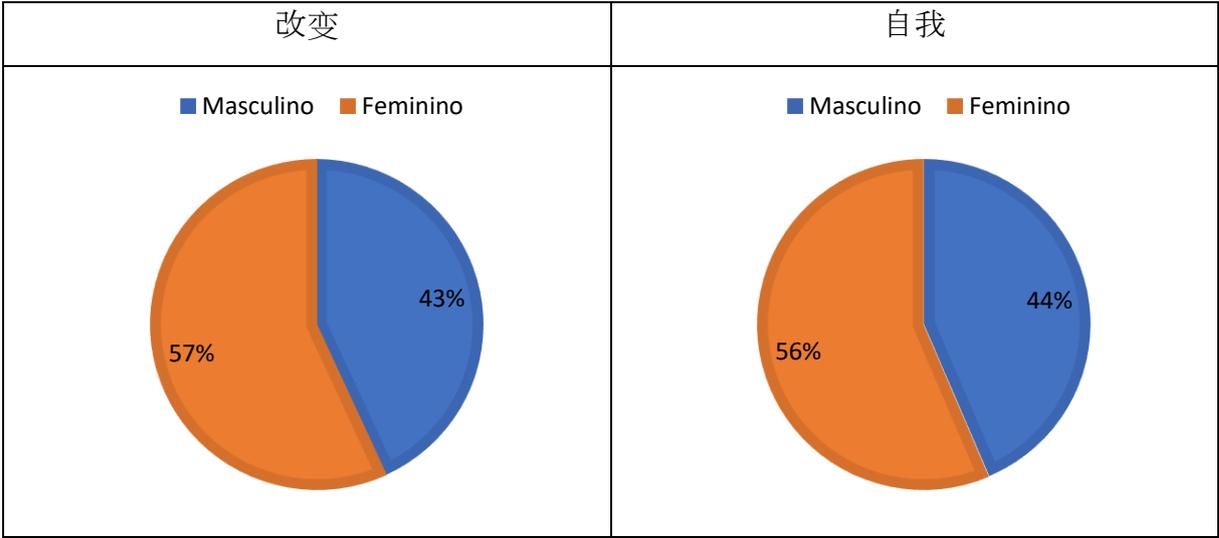
关于年龄差异，我们可以肯定，在EGO和ALTER中，“机会”一词的召唤分布于我们可以称之为“广泛青年”的20年，从18岁到38岁，接下来会减少。正如我们在下表151中看到的，在EGO中，年龄在27到29岁之间，而在ALTER中，年龄在24到26岁之间。

表151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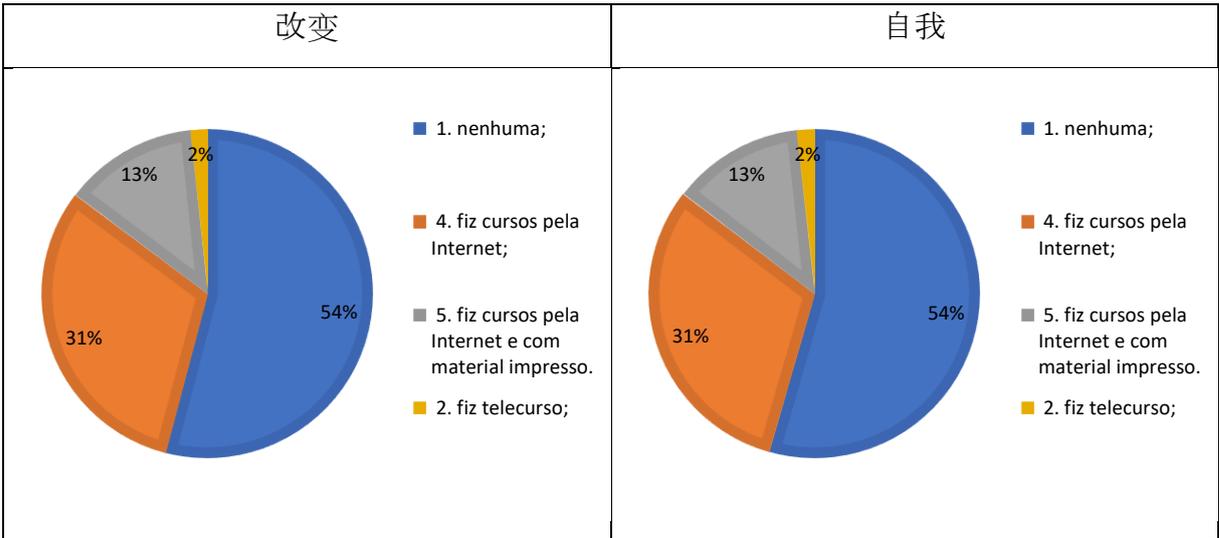
关于性，我们可以注意到EGO和ALTER在召唤“机会”一词时取得平衡，正如我们在下图152中所看到的那样，大多数妇女都是如此。

表152 - 性 - 阿戈拉机会



在关于远程教育经验的"机会"一词的召唤中，我们再次有一个相似性效应（下表153），早前已经观察到。虽然我们发现有大量人通过互联网参与远程教育过程，但没有以前使用 AEd 经验的人非常普遍。

表153 - EAD经验 - 阿戈拉机会



关于在EGO和ALTER的市级地理分布中唤起"机会"一词，前一种趋势是重复的，里约热内卢大都市区的城市占主导位置（下表154）。在这种情况下，如图154所示，下面还有来自大都市地区的人在EGO和ALTER中对内陆地区的普遍召唤。

表154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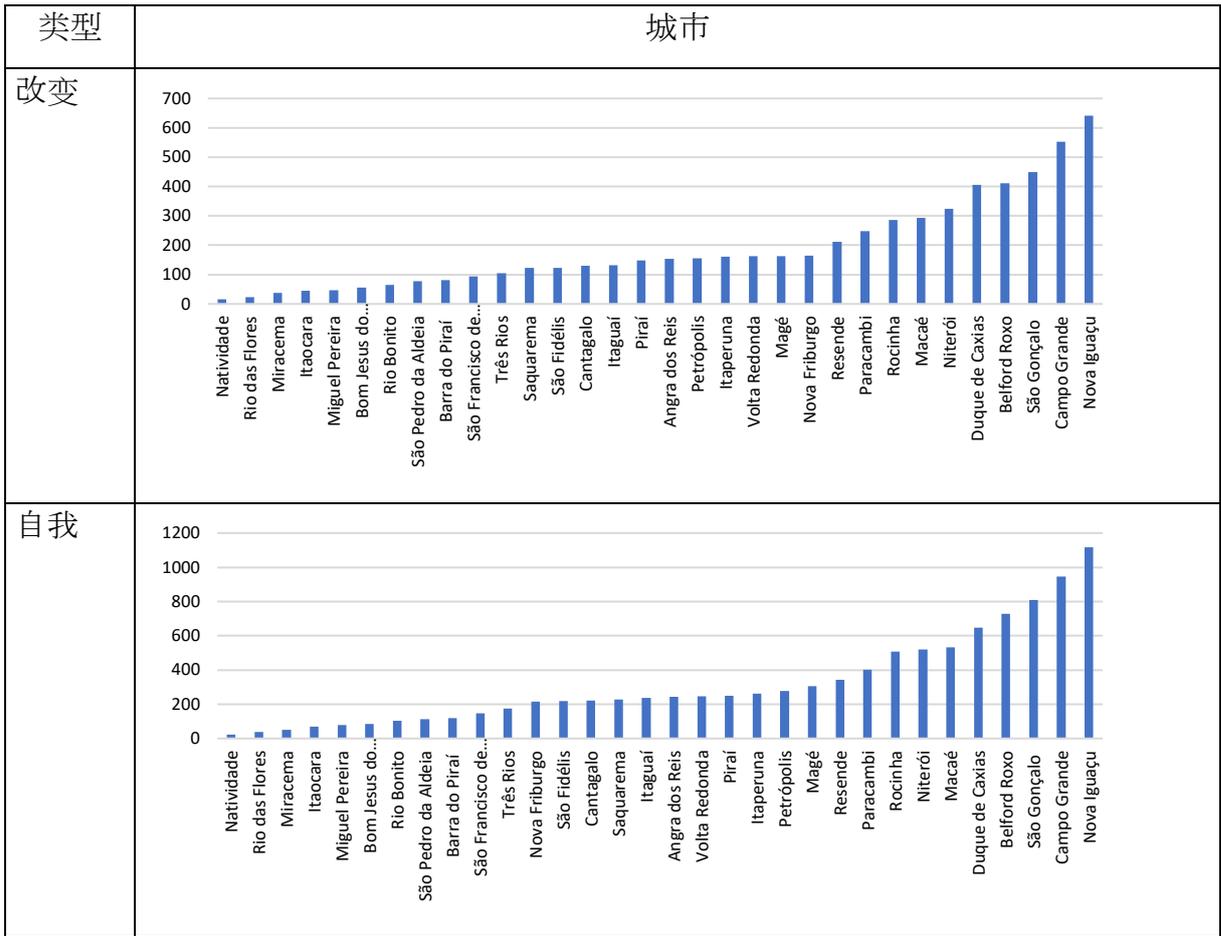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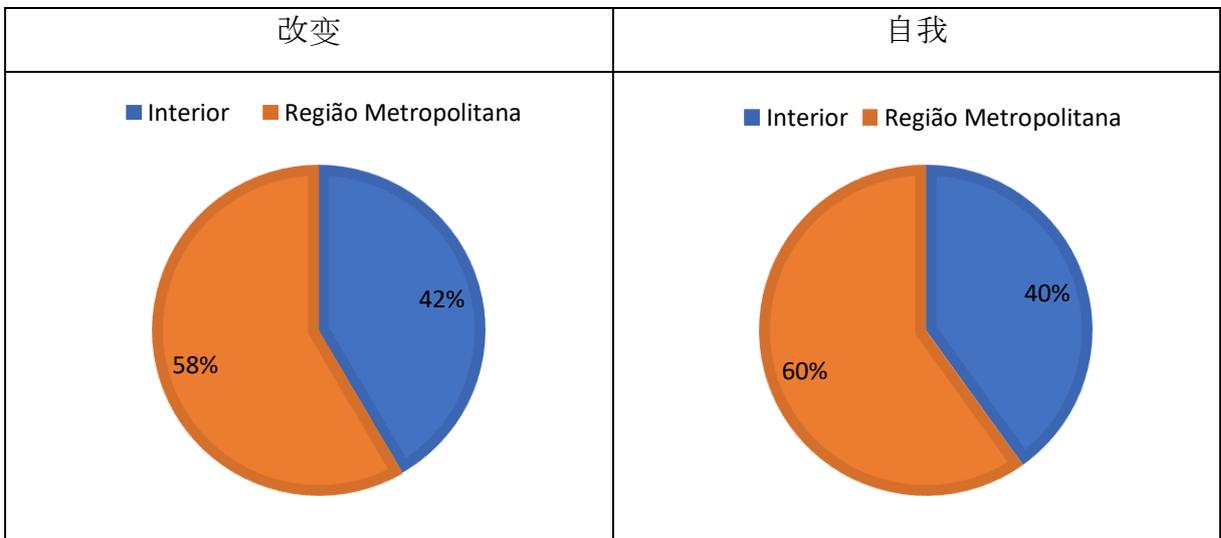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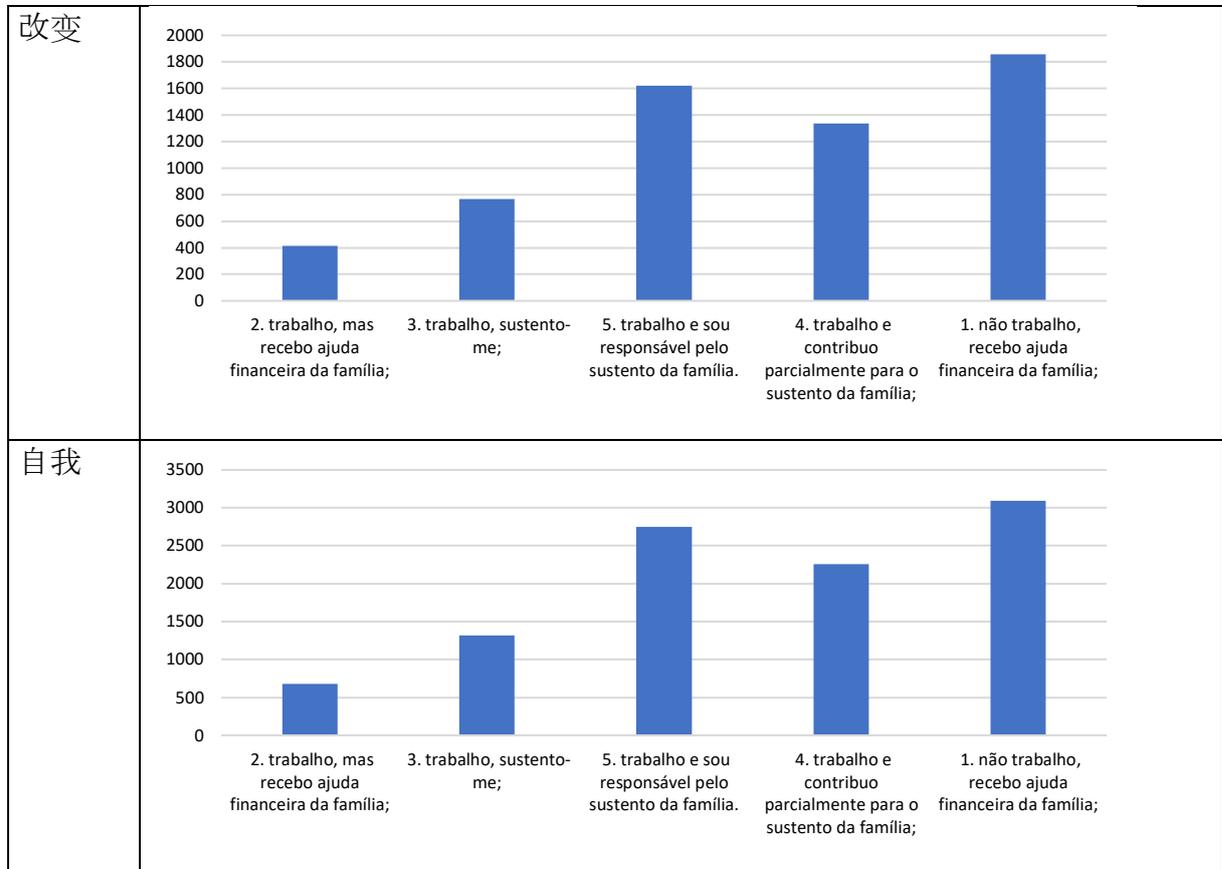
表155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机会



在经济参与方面，主要由经济困难的人提出"机会"，他们依靠家庭，尽管有其他人的积极参与，这些人在自我和ALTER召唤中都对它们负有责任，如下图156所示）。

虽然重量较小，但还是值得一提，我们唤起了部分对其家庭负有责任的人提出的"机会"一词。

表156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机会



4.3.11 阿戈拉实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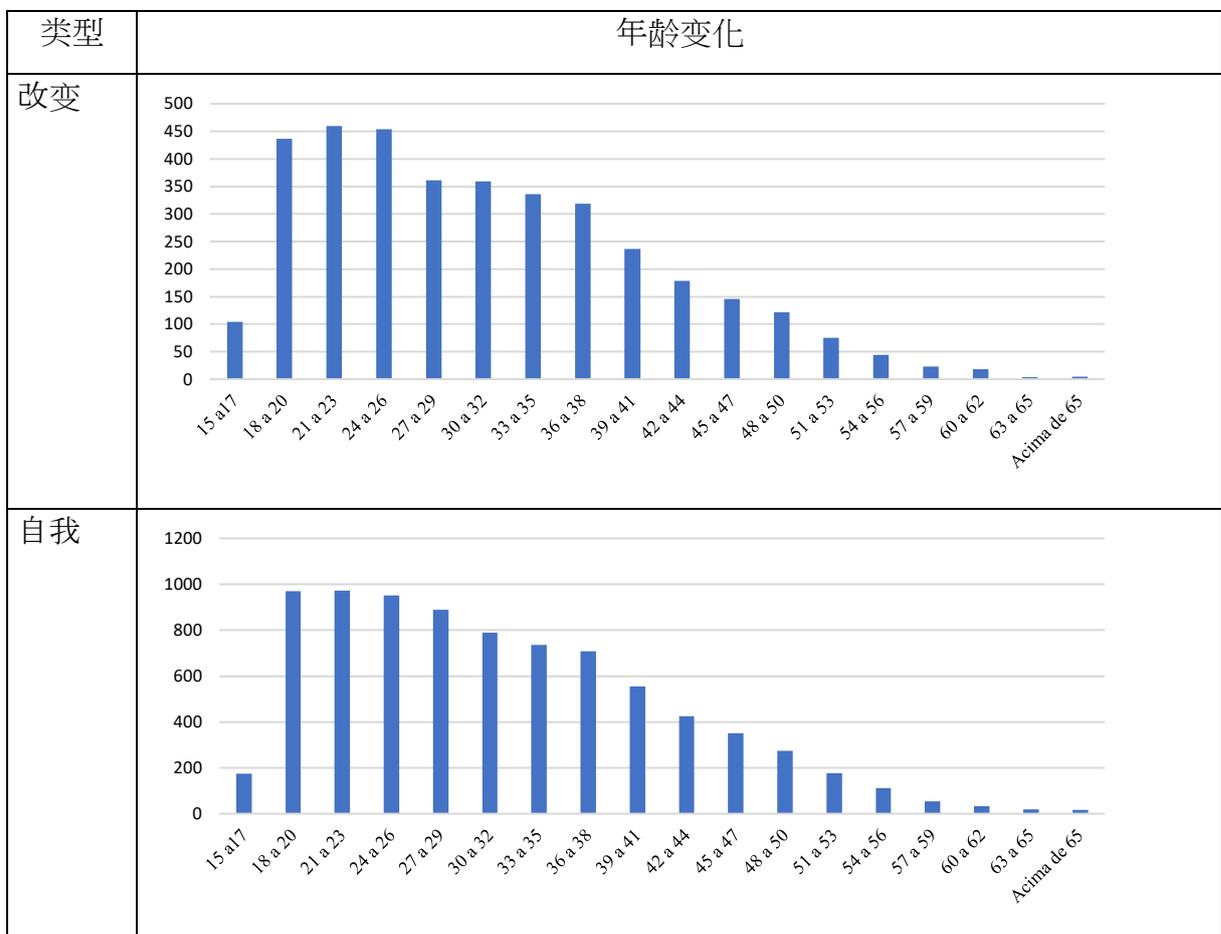
与上一个词一样，从"实用性"一词的召唤中构建起来的"阿戈拉"，提供了大量提到它的人。从EGO的角度来看，那些唤起的只是变化的两倍多，正如我们在下表157中看到的)。

表 157 - 自我和改变使命 - 阿戈拉实用性

阿戈拉	人
自我	8384
改变	37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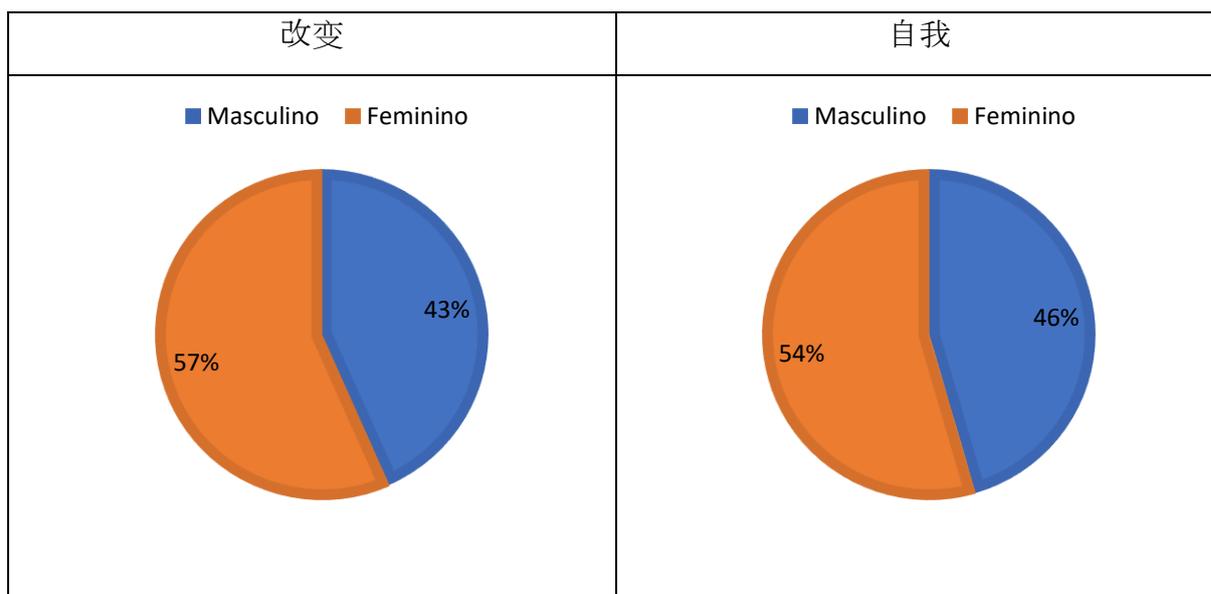
可以观察到，在EGO和ALTER中，在唤起其他阿戈人时，青年流行程度的年龄差异与青年的流行程度相同。虽然它从18岁更有力地限制自己到26岁，后来减少（在EGO中更温和，在ALTER更突然），但"实用性"一词的召唤服从，正如我们在下表158中看到的，年龄逻辑在27年后减少。

表158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实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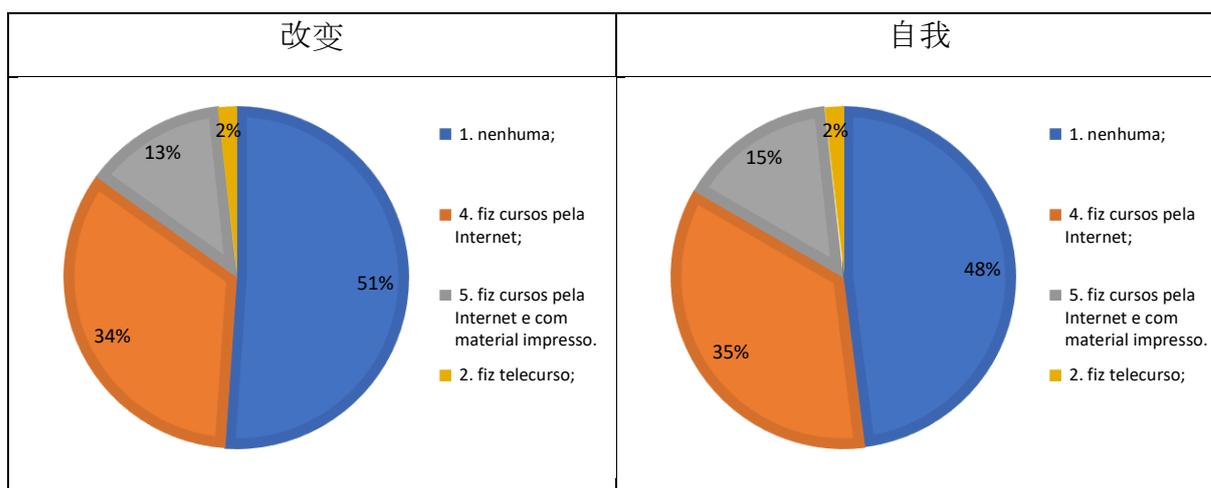
关于唤起"实用性"一词的人的性别，坦率的大多数妇女出现在男人面前，如下图159所示。

表159 - 性 - 阿戈拉实用性



关于远程学习的经验，在EGO和ALTER中，从未进行过任何远程学习经验的人，如下表160所示，在"实用性"一词的召唤下，形成了一种痛苦。与以前研究过的阿戈拉斯一样，有相当比例的人通过互联网学习课程。

表160 - EAD体验 - 阿戈拉实用性



现在，让我们来提一下，在EGO和ALTER中，城市地理分布中，有来自城市的实用性召唤。这里重复了里约热内卢大都市区城市流行的趋势，人们在那里唤起了"实用性"一词（下图161）。此模式再次出现在下图 161 中，其中我们介绍了 EGO 和 ALTER 中的区域地理分布，显示了与内陆区域相比大都市区的流行程度。

表161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实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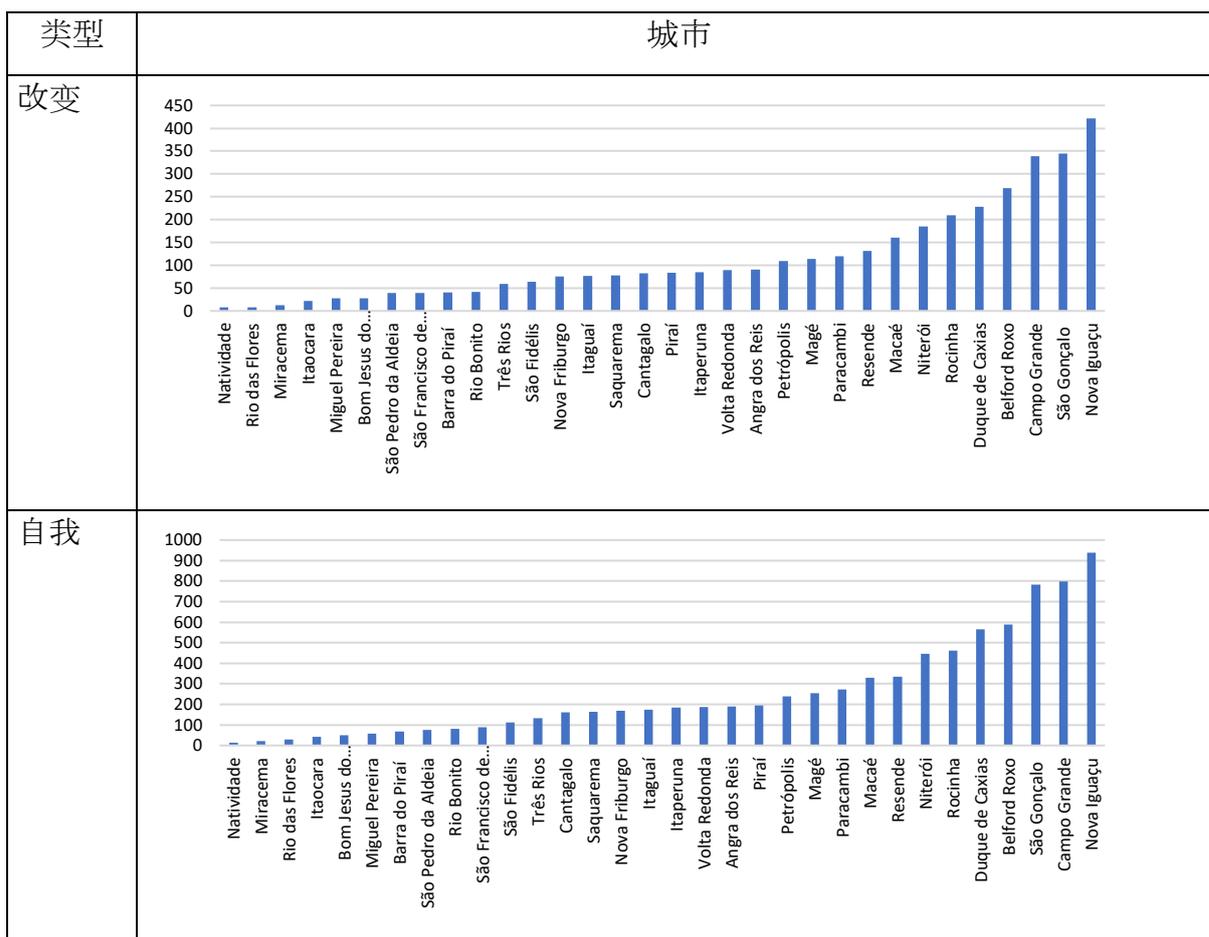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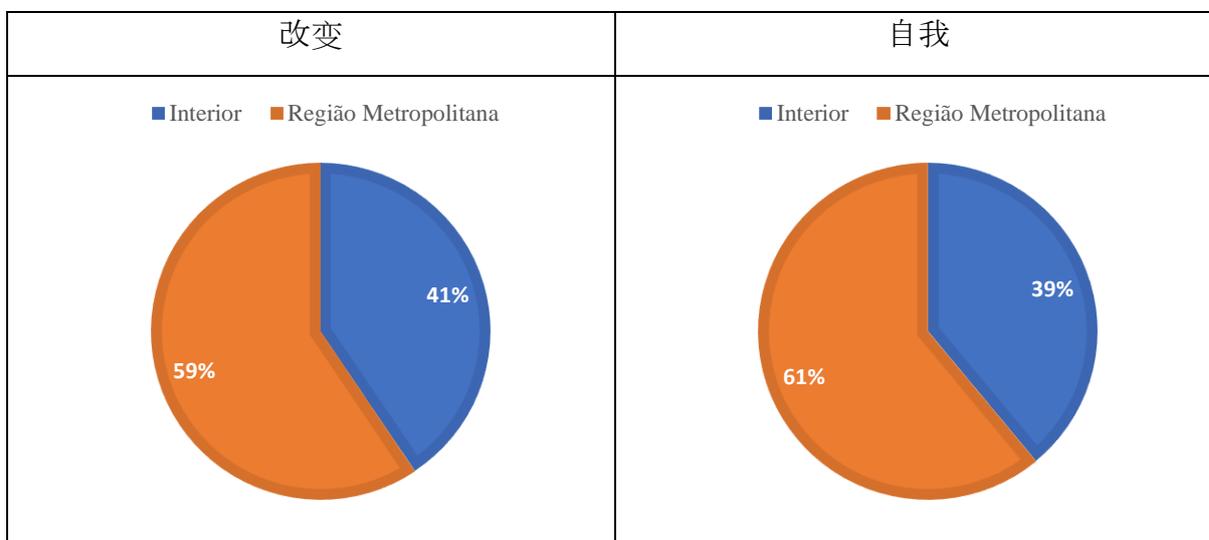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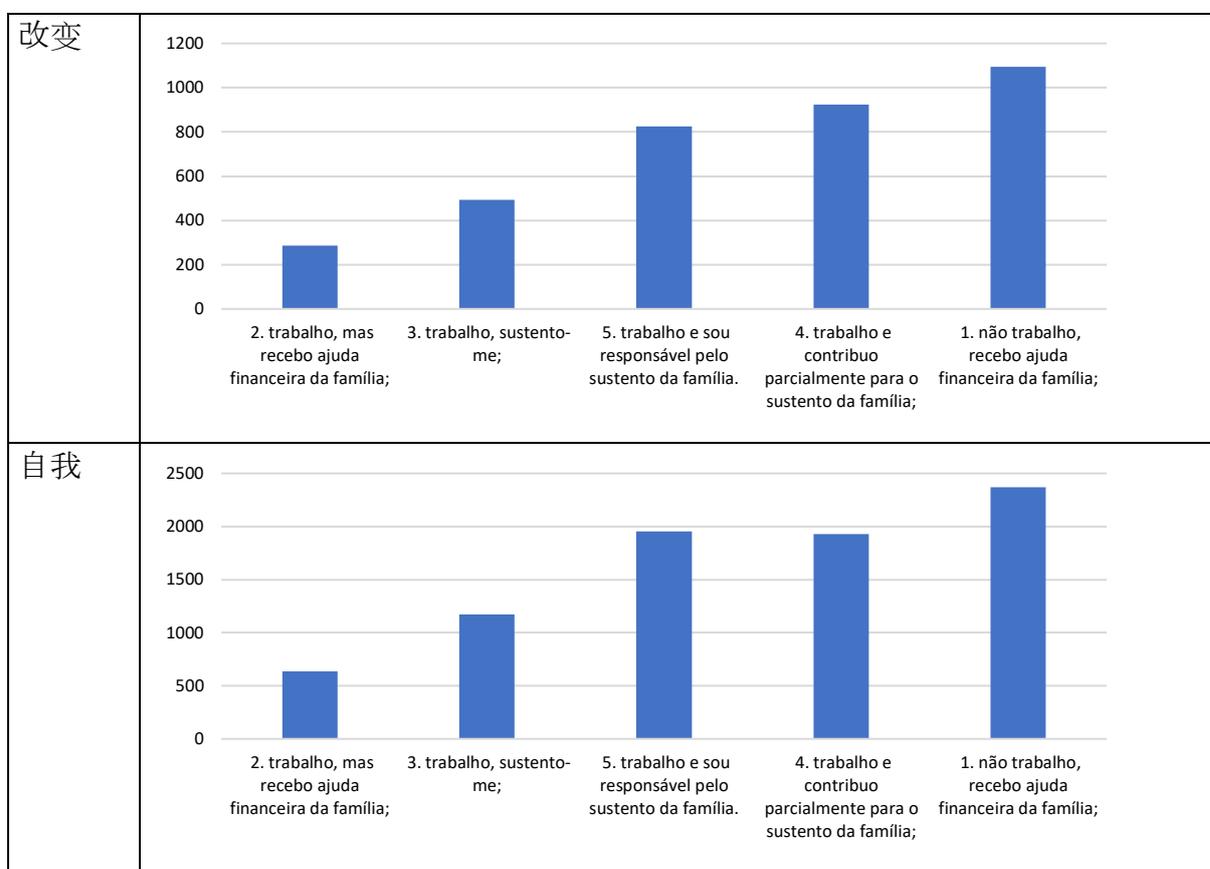


表162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实用性



关于家庭的经济参与，我们在EGO和ALTER中观察到，在"实用性"一词的召唤中，通知那些没有维持生计和依靠家庭的人。然而，正如我们在下表163中看到的那样，部分或全部为家庭收入缴款的人数并非微不足道。

表163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实用性



4.3.12 阿戈拉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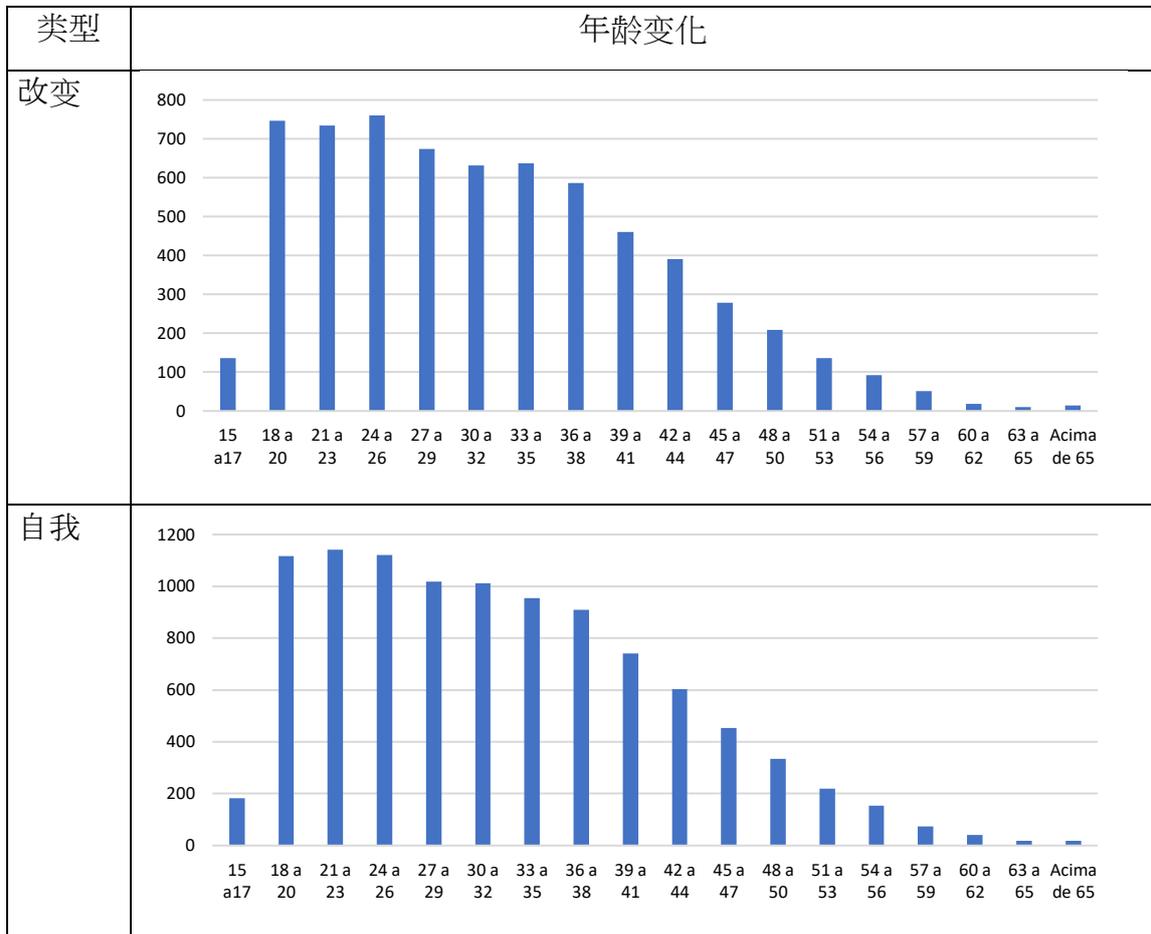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时间"一词也是引用最多的词之一，特别是与EGO有关，如下图164中可见一斑。唤起对方所关心的时间思考问题的人的数量也非常有表现力。

表 164 - EGO 和阿尔特 - 阿戈拉临时

阿戈拉	人
自我	10372
改变	6772

关于阿戈拉节奏的年龄变化，我们注意到分布比迄今为止研究的所有其他阿戈拉要广泛得多，这是年轻人和成年人所关心的问题，尽管由于所研究的人口影响，这些变化较少。在 EGO 和 ALTER 中，都可以观察到这种对时间的关注的扩散（下图 165）。应当指出，它在 EGO 中比在 ALTER 中更为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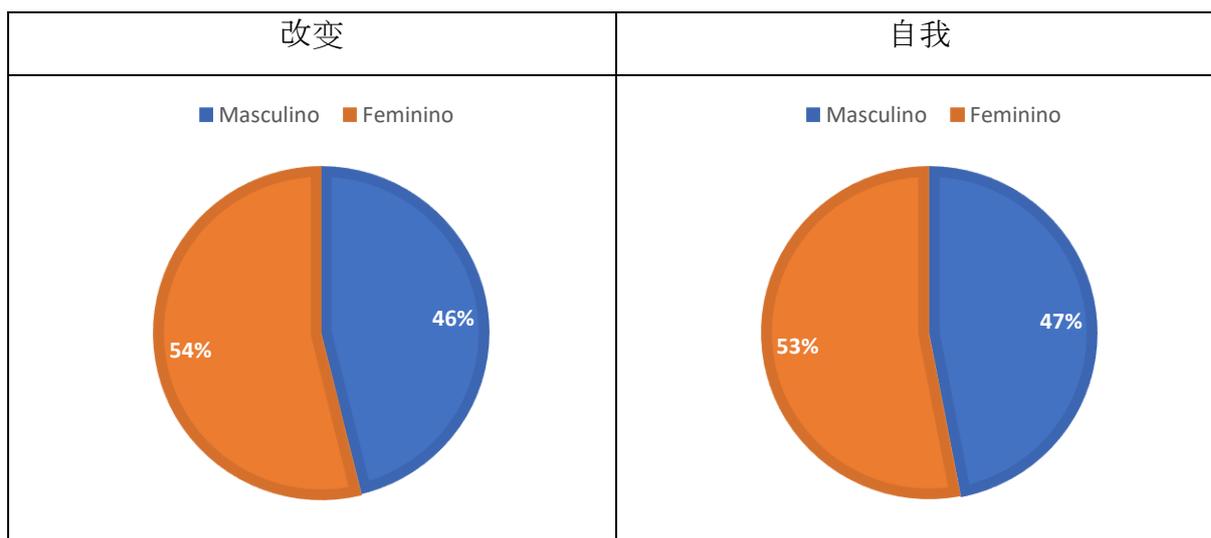
表165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坦波



关注时间的效果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分享，但他们是最后一个最能唤起这个词的人，他们指的是"缺乏时间"可能的社会表现。在表166中，下面我们说明了这两个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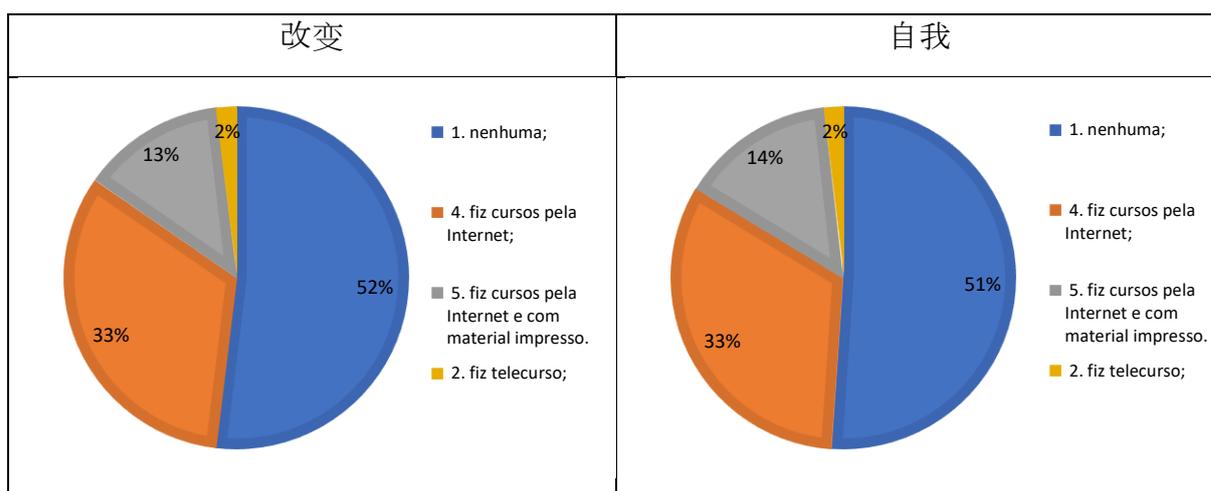
。

表166 - 性 - 阿戈拉·坦波



与迄今为止研究的大多数案例一样，唤起"时间"一词所产生的"时间"一词，重复了在EGO和ALTER中对AE经验的无知模式（如下表167）。与上一个案例一样，许多唤起这个词的人已经通过互联网学习了课程。

表167 - 与EAD的经验 - 阿戈拉临时



与"时间"一词的召唤有关的市级地理分布重复了我们研究的几乎所有痛苦趋势。在EGO和ALTER，来自里约热内卢大都市区的人们更关心天气，尤其是新伊瓜苏（下图168）。区域地理分布证实了EGO和ALTER的趋势，主要是引起人们对大都市区时间的关注，而不是下面表168所示的内陆地区。

表168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坦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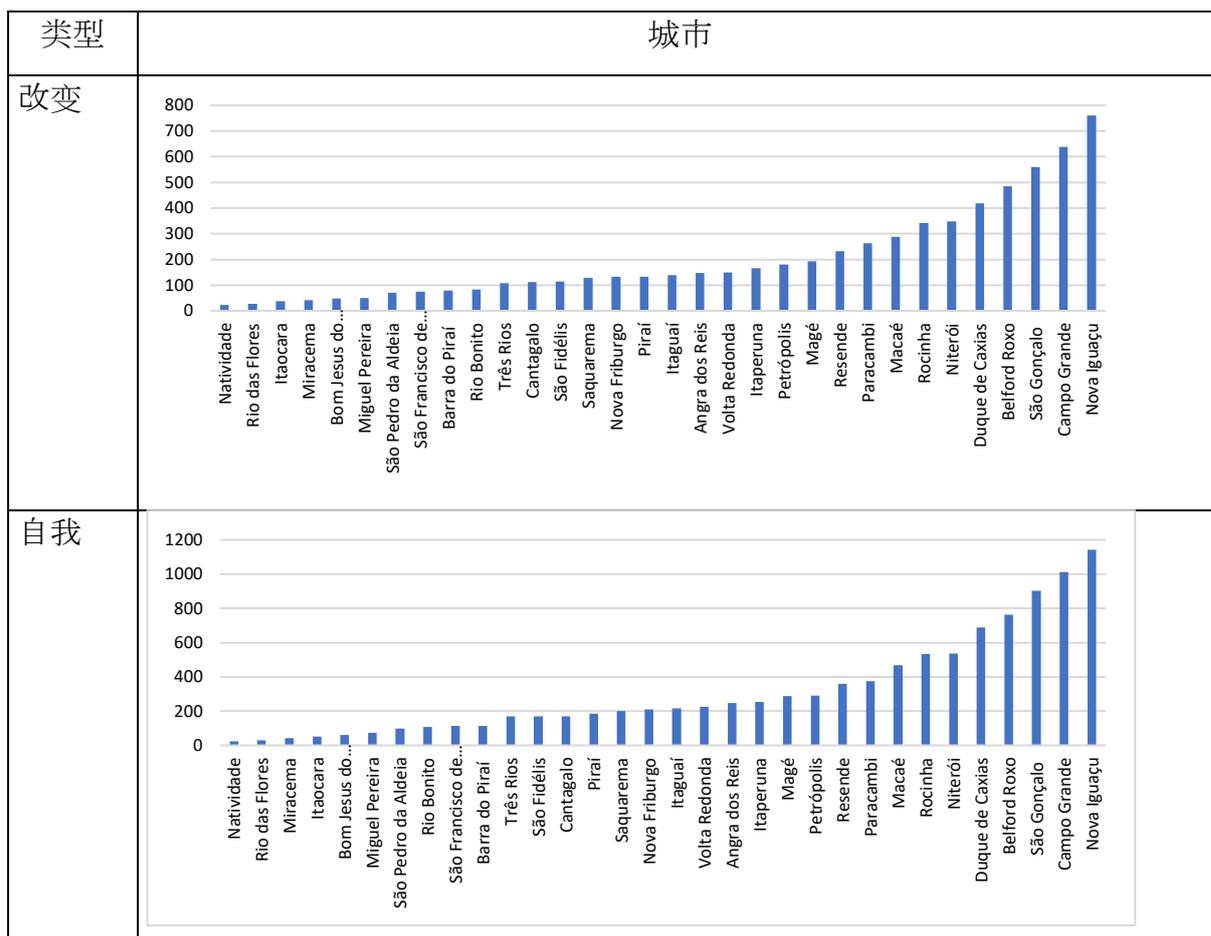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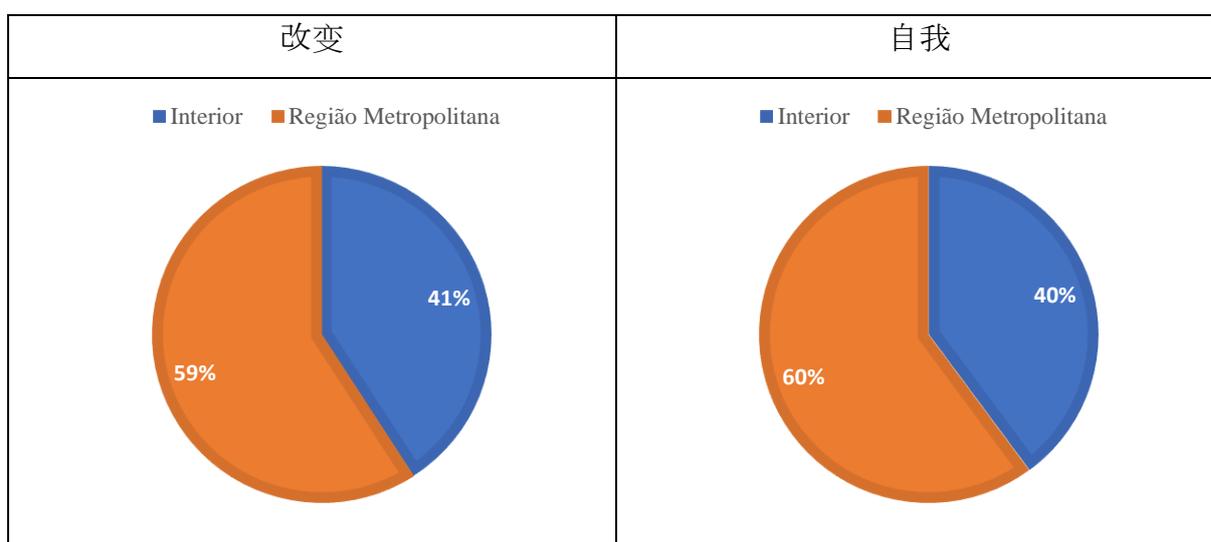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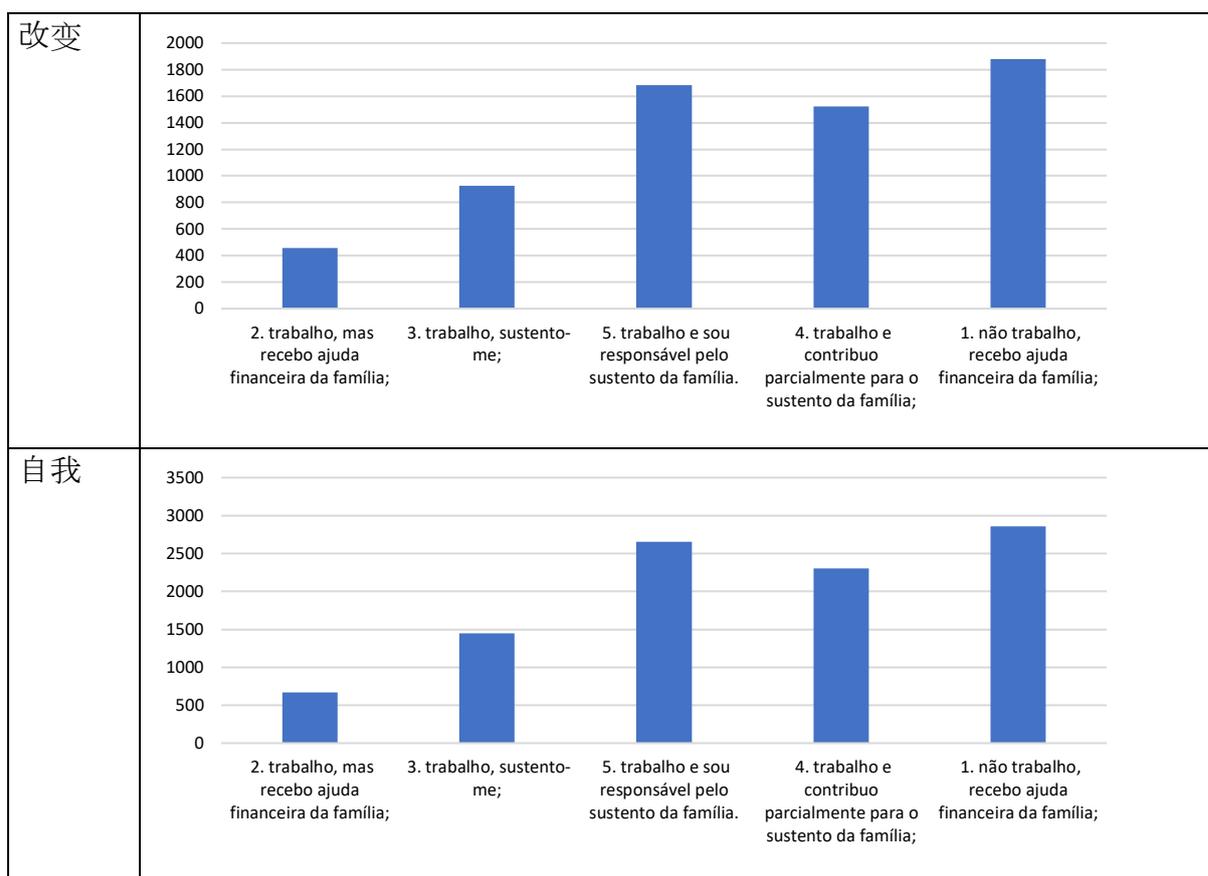


表169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坦波



时间似乎并没有产生一个经济参与家庭的情况，这与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在E GO和ALTER中，“时间”一词主要是由那些没有工作并得到家庭帮助的人唤起的，其次是那些完全来自家庭，然后部分来自家庭的人（下表170）。

表170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坦波



4.3.13 轴 2 结果的整体分析

我们在这里分析安讯士2号的奥雷拉，它包括与我们研究中发现的社会表现相吻合的科学文献中所唤起的词语。

方便

Caregnatoe

Moura (2006年) 等作者在文献评论中发现了这种便利性，在最近的研究中，他们强调远程教育的主要特征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理解，对于本研究中的许多人来说，THE具有满足感、充分性、有用性甚至便利性，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们很有好处。因此，他们把远程学习视为促进日常学习的工具。根据一些作者，如摩尔和科尔斯利(2010年)，远程教育的

目的是舒适，因为许多选择这种模式的人不再大学年龄，工作或有孩子。因此，在家或在任何时间学习的便利性将是这个观众的理想之选。关于这一表现，在这项研究中，可以评估年龄越大，自我中出现的就越多。有了这些数据，可以假定年轻人关心远程教育提供的便利性，从24岁起，这种代表性有了更大的进步。就这一变化而言，对这场变革的重要性似乎在18至37年间保持平衡。通过坎波斯感官的生态学（2017年），人们可以解释为由存在的物质条件配置的便利性。

能够证明"方便"一词的合理性是，无论是在改变中还是在自我方面，都注意到，大多数人是其家园的主要提供者，这本身不仅可以证明代表权，而且可以证明希望将工作与学习相协调。

成本和经济

在这个具体的情况下，我们将一起分析成本和经济陈述，因为理解，从语义上讲，这两个召唤可以是等价的。但是，我们还将进行不同的分析，以表明痛苦（成本和经济）可能包含不同的受众。在痛苦成本方面，大多数引起这种代表性的人是由年龄高于经济年龄组的人组成的。第一个（成本）由36至38岁的男性组成，第二个（经济）由24至26岁的女性组成，而两个（成本）则由来自里约大都市区的人在变化和自我中唤起。孤立地解释一种或另一种痛苦的重要性得到证实，因为在这个特定的公众场合，这些年轻人不关心费用，老年人也存在这种关切。然而，通过分析这些陈述，我们可以理解，词汇的使用实际上涉及到财务问题，根据年龄范围的变化，这一事实可能与每个年龄组的生活经验有关。这是因为，就那些提到费用的人而言，大多数人对家庭负有经济责任，并且与应支付的单子、生活费用等成本关系有更直接的联系；虽然在提到经济时，大多数人不工作，而且是持续的，这导致我们解释，成本召唤所固有的财务细微差别不是他们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就像在另一组人一样。在两种陈述中，大多数人在自我上比在改变中有更多的召唤，这表明这个问题影响到主体本身，当主体是另一个主题时，它就不那么相关了。

例如，在文献评论中，《远程教育》中的成本和经济比率可以解释为更便宜，贝洛尼（1999年）对此提出了广泛批评，他说远程教育的主要功能不能是低成本，而应是教学的灵活性。笔者甚至批评廉价模式，认为社会上没有收益，因为这不是教育

的民主化，而是教育公司集团筹集更多资金的理解。然而，摩尔和科尔斯利（2010年）明白，降低教育成本有助于扩大教育结构，帮助解决不平等问题。关于感官的生态学，这种表现可能与存在的物质条件有关，这一因素本身可以成为寻求远程教育的理由，即该学科寻求远程教育，因为它由于其财政状况而更便宜。

困难

此问题在轴 1 上解决。

学科

该学科受到该学科的广泛讨论，因为它是学生集中教学的一种方式，这使得这种能力对于学生的良好表现至关重要。一些作者甚至认为，远程教育不可能为儿童，因为许多课程的工作过程不是教学，但和教学（MOORE, 2007年），即他们专为成人。根据定义，EAD建议学生处于教学过程的中心。例如，这种中心性本身就带有纪律和时间组织的分量。我们习惯于在教育的某种经典结构中学习，在这种结构中，教师口头解释某一主题，学生接受教师的建议和步骤，但我们不习惯负责教育的制度是学生。这种范式转变需要必要的纪律来进行学习（FORMIGA;利托, 2009;摩尔, 2007;摩尔;科尔斯利, 2010）。

有趣的是，在阿戈拉纪律的情况下，自我的召唤比改变中高八倍。无论是在改变中还是在自我上，我们发现，在家庭的支持下，没有工作的受试者年龄在24至26岁之间。在与感官生态的关系（CAMPOS, 2017年），我们理解，有一个关系，"意识，意志和道德"，由于主题的特点的趋势。

缓解

此问题在轴 1 上解决。

灵活性

引起这种痛苦的代表权在文学评论的几项研究中具有相关性，被认为是实现远程高等教育的主要原因和吸引力之一（MOORE：科尔斯利，2010）。这种社会代表性本身可以带来一些含义，如时间或学习地点的灵活性，并可以是巴西模式的巨大吸引力，考虑到大多数寻求这种教育形式的人在该国工作（ABED，2016年；ABRAEAD，2008；蚂蚁；利托，2009；摩尔，2007）不一定感到惊讶，有这些陈述，因为大多数被唤起。在巴西文学评论中寻求的所有研究中，这种表现都显得突出，如图6和7（第49页和第50页）所示。至于进行的研究，还注意到，就公众而言，大多数是大学年龄和年龄组，其影响最大的年龄组由来自里约热内卢大都市区24至26岁的妇女组成。

然而，根据Caregnato和Moura（2006年）等作者的说法，灵活性是有代价的，他们指出，只有在有纪律的时候，远程教育才有可能灵活。关于坎波斯感官的生态学（2017年），我们强调，这种社会代表性与物质生存条件有关，在物质条件中，主体需要一种舒适的教育，并且不会直接损害他的日常生活，例如，与工作需要有关。

互联网

至于互联网的社会代表性，这是当今教育的主要引擎之一，因为正是由于它，教学距离的方式承担了非常低的成本，并获得了毛细管，有可能满足人谁可能是地理上岛屿的教育（BELLONI，1999年：从海岸；法国，2005年；蚂蚁；利托，2009）。引起互联网风波的公众，无论是改变还是自我，都是18至20岁之间的人，这导致青年与这种媒介作为教育工具的联系。关于性别，大多数男人的问题是针对自我的，但情况在改变中发生了逆转，主要是由妇女构成的。也可以注意到，绝大多数不工作并从其亲属那里获得经济援助的人。

互联网在被引用最多的范围内，是唯一具有物质成分的代表形式，是经济发展基金的组成部分。构成远程教育平台和导师的其他要素没有直接关系，这强化了上述通过这种交流手段的力量观念。也可以解释，缺乏远程教育结构的知识导致研究混淆了作为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

从感官生态学的角度来看（CAMPOS，2017年），我们可以理解，这种痛苦将与存在的物质条件联系在一起，这也可以证明它进入最被引用的，因为它的受欢迎程度。

机会

社会代表机会对于召唤的数量来说是最重要的，在自我中唤起了10, 539人，这个人数是造成这种痛苦的最大表现。另一方面，6, 238人在更改中表示了答案。自我的大多数年龄组为27至29岁，改变年龄为24至26岁。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假设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已经脱离了大学这一年龄，这导致这些人产生一种积极意义的代表性机会的归因，因此，这些人应该考虑自己，并有机会参加远程毕业典礼。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与文学评论有关被指出为教学的"第二次机会"（施利克曼等人，2009年）。然而，这并不一定是坏事，它只是揭示了一个事实，即选择远程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方式不会占首要地位，即不是因为它的教条性，而是功能。当我们分析这些被调查者中大多数说他们不工作，得不到家庭的支持时，机会的问题就更加强调了，也就是说，鉴于缺乏就业和培训，他们可以在EAD中看到他们生活中的一种机会。除此之外，年龄越大。另一个特点是性问题，主要由来自大都市区的妇女组成。

与社会经济相关的社会代表机会给我们带来了不同意见的作者在文学评论中的肯定。对于福米加和利托（2009年），在积极的观点，EAD吸引了观众，没有机会在大学年龄学习，需要资格。作为反驳，我们有像Schlickmann和合作者（2009年）这样的作者，他们认为，即使这种模式被公众认定为劣等，他也同意接受这种学习方法，以期获得文凭。

关于坎波斯感官的生态学（2017年），我们把这种表现归为与意识、意志和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据了解，主题亲密论坛的各个方面（例如，将摆脱失业和高龄）被以"THE"为代表的一种提升生活方式的解决方案所安慰。

实用性

在阿戈拉实用性，它注意到，有一个更高的数字，当涉及到自我，略多于两倍的变化。在分析改变和自我的表现时，我们将看到关于这个痛苦，有可能注意到一个广泛的平衡年龄组，从18岁开始，到26岁作为主要受众。

在文献评论中，我们发现，在一种更符合这些方面相关的日常教育模式的构成中，对实用性的理解，与《论语》的讽刺主义有关，即敏捷和易用。这种表示可能与本研究中已经探讨过的其他方面有联系，例如时间、灵活性和易用性。

在与坎波斯感官生态（2017年）的关系中，这种痛苦被描绘成物质生活条件，例如，与不离开家学习的便利性有关。

时间

阿戈拉时代是与阿戈拉机会一起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但与后者不同，时间表现可能与《时代》的特点有关，而不是与亲密的理解（与良心、意志和道德的联系）有关。时间的概念可以从开发具有灵活性的异步活动的可能性，到摩尔（2007年）等一些作者带来的节省时间的概念来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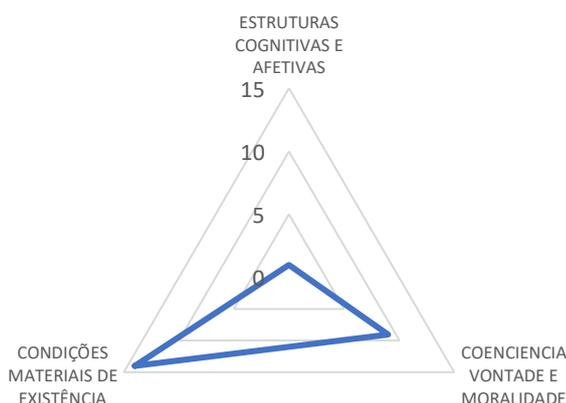
这个阿戈拉的形成有一个亮点的自我超过10, 113召唤，而对于改变，有6, 570。在自我和改变的情况下，这个年龄组有一定的相似性，在里约热内卢大都市区年龄在18至26岁之间。大多数人没有工作，并得到家庭的支持。此外，也注意到，超过一半的这一群体没有经验与。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26岁以下的年轻人对时间的概念有更大的关注或理解。

关于感官的生态学（CAMPOS, 2017年），我们可以再次了解与主题的日常生活动相关的围绕"THE"的物质联系，可能是为了在时间优化方面促进他的日常生活。

观察 - 轴2 - 阿戈拉斯文学评论

如果我们考虑世界形象形成中感官的生态学，我们可以在下图24中看到分析，其中可以理解，这些感官主要是由主体的日常问题及其社会性所形成的，与意识、意志、道德和物质条件、研究基础理论意义的层次构成。

图24 - 理论框架：感官生态学中的文学评论



有趣的是，我们强调，理论的第三层——主体的认知和情感结构——与《轴心2：Agoras文学评论》的任何表现都没有关联，因为尽管这个轴心与日常生活方面的关系突出，但没有任何情感和认知点被证实向着这种层次的方向融合。

4.4 轴 3 - 分析阿戈拉亲和力计划

4.4.1 介绍

从我们迄今在本论文中提出的内容可以推断出，阿戈拉的形成产生于两个理论贡献，一方面考虑到根据结构方法论建议Abric（1994年）对社会表现的系统性召唤模式的创建，另一方面，我们受到网络和群体形成和理论的贡献的启发（MARTELETO，2001年；雷奎罗，2002年），在方法阶段已经澄清。因此，可以找到社会代表性和构成社会代表性的群体，从而在给定代表上形成一个中心，因为它被应用于本文的第1和第2轴。然而，在更广泛地了解社会代表对群体的了解时，我们有可能建立一个具有多个代表性的中心，从而造成可能具有更大意识形态亲和力负担的筑巢。在实践中，在这项研究中，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巧合的RS，而且可以通过两个、三个、四个甚至五个社会表现来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因此，我们创造了一个分散的人的痛苦，他们将有更大的意识形态亲和力的主题，在这项研究的情况下，由于更多的不同的召唤组合在同一个阿格拉。在实践中，我们推断出，唤起术语的巧合数量越多，主体之间的意识形态亲和力就越大：这些亲和力，我们称之为计划。轴1号和2号是由1号飞机进行的，因为它只是由一个巧合的词形成的。但是，第2、3、4和5号计划可能会有一些痛苦，后者是个人之间具有更大意识形态亲和力的方案。另据了解，从统计学上讲，由于我们必须在它们之间发生许多巧合，因此更有可能有一个计划，而不是其他飞机。即，阿戈拉斯的亲和力计划是我们创造的方法的一个深入概念，在这种概念中，人们可以通过围绕共同表达的主题亲和力来分组，即仔细思考特定主题的人。

在本文中，可以获得多达五个亲和力计划，因为受访者被要求表达关于 AEd 的前五个单词。在不同层次上都有亲和力，从一到五个巧合的召唤。然而，在作品的这一部分，我们将展示最大的层次：五个巧合的社会表现，其中我们只会显示与自我，因为巧合的外观在改变是没有什么显著的。最有可能的阿戈拉形成（平面1），即只有一个共同的召唤被证明和讨论在斧头1和2的以前的子查普特。

4.4.2 亲和力计划

在隔离最大亲和力计划（5个单词或表示语）中的最高发生率的过程中，我们列出了在自我中发现的两个最大的单位5aras下面。他们分别有19人和29人在所唤起的5个陈述中作出绝对平等的反应，如下文所述。

表171-5级EGO亲和力计划，发生率较高

社会表现	主题
纪律、组织、动机、主动性、自主性	19
纪律、组织、动机、积极性、好奇心	27

因此，在混淆将要研究的难题方面没有问题，让我们把这19个人称为"A1计划5"，把另外27个人称为"A2计划5"。

然而，论文这一部分的主要动机不是尽可能多地捕捉人，而要理解，与本研究列出的其他更华丽的主题相比，这里提出的主题数量可能看起来像是皮菲奥斯。这里重要的是展示与阿戈拉斯进行研究的更广泛可能性。另一个重要的一点是理解，一个茎没有执行，因此巧合是字面意思，即这些主题必须写完全相同的词，使这些痛苦是由五级亲和力平面创建的。

4.4.3 Agora de A1 计划 5（纪律、组织、动机、主动性、自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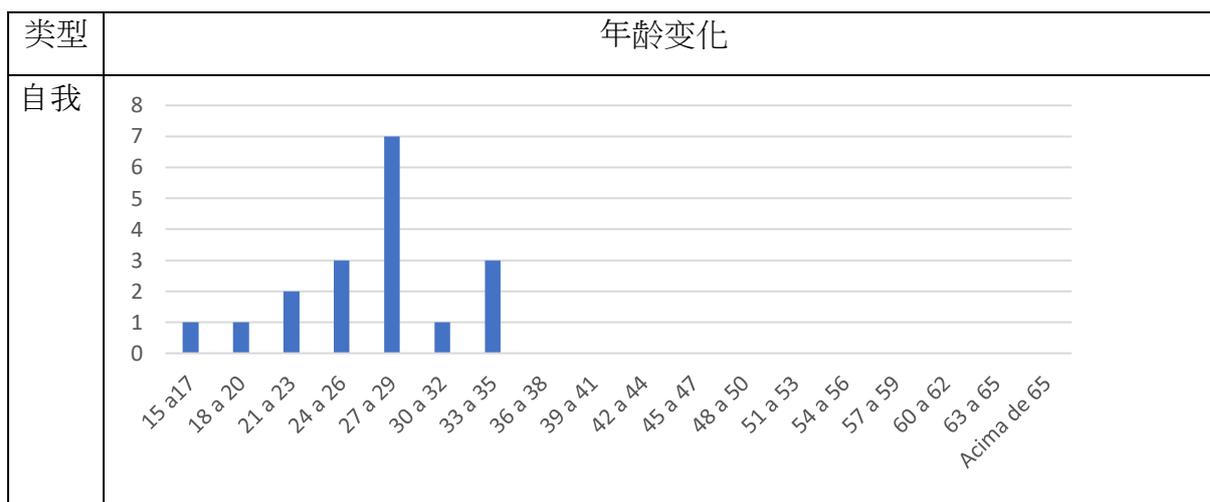
在这个阿戈拉将只检查EGO，因为在改变中只发现两个人与这些相同的表示在改变，如下表中可以看到。

表 172 - A1 计划 5 的 EGO 召唤

阿戈拉	人
自我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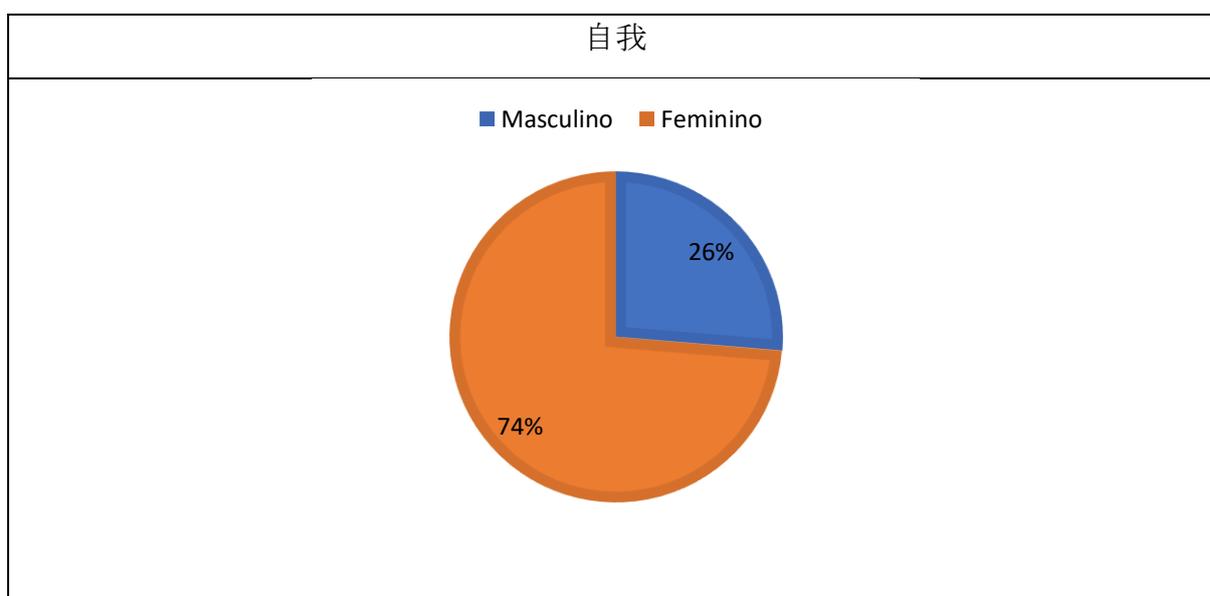
在图表173（下图），关于这个阿戈拉的年龄变化，我们注意到，人数最多的是27至29岁之间，但也有可能看到一些较小的高峰在24至26岁和33至35岁之间。

表173 - 年龄变化 -阿戈拉"A1计划5"



可以注意到，在A1计划5的形成中，有大多数男性，然后它大约占这个A1计划人口的3/4。少数（26%）由妇女组成。在下表 174 中，我们说明了这些陈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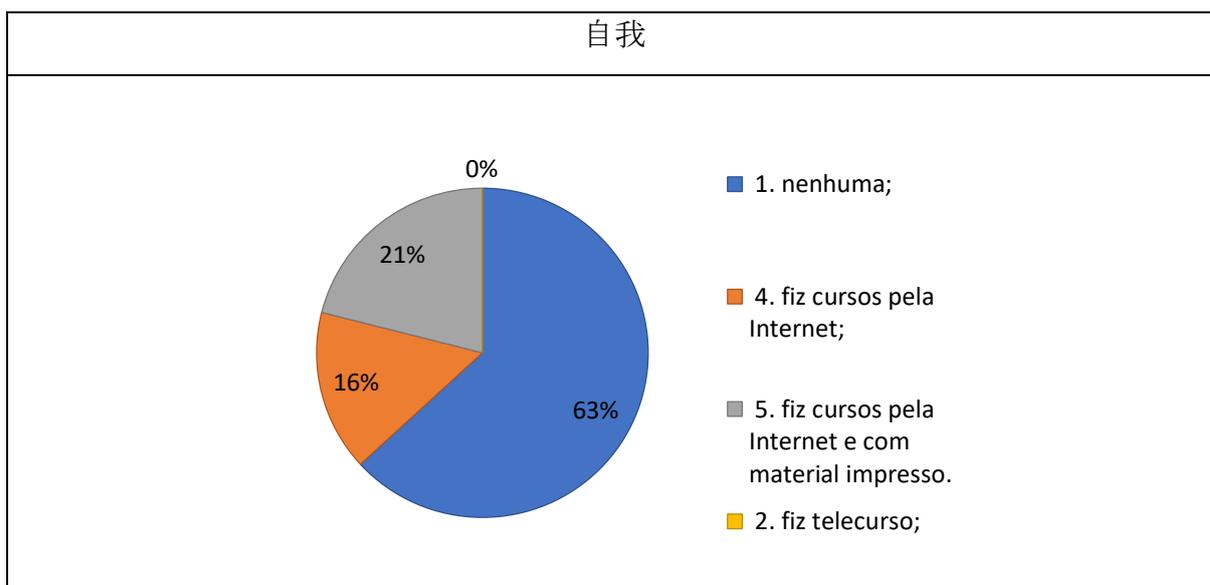
表174 - 性别 - 阿戈拉"A1计划5"



我们可以在下面注意到，关于与的经验，大多数人没有任何经验与这种类型的教学，这是绝大多数与的观众，可以欣赏在表 175 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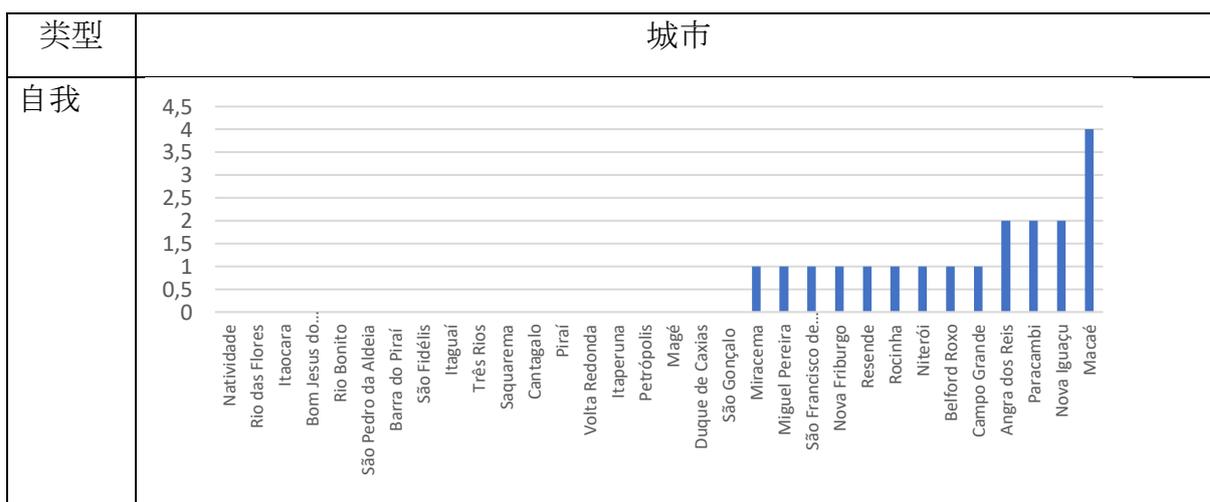
THE
63%

表175 - EAD经验 - 阿戈拉"A1计划5"



在地理分布方面，可以注意到来自里约热内卢州内陆地区，特别是里约热内卢北部地区马卡市的人的发病率较高。请参阅下表 176。

表176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A1计划5"



在经济参与方面，绝大多数人是由家庭支助的人组成的，这一群体中共有近70%的人。以下数据可在表 177 中看到。

表177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A1计划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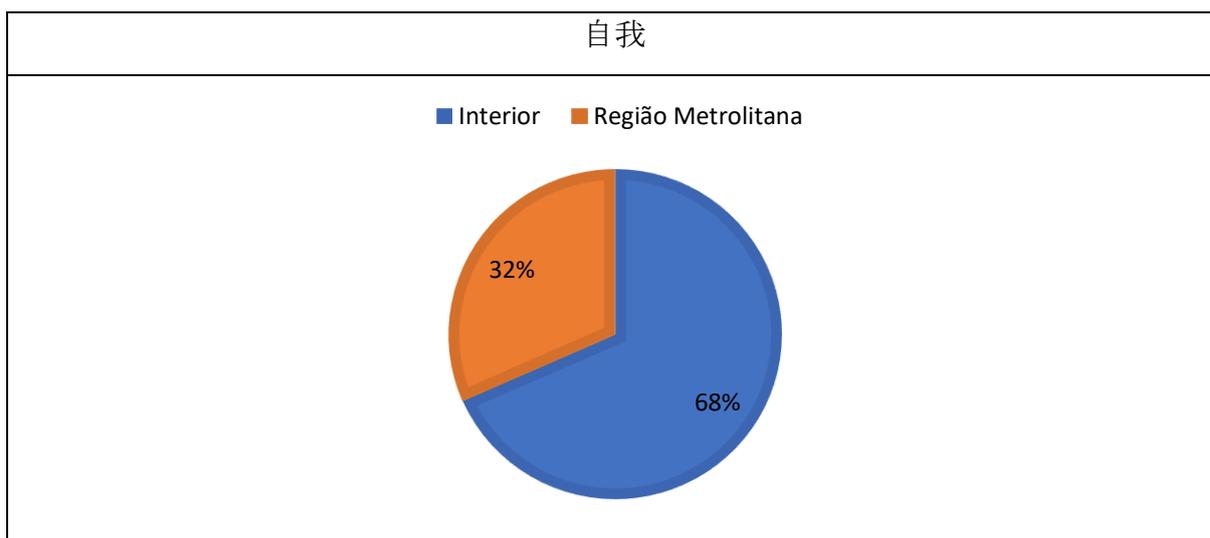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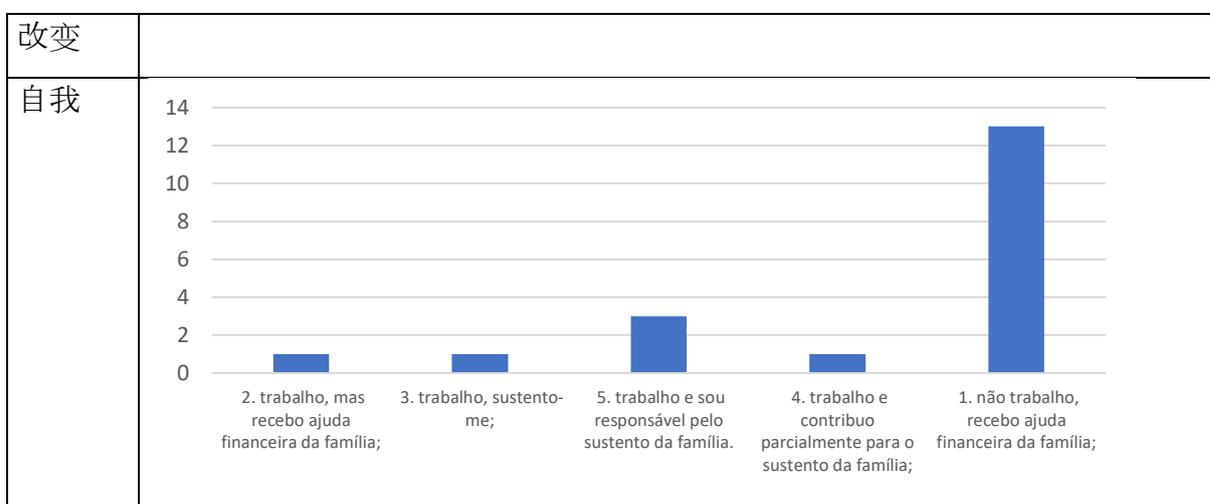


表178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A1计划5"



4.4.4 Agora de A2 计划 5（纪律、组织、动机、主动性、好奇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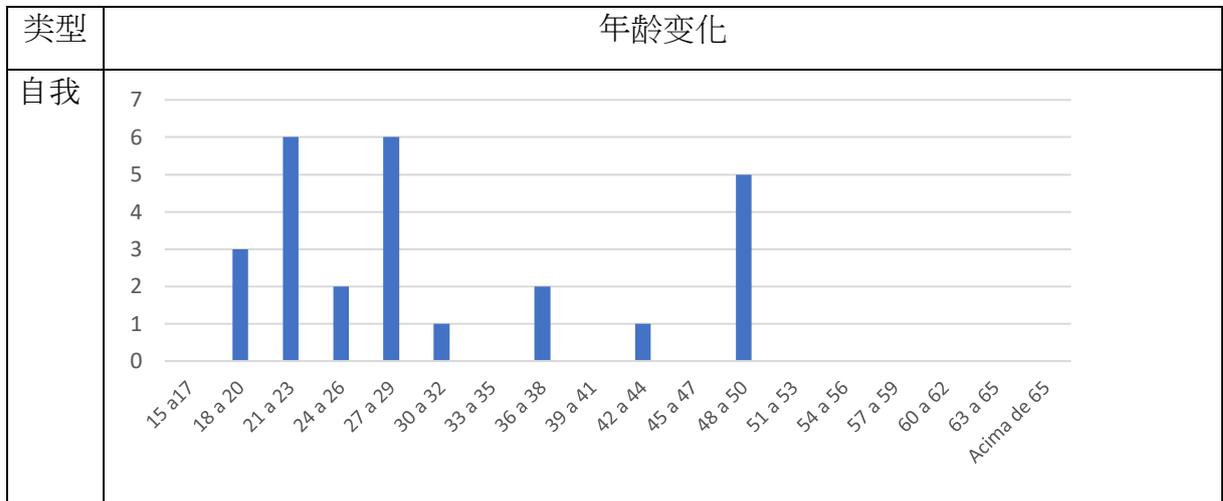
这个阿戈拉的形成由27人组成，是5号计划中最大的一次。所呈现的结果仅指自我。

表179 - EGO使命

阿戈拉	人
自我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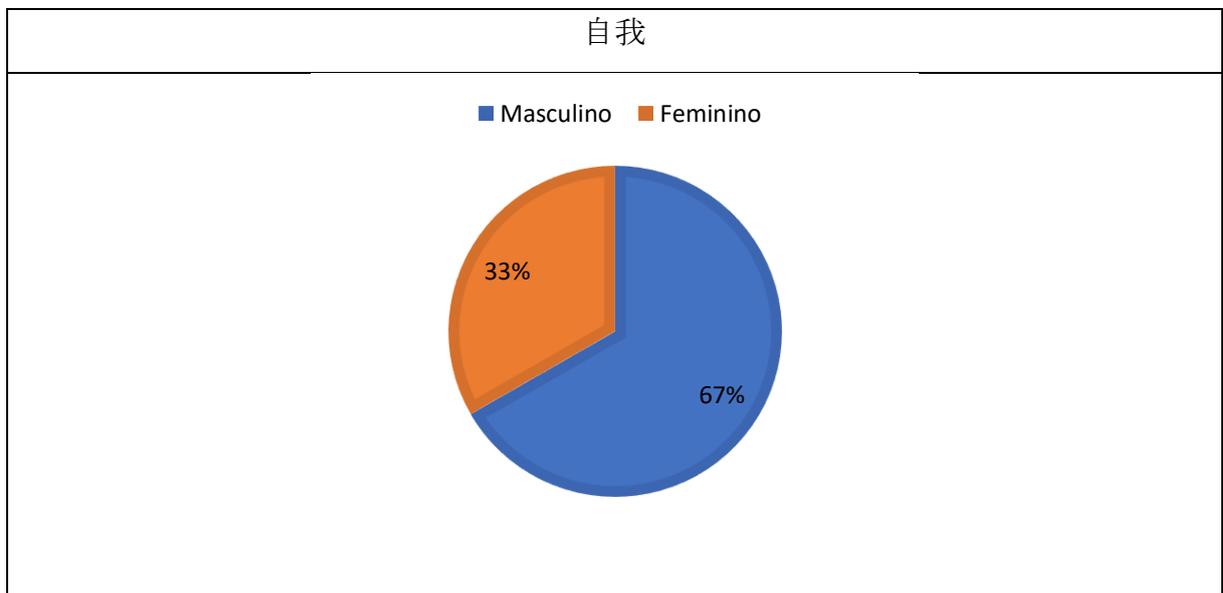
关于这种阿戈拉的年龄差异，可以看出，有两个主要的波段在数字上是捆绑的，一个从21岁到23岁，另一个从27岁到29岁，第三个最显著的范围是在48至50岁之间（如下图180）。

表180 - 年龄变化 - 阿戈拉"A2计划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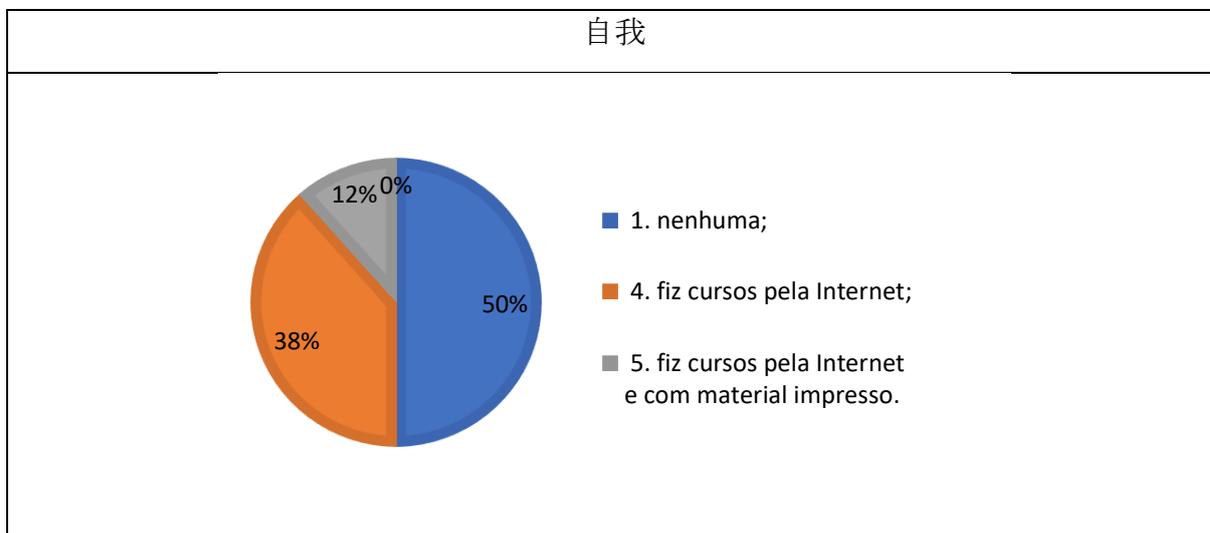
可以注意到，在A2计划5的制定中，有多数男性是大多数成员，只有33%留给女性公众。在表181中，下面我们说明了这些陈述。

表181 - 性别 - 阿戈拉"A2计划5"



我们可以在下面指出，关于与教育的经验，大多数人没有远程教育的经验，这是占50%的受访者，如下所示。

表182 - EAD经验 - 阿戈拉"A2计划5"



在地理分布上，可以注意到来自里约热内卢州内陆地区的人的发生率较高，但发生这些召唤次数最多的城市是新伊瓜苏，它构成了里约热内卢的大都市区。

表183 - 城市地理分布 - 阿戈拉"A2计划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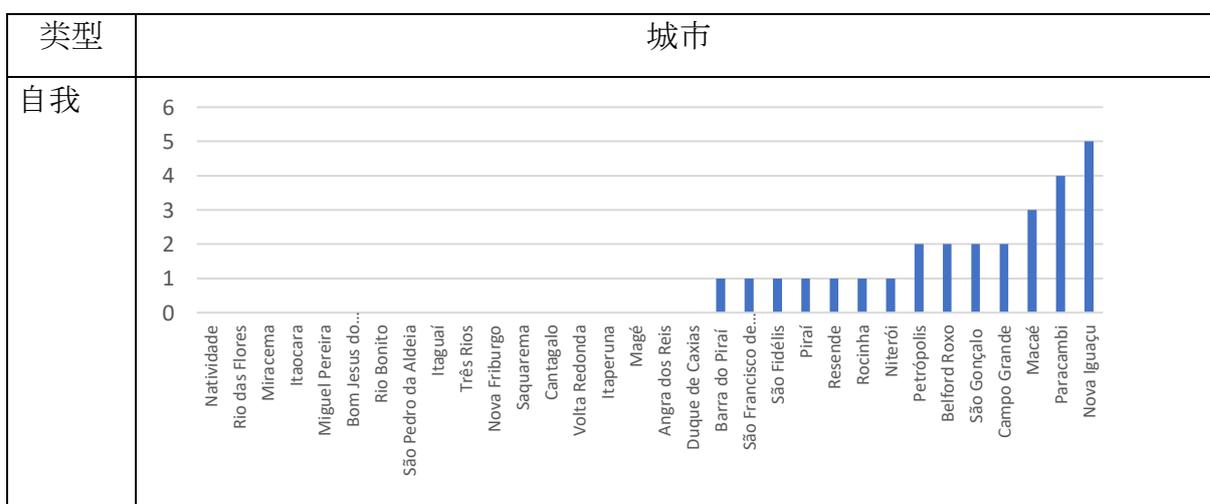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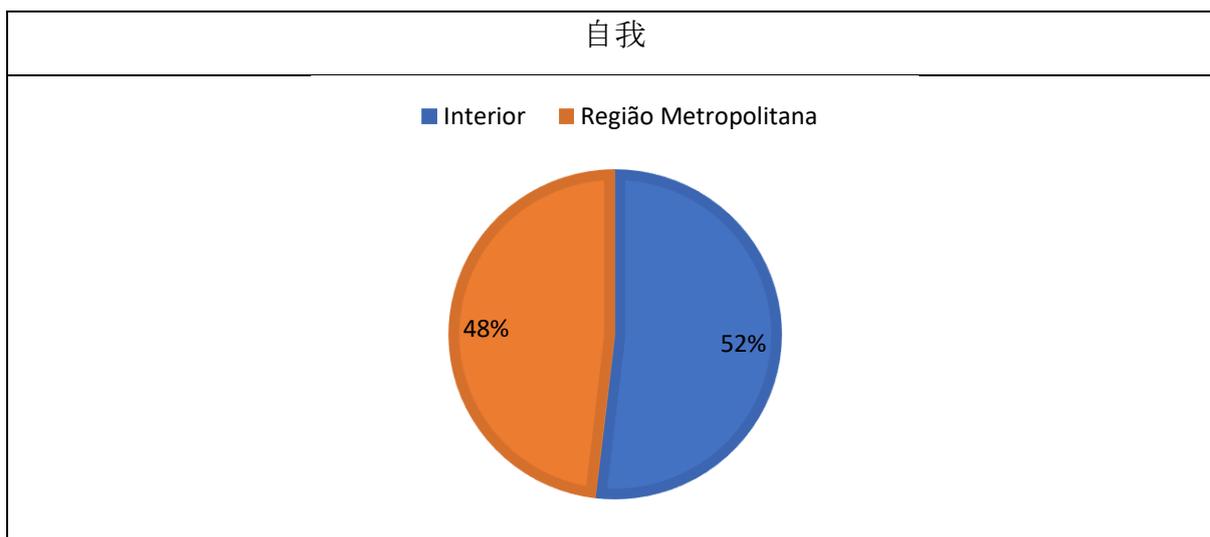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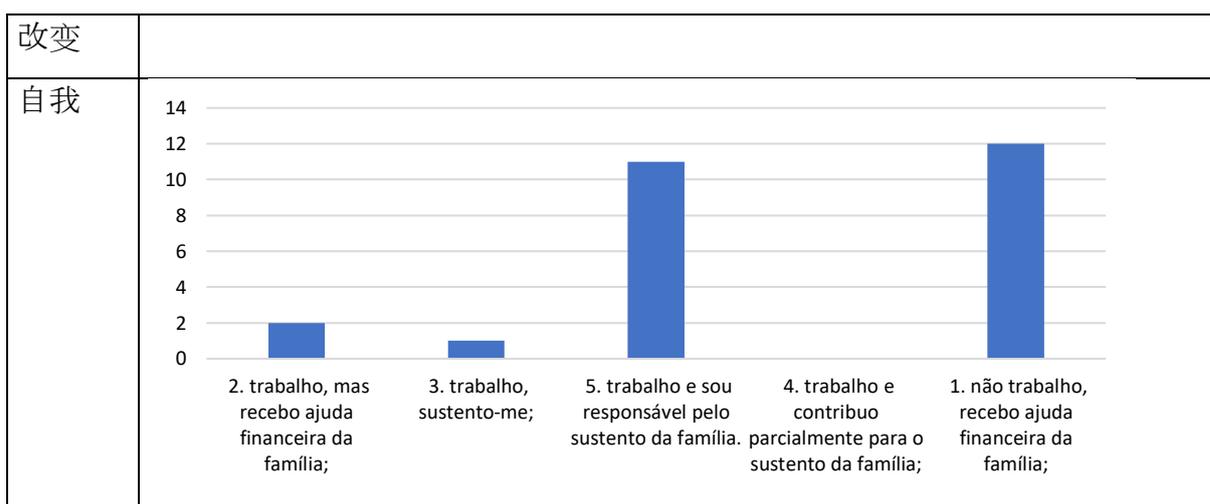


表184 - 区域地理分布 - 阿戈拉"A2计划5"



据指出，关于经济参与，虽然大多数人宣布得到家庭的支持，但有一组答复者几乎与第一组人（即家庭使用者）一起抽签，即负责支持其家园的人。（表185，下图）。

表185 - 经济参与 - 阿戈拉"A2计划5"



4.4.5 轴 3 结果的整体分析

我们展出的两幅平5幅安格拉的分析将在此项目中联合进行，以便比较它们并验证它们的共同点。首先，人们可以强调一个和另一个形成的相似性，以及一个概念，即两者将包括在计划4 agora，也由于其亲和力。需要注意的要点是，在"A1 Plano 5"中，我们看到代表纪律、组织和自主性是被引用最多的50个，在"A2计划5"中，在被

引用最多的50个群体之外，大多数词语形成，即陈述的动机、主动性和自主性。这两个编队主要由来自里约热内卢州内陆的男子组成，他们不工作，年龄相近，年龄从27岁到29岁不等。

个人认为，"A1 Plano 5"的编队大部分由来自马卡市和里约热内卢州内陆的男子组成，这些人年龄近30岁（27至29岁），他们得到家人的支持。有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观察地理位置（Macaé）与在此特定组中唤起的表示的关系。然后，我们可以推断出，构成A1计划5的纪律、组织、动机、积极性和自主性是该地区词典的一部分。

就"A2 Plano 5"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年龄的多样性更大，27至29岁之间占主导地位，新伊瓜苏市是集中更多人的地方。这个小组也由那些大部分不工作的人组成。

当涉及到感官的生态学（CAMPOS, 2017年），我们将分类所有表示与意识，意志和道德有关，与物质条件和认知和情感结构无关。我们还可以研究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 Campos (2017) 在主体之间关系中提出的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因为共同的表示可以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交流中密封，典型的马卡市，例如在社区、社交网络等的互动中，这些交互将这些人归为一类。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本文中并不寻求理解导致这些人具有这些代表性亲和力的原因，但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们可以通过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而形成。

4.5 轴 4 - 痛苦关系分析

4.5.1 介绍

在研究的这个轴心中，我们不会像本研究中已经进行的一般社会经济概况那样分析社会经济概况，而是将表示作为痛苦函数的再现，将变化和自我分开。这里的工作是结合阿戈拉斯和他们的陈述。这一阶段的传导有三种类型的aras选择为这个分析：一个将来自互联网ara（轴2），因为它背离了其他表示，因为唯一一个指的是EAD本身

的组成部分。其他选择根据轴1和2，两个负（偏见和弱），一个可疑（困难）和最唤起（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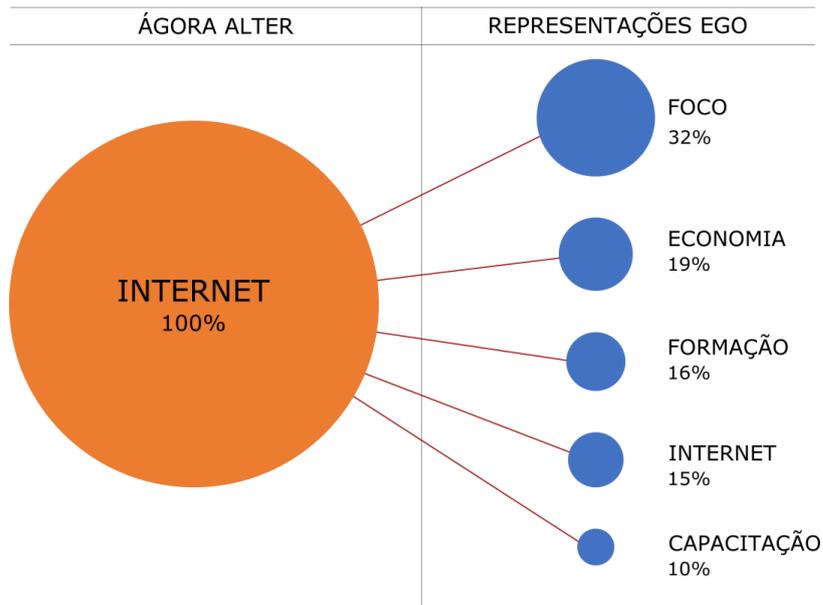
4.5.2 关系分析自我和改变

需要强调的一个重要点是，在痛苦和自我与改变中的表示物之间的图表中，将显示在下方的百分比关系。每个代表将根据阿戈拉成员的人数拥有其总数。由于每个人最多可以唤起五种社会表现，我们强调，可能发生其总数超过 100% 的案件。

互联网痛苦的关系分析在改变

通过分析下面的数字，可以得出结论，形成互联网痛苦的人没有变化，因为大多数引用的表述在自我：焦点，经济，培训，互联网和培训，其中32%已经回答了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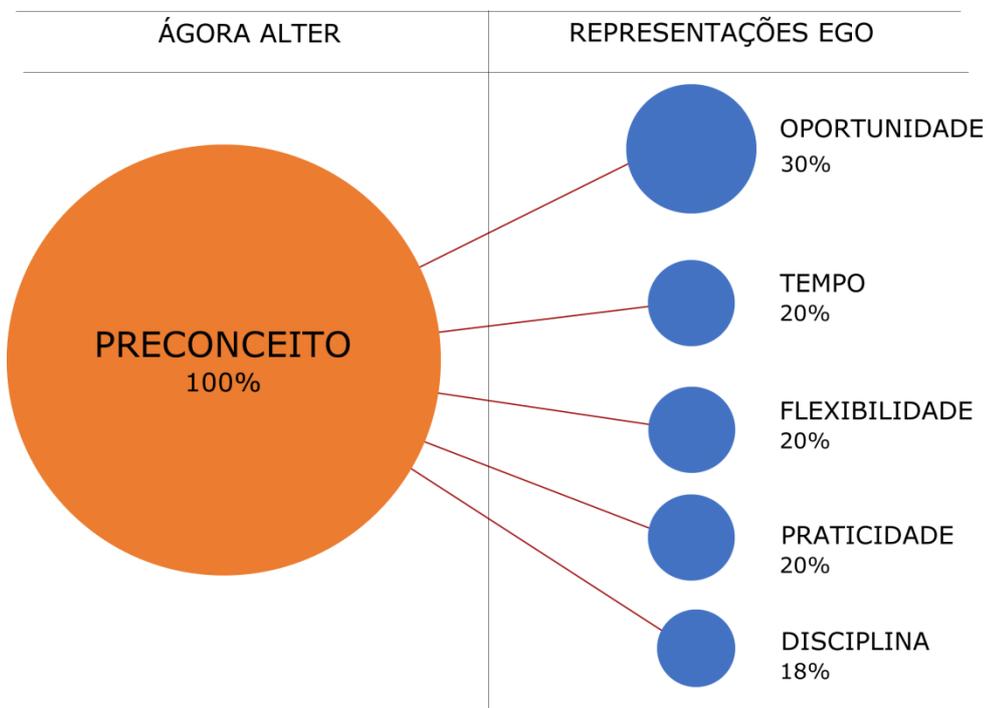
图25 - 阿戈拉互联网没有改变和自我的社会表现



改变中的痛苦偏见的关系分析

在这种关系方面，与表示机会会有显著联系，在时间、灵活性、实用性和纪律性四个具体表示中，占总数的30%，等价物为20%（大约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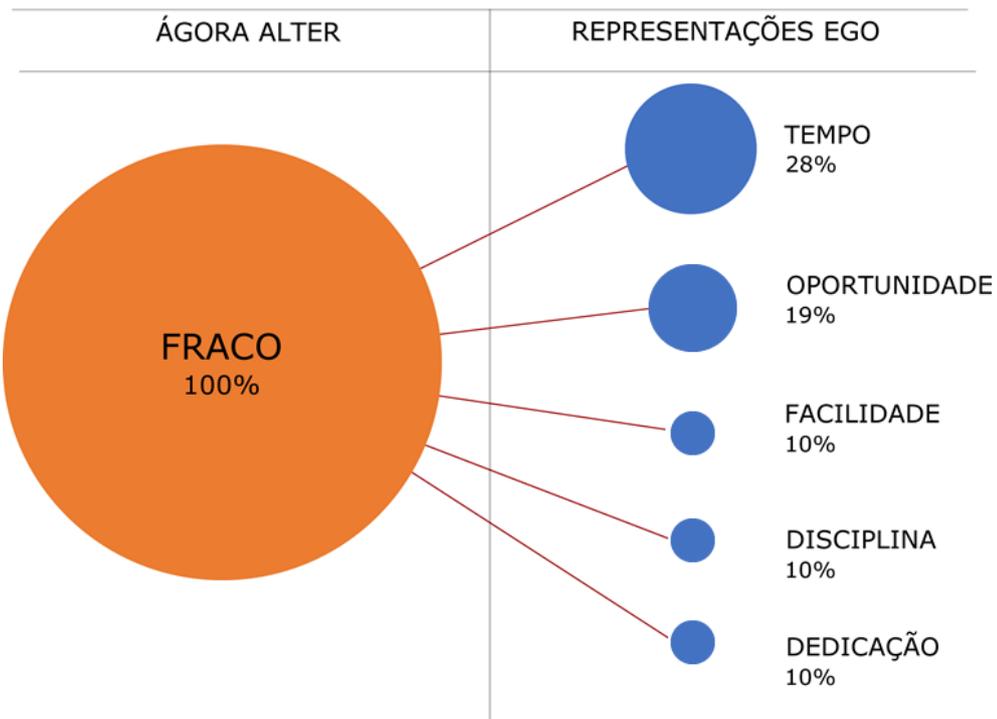
图26-阿戈拉偏见在改变和社会表现在自我



变化中弱阿戈拉的关系分析

如图27所见，在变化中构成弱者的主题有社会表现作为时间，这些是28%，其次，"机会"为19%。然后，绑，约10%，我们将有轻松，纪律和奉献精神，如下图27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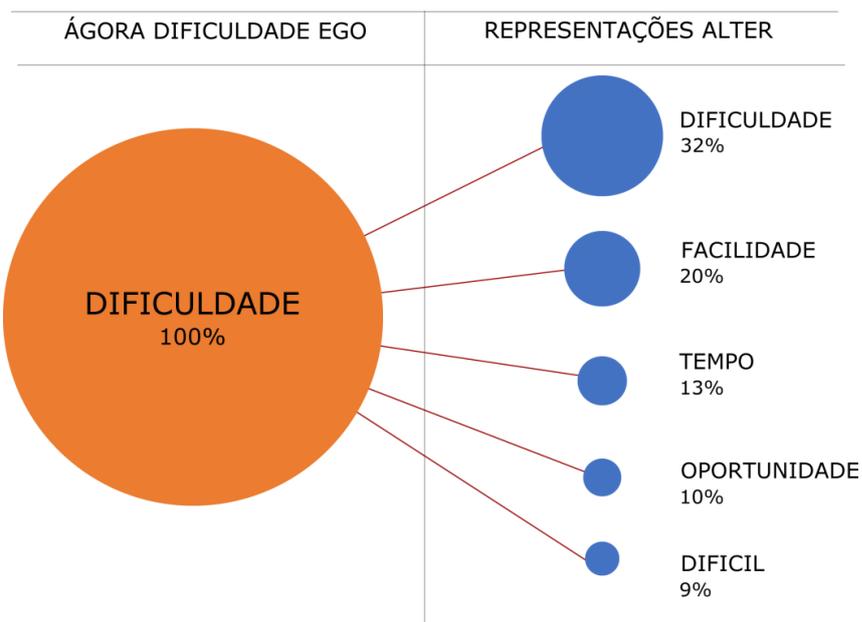
图 27 - 变化中的弱阿戈拉和自我的社会表现



自我痛苦困难的关系分析

下面可以看到，在图28中，在关系性困难中，我们有32%的人与代表困难有关的变化，即，他们相信其他人看到困难在。有趣的是，那些由自我配置了痛苦困难的人提到了在改变中的表示容易，即聚集在-在改变-dificuldade（32%）和轻松（20%）在同一个答案。这种好奇心反映在这个轴心的结论中，在第4.4.3项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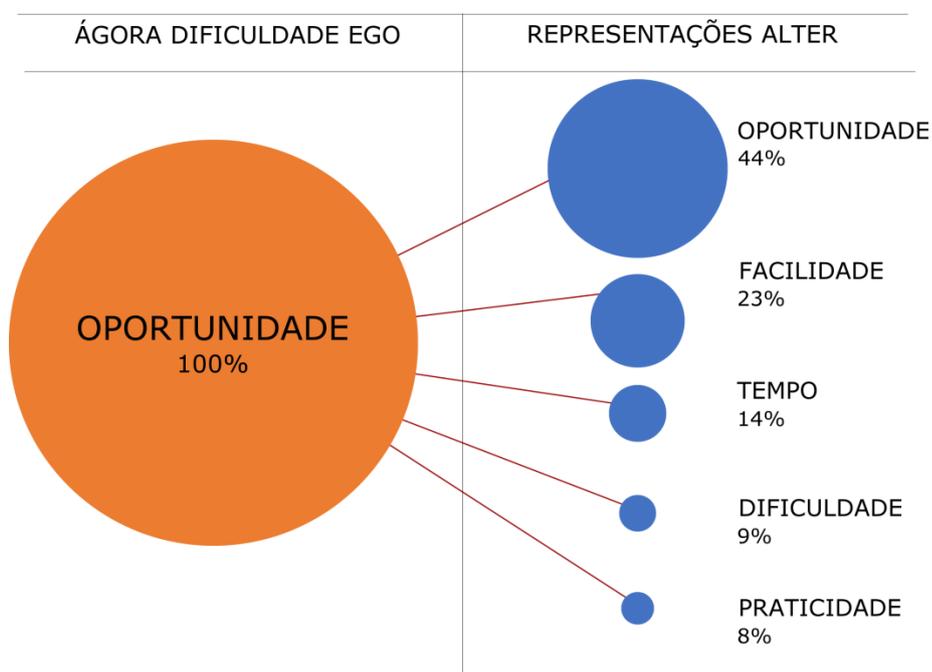
图28-阿戈拉在自我和社会表现的困难在改变



自我中痛苦机会的关系分析

在自我中对痛苦机会的关系分析中，我们可以证实，有许多人在改变中唤起机会，即他们认为对方具有相同的代表性（约44%）。也注意轻松和其他具有较低值，如时间，难度和实用性。

图29—阿戈拉机会在自我和社会表现的变化



4.4.3 轴 4 结果的整体分析

在这个轴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展示了这些表示物是如何被复制为痛苦的函数的，从而分散了变化和自我。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在整个研究中（无论是自我还是改变），教育与距离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建立（50个最引证的陈述中，有8个在自我（16%），50个在改变中（10%）。在改变中对互联网问题的关系分析中，我们看到自我中提到的两种表现与教育有直接关系：培训（16%）和培训（10%）。这一结果表明，人们更经常地联想到教育和AD，只有当通过互联网连接在变化中，在痛苦分析。鉴于这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教育模式是一种教育方式，对于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我们设想可以更多地提到与教育有关的召唤。

至于在改变中对痛苦偏见的关系分析，有趣的是，绝大多数认为对方对《改变》有偏见的人认为，对于他自己（自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是30%的被调查者。在构成几乎相等百分比的其他表示中，人们认为与日常生活的直接联系是时间、灵活性和实用性，此外，人们还认为完成AE（即学科）是必要的另一个特征（MOORE, 2007年）。

对于变化中的弱者的关系分析，我们以自我、社会代表时间的关系为主，约占28%。我们可以建立的关系是：谁认为对方认为EAD薄弱（教学不力），提到时间（被贬为缺乏），在自我中突出，因为它联想到，它自己在这种模式的存在，由于几乎没有时间学习，使别人的意见构成了远程教育的缺点方向。

如第

4.4.2

项所述，我们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数据。在自我痛苦困难的关系分析中，我们发现在改变中表现的易用性：这似乎是一个无稽之谈，因为同一个人谁关联，为自己，DS与困难，相信其他人很容易联系它，一个召唤，数字在第二位20%。我们可以解释，困难和轻松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正面的，一种是负面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很难通过，因此，教学是好的（积极的观点），或者说，THE是复杂的，是一个难以推进的过程（消极的）。第二种情况（易用性）可能与距离模式在日常（正）或质量差（消极）中有所帮助这一事实有关。从这最后的观点来看，贬义为容易表现，有可能与难度相关，也与它的消极意义有关，即远程学习是复杂的。然后，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考虑这种分析，这种关系（自我上的困难和在相同反应的改变中容易），乍一看似乎并

不寻常，不会那么不寻常，如果我们考虑这种分析，通过亲和力，它近似于在召唤困难和轻松中包含的负面解释。

我们特别关注的另一个痛苦是自我中的机会，我们可以从中提取有趣的数据。认为"机会"（自我）的人大体相同，他们认为对方也将其归类，在接受调查的人口中，有44%的人表现自己。这个结果的有趣之处在于观察相反的考虑：在改变中表达机会的一群人，大部分是那些为自己也拥有相同代表权的人（74%）。这导致我们推断出"意识形态泡沫"的存在，只有这些人相信，其他人认为EAD是一个机会，与他们自己的观点是一回事。

4.6 轴 5 - 分析问卷中的前 500 个有效答案

4.6.1 介绍

除了根据每个表示对阿戈拉斯作为研究人群的缩影进行分析外，还在宏观领域进行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超出了痛苦的观点，但EGO和ALTER之间的理解。因此，在这项研究的前500名参与者的社会表现下进行了一项研究。为改变和自我，根据各自的召唤汇编了一份人员档案。不久之后，进行了数据处理，并增加了两个列，以便将单词分类（表 186），从而查看所宣布的五个陈述中是否有任何负面位置。如果有任何负面表示，X 将被标记为得分，如下图所示。附件 1 中可以喜欢所有答案的原始文件。

表 186 - 具有消极性分类的表模型

主题	自我	改变	负自我	负改变
1	代表 1、代表 2、代表 3、 表示 4, 表示 5.	代表 1、代表 2、代表 3、 表示 4, 表示 5.	是 ()	是 ()

4.6.2 轴 5 结果的总体分析

作为结论，在阅读和标记后，如上文所述，共获得约45%（222人），其中载有一些与改变其设置有关的负面表示。此文件可在附件 1 中注明。然而，就自我而言，发现总结的负面陈述数量只导致4项，即在500人中，只有0人，占总数的8%。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被理解为负面的，仅代表权，只有一次发生和三次重复的社会代表恐惧。然后，让-

保罗·萨特提出"地狱是其他人"这句话可能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更多，因为在"我"中，几乎没有负面属性或取消资格。我们亦明白，被研究的市民建议成为远距离大学的候选人，这可能会大大减低他们的消极情绪。理解这一点，研究对象可能不会观察到自己不好的东西，真的考虑到他打算进入这种模式。然而，通过取消对方观点的资格，他可能会对远程学习产生一些拒绝，即使间接地拒绝远程学习。考虑到轴1提出了消极的矛盾，并且已经感觉到自我和改变之间的巨大差异，改变的负面理解在本文中并不新鲜。本研究还从文学评论中其他作者的反映中也指出了对《国家报告》的这种消极看法，这种看法可能构成偏见。然而，这一研究路径开启了一种理解，超越了文献中关于抵制模式的论文的讨论。这是因为可能的偏见（以消极的观点）的方法是从改变的角度提出的，这是我们在这项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概念。

5 讨论

5.1 关于研究问题

必须强调，在这次讨论中，我们不会孤立地把痛苦和数据分开，因为在探索轴线方面已经谈了很多。我们将根据本论文的轨迹提出可以观察到的一般性考虑。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研究问题的前两个问题：

问题1：作为能够扩大社会表现理论范围的模型，阿戈拉是否相关？

问题2：对被调查者自己和他人的社会表现能够构建的阿戈拉的验证是否扩大并有助于了解这一领域，是否与文献中所证实的与所验证的有关偏见和阻力点头？

在接下来的页面中，我们将从轴 1 到轴 5 进行权重，但首先，有必要提出一些点，渗透到论文的所有轴心和问题，即使用一个问题，面向对主题的理解的改变，而不仅仅是在这项工作中使用的自我（自我），包括一个基础的操作的ara系统，并给一个有区别的方法解释的数据及其有用性在整个论文的过程。关于这个主题，我们试图验证有多少人在自我中提出了同样的召唤，并改变以验证这两个分支之间的这种歧视是否有意义。答案是，在总共42,626名被调查者中，只有3,953人在自我和改变中回答相同问题，而38,673名被调查者则以不同的方式回答，占90%以上。简单了解这一富有表现力的统计数字可以澄清研究与所研究的改变的相互关系有关的一些重要性。自我中独特的改变召唤显然可以使他更好地了解他的外部世界观，在这个世界观中，这个主题适应并形成了他通过外部环境进行自我表现的手段。这种对变化的看法将不仅仅是对主题的阐释，而是他们对主观宇宙的环境解释的一部分，在主观宇宙中，它被视为真实的，因为它包括一些作者，如莫斯科维奇（2000年）、约夫切洛维奇（2014年）、马尔科维奇（2003年）。也渗透到坎波斯的视野（2017年），其中可以理解，关于某事的主体的形成和解释也来自他的互动，来自他人对他的看法，以及物质条件和调解因素。感官生态学以及社会语境的另一个重要点是，它们的情绪也来自主体对另一者的债务/信用关系。文学中所回顾的外部概念是主体的组成部分，在我们的理解中呈现得如此原始，以至于人们理解没有人能够单独地把自己构成一个人（BERGER, 2001年）。

我们也可以理解另一方的社会表现和环境的重要性，作为在具有环境适应机制的灵活系统中促进社会互动的一种帮助。主题影响环境，环境影响他，使情绪反应之间的交流和影响表现系统，如（BERGER, 1986年, 第107页）：" (...) 社会位置不仅影响我们的行为，也影响我们的存在，我们是什么。根据这一理解，必须始终考虑到环境礼仪，使主题适应仪式和实体。从坎波斯的观点（2017年），感官的生态学表明，主体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能够在几个象征性的社会系统中运作，并适应它们，而没有绝对或恒定的真理（CAMPOS, 2017年）。对生命不变或科学真理的不要求标志着常识的存在，因为要活着，就不需要对事实进行可理解的版本，而需要对世界及其环境进行最低限度的解释（MARKOVÁ, 2003年）。

环境影响我们的观点与社会心理学的其他思考不相距甚远。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可以采取角色理论，其中主体遵循由他的立场，立场和社会背景定义的脚本。这个角色的交替是社会所接受的，我们并不是说一个人已经腐蚀了他的个性或自我（BERGER, 1986年：伯杰;勒克曼,

1991) .以伯杰本人（2001年）为例，不难想象，在军营内担任上级将军角色的军官期望他奉命向军营敬礼，以示尊重，在军营内采取强硬和粗暴的立场，而与妻子和女儿一起在家的同一个人，可以温顺和和蔼可亲地展示自己，这与军营的理解背道而驰（BERGER, 2001年）。

制服和勋章，使他在一个环境中的突出位置，没有同样的价值，在他自己的家。Axiomas 占上风并形成上下文的逻辑，在此线程中有时是社会表现的形式。

要了解受试者如何看待他周围的问题，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个人，而不认为他是同样围绕对方的问题的组成部分？（伯杰, 1986年：马尔科维, 2003) .我们也可以理解，有时形成思想是为了给某种社会形式赋予工具和合法性。

理解主体与对方的关系是通过沟通途径传播的， Campos (2017) 在感官生态学的权重中指出，交换不仅会通过发件人/接收者的行为进行，而且会通过广泛的通信配置进行，其中接收方能够容纳消息，添加债务或信用的感觉，并返回由其宇宙重塑的信息，即另一个作为消息本身整体代理的愿景（CAMPOS, 2017年）：格拉博夫斯基, 2011;格里泽, 1993) .

基于感官生态学阴谋化假设的另一种思考是其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在变化中会产生共鸣：a)

对话主义，其中给出了话语的方向，即主题的信息是针对某人或某些背景情况的。就

本论文的主题而言，DS将是背景和巴西人，交流的目标，b)

主题可能涉及他的生活背景，并出于某种原因寻求：b)

主题可能涉及他的生活背景，并出于某种原因寻求《问题》：c)

研究交流的表达方式代表自己、他人以及对象或主题：d)

主体出现的预建社会) 物体的构造 (格拉博夫斯基：坎波斯，2014; 格里泽，1996)。

因此，基于改变和自我的问题的理由对于理解个人面对他周围的一切是很重要的。

这一改变的观点将符合社会代表性的概念一致，我们在这里回顾说，这是"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源于日常生活的一套概念、命题和解释。在我们社会中，它们相当于传统社会的神话和信仰体系：它们也可被视为当代版的常识"莫斯科维奇(2000年)：因此，我理解，这一主题的日常信仰体系渗透到他对另一个主题的理解中。这种理论一致性也可以反映在Abrie (2004年，第14页)发展的社会代表的四个功能中，即在通过对变化的理解时，我们将具有：a)

知识的功能，其中对变化的理解将使主体能够引导他了解自己的现实：b)

身份功能，其中受试者可以感知自己，也可以从他想象中的其他人对他或特定主题或目的的看法来看待自己并构成自己。其他两个方面可以与制定Abrie (2004年)一样解释：c)

指导职能，在社会上对一个主体的行为和做法进行传导：d)

证明职能的合理性，允许受试者为所采取的行为和立场辩护。这就是说，从概念上讲，我们在社会表现理论中自负它没有问题，这可能有助于对经验领域的研究。我们辩方认为，在轴1、2、4和5轴上使用改变和自我具有重大价值，我们认为在这种对远程教育的偏见的研究中，有一个相关的收益和良好的贡献。

5.2 关于 EAD 中的消极情绪

关于轴1和5，我们将把它们放在这个解释中，因为两者试图反思研究中的负值的发生率。作为这两个轴中要强调的第一点，我们有几乎所有的负面表示都来自改变。我们对这种现象的理解是，被调查者对"THE"可能没有偏见，主要是因为他们是这种模式的课程候选人。但有一种理解，即社会结社带有偏见，这可能对这些主体的社会交往方式产生影响。可以理解的是，一个人在对方的感知中具有偏见，如软弱、坏、不信任或懒惰：例如，即使你明白你在学习方面有同样的份量，你也会为文凭的起源而感到羞愧。然而，事实上，他利用这种教育形式将取消他在劳动力市场(另一个)

的资格。例如，安讯士5号的数字数据，我们证实，在500人中，45%的人表示了一些负面立场，这使我们不仅反思了研究这一变化的重要性，而且反思了社会对《轴心》的看法。

仍然在消极陈述的关系上，在软弱和坏，我们看到与恐惧和不信任指向 The 的联系。但在表现懒惰，有趣的是，它形容词不是模式，但主题谁参加它，取消资格的人谁需要研究的距离。它提请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不会帮助课程是好的，因为学生自己可以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当被认为是懒惰。此属性可能与弱或仍然坏等表示形式相关联。

文学评论中引用的几位作者以不同的方式验证了在《信息学》中会有负面陈述的想法：例如

， Brauer (2008年) 基于对信息学的抵制，对AEd进行了抵制，当时得到了验证。

摩尔 (2007年) 指出，偏见可能与不适应这种方法的课程的历史有关，并错误地认为距离课程可能比面对面课程更容易。科雷亚和桑托斯 (2009年) 已经给出了诸如"斧头"等词语的提示来描述远程课程，而费雷拉 (2010年) 则表示，偏见将从学院本身开始，并将与教师角色的改变联系起来。桑托斯 (2006年) 引用了经验案例，其中他明白，那些没有执行过《民主教育法》的人可能会有偏见，贝洛尼 (1999年) 认为，偏见甚至可能是正当的，因为它不可能是一种教学民主化的方式，而是一种经济性质的东西，不会适当注意教学质量，并且其起源于福特主义，以及其他几位作者是本文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项研究中发现负面的表述并不新鲜。因此，我们问自己的问题是：阿戈拉对这个主题的贡献是什么，因为已经有一些作者提出了负面的想法。答案很简单。阿戈拉的目标和贡献不是要验证表示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而是要确定与它有联系的人的轮廓，理解每个特征都是通过其观点的自然分组有机地形成的，使每个阿戈拉都呈现不同的特征，正如本研究中实际发生的一样。

在每一个痛苦的这些不同的配置文件中，我们发现变化和自我的差异。例如，关于年龄组，可以观察到，代表懒惰与大学年龄在18至23岁之间的年轻人的关系更为密切，而偏见的年龄范围将更大，从24岁到32岁不等。不信任等其他陈述与33岁以上的人有关。我们不仅在年龄问题上，而且在性别特征上也有差异，例如与38岁左右的男性更相关的无知，他们是家庭风险。

这项研究证实了2016年流行的研究所数据调查，该调查表明，93%的24岁以下的年轻人不希望拥有与远程学习相关的文凭，因为他们担心劳动力市场缺乏认可（流行，2016年）。

关于坎波斯感官生态学的另一个相关点（2017年）是与物质生存条件的非直接联系，但与意识、意志和道德，以及认知和情感结构有关。这可以证实像Conceição（2011年）这样的作者，他们认为今天《论语》的巨大障碍是象征性的和情感性的。考虑到情绪将是人类评估其环境的一种方式（DAMÁSIO, 2004年），我们理解，来自沟通关系（债务）价值观交换的消极情绪可能会影响受试者自己的选择，贬低其他人显然不为社会接受的东西（CAMPOS, 2017年）。我们还了解到，关于轴1和5（1-对负面陈述的分析和对前500个有效答案的分析）的答案是辅助的，以符合研究的第1和第2个问题，因为它们表明，通过分组与意识形态有关的问题，考虑在理解自我和追踪不同概况方面的改变是有效的。

5.3 文学评论

关于轴2-阿戈拉斯的文学评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理解解释上的相似性，研究使用召唤来理解社会代表性，以及桑托斯（2006年），它认为，THE有一个模具和功能的特点，为受试者的日常生活。

我们被分成四组，在这个轴中找到的表示：（1）具有个人属性在痛苦纪律和机会。在机会方面，我们可以强调培训的必要性，在纪律方面，这是获得文凭的一个特点：（2）日常和功能属性在表现方便、难度大、难度大（难）、易（难）、易、灵活、实用、时间等方面：（三）了解主体货币需求的成本、节约等财务属性：（4）互联网等结构属性。鉴于可以适应生活组合的教育需求，THE的工具性视图也可以是进入这种模式的亮点，但理解THE的工具使用将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涉及适应日常生活的需要。鉴于现代社会对技术进步概念的愿望，这一事实被广泛理解。阿尔巴格利，（1999）。从这个意义上说，EAD将直接与这些进步联系在一起（福米加：利托，2009）。

关于结果，可以突出显示一些情况，例如与财务方面有关的陈述，其中可以观察到，费用表示与36至38岁的年龄组关系更密切，是其家庭的主要提供者。现在的经

济更多地与24至26岁左右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他们得到家人的支持。通过与词典关联看到两组不同的配置文件，可以理解分析阿戈拉斯辩护的 neta 论文的重要性。从感官生态学的角度来看（CAMPOS, 2017年），这些表现可以更直接地针对与意志和道德有某种关系的主体存在的物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可能是由于他们的经验而发生的。

无法找到可归因于学习和认知改善的因素，这一事实很有趣地反映出，THE与良好的教育或培训无关，或者显然它与学科的代表性系统无关。在实践中，我们对此的看法是，THE不会寻求获得良好的培训或其教条属性，而是作为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

5.4 亲和力计划

关于轴心3，即建立阿戈拉亲和力计划，目标是利用不止一种社会代表性，在他们之间建立更大的意识形态亲和力。总的说来，阿戈拉斯是与亲和力计划5构成的，其中需要五个巧合的表示来创建它们。因此，我们获得了最大的群体，一个由19个人组成，另一个由27人组成，即：“纪律、组织、动机、积极性、自主性”和“纪律、组织、动机、积极性、好奇心”。

作为一般观察，我们可以评估，如果我们考虑感官的生态学（CAMPOS, 2017年），这些召唤大多具有激励和行为的构成，与意识、意志和道德有着广泛的联系。已经强调的权重之一是，该计划5

agora有19人，与主题谁将有平均27岁，大多数来自马卡市谁没有报酬的活动，由他们的家庭成员支持。本文中发展出的这种方法在文献评论中是找不到的，我们认为也是本研究的一种获取，对我们理解社会心理学和社会表现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这种阿戈拉模型有助于理解部分问题1的研究，我们也考虑了阿戈拉在自然系统中的重要性，在那里受试者可以定位或按其意识形态分组。

5.5 对阿戈拉斯的关系分析

关于轴4，从其表示的角度对改变和自我形成的阿戈拉斯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对构成阿戈拉本身的形成有更多的观察。通过这种做法，我们可以观察改变和自我之间的区别，并在痛苦和表现之间创造一种关系，例如在自我的"机会"中，它聚集了10,000多人，当我们在改变中寻求与此相关的表示时，发现价值将减少到大约6,000人。因此，在实践中，也可以评估，大多数在自我中唤起"机会"的人与改变相同，即显然这一群体受其自身意识形态的牵连。

其他的结果，如"弱"的阿戈拉在改变将有在他们的自我表现有关日常生活作为"时间"，以及个人努力的想法，作为"纪律"和"奉献"。年轻人在自我表述中形成的"互联网"，与向工作人员作为"焦点"的方向和与金融有关的"经济"和学习作为"培训"的方向有关。

这个轴心不是回答研究问题的使命，而是深化阿戈拉的视野。本文中提出的关系分析形式在有关社会表现的文献评论中也没有发现，我们也认为它与研究有关。

5.6 其他观察

我们可以对轴作的其他观察是关于小组使用的词典的问题。正如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使用的关键词表达的召唤，我们主要在人文科学中理解，这些词可能不符合一个情况或思想的数学准确性（CAMPOS, 2017年）。

显然，有越来越多的负面表达或缺乏对《国家信息报告》的全球理解。被调查者在几个答案中使用了诸如"不值得"、"EAD是疯狂的东西"、"甚至我"、"柔软"、"我妈妈不会让"等表达方式。然而，由于这些召唤以更分散的方式出现，考虑到没有使用茎的资源，这些召唤可能导致研究的负面表示的分组减少。即使我们使用过这种仪器，也值得强调应用它的复杂性。这是因为表达可以有几个含义取决于上下文，也就是说，使用的词典可能有一个特定维度的思想或感觉的各种情况，甚至，甚至存在于词汇中来表达的东西。2004年巴西的一个案例说明了这种讨论：当时的教育部长克里斯托瓦姆·布阿克在上任几个月后，在意外辞职之前宣布，他感到"沮丧"，即对救济的失望（TERRA, 2004年）。

无论如何，我们仍然以词的含义来看待词典对计算痛苦的重要性，假设某些术语和表达方式可以被不同的群体使用，这有助于创建分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理解词典也可以在文化中用于理解或解决自然和/或社会环境中的特定问题。因纽特部落

也被称为爱斯基摩人，他们居住在寒冷的北极地区，从阿拉斯加延伸到格陵兰岛，用他们的话来区分不同类型的白色：这将给更多的沟通和生存的机会，然后使冰雪之间的差异，以及各种环境成分（奥利维拉，2015年）。

即使知道语言的语义不仔细分析的存在，我们认为通过词典来解释这些陈述，以掩盖痛苦创造是正当的。毕竟，"导航是准确的，沟通是不准确的"（CAMPOS, 2017）。

6 结论

本文从第一章开始，讨论了《国家经济技术》的历史和定义，以及它在一个大陆层面国家的重要性，也被称为希望技术，一些作者，如尼斯基尔（1999年）。

我们走过这种模式在其历史上遭受的偏见和阻力，与低学术价值的廉价课程有关。这可能具体化了社会与社会之间的象征性障碍，我们讨论了偏见和阻力的过程，在这种障碍中，显然没有根据，因为研究指出，在远处的方式与面对面的方式之间是等价的。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以便更快、更低的成本获得信息。

在第二章中，我们讨论了始于莫斯科维西的社会表现理论，并理解了其定义和历史基础。在同一章中，社会表现在社会中人类进化的交流语境中的重要性，以及创造两个世界，即目标和象征，其中各种概念通过我们的社会，如货币本身作为象征性文物，等等。我们还在社会表现理论（RRT）中，在自我与改变的对话论中，对本论文进行了重要的论述和概念，如马尔科维（2003年）。之后，RRT的结构方法被讨论与使用技术使用召唤，其主要作者之一Abrie（1997年）。接下来，我们介绍了坎波斯感官的生态学（2017年）和互动和沟通功能与Grize（1993年）在这个过程中的贡献，以及在另一个（改变）的讨论中的感情。

在第三章中，我们讨论了支持我们作为基础的阿格拉宪法的方法，将改变和自我划分为收到的答复。在第四章中，我们研究了对结果的分析和对分为五个研究轴的数据的解释：这些轴的目的是观察几个方面的数据，以便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棱镜来理解。即轴1意在理解消极的阿戈拉斯：轴 2, 到痛苦指的是文学评论：和3亲和力计划，其中我们试图巩固阿戈拉斯与多个社会代表性。在轴4中，我们试图建立阿戈拉斯和从改变和自我出发的陈述之间的关系，最后（轴5），我们停止了基于改变和自我的调查，以寻找那些表现出对《反自我》的负面看法的主体。

这使我们反思一些最初的一般结论。一些关于远程学习的负面观点似乎已经得到证实，特别是关于对方的想法（改变），这从陈述、偏见、坏话等方面得到了证明。桑托斯（2006年）等作者已经提出了这种观点，该观点用“我没有看到，不喜欢！”

（桑托斯，2006年，第15页）这些预先判断似乎仍然存在于研究中，因为一些对 THE 有负面陈述的人从未接触过这种模式。

从本文中可以看出，距离模式的偏见问题不仅与它本身有关，而且对学生也有延伸。在社会看来，AD学生有个人过错或处于观望状态。感知是，它可以通过表示懒惰来观察，而懒惰是唯一提到个人特征的。就是说，那些选择远程教育的人会很懒，不想学习或工作。

恐惧、软弱和坏等表现是此次变化中引用最多的，包括在阿戈拉斯以外的全球理解中，当前500名被调查者的答案被阅读时，可以发现大约45%的人与《反恐怖法》有某种负面价值。在实践中，它证实了偏见和问题，由国家，即使在今天几代人。

因此，我们认为，那些制造《战略》的人遭受了无声的痛苦，因为一方面，如果社会在方式上可能存在许多偏见，那么那些需要培训的人也迫切需要和需要这种偏见。值得一提的是，一般来说，这些消极的概念之所以得以实现，是由于他对于对方想法的看法没有改变。

在《国家报告》中，社会表现的消极情绪可能是由于巴西关于其使用的历史造成的。显然，不良的质量占上风，有可能在年龄组，包括年轻群体中找到消极的形态。然而，我们补充说，不可否认的是，与远程学习相关的公司只能靠利润工作，而不必真正担心学术素质（BIELSCHOWSKY，2018年），使EAD作为一种“教学工厂”的福特联系，其独家目标将是教育过程的廉价，而不关心教学质量（MAGGIO，2001年）。

然而，我们不应否认，一个贫穷国家教育成本的降低可以促进这种纳入不太受青睐的阶层，鉴于“成本”和“经济”等表述的召唤指数，这一点在这项研究中甚至非常明显。在高等教育民主化方面，这一方面是一个积极的观点。然而，我们认为，降低入学质量可能是一场闹剧，因为大学的资本是知识，一旦这些科目在没有这种智力获取的情况下形成，他们就会参与一种具有学术戏剧性来证明其文凭正当性的欺骗行为。那些“购买”教育的人无法评估他们获得什么，因为他们不掌握“购买”的主题。即，低质量的营销课程可能是一种智力安慰剂，其用户会认为他们正在采取具有治疗特性的补救措施，包裹在“胶囊”中，里面装满了常规疗法的官方标签。在这一点上，值得强调该领域的专家的监管重要性，以便我们避免这类对整个国家有害的问题（BIELSCHOWSKY，2018年）。

也认为这是社会深渊的一个因素，因为鉴于缺乏监管，更便宜和更坏的课程可以由不太受青睐的层获得，而好的课程则由购买力更高的层获得。

最后，可以观察到，对许多人来说，教育教育将是一条生命线，人们可以坚持接受培训，因为特殊原因不能亲自上大学，或处于生活阶段的人，传统模式会造成并发症。正如本文中预言的几次，我们认为，可以理解为"第二次机会"模型（施利克曼等人，2009年）。

从外国的眼光来看，这似乎是一种贬义的方式来对待这种模式，然而我们相信，对于一大群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生活中的机会，有时不是第二次机会，而是第一次机会，也许是第一次机会，也是唯一机会。这个词应该重定向到类似"第二次机会，非常自豪"的东西，这与研究中出现的"机会"类型的召唤一致，在自我中有更多的召唤，这导致我们强化了这个问题。加强《教育法》作为机会的教导，也可以通过真实性格本身来理解，因为它将被理解为灵活，促进学科的工作、学习和私人生活。

从本文中我们可以推断出的另一点，通过援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是可能具有不同类型的人和群体的关切和需求类型，例如代表便利性与更高级的年龄组相关，即年龄越大，寻求的便利就越多。在复杂的痛苦中，我们与大多数年轻人有联系，大约18岁。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青年虽然与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会认为，缺乏兴趣和主动性，无法从事远离传统面对面模式的研究模式，会使"远程"变得复杂吗？像这样，在搜索中可能会出现其他问题来了解此配置。

关于本研究所探讨的关于《研究》所探讨的消极性，我们也可以说，这种观点在概况上存在差异，这些变化带有细微差别，例如主题的生命时刻，而该主题又负责向良心印刷这种研究方式意义的标记，正如感官生态学所宣布的（CAMPOS, 2017年）。在他的著作《导航是准确、不准确的沟通》中，作者用导航暗示了他的理论。用同样的比喻，我们可以说，在这个论文中，社会表现，心理形象是导航的最后一点，即通过记忆的抽象锚点，可以拯救和理解世界与莫斯科维奇（2000年）带来的改变，自我和对象（EAD）之间的不可分割性。我们还通过痛苦地认识到，关于社会表现，不可能有一个共识点或绝对真理，受试者宇宙的版本源于与外部世界的互动（JOVCH ELOVITCH, 2014年;莫斯科维奇, 2000）。

如果，对于坎波斯（2017年），"沟通是不准确的"，想象一下思考的行为？可以确定多少个变体！因此，毫不奇怪，本研究中提出的许多结果在同一组表示中具有几种解释的可能性，而且随着因特网交流的增加，思想的传播趋势正在增加。"在现代社

会中，社交网络中日益复杂的互动一直是社会心理学的一大挑战（JOVCHELOVITCH，2014年）。

我们认为，格式化，如agoras，其中没有物理领域作为优先事项，但想法，可以帮助理解一些现象在网络空间。

阿戈拉斯可以帮助理解形成受试者逻辑的轴向瘤。通过意识形态识别配置文件的能力是深入了解 AE
和反映每个群体需求的有用工具。我们认为，阿戈拉的价值在于通过带来当前论文的差异化理论方法，以及社会表现领域的重要方法论转换，为代表和社会心理学的新研究服务。从此，我们可以理解意识形态的形成、思维方式和偏见等社会问题。本论文在教育领域的反思中强调了这一具体观点，即歧视问题。然而，我们也明白，本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痛苦"概念也有可能应用于其他领域的讨论，如通信、营销、人力资源、政治和经济，这些领域正朝着 试图理解社会心理主题的方向发展。

